

掌权的布尔什维克

著者：Alexander Rabinowitch

译者：昌明林、lj soviet

目录

整理者前言	2
昌明林译者前言	3
布尔什维克当政：序	4
缩写表	9
第一部：温和派的失败	10
一、 组建政府	10
二、 从造反者到统治者	45
三、 集合力量	69
四、 立宪会议的命运	91
第二部：战还是和？	115
五、 战列宁	115
六、“社会主义祖国在危急中”	136
七、 一份可耻的和约	161

整理者前言

此书是印地安那大学伯明顿分校荣休教授 Alexander Rabinowitch 著作 *The Bolsheviks in Power: The First Year of Soviet Rule in Petrograd* 的汉译版，译者为知乎用户昌明林和 lj soviet。

原书共 15 章，逾 500 页，其中，昌明林翻译了原书的序言、引子以及第 15 章；lj soviet 翻译了原书的第 1 章至第 7 章。余下章节未译。

本书在海外受到一致好评，众人皆以为是研究布尔什维克的杰作，如今有了汉译，于国内读者而言，实乃幸事。惜知乎排版究竟不能与专业的引擎相比，且也无法满足离线阅读的需求，故整理者决定将二人的译文汇编成册，希望对社区有所帮助。

本文件源码俱来源于 Github，如您对排版此文件中所用到的工具感兴趣，或想修改正文字体以满足个人喜好，请见[开源仓库](#)的说明。

整理者对于译文的内容没有贡献。

昌明林译者前言

在今年是十月革命 105 周年。毫无疑问，全世界社会主义者都应该认真研究十月革命这一影响最深远的社会主义革命之一的影响与教训。但是可惜的是在我国，一些社会主义者仍然抱着 50 年前、80 年前甚至是 100 年前的结论不放，对戈尔巴乔夫时期以及苏联解体后解密的资料，以及历史学家依据这些资料重新进行的研究知之甚少。当然，这一遗憾的局面也与本国严厉的限制有关，不能完全归咎于一些社会主义者拥有的某种崇古心态。

《布尔什维克当政——彼得格勒苏维埃统治的第一年》一书通过研究在戈尔巴乔夫时代之前无法获得的史料，对苏维埃政权在彼得格勒的第一年进行了详细的介绍。本书的内容主要有对以加米涅夫为代表的布尔什维克温和派活动的介绍与重新评价、对布列斯特和约造成的严重危机进行了介绍、介绍了彼得格勒面临的无尽的危机以及彼得格勒苏维埃当局的应对、介绍了极富成效且极其重要的布尔什维克-左翼社革党联盟在彼得格勒的活动、介绍了彼得格勒红色恐怖的来龙去脉等等。总的来说，我认为本书极其详尽地为读者描绘出了彼得格勒苏维埃政权的第一年。

据英文维基介绍，本书作者亚历山大·拉比诺维奇是一位美国历史学家。他是印第安纳大学伯明顿分校的历史学名誉教授，从 1968 年到 1999 年在该校任教，并从 2013 年起在俄罗斯科学院圣彼得堡历史研究所担任隶属研究学者。他是国际公认一流的研究布尔什维克、1917 年俄国革命和俄国内战的专家。

目前，我翻译了本书的三个部分，即序言、引子和第 15 章。序言讲述了作者希望通过该书回答的历史问题、作者是如何撰写本书的等等；引子简要介绍了布尔什维克在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这段期间的活动；第 15 章是对本书内容的一个简要总结。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会继续翻译本书，但由于本书的体量比较大，翻译完毕尚需时日，还请各位读者朋友多多包涵。

如果本书以及我之前翻译的《俄国革命的悲剧——1918 年左翼社会革命党的承诺和诺言的违背》能够为填满对十月革命的研究的这片汪洋大海尽到一份小小的贡献，能够为读者朋友们提供有关十月革命的一点新的见解，那就再好不过了。

知友 [lj soviet](#) 告诉我 ta 已经开始了对本书正文部分的翻译工作。虽然译本不嫌多，但是我还是打算不翻译本书剩下的部分了。接下来我会将已经翻译好的部分与各位读者朋友分享，可能会在之后就本书写一篇读后感。如果想阅读本书完整的中译本的读者朋友，欢迎关注 [lj soviet](#)。

本作品采用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相同方式共享 4.0 国际 (CC BY-NC-SA 4.0) 进行许可

布尔什维克当政：序

1917年10月，布尔什维克在俄罗斯掌握政权。他们建立的致力于实现全球共产主义胜利的政权，控制了俄罗斯政治和社会超过75年。可以合理地认为，这一结果比其他任何单一事件对20世纪大部分时间的世界历史的影响都大。

我的大部分专业研究和写作都致力于研究1917年10月的革命及其在彼得格勒（现在的圣彼得堡，帝俄和革命俄国的首都）的直接结果。在我的第一本书《革命的前奏：彼得格勒布尔什维克和七月起义》¹中，我探讨了流产的1917年7月彼得格勒起义的原因、发展和结果，以此来澄清民众对自由主义/温和社会主义临时政府不满的来源，以及（与当代其他政党相比）布尔什维克党的纲领、结构、运作方法和优缺点。在我的下一本书《布尔什维克掌权》²中，我利用《革命的前奏》提供的见解，以更好地理解1917年10月俄国革命的性质、西式民主失败的原因以及列宁和布尔什维克的胜利。最根本的是，我在这两本书中的目标都是研究彼得格勒的事件，以此来回答与布尔什维克和十月革命进程有关的基本问题，而这些问题当时没有得到充分研究。

《布尔什维克掌权》和《革命的前奏》一道挑战了西方的主流观念，即十月革命不过是一小撮由列宁出色地领导的团结的革命狂热分子发动的军事政变。我发现，在1917年，彼得格勒的布尔什维克党将自己转变为一个群众性的政党。而且，它不是一个步调一致地跟在列宁后面的死板的运动，其领导层分为左派、中间派与温和右派，每一派都有助于革命战略和战术的形成。我还发现，该党在1917年2月推翻沙皇的权力斗争中的成功，至关重要的原因是其组织的灵活性、开放性和对民众愿望的热切回应，以及其与工厂工人、彼得格勒卫戍区士兵和波罗的海舰队水兵广泛的、精心培育的联系。我的结论是，彼得格勒的十月革命与其说是一次军事行动，不如说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它植根于大众的政治文化、对二月革命结果的广泛失望，以及在这种情况下，布尔什维克承诺的立刻实现和平、面包、农民的土地和通过多党制苏维埃行使的基层民主所具有的如磁铁一般的吸引力。

然而，这一解读提出的问题和它所回答的问题一样多。因为如果布尔什维克党在1917年的成功至少部分归功于其开放的、相对民主的、分权的特征和运作方式，这一点似乎是明确的，那么如何解释它如此迅速地转变为现代历史上最高度集中、最独裁的政治组织之一？此外，如果苏维埃在1917年是真正民主的，处在萌芽期的人民自治组织（我的研究表明了这一点），苏维埃和其他群众组织的独立性怎么会如此迅速地被摧毁？也许最根本的是，带头颠覆临时政府并促成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的许多不满的彼得格勒下层公民，如果他们的目标是建立一个平等的社会和一个民主社会主义的多党政治制度，如果这个目标是许多杰出的布尔什维

¹Prelude to Revolution: The Petrograd Bolsheviks and the July Uprising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68). 中译本将所有正文及引文中所列出的参考资料的作者与资料源语言名列出，以便有需要的读者查阅。——译者

²The Bolsheviks Come to Power (1976).

维克所共有的（我的研究也表明了这一点），人们如何解释这些理想被颠覆和布尔什维克的独裁主义变得根深蒂固的惊人速度？

这些是本书中提出的关键问题。我花了特别长的时间来完成这本书，讽刺的是，部分原因是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开展的文化自由化。20世纪80年代初，我在前往列宁格勒和莫斯科的图书馆时就已经完成了相关的研究。早在戈尔巴乔夫和1991年苏联解体之前，我就已经开始起草主要章节。然而，我对结果不满意，特别是有关1918年上半年大部分非布尔什维克报刊被关闭后的时期，这消除了我的一个主要资料来源。即使是我研究1917年工作至关重要的1918年关于事件、机构、社会团体以及政治人物和政党，特别是彼得格勒的布尔什维克党组织的有限种类的公开文件也无法获得。因此，为了完成这本书，我需要查阅苏联政府和共产党的档案，而这些档案当时仍是严格保密的。

1989年，《布尔什维克掌权》成为在苏联出版的第一本西方的革命研究报告，这是对我的第一个强烈暗示，暗示戈尔巴乔夫治下的自由化将对作为研究俄国革命和最早期苏联时期的西方历史学家的我将会产生的巨大变化。我记得在莫斯科进步出版社的一个礼堂里介绍这本书的时刻，这是我一生中最满意的事情之一。尽管如此，即使在该书在苏联出版后，像我这样的“资产阶级造假者”很快就有机会在苏联历史档案馆工作的可能性似乎仍然很渺茫。

这种情况在1991年6月发生了突变，当时我去了俄罗斯，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图书馆做一些补充研究。在苏联同事的支持下，我申请在莫斯科，晚些时候在列宁格勒的政府和共产党档案馆工作。令我非常惊讶的是这些申请都被批准了。虽然马上就得知我最感兴趣的一些材料仍然是保密的，但我潜在的资料来源现在已经增加到不可估量的程度。此外，在1993年，当我第一次被允许在前克格勃档案馆工作时，以及在20世纪90年代的剩余时间里，随着越来越多的文件被逐渐解密时，资料来源甚至变得更多。这是积极的一面。消极的一面是，实际情势要求我不得不重新开始我的研究。

本书末尾有一份本作品所依据的资料索引。³我可以获得的与彼得格勒苏维埃政权第一年有关的重要的未发表资料包括布尔什维克彼得格勒委员会1918年的会议记录以及党的其他全市性会议记录；布尔什维克各区委员会的会议记录；人民委员会的会议记录；彼得格勒苏维埃及其领导机构重要会议的速记记录；彼得格勒各区苏维埃的会议记录；内部备忘录；通信；未发表的回忆录；其他政党和政府、行政与市政机构的大量记录；以及这一时期布尔什维克主要领导人的个人档案。此外，我还查阅了全俄罗斯肃清反革命、投机倒把和怠工特别委员会（全俄契卡）在这一时期的一些（尽管绝非全部）相关案件档案，以及地方侦察机构的档案。对我来说，同样具有重大价值的是过去15年里在俄罗斯出版的有关革命时期和革命后不久的布尔什维克党以外的政治组织经过精心注释的、全面的、曾经保密的历史记录集。

³ 中译本略去资料索引。读者如有需要，可查阅本书原文。——译者

综合来看，这些新近可用的资料使我有可能首次研究布尔什维克在彼得格勒从上到下的内部辩论和决策，党和政府机构的发展及其在各个层面的关系，以及苏维埃政权第一年中民众政治观点的演变。基于这种分析，我试图重建肇端于彼得格勒十月革命后深刻的政治、经济、社会和军事危机的，高压的、极端专制的苏联政治制度的最初发展动态。我希望无论多么不完美，这种重建都能为早期苏联历史的核心历史编纂学问题之一提供有用的、新的见解，即在塑造苏维埃俄国的高度集中的独裁政治制度中，变化的环境与对它们的反应的相对重要性，而不是事先形成的布尔什维克革命意识形态或牢固确立的独裁行为模式。

《布尔什维克当政》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涵盖了从十月革命到 1918 年 1 月立宪会议解散的时期。在此期间，彼得格勒布尔什维克在彼得格勒巩固了权力，且列宁成功地扼杀了布尔什维克的温和派，他们对国外社会主义革命早日到来的前景持怀疑态度，并期盼于一个对社会主义友好的立宪会议来推动俄国的革命。第二部分的核心重点是关于《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的激烈争论的过程和影响，该和约是与德国单独达成的和平，于 1918 年 1 月在彼得格勒大多数最重要的布尔什维克和列宁之间开始，并在次年 3 月随着德国军队推进到彼得格勒的大门口、苏维埃政府狂乱地逃往莫斯科以及和约的批准而结束。第三部分探讨了 1918 年春季和初夏期间彼得格勒灾难性的内部和军事危机，工人对这些危机的反应，以及这些危机如何塑造了布尔什维克在当时已经是俄罗斯的“第二城市”的统治方法。这一部分最后考察了布尔什维克-左翼社革党联盟在西北地区的瓦解以及 7 月初转向一党统治的情况。第四部分主要关注 1918 年 7-8 月的彼得格勒布尔什维克及其政治发展，导致在秋季大规模“红色恐怖”的宣布，以及恐怖在彼得格勒的动态和影响。第四部分的最后一章重点介绍了在彼得格勒举行的纪念十月革命一周年的盛大庆典的组织和举办情况。庆祝活动被作为评估彼得格勒布尔什维克的状况，展现革命希望和自我认同，以及彼得格勒政府变化的结构的手段。彼得格勒政府经过 12 个月的绝望斗争，直到预想的、决定性的社会主义革命在西方爆发，才得以保住权力。在整本书中，我把重点放在特定的事件和时间点上，这些事件和时间点提供了特别有启发性的见解，回答了关于十月革命后布尔什维克党和苏维埃性质变化的核心的、仍然令人困惑的问题，以及解释了革命的最初目标和早期结果之间的差距。

—

本书采用的音译系统是美国国会图书馆使用的系统，但在一些情况下进行了一些简化，例如知名专有名词（例如，Trotsky，而不是 Trotskii）。⁴

1918 年 2 月 1 日，俄罗斯从儒略历切换为西方的格里高利历，当时的格里高利历比前者早 13 天。除非另有说明，文中的所有日期都符合俄罗斯当时使用的历法。

⁴ 中译本使用《世界人名翻译大辞典》（修订版）（新华通讯社译名室编，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 2007 年版）翻译人名。——译者

在我为这本书工作的这么多年里，有如此多的人和机构为我的工作提供了帮助，使得我不可能向他们一一表示感谢。如果没有约翰·西蒙·古根海姆纪念基金会、约翰·D·与凯瑟琳·T·麦克阿瑟基金会、国际研究和交流委员会、全国欧亚和东欧研究委员会、美国学术团体委员会、哥伦比亚大学哈里曼研究所、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以及印第安纳大学国际项目办公室、俄罗斯东欧研究所以及研究分管副校长办公室的慷慨支持，我的工作就无法完成。

我也非常感谢胡佛研究所、纽约公共图书馆、国会图书馆、印第安纳大学图书馆、伦敦国家图书馆、楠泰尔国际当代文献图书馆、莫斯科与圣彼得堡俄罗斯国家图书馆、莫斯科俄罗斯国家公共历史图书馆、莫斯科俄罗斯科学院社会科学情报研究所、圣彼得堡俄罗斯科学院图书馆、圣彼得堡俄罗斯国家政治历史博物馆、英国国家档案馆、公共记录办公室、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俄罗斯国家社会和政治历史档案馆、圣彼得堡中央国家档案馆、圣彼得堡中央国家历史政治文献档案馆、维堡列宁格勒州档案馆、圣彼得堡中央国家海军档案馆、莫斯科俄罗斯联邦安全局档案管理部门、以及圣彼得堡与列宁格勒州联邦安全局档案管理部门的全体职工。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我的研究和写作极大地受益于与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的历史学家的互动，特别是亨利希·约费、米哈伊尔·伊罗什尼科夫、维克托·米勒、阿尔贝特·涅纳罗科夫、根纳季·索博列夫、维塔利·斯塔尔采夫、帕维尔·沃洛布耶夫和奥列格·兹纳缅斯基。自苏联解体以来，西方和俄罗斯学者之间的接触已经正常化。和其他人一样，我从这一可喜的发展中受益。从我在列宁格勒（共产党）档案馆（现为圣彼得堡中央国家历史和政治文献档案馆）工作的第一天开始，高级研究员兼档案员伊琳娜·伊尔玛罗芙娜·萨佐诺娃和高级研究员兼首席档案专家泰莎·帕夫洛夫娜·邦达列夫斯卡娅就悉心照顾我，与我分享他们丰富的知识，并以无数其他方式帮助我的研究。泰莎·帕夫洛夫娜的主要学术兴趣与我不谋而合，她今天仍像当初一样宽厚地对待我。俄罗斯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彼得堡分所有幸拥有一批杰出的历史学家，他们的兴趣也与我重合。在该研究所，我特别感谢鲍里斯·阿纳尼奇、塔玛拉·阿布罗西莫娃、弗拉基米尔·切尔尼雅耶夫、拉斐尔·加涅林、鲍里斯·科洛尼茨基、谢尔盖·波托洛夫和尼古拉·斯米尔诺夫，感谢他们的鼓励、学术见解和友谊。此外，还特别感谢芭芭拉·艾伦、斯坦尼斯拉夫·贝尔内夫、理查德·比德拉克、娜杰日达·切列皮尼娜、谢尔盖·切尔诺夫、芭芭拉·埃文斯·克莱门茨、皮特·格拉特、利奥波德·海姆森、弗拉德连·伊兹莫齐克、亚历山大·卡尔梅科夫、斯韦特兰娜·科列涅娃、阿纳托利·克劳什金、卡罗尔·利德纳姆、谢尔盖·列昂诺夫、雅罗斯拉夫·列昂季耶夫、摩西·莱温、阿列克谢·利特温、尼基塔·洛马金、弗拉德连·洛吉诺夫、安德烈娅·林恩、迈克尔·梅兰孔、拉里莎·马拉申科、弗拉基米尔·瑙莫夫、奥列格·瑙莫夫、迈克拉·波尔、托伊沃·劳恩、阿纳托利·拉兹贡、拉里莎·罗戈瓦亚、乔纳森·桑德斯、理查德·斯宾塞、米哈伊尔·什克利亚罗夫斯基、斯坦尼斯拉夫·秋秋金、菲尔·托马塞利和雷克斯·韦德，感谢他们的建议和帮助。多年来，我在印第安纳大学历史系的学生一直是我灵感的不竭源泉，我也深深地感谢他们。让

我补充一下，玛丽·麦考利的开创性研究《面包与正义：1917-1922年彼得格勒的政府与社会》⁵，帮助我更好地理解我的工作所处的更广泛的背景。唐纳德·J·罗利的《经历俄罗斯内战：萨拉托夫的政治、社会和革命文化，1917-1922》⁶、彼得·霍尔奎斯特的《制造战争，锻造革命：俄国的连续危机，1914-1921》⁷、以及理查德·萨克瓦的《苏维埃共产党人当政：对内战期间莫斯科的研究，1918-1921》⁸也是如此。V·A·希什金编辑的丰富的后苏联论文集《时代之交的彼得格勒：革命和内战期间的城市及其居民》⁹，为我提供了来自当代彼得堡历史学家的刺激性见解，我对此特别感兴趣。

感谢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的工作人员，感谢他们在编辑和制作我的书时的周到和高效。最后但绝对同样重要的是，如果没有我妻子珍妮特的不断支持、鼓励和一贯合理的建议，这本书就不会得以完成。她接连不断地阅读了每一章的草稿，并提出了改进建议，这些建议对修改这些草稿非常有价值。当然，只有我一个人对仍然存在的不足之处负责。

⁵Mary McAuley, *Bread and Justice: State and Society in Petrograd, 1917–1922*.

⁶Donald J. Raleigh, *Experiencing Russia’s Civil War: Politics, Society, and Revolutionary Culture in Saratov, 1917–1922*.

⁷Peter Holquist, *Making War, Forging Revolution: Russia’s Continuum of Crisis, 1914–1921*.

⁸Richard Sakwa, *Soviet Communists in Power: A Study of Moscow during the Civil War, 1918–1921*.

⁹В.А. Шишкин, *Петроград на переломе эпох : Город и его жители в годы революции и гражданской войны*.

缩写表

中译本根据实际需求重新进行缩写，与原书中的缩写并不一致。——译者

- 北方州经济委员会：北方州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
- 北方州委：布尔什维克北方州委员会；
- 彼得格勒契卡：彼得格勒肃清反革命、投机倒把和怠工特别委员会；
- 彼得格勒公社：彼得格勒劳工公社；
- 彼得格勒委员会：彼得格勒劳工公社委员会；
- 护宪联盟：全俄罗斯
- 保护立宪会议联盟；
- 经济委员会：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
- 救国委员会：全俄罗斯拯救祖国与革命委员会；
- 军革委：彼得格勒苏维埃军事革命委员会；
- 立宪会议委员会：立宪会议成员委员会；
- 全俄契卡：全俄罗斯肃清反革命、投机倒把和怠工特别委员会；
- 全俄中执委：全俄罗斯工兵代表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于全俄农民代表苏维埃特别代表大会决定与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合并前) /全俄罗斯工兵农代表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于合并后)；
- 社革党：社会革命党；
- 社革党左派：社会革命党左派(于1917年11月左翼社会革命党第一届代表大会前，该大会宣告了左翼社革党的正式成立，标志着社革党左派与社会革命党的正式决裂)；
- 特别厂代会：彼得格勒工厂代表特别会议；¹⁰
- 铁路工会执委会：全俄罗斯铁路工人联合会执行委员会；
- 左翼社革党：左翼社会革命党(于左翼社革党第一届代表大会后)。

¹⁰此处的“工厂”，在英文中是factory和plant，在俄文中是фабрика和 завод。 завод特指重工业工厂，фабрика指除了重工业工厂以外的工厂。中译本将其统一翻译为“工厂”。——译者

第一部：温和派的失败

一、组建政府

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开幕会议上的严重挫折，并不能阻止布尔什维克温和派（和其他左翼社会主义团体的人）在苏维埃代表大会期间及随后，努力组建一个清一色社会主义多党政府。其间，他们试图恢复旨在建立广泛的社会主义联盟的运动——在列宁的领导下，恰于苏维埃代表大会开幕前，用暴力推翻了临时政府，这一运动因而遭到严重破坏。事败之际，他们又奋力斗争，以确保由代表大会最终批准的清一色布尔什维克内阁——人民委员会（Совнарком）——严格地向多党的中央执行委员会¹¹负责。

* * *

25日夜至26日凌晨举行的混乱的代表大会开幕会议，在认可政权转交苏维埃之后便告休会，没有对新政府做出规定。一时间，俄国实际上没有中央政府在运作。10月24日，在推翻临时政府前的最后一次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会议上，加米涅夫和扬·别尔津¹²被指派与左翼社革党进行有关后者参加苏维埃政府的谈判。¹³次日，又就与布尔什维克结盟问题，打探了左翼社革党领导人的口风。¹⁴留在还是退出代表大会，以及是否加入新政府，成了10月26日左翼社革党团会议讨论的主要议题。尽管对已密切共事数周的布尔什维克抱有好感，但左翼社革党团成员仍然相信这条原则：要使革命继续下去，就必须组建一个广泛的、各苏维埃政党按其在苏维埃代表大会中的代表比例参加的联合政府。为促成这一结果，他们一方面坚称，与布尔什维克和革命群众保持联系是重要的，另一方面又拒绝与布尔什维克共组政府。¹⁵26日傍晚，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与左翼社革党领导人举行

¹¹指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Всероссийский Центральный Исполнительный Комитет，简称 ВЦИК，拉丁字母转写 VTsIK）。第二届全俄中执委的委员和候补委员分别来自布尔什维克（62名委员，29名候补委员）、左翼社会革命党（30名委员，5名候补委员）、统一社会民主党人-国际派（6名委员）、乌克兰社会党（3名委员）和社会革命党-最高纲领派（1名委员），故称“多党”。——译者注

¹²扬·卡尔洛维奇·别尔津（Ян Карлович Берзин，1889-1938），拉脱维亚人，1905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7年俄国革命后加入布尔什维克，当年底加入契卡，此后长期领导苏维埃军队的政治、情报和肃反工作，曾参加援助西班牙内战，1938年死于大清洗，1956年平反。——译者注

¹³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会议记录，1917年8月—1918年2月》（Протоколы центрального комитета РСДРП (б), август 1917–февраль 1918），莫斯科，1958年，第120页。

¹⁴阿·伊·拉兹贡（Анатолий Израилевич Разгон）：《被遗忘的名字》（Забытые имена），《第一届苏维埃政府》（Первое Советское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о），莫斯科，1991年，第455页。

¹⁵《劳动旗帜报》，1917年10月27日，第4页。另参见谢·姆斯季拉夫斯基（Сергей Дмитриевич Мстиславский Sergei Mstislavskii），《改变俄国的五天》（Five Days Which Transformed Russia，即 Пять Дней. Начало и конец Февраль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 一书的英译.），布卢明顿，1988年，第130页。

会谈。其间，左翼社革党表示，除非建立一个成分广泛的社会主义联盟，否则拒绝入阁。¹⁶

在与左翼社革党组建政府的努力失败后，加米涅夫最终于10月26日夜9点召开了苏维埃代表大会的第二次会议。他在一片赞同声中，宣布主席团已按照代表大会的决议，签署了如下命令：在前线废除死刑，释放因政治罪入狱的士兵；释放被前政府监禁的土地和农民委员会成员；逮捕克伦斯基。授权实施上述措施的例行法令被欢呼通过。¹⁷

当晚的首要议程是政府问题，但由于左翼社革党方面抵制与布尔什维克单独结盟，这一问题的解决变得复杂起来。显然，为了在讨论组成问题之前先确定苏维埃政府的纲领，重新调整了议程。列宁走上讲台，向“一切交战国的人民及其政府”发表了一份和平宣言¹⁸。这是列宁首次在代表大会上露面。所有资料都显示，他获得了一阵雷鸣般的掌声。在爆发的掌声的时而打断之下，他的宣言发誓结束秘密外交，建议一切交战国人民及其政府立即休战，并开始就缔结公正民主的和约进行谈判。这份宣言还为世界各地被统治的民族（无论其何时被更大的国家吞并）提供了自决权的理据。¹⁹在晚些时候的演讲中，托洛茨基指出，这份宣言首先面向的是全世界革命群众。“我们当然不打算以自己的呼吁来影响帝国主义政府，但只要它们还存在，我们就不能忽视它们，”他说道，“我们的全部希望寄托在我们的革命能够引发欧洲革命之上。如果欧洲人民的起义不能粉碎帝国主义，那我们就将被粉碎。”²⁰

在和平宣言和接踵而至的讨论中，列宁全力强调，“10月24-25日的革命”而非苏维埃代表大会是苏维埃政府的合法性来源。这会成为他此后的主要话题之一。此外，与神话般的十月武装起义的联系成了布尔什维克身份认同的核心。列宁还强调，和苏维埃代表大会的一切法令一样，和平宣言是“临时的”，有待立宪会议的批准。可在代表大会之后，对其纲领支持与否，却成了各政治团体和机构（包括立宪会议）可否被接纳的评判标准。和平宣言包含的方方面面是极左翼多年来

¹⁶阿·伊·拉兹贡，《政府阵营》(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енный блок)，载《历史札记》(Исторические записки)，第117卷，1989年，第108页。另参见赖·马·萨维茨卡娅(Раиса Малаховна Савицкая)《弗·伊·列宁在筹备和召开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期间活动的材料》(Источники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В. И. Ленина по подготовке и проведению II всероссийского съезда советов)，载《伟大十月：历史、历史编纂学、史料学》(Великий Октябрь: история, историография, источниковедение)，莫斯科，1978年，第263页；波克罗夫斯基、雅科夫列夫：《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第26、83页。至于卡姆科夫事后对拒绝原因的解释，见《左翼社会革命党(国际派)第一次代表大会记录》(Протоколы первого съезда партии левых социалистов-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ов(интернационалистов)，彼得格勒，1918年，第43页。

¹⁷波克罗夫斯基、雅科夫列夫：《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第13、56-57页。

¹⁸即《和平法令》——译者注

¹⁹波克罗夫斯基、雅科夫列夫：《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第15-16、59-62页。

²⁰波克罗夫斯基、雅科夫列夫：《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第29、86-87页。(参见托洛茨基：《在第二届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上的三次讲话·关于组织政权》，载《托洛茨基亲述十月革命》，施用勤译，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374页。为忠实于拉宾诺维奇的英译文，此处中译文在施用勤译文的基础上，略作了调整。施用勤的译文是忠实于俄文原文的。——译者注)

的头号主张。因此，它得到全票通过是不足为奇的。在进入下一议题前，集会的代表又给了列宁一阵响亮的掌声，并唱起社会主义的世界圣歌《国际歌》。²¹

列宁随后提交了一项有关土地改革的法令。这项法令将废除土地私有制，将一切私人和教会土地转交给土地委员会和农民代表苏维埃，由后者根据需要分配给个体农民。这一法令违背了布尔什维克长期主张的公有土地纲领的基本原则，实际上是模仿广受欢迎的社会革命党土地纲领而拟定的。在几名代表指出这一点后，列宁回复道：“就让它这样吧。……我们既是民主政府，就不能漠视群众的感受，即使我们并不同意他们。”²²经左翼社革党人于会议间隙审议之后，这项法令不经讨论，便以压倒性多数通过。²³

直到 10 月 27 日将近凌晨 2 点半的时候，代表大会才终于开始考虑新一届中央政府的架构和组成。加米涅夫负责阐述列宁的看法。他曾领衔反对布尔什维克单方面夺取政权，并仍然坚定地致力于建立理论和实践意义上的广泛的社会主义联盟。²⁴列宁的看法体现于一项附有清一色布尔什维克“临时”政府组成名单的简短法令当中。根据这项法令，将由代表大会建立的工农政府——人民委员会将只运行到立宪会议召开时为止。政府的各主要部门或称“人民委员部”将由一个理事会领导。各会议主席和政府首脑组成为人民委员会。它与群众组织密切合作，并保证执行苏维埃代表大会的纲领。监督人民委员会以及撤换委员的权力属于将由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新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加米涅夫最后宣读了清一色布尔什维克的人民委员提名名单。名单中，列宁担任首脑，托洛茨基为负责对外事务的人民委员。引人注意的是，名单中没有列宁早年最亲密的战友之一——季诺维也夫。²⁵

加米涅夫宣读完毕后，鲍里斯·阿维洛夫²⁶代表统一社会民主党人-国际派和一群尚未退出代表大会的孟什维克国际派，对于立即组建清一色布尔什维克政府，发表了一通极富预见性的、与相当一部分布尔什维克代表（包括近半数被提

²¹波克罗夫斯基、雅科夫列夫：《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第 15-21、59-68 页。

²²列宁：《关于土地问题的报告》，《列宁全集》第 33 卷，中央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年，第 20 页。为忠实于拉宾诺维奇的英译文，这里的译文在编译局译文的基础上，略作了调整。——译者注

²³波克罗夫斯基、雅科夫列夫：《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第 21-25、69-77 页。

²⁴列宁：《全集》，第 35 卷，第 28-29 页。（参见列宁：《关于成立工农政府的决定》，《列宁全集》第 33 卷，中央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年，第 22-23 页。——译者注）

²⁵除列宁与托洛茨基之外，被提名在政府中任职的还有：阿列克谢·李可夫，内务；伊万·泰奥多罗维奇，食品供应；弗拉基米尔·米柳亭，农业；亚历山大·施略普尼柯夫，劳动；弗拉基米尔·安东诺夫·奥弗申柯、尼古拉·克雷连柯和帕维尔·德宾科，陆海军；维克托·诺金，商业与工业；阿纳托利·卢那察尔斯基，教育；伊万·斯克沃尔佐夫-斯捷潘诺夫，财政；格里戈里·洛莫夫，司法；尼古拉·阿维洛夫，邮政与电报；以及约瑟夫·斯大林，民族事务。

²⁶鲍里斯·瓦西里耶维奇·阿维洛夫（Борис Васильевич Аヴィлов，1874-1938），1893 年参加革命，1897 年参加社会民主主义团体，1905 年成为布尔什维克，1905 年革命时组织了哈尔科夫的武装起义，1912 年加入布尔什维克的地下组织，二月革命后退出布尔什维克，加入新生活派，参与建立了统一社会民主党人-国际派。立宪会议解散后，逐渐退出政治生活，此后从事经济工作。1938 年死于大清洗，1958 年平反。——译者注

名的内阁阁员）看法相同的反驳意见。阿维洛夫极为怀疑清一色布尔什维克政府有能力缓解食品供应短缺。由于得不到盟国政府的承认，再加上欧洲工农依然不会在短期内举行决定性的起义，这样的政府不能带来和平。因此，要么同盟国与协约国之间以俄国为代价而达成和约，要么俄国被迫接受单独与德国达成苛刻的和约。阿维洛夫提出决议，呼吁推迟批准布尔什维克政府，并代之以一个临时执行委员会，由后者以参加苏维埃代表大会的各革命民主派团体（包括那些离开了会场的团体）的协议为基础，组建政府。²⁷但这项决议未得通过。

阿维洛夫强调创建一个代表全体革命民主派的政府，这样的立场与左翼社革党以及布尔什维克温和派相近。左翼社革党领导人弗拉基米尔·卡列林²⁸随后起而宣称“形势要求创建一个清一色民主派政府”，并且“如果没有离开大会的党派的支持，清一色[社会主义]政府将不可能推行它的政策”。同时就昨天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出走的责难，他为布尔什维克做了开脱，并宣称：“整个革命的命运[如今]不可避免地与他们的[布尔什维克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他们的毁灭将意味着革命的毁灭。”虽然如此，他仍然批评布尔什维克：组建一个“既成的政府”而非临时委员会来试图解决刻不容缓的关键问题；做出对其他革命-民主党派（包括左翼社革党）的不友好举动；侵犯言论自由。此外，他还阐述了左翼社革党长期以来的原则：任何新的中央执行机构都应隶属于多党的中执委，并严格地向后者负责。²⁹

由于仍在主持会议的加米涅夫同情阿维洛夫和卡列林的看法，托洛茨基被叫来为立即任命清一色布尔什维克政府做辩护。后者如今是一种现实的可能性，而托洛茨基并不比列宁更愿意失掉机会。对于阿维洛夫坚称只有基础广泛的联盟才能克服俄国日益加深的危机，托洛茨基予以驳斥。他宣称，跟费奥多尔·唐恩³⁰和米哈伊尔·李伯尔³¹（两人都是杰出的孟什维克）这样的人物结盟绝不会壮大革命的力量，反而必然造成革命的垮台。托洛茨基以类似的话驳斥了卡列林。他警告称，如果试图挑战与贫农团结一致的布尔什维克，那么左翼社革党会失去群众的支持，并被贫农孤立。此外，他宣称布尔什维克已经公开“举起了起义的旗帜”，并通过将 10 月 24-25 日采取军事行动的责任推给克伦斯基，抹除了布尔什维克抢占苏维埃代表大会先机的指控。他将离开代表大会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打

²⁷ 波克罗夫斯基、雅科夫列夫：《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第 25、80-82 页。

²⁸ 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卡列林（Владимир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Карелин，1891-1938），左翼社会革命党领导人，1907 年参加社会革命党，二月革命后成为社会革命党在哈尔科夫的领导人之一。1917 年 7 月任哈尔科夫市杜马主席，11 月当选左翼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12 月任国家财产人民委员，并兼任司法人民委员部的工作。1918 年参与组织了左翼社会革命党暴动。1919 年被捕，释放后放弃反布尔什维克立场。余生从事法律工作，1938 年死于大清洗。——译者注

²⁹ 波克罗夫斯基、雅科夫列夫：《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第 25-26、82-83 页。

³⁰ 费尔奥多·伊里奇·唐恩（Фёдор Ильич Дан，1871-1947），原名古尔维奇（Гурвич），孟什维克领袖，斯托雷平反动时期为取消派，一战后为护国派，1922 年流亡国外，后在美国去世。——译者注

³¹ 米哈伊尔·伊萨科维奇·李伯尔（Михаил Isaакович Либер，1880-1937），原名戈利杰曼（Гольдман），孟什维克护国派和崩得领导人，1897 年加入崩得，1906 年随崩得加入孟什维克，斯托雷平反动时期为取消派，一战爆发初期为温和国际派，二月革命后转为革命护国派，此后积极支持克伦斯基政府，1937 年死于大清洗。——译者注

成“我们永不会和他们走在一起的革命叛徒”，声称对任何有意帮助执行代表大会纲领、愿意始终与布尔什维克站在街垒同一边的团体，表示欢迎。³²

托洛茨基讲完后，一位来自全俄铁路工会执行委员会（Викжель）³³的代表提出宣读一份电报。这份电报坚决反对“任何党派独自夺取政权”，并强烈支持建立一个对“整个革命民主派”负责的“革命社会主义”政府。这份电报声明，全铁工执委有意控制整个俄国铁路网，直到成立这样的政府。全铁工执委的代表甚至进一步威胁布尔什维克，明确表示，在苏维埃新老领导层之间的斗争中，全铁工执委会支持老领导层。³⁴他结束讲话后，两名基层铁路工人质疑全铁工执委有权干涉全国政治，其中一人斩钉截铁地宣称，全铁工执委是一具“再也无法代表其成员态度的政治僵尸”³⁵。列宁有关任命清一色布尔什维克政府的法令轻松过关，而阿维洛夫的动议在 600 余票中，仅得到 150 余票的支持。³⁶但是，政府如不扩大自身的广泛性则有可能出现灾难性的铁路停运，这样的威胁给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的闭幕时刻带来了不详的阴云。

在选出了由 62 名布尔什维克、29 名左翼社革党、6 名统一社会民主党人-国际派、3 名乌克兰社会党和 1 名社会革命党-最高纲领派组成的新一届中执委之后，代表大会同意，这个由加米涅夫领导的机构可以吸收农民苏维埃、军队组织和昨日出走的团体的代表，从而扩大自己的规模。³⁷农民苏维埃的代表能够进入中执委，对于政府增加自身的广泛性而言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农村的大部分苏维埃仍然受控于社会革命党。随后，历史性的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闭幕。

* * *

随着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于 10 月 27 日晨闭幕，来自全国各地的代表离开了斯莫尔尼宫。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包括布尔什维克温和派）预料，一旦头脑冷静下来，人民委员会就会根据布尔什维克在十月前的政治纲领进行重组，成为一个反映着苏维埃代表大会开幕时各党派和团体力量对比的清一色社会主义多

³²波克罗夫斯基、雅科夫列夫：《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第 26-30、83-87 页。

³³全俄铁路工会执行委员会（Всероссийский исполнительный комитет железнодорожного профсоюза）是全俄铁路工会的中央管理机关，于 1917 年公历 7 月 28 日由莫斯科举行的全俄铁路员工第一次代表大会选举产生。该执委会由 40 名委员组成，其中社会革命党 14 人、孟什维克 6 人、布尔什维克 3 人，右翼占多数。科尔尼洛夫事件时，在全铁工执委的指示下，俄国铁路工人阻止了军队的运输和集结，为粉碎科氏的政变企图做出了巨大贡献。十月革命后，该执委会不支持布尔什维克政权，并将铁路管理权据为己有。在试图斡旋各社会主义党派就政权问题展开磋商失败后，全铁工执委以保留对铁路的管理权为条件，承认苏维埃政权。1917 年 12 月 25 日，在彼得格勒和莫斯科铁路枢纽站工会的发起下，召开了全俄铁路工人与工长特别代表大会。这次布尔什维克占优势的大会通过了对全铁工执委的不信任案。1918 年 1 月 18 日至 2 月 12 日举行的全俄铁路紧急代表大会宣布解散全铁工执委，代之以布尔什维克占多数的全俄铁路员工执行委员会（Викжедор）。此后不久，人民委员会从全俄铁路员工执委会手中收回了对全俄铁路的管理权。——译者注

³⁴波克罗夫斯基、雅科夫列夫：《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第 30、87-89 页。

³⁵波克罗夫斯基、雅科夫列夫：《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第 30-31、89-90 页。

³⁶苏汉诺夫：《革命札记》，第 3 卷，第 361 页。

³⁷波克罗夫斯基、雅科夫列夫：《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第 90-92 页。

党联合政府。他们认为，只有这种得到苏维埃支持的、基础广泛的中央政权，才能够避免经济灾难、抵御反革命，并避免全面内战。但列宁和托洛茨基并不这么认为。他们现在最关心的是，维护自己的行动自由，以使俄国的暴力社会动乱尽可能地刺激外国革命工人。

大部分代表离开斯莫尔尼宫时，还带着这样的印象：正如代表大会有关新临时政府的架构的法令所示，临时政府会向中执委负责，而后者已经包括了左翼社会革命党人、统一社会民主党人-国际派、乌克兰社会党人和社革党最高纲领派（一个从社革党中分裂出来的激进小团体）的代表，并且还会吸收所有其他苏维埃团体（包括那些或者离开了代表大会或者在会上未得到充分代表的团体）加入。无论如何，建立人民委员会的法令似乎使这一点确定无疑，即人民委员会不久就会将自己的权威让给资产阶级已经靠边站了的立宪会议，而后者会批准代表们自觉已经采取的初步措施，并以此为基础走向光明的未来。托洛茨基证实，在苏维埃代表大会之后的起初几小时里，列宁有意推迟立宪会议的选举，以待其组织得更利于极左翼。³⁸但大部分党的领导人，因为要么像加米涅夫那样拒斥列宁的理论观点和战略，要么像雅科夫·斯维尔德洛夫那样，唯恐违背十月前的承诺、扰乱选举会引起广泛的抗议，坚持兑现他们关于立宪会议的诺言。因此在 10 月 27 日，列宁签署法令，确定 11 月 12-14 日举行选举，11 月 28 日召开立宪会议。³⁹

在推翻克伦斯基后的最初几天里，消灭清一色布尔什维克人民委员会的努力是最为激烈的。那时在彼得格勒和莫斯科，被废黜的临时政府的支持者与苏维埃政权的拥趸之间爆发了激烈的武装战斗。对于无论哪个党的国际派而言，除非签订协议并立即建立某种全面的社会主义“统一战线”，否则革命似乎将处于分崩离析、血流成河的边缘。另一方面，卡杰特以及孟什维克和社革党的右派与中派认为，布尔什维克是毫无道德原则的篡权者。对于布尔什维克政府以及无产阶级与贫农专政的非常想法，他们深恶痛绝。在十月的高潮，这些反对派团体得到了团结于彼得格勒市杜马周围的官员、军校士官生和哥萨克部队的支持。而在彼得格勒市杜马看来，自己以及自己创建的全国性机构——由温和社会主义者控制的、成分更为广泛的全俄拯救祖国与革命委员会（全拯委）⁴⁰是俄国现行的最高中央政治

³⁸列·托洛茨基：《论列宁》（Lenin），纽约，1959年，第 110 页。（参见托洛茨基：《论列宁》，王家华、张海滨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0 年，第 82 页。——译者注）

³⁹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苏维埃政权法令》（Декреты Советской власти），第 1 卷，莫斯科，1957 年，第 25-26 页。

⁴⁰全俄拯救祖国与革命委员会（Всероссийский комитет спасения родины и революции），又译“全俄救国救革命委员会”，是十月革命当日夜成立的反布尔什维克机构，其成员主要来自资产阶级政治力量和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右翼，主席为右翼社会革命党领导人阿布拉姆·拉斐洛维奇·戈茨（Абрам Рафаилович Гоц，1882-1940）。11 月末，该委员会转变为保卫立宪会议联盟（Союз защиты Учредительного собрания）。随着立宪会议的解散，该联盟自动瓦解。——译者注

当局。⁴¹另一方面，一俟得到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批准，列宁和托洛茨基（现在是布尔什维克中排位第二的人物）便使自己的政府摆出革命俄国唯一合法政治当局的架势。所有反对它的个人和机构都被定为反革命，成了彼得格勒苏维埃军事革命委员会——它得到了工厂武装民兵（赤卫队）、波罗的海舰队水兵和不甚可靠的彼得格勒卫戍部队的支持——理所当然的打击目标。

首都的大部分报纸站在全拯委一边，反对布尔什维克政府，完全可以被控鼓动推翻布尔什维克政府。军事革命委员会立刻解决了这个问题。在 10 月 26 日夜，当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还在进行时，它突袭并查封了几份反对派报纸。⁴²随后几天里，又查封了其他特别敌视布尔什维克的报纸。10 月 27 日，列宁以人民委员会的名义⁴³签署法令，正式支持查封上述媒体，并解释称，暂时侵犯言论自由是正当的，因为在那样关键的时刻，反对派报纸的“危险不亚于炸弹和机关枪”⁴⁴。

到 10 月 28 日，在全拯委和市中央杜马以及大部分区杜马的鼓动下，大多数中央和市政官僚拒绝承认人民委员会和市区革命机构的权威，并且要么静坐罢工要么离开岗位。这使得彼得格勒的政府陷于瘫痪。彼得·克拉斯诺夫将军⁴⁵在克伦斯基的跟随下，率领一支据说纪律严明、约 700 名哥萨克组成的反左部队，在加特契纳与皇村之间，扫荡了彼得格勒士兵、水兵和赤卫队的无组织的部队。这里距彼得格勒不到 20 英里⁴⁶。此时，在整个 1917 年都不可靠、不稳定的彼得格勒卫戍部队各单位无视了军事革命委员会的动员请求。雪上加霜的是，赤卫队的许多部队没有组织，缺乏领导。列宁和托洛茨基不得不亲自干预，给革命部队的混乱现状带来了一些表面的秩序，并且最重要的是，使一些革命部队进入在普尔科沃高地（这里俯瞰彼得格勒南郊）周边匆匆构筑的防线。⁴⁷与此同时，还动员工厂女工

⁴¹全拯委成立于 10 月 25-26 日夜，由来自彼得格勒市杜马、前预备议会、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老”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俄农民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以及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中的孟什维克和社革党党团的代表组成。

⁴²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5 号全宗，1 号目录，2857 号案卷，第 1 张。

⁴³人民委员会于 11 月 3 日首次开会，此后直到 11 月 15 日都未再开会（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19 号全宗，1 号目录，1、1a 号案卷）。就此，参见人民委员会秘书尼·彼·戈尔布诺夫未刊回忆材料（中央国家历史-政治文献档案馆，4000 号全宗，5 号目录，2220 号案卷，第 8 张）。

⁴⁴《苏维埃政权法令》，第 1 卷，第 24-25 页。（《苏维埃政府关于查禁敌对报刊的法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文献史料选编》第 4 卷，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社会主义系编，北京：中国人民出版社，1985 年，第 117 页。此处中译文按拉宾诺维奇的英译文略作改动。——译者注）

⁴⁵彼得·尼古拉耶维奇·克拉斯诺夫（Пётр Николаевич Краснов，1869-1947），生于哥萨克高级军官世家，十月革命后多次发动和指挥反苏维埃叛乱，1919 年流亡国外，继续从事反苏活动。二战期间组织傀儡军胁从纳粹德国入侵苏联。1945 年以不被引渡至苏联为条件，向英军投降。但不久后英国食言，将其交予苏联。1947 年被处以绞刑。——译者注

⁴⁶20 英里约合 32 公里。——译者注

⁴⁷参见由布尔什维克组织的 10 月 29 日卫戍部队各单位代表会议的记录（《1917 年 10 月 29 日彼得格勒卫戍部队团级代表会议》[Совещание полковых представителей Петроградского гарнизона, 29 октября 1917 г.]，载《红色编年史》[Красная летопись]，1927 年第 2 期〔总第 23 期〕，第 220-225 页）。那次会上，列宁、托洛茨基和自称游击战专家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米哈伊尔·波克罗夫斯基成功地求得了支持。

前往彼得格勒的农村地区，动员当地农民支持苏维埃政府。⁴⁸

29日，克拉斯诺夫和克伦斯基在皇村等待支援，并宣称有意于次日对首都发起总攻。作为接应，全拯委与社革党军事委员会共同谋划，准备于克拉斯诺夫的进攻开始时，在彼得格勒市内发起暴动。这次暴动主要由彼得格勒几所军校的士官生参加。他们将利用军革委会专注于克拉斯诺夫，夺取关键军事设施和通讯设备。但在28日晚些时候，由于一名携带着计划副本的暴动领导人非常偶然地被捕，军革委破获了暴动计划。于是决定不等克拉斯诺夫的牵制，提前一天起事。但是，彼得格勒卫戍部队的正规军（regular troop）和驻扎于彼得格勒的哥萨克部队无视了全拯委代表要求支持的恳求。这样一来，委员会的部队注定要灭亡。他们的叛乱于29日傍晚遭到毫不留情的镇压。在10月29日彼得格勒的街头战斗中，总共约有200名参战人员死伤。⁴⁹这一伤亡数字远高于二月和十月革命期间首都的伤亡数字。

与此同时，彼得格勒布尔什维克当局指挥的武装力量太过分散，以至无力迫使人们服从命令。许多十月革命后立即被查封的反对派报纸稍微改了一下名字，便迅速恢复了发行。它们的版面上充斥着这些骇人听闻的描述：布尔什维克的暴行，随意搜查逮捕，广泛存在的掳掠和街头暴力，持续入夜的长时间枪击。占领冬宫时被俘女兵遭到强奸，军革委的俘虏在街头被处决，以及所有被捕者的处境都非笔墨所能形容，也得到了大肆报道。在市杜马夜以继日的会议上，也流传着类似骇人的报道。⁵⁰甚至到今天，对于布尔什维克早期的“恐怖”，也很难将虚构与事实分辨开来。彼得格勒是一个充斥着焦虑、恐惧和激烈对立的战区。尽管新政府是那样的虚弱、那样的缺乏组织，以至在首都几个特权阶级聚居的中心城区，虽然已正式建立“人民政权”，但仍然无法控制例行辱骂工人和赤卫队员的哥萨克。富裕市民、已被夺权的“剥削者”，从他们的阳台上看着装备步枪和铲子的士兵、水兵和赤卫队员排成纵队向南方涌去。波罗的海舰队的战舰停在涅瓦河上，炮口指向被克拉斯诺夫规模不大的哥萨克部队占领的南郊的目标。匆忙筑起的街垒、挂着倒钩的铁丝网、市内挖掘的壕沟。在这种情况下，常常非理性的流言获得了持久的信用。

当时最轰动的几项对布尔什维克的指控经过调查，确定是假的。但反对派媒体报道的一部分布尔什维克暴行得到了可靠证据的支持。在镇压了士官生暴动后，军革委依靠匆忙组织起来的“克拉斯诺夫战线”的部队来维持彼得格勒的秩序，它在相当程度上必须依靠像区苏维埃这样的机构，而后者自己又要依靠激进的、常常难以控制且富于报复性的工人赤卫队。

⁴⁸中央国家历史-政治文献档案馆，1号全宗，1号目录，26号案卷，第19、26张。

⁴⁹《新生活报》，1917年10月31日，第3页。

⁵⁰圣彼得堡俄罗斯国家图书馆手稿部（РНБ СПб РО），《1917年8月20日彼得格勒中央市杜马速记记录》（Стенографические отчеты Петроградской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городской думы созыва 20 августа 1917 г.），第368-369张。

10月29日晨，在全俄拯救祖国与革命委员会计划的暴动开始时，军革委宣布彼得格勒戒严。当日晚些时候，军革委任命左翼社革党人米哈伊尔·穆拉维约夫中校⁵¹负责指挥彼得格勒防务。穆拉维约夫是位富有才华但狂热的军事领导人，他在九个月后将因背叛布尔什维克而被枪杀。看上去，他已经成为了有意肩负此责的最高军衔的军官。他上任后签署的《第1号命令》，授权工人对反革命嫌犯可以不经审判即处以私刑。⁵²

彼得格勒的局势已经够乱了，但后来莫斯科的报告表明，那里的情况更糟。在莫斯科，忠于临时政府的公安委员会和布尔什维克控制的军革委之间为争夺政权爆发了全面的斗争，其结果持续了可能超过一周。10月28日开始的激烈巷战和猛击炮击严重破坏了建筑物，其中一些还发生于克里姆林宫内和周边，且伤亡数以百计。作为对莫斯科战事报告的回应，尚未在战斗双方中坚定站队的彼得格勒主要的工人组织和社会主义政治团体发出紧急呼吁，要求停火，并立即开始组建双方均能接受的、具有包容性的清一色社会主义联合政府。这些团体中最重要的是孟什维克国际派和（尤其是）左翼社革党。鲍里斯·卡姆科夫在10月31日的《劳动旗帜报》（它是彼得格勒左翼社革党的喉舌）上悲痛地写到，实际上，“旧联合政府垮台了，但我们还没有一个新政府。对于人民委员会，你可以随便怎么叫它，反克伦斯基总参谋也好，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也罢，但它并不是一个可行的政府”。和卡姆科夫的编者按一道的头版文章呼吁“每个人”都去结束内战，并“团结一致，要求立即建立由所有社会主义党派代表组成的清一色革命政府”。

* * *

除了左翼社革党外，全铁工执委是此时试图调和对立双方的另一关键组织。正如其发给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的电报所预告的，它于10月29日邀请各主要“民主”团体参加其支持下、于当日开始的谈判，旨在创建一个全面包容从极左翼的布尔什维克到右翼的民粹社会主义派的清一色社会主义政府。此外，全铁工执委宣称，除非在彼得格勒和莫斯科宣布休战，并就重建政府展开严肃对话，否则将于当日午夜呼吁开始全国铁路罢工。⁵³立即停止内部武装冲突，并重组广泛

⁵¹米哈伊尔·阿尔捷米耶维奇·穆拉维约夫（Михаил Артемьевич Муравьёв，1880—1918），1898年进入喀山步兵士官学校，开始了在帝俄军队的服役生涯，后参加日俄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二月革命后，穆拉维约夫组织了一批突击营和妇女营，此后被克伦斯基任命为临时政府保卫事务负责人，并被提拔为中校。科尔尼洛夫事件后，加入左翼社会革命党。十月革命后，为苏维埃政府服务，指挥了保卫彼得格勒的战斗。1918年初，指挥苏维埃军队在乌克兰战斗。1918年7月左翼社会革命党暴动后，率部叛变，7月11日在辛比尔斯克被当地赤卫队和契卡击毙。——译者注

⁵²《消息报》，1917年11月2日，第1-2页。

⁵³约翰·莱·霍·基普（John Leslie Howard Keep）编译：《关于苏维埃政权的争论：第二届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记录》，牛津，1979年，第44-45页；《第二届工人、士兵、农民和哥萨克代表苏维埃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记录》（Протоколы заседаний Исполнительного Комитета Советов Р., С., Кр., и Каз. Депутатов II созыва）（译者注：拉宾诺维奇委员此处书名漏了“全俄中央”字样），莫斯科，1918年，第9-10页。基普以文献为基础对新中执委会议的重建比后者要全面得多。另参见帕·翁佩（Павел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Вомпе）：《十月革命的日子与铁路员工》（Дни Октябрь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 и железнодорожники），莫斯科，1924年，第21-22页。

的清一色社会主义政府，全铁工执委这样的要求引起了彼得格勒农民代表苏维埃、各工会和彼得格勒工会理事会以及布尔什维克占多数的工厂委员会中央理事会⁵⁴的共鸣。⁵⁵

此时列宁和托洛茨基正专心于剿灭全拯委叛乱和抵御克拉斯诺夫的哥萨克。在他们缺席的情况下，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于全铁工执委发布最后通牒后不久，连忙宣布赞同该党参加被提议的谈判，并确定了自己的谈判立场。最重要的是，在其 10 月 29 日的会议上，中央委员会一致同意，应当扩大政府的代表性，并允许所有苏维埃党派参加政府。本着苏维埃代表大会授权的精神，同意新政府都应当由中执委组建，并对其负责，还受制于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法令。对于特定个人加入新政府这一必定非常敏感的问题（因为温和社会主义者和市杜马要求，列宁和托洛茨基没有资格占据政府首脑职务），中央委员会以 5 票支持、3 票反对、1 票弃权，通过了模糊的结论：“某些对党的提名的反应是可以接受的。”⁵⁶在数小时后的中执委全会上，加米涅夫就此更明确地宣称：“建立一个清一色社会主义政府”的关键不在于其组成或个体成员，而是在于“认可[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基本主张”⁵⁷。这一声明延续了加米涅夫在临时政府被推翻前的立场。它在当时的局势下意味着，列宁和托洛茨基并非不可触碰，并且即便在一个接纳了全部社会主义党派的政府当中，布尔什维克占多数也不是绝对必需的。列宁随后宣称，布尔什维克在这几天里对以谈判解决政府问题的兴趣是一种“军事行动的外交掩护”⁵⁸。他和托洛茨基无疑是这么看的。但由于他们的缺席，这显然不是中央

⁵⁴ 工厂委员会中央理事会（Центральным советом фабрично-заводских комитетов，简称 ЦСФЗК），即彼得格勒工厂委员会中央理事会（ЦС ФЗК Петрограда，以下简称“理事会”），由彼得格勒工厂委员会第一次代表会议于 1917 年 6 月 3 日（16 日）选举产生。第一届理事会由 25 人组成，其中包括 19 名布尔什维克。随着此后全俄其他城市相继建立起工厂委员会，理事会成为全俄工厂委员会实际上的中央指导机关。在当年 8 月彼得格勒工厂委员会第二次代表会议闭幕后，理事会负责组织了全俄工厂委员会代表会议。此后，理事会积极参与了十月革命的组织和准备工作，并派代表参加军事革命委员会。革命成功后，又参与了保卫苏维埃政权、创建苏维埃经济制度和组织工人监督的斗争。1918 年，分别于 1 月和 2 月召开全俄工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和彼得格勒工厂委员会第六次代表会议做出决定，将工厂委员会并入工会。此后，理事会解散。理事会的首任主席为布尔什维克格里戈里·费奥多罗维奇·费奥多罗夫（Григорий Фёдорович Фёдоров，1891-1936），1917 年 8 月后由尼古拉·伊万诺维奇·杰尔比舍夫（Николай Иванович Дербышев，1879-1955）接任理事会主席职务直至理事会解散。——译者注

⁵⁵ 安斯基（А. Л. Анский）编：《1917 年彼得格勒工会理事会会议记录》（Протоколы Петроградского совета профессиональных союзов за 1917 г.），彼得格勒，1927 年（译者注：拉宾诺维奇此处原文误为 1928 年），第 128-129 页；彼·阿·加尔维（Петр Абрамович Гарви）：《革命初年的俄国工会》（Профессиональные союзы в России в первые годы революции）（译者注：拉宾诺维奇此处原文漏去“革命初年的”字样），纽约，1981 年，第 29 页、第 128-129 页第 1 段。

⁵⁶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会议记录》，第 122-123、269-270 页。

⁵⁷ 基普：《争论》，第 46 页；《第二届工人、士兵、农民和哥萨克代表苏维埃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记录》，第 10 页。

⁵⁸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会议记录》，第 127 页。（列宁：《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上的发言》，《列宁全集》第 33 卷，中央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年，第 38 页。——译者注）

委员会大多数人的看法。10月29日中央委员会通过的有关人民委员会的立场作为党的官方政策被迅速传达给全国的主要党组织。⁵⁹

尽管在苏维埃代表大会结束之初的混乱时期，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对急剧扩大人民委员会包容性的支持力度达到了它的顶峰，但对那些在整个1917年都支持临时政府并为抗议布尔什维克推翻后者而离开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的社会主义团体（首先是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的中派和右派），话却不能这么说。实际上，那些使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中的“动摇”分子倒向妥协的主要因素——全铁工执委的威胁，党孤立于所有其他政治团体，以及它似乎没有能力要么进行治理要么独力捍卫革命——让温和社会主义者觉得，布尔什维克正濒临失败，因此更应该抵制而非迎合他们。

孟什维克中央委员会于10月28日通过的一份立场强硬的决议反映了上述看法。这份决议禁止在完全肃清其“冒险行径”之前，与布尔什维克进行任何形式的谈判。此外，它呼吁全拯救委与临时政府、预备议会⁶⁰和工人组织讨论新政府的组建问题。孟什维克中派和右派对事遂已愿是如此自信，以至在决议中呼吁全拯委提议军革委立即投降——以换取对其领导人人身安全的保障，直到立宪会议有机会决定他们将如何受审。⁶¹

10月29-30日全铁工执委对话最初三次会议上温和社会主义团体和全拯委代表的表现，以及30日上午由与会者委任的“特别委员会”进行的有关新政府组成与纲领的协议草案的起草工作，反映了上述坚定的反布尔什维克立场。⁶²在这些讲坛上，孟什维克和社革党领导人要求：立即解散列宁政府，代之以排除布尔什维克和特权阶层代表的清一色社会主义联合内阁；解除工人的武装；解散军革委；应当宣布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所做的一切（包括它的存在）都是无效的。作为回

⁵⁹ 安·布勃诺夫：《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十月公报》（Октябрьский бюллетень ЦК большевиков），《无产阶级革命》（Пролетарская революция），1921年，第1期，第10-11页。

⁶⁰ 预备议会（Предпарламент）指全俄民主理事会（Всероссийский демократический совет），后改称俄罗斯共和国临时议会（Временный совет Российской республики），是1917年10月根据全俄民主会议主席团决议成立的机关，旨在于制宪会议前代行议会职能，但实际上成了临时政府的咨询机关。起初，预备议会宣称将按照民主会议各团体代表比例，从民主会议成员中选举成员。但实际上，最终形成的预备议会却吸纳了大量未曾出席民主会议的资产阶级和地主的政治代表，从而使之成为右翼主导的政治机构。十月革命爆发后，预备会议被军事革命委员会解散。
——译者注

⁶¹ 齐瓦·加利利（Ziva Galili）、阿·涅纳罗科夫（Альберт Павлович Ненароков）主编：《1917年的孟什维克》（Меньшевики в 1917 году），第3卷，第2分册，莫斯科，1997年（译者注：拉宾诺维奇原文误为1994年），第261-262页；斯·瓦·秋秋金（Станислав Васильевич Тютюкин）：《孟什维主义：历史篇章》（Меньшевизм: страницы истории），莫斯科，2002年，第435页。

⁶² 对于这些活动的详细记录，参见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5498号全宗，1号目录，67号案卷，第1-31张。这份记录在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275号全宗，1号目录，43号案卷）的副本刊于加利利、涅纳罗科夫：《1917年的孟什维克》，第3卷，第2分册，第602-628页。另参见秋秋金：《孟什维主义》，第437-440页。

报，应努力确保克拉斯诺夫的部队入京后，不进行报复。⁶³

反而是参加全铁工执委对话的布尔什维克为建立具有广泛代表性的苏维埃新政府而据理力争。10月29/30日夜⁶⁴，加米涅夫回复孟什维克，坚称工人不会支持一个排除了布尔什维克的政府。⁶⁵后来，眼见温和社会主义者正将达成协议的可能性消灭尽净，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代表格里戈里·索科利尼科夫⁶⁶宣称，该党并不“寻求掌权”，并且“接受铁路人提出的”条件，即新政府应当对中执委负责，并[忠于]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的纲领。“我们无意推迟立宪会议”，他坚称，“苏维埃政权将被转交给它。”⁶⁷布尔什维克温和派达维德·梁赞诺夫作为工会领导层的代表参加了对话。他准备为社会主义党派的团结而放弃保留以苏维埃为基础的政府。⁶⁸但他担心，如果像唐恩所要求的那样，解除工人的武装，那么工人会遭到屠戮。因此在全铁工执委谈判的这次会议上，他的讲话聚焦于这种危险。⁶⁹

在这个关节点上，彼得格勒和莫斯科街头、彼得格勒南部普尔科沃高地的激战报告不断打断着组建新政府的谈判。对话首日（10月29日）的士官生暴动以及对它的无情镇压也破坏了对话。从一开始，对政府架构和组成的讨论就伴随着互相指责和为立即休战竭力寻求可接受条件的努力。⁷⁰代表统一社会民主党人-国际派发言的阿·阿·布卢姆⁷¹、代表孟什维克国际派的马尔托夫和代表左翼社革党的鲍里斯·马尔金⁷²呼吁全拯委的支持者保持理性。“你们有没有想过，布尔什维克的失

⁶³ 参见例如唐恩在开始时的激烈攻击，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5498号全宗，1号目录，67号案卷，第6-7、10张。

⁶⁴ 即20日与30日之交的夜晚。以下凡出现“甲日期/乙日期”的情况，均表示甲日期与乙日期之交的意思。——译者注

⁶⁵ 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5498号全宗，1号目录，67号案卷，第1-2、11张。

⁶⁶ 格里戈里·雅科夫列维奇·索科利尼科夫（Григорий Яковлевич Сокольников，1888-1939），俄国犹太裔革命家，1905年加入布尔什维克，1906-1907年在莫斯科从事宣传工作，1907年秋被捕后流放西伯利亚。1909年逃亡国外，后从事研究和宣传工作。二月革命后返回俄国，起初在莫斯科工作，后至彼得格勒从事政治工作，当选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17年8月成为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1918年参加布列斯特谈判。内战爆发后，在红军中从事政治工作。1922年担任财政人民委员。1925年起成为斯大林的公开反对派，称苏联的经济为国家资本主义，1939年死于大清洗。——译者注

⁶⁷ 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5498号全宗，1号目录，67号案卷，第8-9张。另参见一位身份不明的全铁工执委代表对这些讨论的日记记录，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5498号全宗，1号目录，56号案卷，第7-8张。

⁶⁸ 梁赞诺夫之所以这样不顾一切，是因为他急切地感到，此时此刻，所有社会主义团体迫切需要立即达成协议。关于这一点，参见谢·安·斯基（Семен Акимович Ан-Ский）：《1917年10月25日政变之后》（После переворота 25-го Октября 1917 г.），载《俄国革命档案》（Архив Рус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第8卷，第47页。

⁶⁹ 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5498号全宗，1号目录，1号案卷，第11-12张。

⁷⁰ 圣彼得堡俄罗斯国家图书馆手稿部，《彼得格勒市杜马速记记录》，第369-405张。

⁷¹ 阿尔图尔·阿达莫维奇·布卢姆（Артур Адамович Блюм，1877-1938），1890年代参加社会民主主义运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分裂后为布尔什维克，一战爆发后成为护国派，1917年成为统一社会民主党人-国际派组织中央委员，后参加经济工作，1938年死于大清洗。——译者注

⁷² 鲍里斯·费奥多罗维奇·马尔金（Борис Фёдорович Малкин，1891-1938），左翼社会革命党领导人，1918年加入俄共（布），1938年死于大清洗，1956年平反。——译者注

败意味着什么？”布卢姆问道，“布尔什维克的行动是工人和士兵的行动。工人和士兵会和这个无产阶级政党一道被毁掉。……建立一个统一革命战线是至关重要的。”⁷³马尔托夫附和道：“通过双方谈判来和平消除危机是绝对必要的。”在他看来，只有组建团结了整个民主派（不仅是苏维埃）的政府，而非排除特权阶层的代表，才有可能避免可怕的内战、民主派的瓦解和右派专政的来临（imposition）。⁷⁴

马尔金也激烈地恳求支持全铁工执委的倡议。尽管赞同布尔什维克所坚持的新政府应由中执委监督并承认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法令，但为了使温和社会主义者更能接受这一条件，他还是提议改组中执委和政府，以使布尔什维克与“护国派”的代表人数相同，并赋予中派以相当的权力（尤其是在成员占比中，40% 给予布尔什维克，40% 给予“护国派”[很大程度上即是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20% 给予“国际派”[首先是左翼社革党和孟什维克国际派]）。⁷⁵鉴于如果没有其他“国际派”的支持，布尔什维克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开幕时不会占据多数，这一提议不像它或许看上去的那样离谱。但更重要的是，在最初两次全铁工执委的全体会议和 10 月 30 日的“特别委员会”会议上，孟什维克和社革党坚持必须完全将布尔什维克排除于政府之外，从而全力阻止了妥协的达成。

全拯委组织的起义于 10 月 29 日夜被镇压下去了，普尔科沃附近被认为忠于克伦斯基的部队的威胁出人意料地得到迅速消除，并且（同样重要的是）跨部门基层工人代表坚持要求达成妥协协议。⁷⁶伴随于此，在 10 月 30/31 日夜的中执委会议上，孟什维克软化了将布尔什维克完全排除于政府之外的立场。⁷⁷10 月 31 日，孟什维克中央委员会以 1 票之差批准参与组建一个包括布尔什维克在内的社会主义联合政府，尽管孟什维克和社革党仍然坚决反对列宁或托洛茨基加入新政府。⁷⁸看到有望达成协议，布尔什维克温和派作出了进一步妥协。全铁工执委对话中的孟什维克和社革党代表在 10 月 30/31 日夜提议创建一个名为“临时人民会议”的代表机构，清一色社会主义新内阁将向其负责。为了使布尔什维克不可能占多数，除其他人之外，这个机构将包括来自第一届中执委、彼得格勒和莫斯科市杜马、全

⁷³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5498 号全宗，1 号目录，67 号案卷，第 3-4 张。

⁷⁴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5498 号全宗，1 号目录，67 号案卷，第 4-6 张。

⁷⁵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5498 号全宗，1 号目录，67 号案卷，第 9 张。

⁷⁶关于这一点对孟什维克的意义，参见拉·阿布拉莫维奇（Рафаил Абрамович Абрамович）：《历史篇章：全铁工执委（1917 年 11 月）》（Страницы истории: Викжель (ноябрь 1917)），载《社会主义通讯》（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ий вестник），1960 年 5 月号，第 99 页，和 1960 年 6 月号，第 118-119 页；以及鲍·伊·尼古拉耶夫斯基（Борис Иванович Николаевский）：《十月政变期间的孟什维克》（Меньшевики в дни Октябрьского переворота），纽约，1962 年，第 5-9 页。另参见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5498 号全宗，1 号目录，56 号案卷，第 9 张。

⁷⁷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5498 号全宗，1 号目录，67 号案卷，第 24-25、29 张。尼古拉耶夫斯基：《孟什维克》，第 6-7 页。

⁷⁸加利利、涅纳罗科夫：《1917 年的孟什维克》，第 3 卷，第 2 分册，第 271 页；尼古拉耶夫斯基：《孟什维克》，第 4 页；阿布拉莫维奇：《历史篇章》，第 119 页；秋秋金：《孟什维主义》，第 439 页。

俄农民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工会中央理事会⁷⁹以及全铁工执委的代表。加米涅夫及其同事对此的回应是，坚持这一新实体应当以第二届中执委为核心。列宁后来指责他们放弃了这一原则。尽管这一问题的相关证据相互矛盾，但毫无疑问的是，这次会议的大多数与会者接受了建立临时人民会议且所有社会主义党派代表组成的政府向之负责的总体计划。⁸⁰

次日夜（10月31日/11月1日），加米涅夫、索科利尼科夫和梁赞诺夫参加了另一个委员会的讨论。组建这个委员会的目的，在于就（向临时人民会议负责的）新政府的组成准备推荐名单。30名奥布霍夫工厂工人的代表突然怒气冲冲地打断了讨论，他们要求不再拖延，立刻达成协议，组建一个向中执委负责、致力于实现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纲领的社会主义联合政府。⁸¹一名奥布霍夫的代表用拳头敲着桌子，叫道：“结束掉，你们听着，结束掉……人们已经在白刃战了……领袖和党都下地狱去吧……把列宁、克伦斯基和托洛茨基这些人统统绑起来……我们要一份协议，没有它我们就不走了！”⁸²

此后经过数小时的激烈争论，委员会最终以多数票决定，将列宁和托洛茨基排除于部长职务的候选人之列，并在提议的新内阁当中将布尔什维克的代表仅限于教育部（卢那察尔斯基）、工商业部（列昂尼德·克拉辛⁸³），以及还有可能劳动、外交与内务部（可能的布尔什维克候选人分别是亚历山大·施略普尼柯夫、米哈伊尔·波克罗夫斯基和李可夫）。根据这次会议起草的部长候选人初步名单，维克托·切尔诺夫⁸⁴是总理的主要候选人，他的社革党同事、全拯委领导人、曾公然参与该

⁷⁹即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Всероссийский Центральный Совет Профессиональных Союзов，简称 ВЦСПС），由1917年6月的全俄工会代表会议选举产生，是全俄工会的中央领导机关。后发展为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Всесоюзный центральный совет профессиональных союзов，简称 ВЦСПС）。——译者注

⁸⁰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5498号全宗，1号目录，67号案卷，第24-29张；5498号全宗，1号目录，57号案卷，第31张；圣彼得堡俄罗斯国家图书馆手稿部，《彼得格勒市杜马速记记录》，第456-458张；《消息报》，1917年11月3日，第4页。另参见阿·拉兹贡（Анатолий Израилевич Разгон）：《无产阶级专政最初数月里的苏维埃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ВЦИК Советов в первые месяцы диктатуры пролетариата），莫斯科，1977年，第130页；翁佩：《十月革命的日子》，第37页。

⁸¹10月31日奥布霍夫工厂的群众大会通过了一份体现这些要求的决议。这份决议看上去似乎反映了一大批工厂工人态度。（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5498号全宗，1号目录，70号案卷，第3张。）

⁸²圣彼得堡俄罗斯国家图书馆手稿部，《彼得格勒市杜马速记记录》，第463-464张。

⁸³列昂尼德·鲍里索维奇·克拉辛（Леонид Борисович Красин，1870-1926），1890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0年在巴库从事组织工作，参与组织了1903年的巴库罢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分裂后反对布尔什维克，1905-1907年负责领导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战斗装备组，参与创办了《新生活报》，参与组织了1907年梯弗里斯银行抢劫案，1908年流亡国外，1918年任最高国民经济会议主席团成员、工商人民委员，1919年任交通人民委员会，1920年任对外贸易人民委员，此后主要从事外交工作，1926年病亡。——译者注

⁸⁴维克托·米哈伊洛维奇·切尔诺夫（Виктор Михайлович Чернов，1873-1952），俄国社会革命党创建者之一，1890年代初加入民粹派，1894年被捕。1895年出狱后主要在坦波夫省从事民粹派的宣传和组织工作，1900年参与组建农民社会主义联盟，1901年加入新成立的社会革命党，成为该党机关报《革命俄罗斯报》的编辑。1905年革命后返回俄国，担任第二届杜马社会革命党

委员会起义的尼古拉·阿夫克先季耶夫⁸⁵是外交部长的头号候选人。⁸⁶许多年后，委员会杰出的孟什维克成员拉斐尔·阿布拉莫维奇⁸⁷回忆到，对于将列宁和托洛茨基排除于部长候选人之列，委员会里的布尔什维克是同意的。⁸⁸

在加米涅夫的鼓励下，全铁工执委的官员现在宣布接受组建新政府的最终协议的基础。全铁工执委还宣布，与会各方都承认，必须立即休战。⁸⁹此时，在发给莫斯科同事的消息中，全铁工执委的彼得格勒官员有把握地表示，肯定能达成双方都满意的协议。⁹⁰即便彼得格勒的苏维埃媒体也似乎对于协议快要达成颇有信心。所以 11 月 1 日，布尔什维克控制下的彼得格勒苏维埃报纸《工人与士兵报》在首席社论中告诉读者：“[参加全铁工执委对话的]各派已达成基于这一原则的协议：应当由苏维埃当中的所有社会主义党派组建政府。”“布尔什维克在提倡政权应属于革命民主派的时候，”社论继续写道，“一直把它理解为所有社会主义党派的联盟……而非单独一党的支配地位。”

* * *

对于自己的中央委员会同事在镇压了士官生暴动后的 10 月 29/30 日夜就组建政府达成妥协协议的努力，列宁最初似乎保持全面的警惕。俄国的社会革命和内战即将在欧洲引起决定性的社会主义革命，列宁对此抱有极大的信心。在过去的

党团领袖。1908 年流亡国外，一战爆发后持国际派立场。二月革命后返回俄国，任彼得格勒苏维埃副主席、克伦斯基临时政府农业部长，科尔尼洛夫事件之初辞去部长职务，后反对十月革命，参与组建全俄拯救祖国与革命委员会。1920 年代流亡国外，1952 年病亡于纽约。——译者注

⁸⁵尼古拉·德米特里耶维奇·阿夫克先季耶夫（Николай Дмитриевич Авксентьев，1878-1943），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二月革命后曾任全俄农民代表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克伦斯基政府内务部长、全俄临时政府首脑，1918 年流亡国外，此后在侨民中从事组织工作，1943 年病亡于纽约。——译者注

⁸⁶安·利·弗赖曼（Антон Львович Фрайман）在《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哨：苏维埃政权最初数月里的彼得格勒》（Форпост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 Петроград в первые месяцы Советской власти），列宁格勒，1969 年，第 86-87 页，引用了这次会议的一份速记稿和《赫尔辛格福斯苏维埃消息报》（Известия Гельсингфорского совета）（译者注：赫尔辛格福斯即赫尔辛基）1917 年 11 月 2 日号外的一篇报道。但我无法找到这些资料。一份与弗赖曼所述相近的未来部长名单草稿保存于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5498 号全宗，1 号目录，57 号案卷，第 31 张。会议结束数小时后，彼得格勒市杜马收到了口头报告（圣彼得堡俄罗斯国家图书馆手稿部，《彼得格勒市杜马速记记录》，第 456-473 张）。这份报告对会议的描述与弗赖曼的说法相吻合。另参见基·弗·古谢夫（Кирилл Владимирович Гусев）：《维·米·切尔诺夫：勾勒政治肖像》（В. М. Чернов, Штрихи к политическому портрету）

⁸⁷拉斐尔·阿布拉莫维奇·阿布拉莫维奇（Рафаил Абрамович Абрамович，1880-1963），原姓赖恩（Рейн），俄国犹太裔革命家，1899 年加入崩得，1903 年逃亡国外，1904 年成为崩得中央委员，1906 年崩得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后成为该党中央委员会，追随孟什维克，1905 年革命失败后为取消派，1910 年再次逃亡国外，一战后持温和的国际派立场，二月革命后回国，全俄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全铁工执委谈判失败后，持反布尔什维克立场，1918 年被捕，1919-1920 年作为反对派在莫斯科继续从事政治活动，1920 年离开俄国后，在侨民当中继续从事孟什维克的组织工作，1963 年在纽约去世。——译者注

⁸⁸阿布拉莫维奇：《历史篇章》，载《社会主义通讯》，1960 年 6 月号，第 119 页。

⁸⁹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275 号全宗，1 号目录，208 号案卷，第 46-47 张。

⁹⁰参见例如主持全铁工执委对话的亚·马利茨基在 11 月 1 日上午就迅速达成协议的前景的乐观报告，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5598 号全宗，1 号目录，57 号案卷，第 40 张。

一个半月里，他不顾一切地推动自己的党单方面夺取政权，并拜克伦斯基之助，经11小时而取胜。随后在苏维埃代表大会上，部分由于孟什维克和社革党的退出，他又巧妙地占据了布尔什维克温和派和左翼社革党的上风。此外，在工人、士兵和水兵——他们受到苏维埃代表大会纲领所描绘的光明前景的鼓舞——的支持下，他和托洛茨基指挥镇压了全拯委暴动，并准备好遏止克拉斯诺夫的进攻。

从工厂、工人组织和卫戍部队军事单位那里，决议如潮水般喷涌而出。这反映出，紧随这些最初的胜利之后，人民空前强烈地支持清一色社会主义苏维埃政权，前所未有的厌恶与资产阶级的哪怕一丝一毫的合作。例如，布尔什维克彼得堡委员会在10月29日第一次考量了党对全铁工执委谈判的立场。⁹¹在那天会前，它征求并收到了各区党委有关所在地一般政治情绪的简报。这些报告中有一小部分强调了有理由退却。比如，在市中心上层阶级聚居的铸造厂区，即便布尔什维克基层党员都强烈支持，为了就拓宽政府组成达成协议，可以向温和社会主义者做出重要的让步。但散布着工厂的纳尔瓦区的信息更具代表性。它报告称，“群众是从维护十月革命的胜利并使之发挥效用的角度来看待协议的……对社革党和孟什维克抱着敌视的态度。”⁹²

新提交的地方报告开启了彼得堡委员会10月29日的会议。恰在此时，全拯委暴动处于最危险的阶段，而普尔科沃附近与克拉斯诺夫部队的冲突也迫在眉睫。所以这些报告一心关切的是，诸如控制具有战略意义的铁路、可用的武器和载具、赤卫队和工人总体的力量和战斗精神这类问题，此外还有各区苏维埃的军事行动和地方安全状况。但这些报告都提出，随着他们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成果，工人的战斗精神是高昂的。部分由于这些报告的影响，彼得堡委员会的成员虽然希望拓宽政府的组成以接纳其他国际派团体（比如左翼社革党和孟什维克国际派），但对党内温和派在全铁工执委对话中采取的原则——不惜一切代价达成协议——却鲜有支持。此外，大部分委员坚持，党必须继续维护苏维埃政权和苏维埃代表大会的纲领。在他们讨论的最后，通过了一项决议，确认此时的首要任务是在中央和地方都落实“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并且苏维埃政权的目标是实现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所采纳的纲领。任何牺牲这一目标的妥协都是不可接受的。⁹³

⁹¹ 塔·亚·阿布罗西莫娃（Тамара Александровна Абросимова）及其他编：《1917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彼得堡委员会：会议记录与材料》（Петербургский комитет РСДРП(б) в 1917 году: Протоколы и материалы заседаний）（译者注：拉宾诺维奇原文此处遗漏“1917年”字样），圣彼得堡，2003年，第523-534页。这部后苏联时代的彼得堡委员会1917年会议记录汇编注解精善，其全面性和准确性超过了最初俄共（布）十月革命史委员会（Истпарт）的版本，即普·弗·库杰利主编：《1917年第一个合法的布尔什维克彼得堡委员会》（Первый легальный Петербургский комитет большевиков в 1917 г.），莫斯科-列宁格勒，1927年。

⁹² 中央国家历史-政治文献档案馆，1号全宗，4号目录，92号案卷，第6张背面、第10-15、22-25张。

⁹³ 《彼得堡委员会》，第523-530页。

毫无疑问，正如十月革命前一样，就拥护甚至偏向布尔什维克一党统治而言，人民的普遍情绪不是特别亲布尔什维克的。但从上述报告和全铁工执委对话会议上工人代表的激烈抗议来看，列宁的这种说法是正确的：群众会把有损苏维埃政权和十月成果的妥协视为布尔什维克背信食言。但在这里，那些拒斥他的基本理论信条并从二月革命起就反对他曾热烈论证的诸多战略指示的党内同事正操纵着党走向政治协议。而在列宁看来，这将使温和社会主义者恢复对政府的巨大影响，并因此毁掉他给俄国引爆决定性的国际革命所下的赌注。

11月1日，在彼得堡委员会（其中包括数名中央委员）和中央委员会（其中包括彼得堡委员会、布尔什维克军事组织和布尔什维克工会领袖的代表）的会议上，列宁表达了他对这种事态的愤怒。⁹⁴在彼得堡委员会的会议上，列宁显然在努力保持冷静，但却不甚成功。他指责中央委员会代表在全铁工执委会议上的表现是背叛。唯一得到他赞扬的布尔什维克领导人是托洛茨基。“很久之前，托洛茨基就承认，联合是不可能的。从那时起，就没有更好的布尔什维克了。……如果[党内]一定要分裂，那就分裂吧，”列宁愤怒地说道，“如果你们[在整个中央委员会当中]取得了多数，就在中执委里掌权并保持下去吧。但我们会到水兵那里去。”⁹⁵

党的中央领导层围绕未来政府问题在他们眼前爆发的激烈斗争，把彼得堡委员会的委员们惊得目瞪口呆。列宁极少参加他们的会议；实际上，在此前7个月里，他只参加过三次。可如今，委员会直接听到列宁对政府、对革命的未来和对党的上层的内部危机的看法。卢那察尔斯基随后起而为温和派的观点辩护。托洛茨基继续着列宁的攻势，猛烈地、毫不留情地攻击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及其支持者，而紧随其后的诺金则为妥协做了最后热烈的恳求。

卢那察尔斯基坚称，清一色社会主义政府比起清一色布尔什维克甚或苏维埃政府更为必要。针对列宁明确拒斥妥协，他辩称，如果没有现存国家机器的合作，那布尔什维克“会什么都没法管理”。他承认，党还有“诉诸恐怖”的选项。“但为什么？”他质问道。在他看来，逮捕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国家官僚集团太过庞大、太过复杂，以至难以用恐怖手段加以掌控。唯一可行的办法，他坚称，是“遵循阻力最小的路线”而非“用刺刀冲锋拿下每一站”。⁹⁶

⁹⁴ 《彼得堡委员会》，第535-550页；列·托洛茨基：《斯大林伪造学派》（The Stalin School of Falsification），纽约，1972年，第107-123页；《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会议记录》，第124-130页。

⁹⁵ 《彼得堡委员会》，第533-538页；托洛茨基：《斯大林学派》，第108-111页。（参见托洛茨基：《斯大林伪造历史》，《俄国局势真相》，刘琪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3年，第128页。——译者注）

⁹⁶ 《彼得堡委员会》，第538-540页；托洛茨基：《斯大林学派》，第112-115页。



图 1 布尔什维克温和派列夫·加米涅夫、维克托·诺金和阿纳托利·卢那察尔斯基。尤·康·阿尔齐布舍夫绘，载《“无产阶级专政”在俄国：尤·康·阿尔齐布舍夫生活素描》("Диктатура пролетариата" в России: наброски с натуры Ю. К. Арцыбушева)，莫斯科，1922 年。

在托洛茨基看来，卢那察尔斯基偏爱谈判甚于武装暴力和恐怖，以及他对渐进主义而非决定性的直接行动的强调，是“小资产阶级心理”的遗存。拒绝站边的“中等阶级虱子”（包括全铁工执委）一旦看到布尔什维克政府的力量，就会倒向布尔什维克。“官僚有自己的利益和习惯”，他说道，“必须将之粉碎再加以恢复。只有到那时我们才能够工作。”在政府当中与温和社会主义者的妥协只会不断动摇并消灭布尔什维克在群众中的威信。⁹⁷

诺金是莫斯科市党组织的关键领导人，并从 10 月 2 日以来担任莫斯科苏维埃主席。在筹备苏维埃代表大会期间，他尤为热烈地支持将大会的讨论与创建清一色社会主义政府联系在一起。在莫斯科的布尔什维克处境最为严峻的非常时刻，他启程前往彼得格勒报告当前事态，有理有据地为妥协辩护，并在工商业人民委员会担任了职务。他在 11 月 3 日人民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记录表明，莫斯科阶级战争的残酷无情和那里盛行的无政府状态使他确信，除非布尔什维克向全铁工执委做出让步，从而分裂反对派，否则他们“注定要在一场持久内战中浪费掉自己的全部力量，而后毁灭”。⁹⁸在彼得堡委员会 11 月 1 日会议上，他呼吁立刻停止流血。他还高声自问，为什么“妥协”这个字眼对列宁和托洛茨基来讲那么刺耳。他认为，党是无法独力自存的，他所谓的“少数中央委员”如果试着这么做，便会不可避免地造成一场漫长的内战、饥荒、苏维埃的瓦解、党的毁灭以及

⁹⁷ 《彼得堡委员会》，第 540-544 页；托洛茨基：《斯大林学派》，第 112-115 页。

⁹⁸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19 号全宗，1 号目录，1 号案卷，第 1 张。另参见尼·彼·戈尔布诺夫（Николай Петрович Горбунов）：《人民委员会的工作机构是如何在十月的日子里产生的》（Как создавался в Октябрьские дни рабочий аппарат совета народных комиссаров），载《苏维埃国家的早晨》（Утро страны советов），米·帕·伊罗什尼科夫（Михаил Павлович Ирошников）编，列宁格勒，1988 年，第 149-150 页。

反革命的胜利。⁹⁹

相互对立的中央委员在这次会议上的争论是如此漫长激烈，以至一派激进的记者和执委会委员安东·斯卢茨基¹⁰⁰成了少数几位能插上话的彼得堡委员会委员之一。斯卢茨基支持列宁和托洛茨基，攻击妥协是“伪装起来的放弃政权”，并高声重申了继续捍卫清一色苏维埃政权的极端重要性。对除此之外，他提出，没有什么会得到革命群众的响应。¹⁰¹在他讲话结束后，同意于次日召集增加了区委员会代表参加的彼得堡委员会扩大会议（这次会议到 11 月 4 日才召开），来解释该市布尔什维克领导层的立场。不久后，因为几名与会者要参加将要召开的中央委员会扩大会议，会议结束。

正如彼得堡委员会的情况那样，在 11 月 1 日中央委员会的会议上，列宁再次与托洛茨基联手攻击被提出的全铁工执委妥协案。托洛茨基称，那些甚至都没参加起义的党派正利用谈判从如今已占上风的党的手中夺取政权。他坚称，布尔什维克应当主导新政府，列宁应当成为政府首脑。¹⁰²托洛茨基不落列宁之后，也惦记着俄国的革命重拳会在最先进的欧洲国家立即引发决定性的社会主义革命。根据他的发言，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一首要关切最大程度地塑造了他对俄国政治的思考。¹⁰³而列宁则再次明确无疑地表示，坚决反对与孟什维克和社革党展开任何进一步的谈判。¹⁰⁴

在这波猛攻的重压之下，包括加米涅夫、李可夫、卢那察尔斯基与梁赞诺夫在内的布尔什维克温和派领导人与悬而未决的全铁工执委协议的某些方面拉开了距离。但是在论证有必要根据 10 月 29 日中央委员会达成的路线而向其他社会主义团体做出重大妥协时，他们和列宁以及托洛茨基一样激烈。以梁赞诺夫为例。他像加米涅夫、李可夫和卢那察尔斯基一样，在 1917 年夏季和初秋，领导了遏制列宁的激进主义影响的激烈（且常常成功的）斗争。基于这一经验以及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期间与本党同事的讨论，他觉得，莫斯科和外省的大部分布尔什维克领导人赞同他的看法。在为具有广泛代表性政府做辩护时，作为彼得格勒工会理事会主席的梁赞诺夫可以理直气壮地声称代表彼得格勒 45 万工会工人。11 月 6 日彼得格勒工会理事会会议期间，他在与列宁激辩时，就强调了这一点。¹⁰⁵在 11 月 1 日，面对中央委员会，他尤为卖力地为妥协辩护：“如果放弃协议，”他一

⁹⁹ 《彼得堡委员会》，第 543-544 页；托洛茨基：《斯大林学派》，第 120 页。

¹⁰⁰ 安东·约瑟福维奇·斯卢茨基（Антон Иосифович Слуцкий，1884-1918），犹太裔俄国革命家，生于华沙，1905 年参加革命，二月革命后在彼得格勒的奥布霍夫工厂从事组织工作，使该厂工人从支持社革党转为支持布尔什维克，曾任布尔什维克彼得堡委员会委员、乌克兰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塔夫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领导建立了克里米亚的苏维埃政权，1918 年被反苏维埃暴乱分子逮捕并杀害。——译者注

¹⁰¹ 《彼得堡委员会》，第 544-545 页；托洛茨基：《斯大林学派》，第 121-122 页。

¹⁰²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会议记录》，第 125 页。

¹⁰³ 参见例如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67 号全宗，1 号目录，46 号案卷，第 175 张。

¹⁰⁴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会议记录》，第 126 页。

¹⁰⁵ 《1917 年彼得格勒工会理事会会议记录》，第 136 页。

度宣称，“我们就将处于彻底的、绝望的孤立之中……没有左翼社革党，就什么也没有……我们将面临这样的事实：我们欺骗了群众，曾答应过他们会有一个苏维埃政府的……[某种]协议是必须的。”¹⁰⁶

曾于 10 月 29 日投票赞成参加全铁工执委讨论的中派中央委员（包括扬·别尔津、莫伊塞·乌里茨基¹⁰⁷、安德烈·布勃诺夫¹⁰⁸和雅科夫·斯维尔德洛夫），也不接受托洛茨基和列宁对于跟反对派谈判的明确的消极态度。但是，受到党在彼得格勒的处境发生突变的鼓舞，再加之列宁和（也有可能）彼得堡委员会中层领导人的推动，即便他们也觉得，加米涅夫和其他参加全铁工执委对话的布尔什维克超出了中央委员会 10 月 29 日的授权，预备协议中的一些条款是不可接受的。例如，乌里茨基宣称：“我们决不能让出列宁或托洛茨基，因为这将等于宣布放弃我们的纲领。”¹⁰⁹

在 11 月 1 日的中央委员会扩大会议上，斯卢茨基被任命为彼得堡委员会发言人。他又和列宁以及托洛茨基站到了一起，坚称党的谈判员正“反对全体工人”。只要想到群众，[即苏维埃政权的]问题就能解决，他补充道：“我们不应该谈论任何形式的拓宽苏维埃的组成。”¹¹⁰

这次会议快闭幕时，中央委员会以 10 票对 4 票拒绝了列宁立即终止全铁工执委对话的要求。反而决定，党应当最后一次参加对话，以最后通牒的形式表达自己的最低要求，哪怕只是为了向左翼社革党表明协议是不可能的。这一最后通牒坚称，在其他事情中，新政府必须承认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法令不可侵犯，以及第二次代表大会和中执委是唯一的政府权威。它还重申了这样的原则，只有此前在苏维埃之中的团体才能够派代表参加拓宽了的中执委。因此，市杜马的代表以及一些像人民会议这样的杂交组织是不能参加的。¹¹¹尤其重要的是，弗·沃洛达尔斯基（莫伊塞·戈利德施泰因）¹¹²而非加米涅夫被授权向当日夜（11 月 1/2 日）的中执委会议宣布党拒绝全铁工执委委员会的提议以及它新的最后通牒。

尽管年仅 26 岁，但沃洛达尔斯基已是一名老革命家了，他以论战技巧、精力充沛和善于鼓动大批群众而著称。在 1917 年 5 月回到俄国后，他成了布尔什维克

¹⁰⁶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会议记录》，第 128 页。

¹⁰⁷ 莫伊塞·索洛蒙诺维奇·乌里茨基（Моисей Соломонович Урицкий，1873-1918），犹太裔俄国革命家，出生于乌克兰，早年曾为孟什维克，一战期间持中派立场，1917 年加入区联派，后加入布尔什维克，参与组织了十月革命，1918 年被社会革命党暗杀。——译者注

¹⁰⁸ 安德烈·谢尔盖耶维奇·布勃诺夫（Андрей Сергеевич Бубнов，1883-1938），1903 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该党分裂后支持布尔什维克，1917 年参与组织十月革命，曾参加托洛茨基反对派，1938 年死于大清洗，1956 年平反。——译者注

¹⁰⁹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会议记录》，第 124-129 页。

¹¹⁰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会议记录》，第 126 页。

¹¹¹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会议记录》，第 130、274-275 页。

¹¹² 弗·沃洛达尔斯基（В. Володарский，1891-1918），原名莫伊塞·马尔科维奇·戈利德施泰因（Моисей Маркович Гольдштейн），犹太裔俄国革命家，生于乌克兰，1905 年加入崩得，1913 年流亡美国，1917 年回国后加入布尔什维克，在彼得格勒从事宣传鼓动工作，1918 年遇刺身亡。——译者注

彼得堡委员会的重要成员。作为一名衷心的列宁主义者，沃洛达尔斯基在十月革命前夕，成了那种策略上讲求实际的彼得格勒布尔什维克。这些人要求小心谨慎，认真做好准备工作，然后再尝试推翻临时政府。之所以持这种立场，是因为对于可能要给俄国人民提供面包，以及要么结束“帝国主义”战争要么动员支持一场革命战争，他是颇为不安的。对于欧洲可能发生社会主义革命，他也有怀疑。“我们必须明白，一旦掌权，我们将不得不降低工资、增加失业，并实行恐怖，”他警告道，“我们无权拒绝这些办法，但也没必要向它们冲去。”¹¹³在中央委员会休会后不久召开的 11 月 1 日的中执委会议上，他委婉地表示，在我们[布尔什维克]中间，“很少有人不希望达成协议。……可是，我们不能为了达成协议而不惜一切代价。……我们决不能让出数十万工农兵为之战斗的立场。”沃洛达尔斯基之后向仍然由加米涅夫任主席的中执委提交了一份决议，这份决议内容紧密地坚持前述中央委员会最后通牒的条款。¹¹⁴

对布尔什维克突然从昨天全铁工执委谈话的更为调和得多的立场上后退，弗拉基米尔·巴扎罗夫¹¹⁵显然大吃了一惊。他代表统一社会民主党人-国际派提交了一份措辞严厉的决议，谴责布尔什维克食言，并宣布他的团体有意退出中执委，直到布尔什维克放弃不妥协的态度。此前达成和平政治协议的光明前景突然坍塌瓦解，这给卡列林带来的惊愕不亚于巴扎罗夫。他试图为协议找寻新的基础，建议在重组后的政府向其报告的革命议会中，比昨日夜达成的试探性协议，苏维埃代表应该拥有更大得多的优势，并且新政府应当保证忠于第二次代表大会各项法令所体现的原则。在初步投票中，沃洛达尔斯基的决议得 38 票，卡列林的决议得 29 票。但略经修订之后，沃洛达尔斯基的提案得到了左翼社革党人的投票支持。¹¹⁶后者最大关切仍然在于，建立包括布尔什维克在内的广泛的社会主义联盟。¹¹⁷

与此同时，又展开了争夺布尔什维克党领导权的斗争。因为据悉于 11 月 2、4 以及 5 或 6 日召开的中央委员会会议实际上并无记录可用，所以重建此间围绕政府问题的冲突及其在中央委员会造成的反响是复杂困难的。¹¹⁸全铁工执委谈判无疑是 11 月 2 日中央委员会会议长时间激烈争论的主题。这次争论最终以 1 票之差通过列宁提出的决议，痛斥温和派屈从苏维埃少数派重建政府的压力，从而违背

¹¹³ 参见拉宾诺维奇：《走向政权的布尔什维克》(The Bolsheviks Come to Power)，第 197-198 页。

¹¹⁴ 基普：《争论》，第 51-53 页；《第二届工人、士兵、农民和哥萨克代表苏维埃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记录》，第 12-13 页。

¹¹⁵ 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巴扎罗夫 (Владимир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Базаров，1874-1939)，1896 年参加革命，1899 年流亡海外，1901 年回国，1904 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参与翻译出版了《资本论》俄文版，后因信奉经验批判主义而脱离布尔什维克，1917 年成为统一社会民主党人-国际派的组织者和理论家，1921 年起在国家计划委员会工作，成为苏联计划经济的先驱，1939 年死于大清洗。——译者注

¹¹⁶ 沃洛达尔斯基修订后的提案得到 1 票弃权之外的全票通过。——译者注

¹¹⁷ 基普：《争论》，第 53-58 页；《第二届工人、士兵、农民和哥萨克代表苏维埃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记录》，第 13、15 页。

¹¹⁸ 《苏共中央通报》(Известия ЦК КПСС)，1989 年，第 1 期，第 231-232 页，再次确认了处理领导权斗争的中央委员会会议是在那几天召开的。

了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意志。决议还认为，唯有现政府的政策才能使社会主义在俄国和欧洲取胜，并因此对之加以支持。¹¹⁹

可列宁取得如此险胜的办法却是冒险的。此前两次就是向温和社会主义者做出重大让步进行的投票，都以平手告终。此后，列宁向彼得堡委员会求援。¹²⁰11月2日彼得堡委员会会议的一条不甚明了的记录显示，会议在开始后不久突然中断，以便宣读一份列宁的紧急便条¹²¹。便条说，应当立即通过反对妥协的决议，并提交于当时正在进行的中央委员会会议。转达列宁诉求的雅科夫·费尼格施泰因¹²²解释道，“莫斯科人”（显然指诺金和李可夫）正要求与孟什维克和社革党达成协议，需要彼得堡委员会帮忙回绝他们。¹²³

收到列宁便条的时候，斯大林未来的外交部长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正在做关于“当前形势”的报告。作为回应，彼得堡委员会派出其1917年间的领导人之一格列布·博基¹²⁴通知中央委员会：强烈反对削弱苏维埃政权或背离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改革纲领的妥协。博基离开后，一群富于战斗性的地方领导人声言反对吸收温和社会主义者进入政府。没人支持继续进行全铁工执委对话。因此，中央委员会和中执委前一天通过的最后通牒得到了批准。稍后，从中央委员会会议返回的博基报告称，他无权声明彼得堡委员会支持列宁。于是，彼得堡委员会急忙派遣莫洛托夫和斯卢茨基去告知中央委员会它的最新动作。¹²⁵

彼得堡委员会的干预是否推动了中央委员会倒向列宁？我们不得而知。我们所能知道的是，列宁对温和派所作所为的攻击并没有使他们放弃维持有关重建政府的谈判。这在11月2日中执委的深夜会议上得到了明显的表现。¹²⁶当这次会议转到全铁工执委谈判时，看上去已经明白列宁占据温和派上风的马尔金起而宣读了一份左翼社革党的声明。这份声明攻击布尔什维克在政府谈判中缺乏灵活性，“将国家投入内战的深渊”，并在结尾处向布尔什维克发出最后通牒：要么采纳更能为

¹¹⁹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会议记录》，第131-132页。

¹²⁰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会议记录》，第275页。

¹²¹ 即《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彼得格勒委员会（1917年11月2日〔15日〕）》，《列宁全集》第48卷，中央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2、5页。

¹²² 雅科夫·亨里科维奇·多列茨基（Яков Генрихович Долецкий，1888-1937），原名费尼格施泰因（Фенигштейн），生于波兰，1904年加入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1916年加入布尔什维克，1917年成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19年担任立陶宛-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人民委员会内务人民委员，1925年起领导塔斯社的工作，1937年死于大清洗。——译者注

¹²³ 《彼得堡委员会》，第555、560页。

¹²⁴ 格列布·伊万诺维奇·博基（Глеб Иванович Бокий，1879-1937），生于乌克兰，1897年加入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1900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该党分裂后追随布尔什维克，1917年二月革命后领导布尔什维克彼得堡委员会，参与组织了十月革命，1918年参加契卡，后主要从事秘密警察工作，1937年死于大清洗。——译者注

¹²⁵ 《彼得堡委员会》，第556-559页。

¹²⁶ 基普：《争论》，第59-67页；《第二届工人、士兵、农民和哥萨克代表苏维埃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记录》，第17-22页。

人所接受的条款，要么单打独斗。¹²⁷可以想见，布尔什维克温和派为了加强自己的地位，确实有可能鼓动左翼社革党发出这份最后通牒。在几周后的左翼社革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卡姆科夫回忆称，正是在那个时候，[布尔什维克]党的“负责代表”找到他们，并说道：“左翼社革党的同志们，努力争取你们的目标——我们支持你们，希望我们能够达成协议。”¹²⁸

在 11 月 2 日的中执委会议上，作为对马尔金的回应，季诺维也夫尽职地阐明了中央委员会在当日夜早些时候采纳的列宁反对与温和社会主义者达成协议的立场。但他随即声明，这不是布尔什维克的最终立场，并解释称，这一立场尚未得到该党中执委党团的讨论，并需要休会一小时来讨论。休会期间的布尔什维克党团会议虽然记录缺失，但却草草拼凑了一份有关组建新政府的提案，并立即由加米涅夫提交给中执委。这无疑表明，经过他和季诺维也夫后来所称的“异乎寻常的努力”，他们成功说服了大多数党团成员软化中央委员会更为强硬的新谈判立场。尽管仍然包括由中央委员会 11 月 1 日最后通牒中的许多最低要求（有关中执委的最高地位，承认苏维埃代表大会的法令，拒绝创建任何全新的议会机构），但它同意彼得格勒市杜马的社会主义党派代表加入中执委（从而为拓宽中执委组成、吸纳非苏维埃团体打开了大门），并约定“至少半数”（而非布尔什维克 11 月 1 日最后通牒所称的那种压倒性多数）政府部长职位属于布尔什维克。提案坚持列宁和托洛茨基参加新政府，但职位待定。¹²⁹

最重要的是，11 月 1 日中央委员会的最后通牒以及列宁对温和派毫不含糊的攻击，旨在立即停止有关重组政府的谈判。而加米涅夫的提案，其主旨则在于继续谈判。对于左翼社革党来说，这些可谓进步。他们撤回了自己的最后通牒，并在原则上支持布尔什维克的新提案。¹³⁰加米涅夫、梁赞诺夫和季诺维也夫代表布尔什维克，卡列林和普罗什·普罗尚¹³¹代表左翼社革党，将代表中执委参加有关组建新政府的进一步谈判。¹³²

在 11 月 3 日全铁工执委的下一次会议上，梁赞诺夫向与会者提交了上述提案。这次会议开幕时，温和社会主义者形势不妙。他们以为，10 月 31 日/11 月 1 日夜全铁工执委委员会达成的初步协议会成为组建新政府的基石，并且因此使新政府受控于布尔什维克的影响被降至最低的人民会议。可是，会议主席亚·马利茨

¹²⁷ 基普：《争论》，第 60-61 页；《第二届工人、士兵、农民和哥萨克代表苏维埃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记录》，第 20-21 页。

¹²⁸ 《左翼社会革命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会议记录》，第 44 页。

¹²⁹ 基普：《争论》，第 62-63 页；《第二届工人、士兵、农民和哥萨克代表苏维埃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记录》，第 21-22 页。

¹³⁰ 《第二届工人、士兵、农民和哥萨克代表苏维埃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记录》，第 22 页。

¹³¹ 普罗什·佩尔切维奇·普罗尚（Прош Пельчевич Прошьян, 1883-1918），又译“普罗相”，生于亚美尼亚，1903 年加入社会革命党，1913 年逃亡国外，1917 年回国后成为左翼社会革命的领导人之一，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被选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当年末担任邮电人民委员，1918 年因布列斯特和约而辞职，后参与领导左翼社会革命党暴动，同年逝世。——译者注

¹³² 《第二届工人、士兵、农民和哥萨克代表苏维埃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记录》，第 22 页。另参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会议记录》，第 275-276 页注释 176。

基¹³³宣读了一份由数千普提洛夫工厂工人派出的代表团刚刚提交给他的决议。像几天前奥布霍夫工厂工人的要求一样，这份决议申明，建立清一色社会主义政府是至关重要的，但是它必须：接受有关土地、和平、工人监督和立即召集立宪会议的法令所体现的苏维埃政府的纲领；承认有必要对反革命展开无情斗争；承认农民参加的第二代表大会是政权的唯一合法性来源；拒绝未参加苏维埃的组织加入中执委。简言之，像梁赞诺夫之后提交的中执委提案那样，普提洛夫工人的决议拒绝了 10 月 31 日/11 月 1 日夜全铁工执委谈判临时达成的许多重大妥协。阿布拉莫维奇代表统一社会民主党人-国际派（或许还有孟什维克国际派，但未提及孟什维克和社革党主流），宣称梁赞诺夫提交的提案阻碍了协议的达成，并且其后果由中执委承担责任。在会议余下的时间里，温和社会主义者对布尔什维克的“恐怖”展开攻击；还通过了一项决议，要求组建具有全面代表性的、向整个“民主派”的代表机构（即临时人民会议）负责的社会主义政府。¹³⁴

* * *

尽管全铁工执委对话显然土崩瓦解了，但人们还是大可想见，对于加米涅夫和季诺维也夫领导中执委布尔什维克党团继续为组建新政府而展开政治谈判，列宁是愤怒的。在列宁看来，这种公开的政治悖逆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前几天激烈的党内争论表明，在他的一些最有权威的同事看来，妥协协议仍然具有巨大的吸引力。因此，他如今要求所有未与加米涅夫公开结盟的中央委员签署正式声明，誓言如果“中央委员会少数派”不以书面形式明确表示服从支持列宁政府的构成和政策的 11 月 2 日决议的文字和精神，那么将把与温和派的争端提交给党最高层级的地方和全国委员会以及（如有必要）非常党代会。¹³⁵除列宁之外，签署了这份声明的还有托洛茨基、斯维尔德洛夫、斯大林、乌里茨基、捷尔任斯基、索科利尼科夫、布勃诺夫、阿道夫·越飞和马特维·穆拉诺夫¹³⁶。¹³⁷对现有证据的分析表明，尽管后者当中一些人仍然倾向于妥协（并且显然曾投票支持 10 月 29 日的重大妥协），但内战萌芽之际，很少有人准备在不许公然违反党纪这一方面挑战列宁。

在另一方面，深感自己事业绝对重要的温和派领导人——加米涅夫、李可夫、季诺维也夫、诺金和弗拉基米尔·米柳亭——立即辞去了中央委员职务，以便如他们对列宁声明的书面回复所称：“我们将能在群众面前自由地阐述我们的观

¹³³ 亚历山大·列昂尼多维奇·马利茨基（Александр Леонидович Малицкий），律师，左翼社会革命党人，曾任莫斯科铁路枢纽站法律顾问、全俄铁路工人工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译者注

¹³⁴ 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5498 号全宗，1 号目录，67 号案卷，第 34-39 张；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71 号全宗，34 号目录，88 号案卷，第 2 张。

¹³⁵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会议记录》，第 133-134、275 页注释 175。

¹³⁶ 马特维·康斯坦丁诺维奇·穆拉诺夫（Матвей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ич Муранов，1873-1959），生于乌克兰，曾为铁路工人，1904 年加入布尔什维克。1912 年当选杜马代表，1915 年因持国际主义立场而被流放西伯利亚。二月革命后回到彼得格勒，成为彼得格勒苏维埃执委会委员，并进入《真理报》编辑部。1917 年 8 月当选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参加十月革命，并在此后进入全俄苏维埃中执委主席团。1920 年代布尔什维克党内斗争中支持斯大林，1922 年当选俄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大清洗期间退休。——译者注

¹³⁷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会议记录》，第 134 页。

点……并寻求他们支持我们的诉求——立即就代表[全体]苏维埃党派的政府达成协议。”¹³⁸

加米涅夫和他的同事们显然希望，自己的辞职能够为他们积聚党内的支持。据斯维尔德洛夫称，他们的所作所为引起了一些震动。¹³⁹但回过头来看，留在仍然将进行至关重要且有胜算的战斗（例如，有关立宪会议的政策）的中央委员会，并用列宁提出的让党的代表大会或代表会议裁决党的领导层的分歧来挑战列宁，或许本会对他们更有利。因为全国党代会未必支持列宁。退出中央委员会并对召集全国紧急党代会的看法不做积极回应，布尔什维克温和派这样便离开了革命最重要的战场之一，其有助于“确保列宁全部路线的胜利”是毫不下于孟什维克和社革党离开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的。

实际上由于军革委的过火行为此时仍在继续，温和社会主义者对于与布尔什维克合作的态度又变得强硬起来。在孟什维克和社革党看来，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的辞职意味着，布尔什维克不出所料地开始瓦解了。¹⁴⁰这种想法自然破坏了他们残存的无论何种对与布尔什维克妥协的兴趣。他们于 11 月 5/6 日夜出席了此前已确定的、布尔什维克和左翼社革党缺席的全铁工执委会议，但却没有表现出任何谈判意愿。由此，全铁工执委对话被无限期推迟。¹⁴¹

对孟什维克和社革党来说，不幸的是，布尔什维克初期的革命法令以及他们在对于内外反革命方面显而易见的强硬，重新激起了彼得格勒下层阶级的革命精神。这导致地方层面愈发支持列宁立场。11 月 4 日召开的彼得堡委员会各区党组织代表会议为此提供了生动的例证。在这次会议上，来自首都各区的约 112 名布尔什维克活动家聆听了托洛茨基激动人心的讲话。他的讲话述说了布尔什维克党的伟大，并描述了关于政府问题妥协案的党内斗争。他宣称，只有布尔什维克敢于克服占少数的党内温和派（他们在十月的日子里反对武装起义，并拒斥“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的反对，领导一场武装人民起义。只有在布尔什维克党[的列宁派]的领导下，工人才能够取得他们为之斗争已久的目标。“现在发生的”，他继续说道，“是一场社会主义革命，一场工人阶级的革命，我们最高纲领的实现

¹³⁸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会议记录》，第 135-136 页。另参见安·利·弗赖曼：《社会主义革命的前哨》，第 94 页；拉·阿布拉莫维奇：《历史篇章》，第 123 页。

¹³⁹ 参见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书记处与地方党组织通信集》（Переписка секретариата ЦК РСДРП (б) с местными партийными организациями），第 2 卷，莫斯科，1957 年，第 27 页；别·叶洛夫（Б. Елов）：《关于俄共彼得格勒组织的党的代表会议》（О партийных конференциях петроградской организации РКП），载《彼得格勒鼓动员手册》（Справочник Петроградского агитатора），1921 年，第 10 期，第 96 页；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60 号全宗，1 号目录，26 号案卷，第 31 张。

¹⁴⁰ 参见例如，《十月后第一届工兵代表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局与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记录》（Протоколы заседаний ЦИК и Бюро ЦИК С. Р. и С. Д. 1-го созыва после Октября），载《红色档案》（Красный архив），1925 年，第 10 卷，第 99 页。

¹⁴¹ 11 月中旬，为恢复对话，全铁工执委召集莫斯科的铁路线代表开了两天的大会。这次大会批准恢复对话，但却没有造成任何结果（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71 号全宗，34 号目录，88 号案卷，第 49-79 张）。

已是指日可待。”¹⁴²这话还是上头的。会上通过的决议申明，“为了实现自己的纲领，布尔什维克作为苏维埃政权的模范承担者，需要的是被压迫劳动群众全心全意的支持，而非与小资产阶级团体的合作”，并且局势要求“稳定的革命进程、最大程度的纪律……以及绝不离开负责的岗位。”¹⁴³

与此类似，在11月5日召开的、布尔什维克发起的工厂女工大会（称为“彼得格勒女工第一次代表会议”¹⁴⁴）的开幕会议上，也发生了转向支持列宁立场。这次大会是由数名聚集在《女工》杂志周围的布尔什维克女领导人在十月前就开始组织的，¹⁴⁵其首先是要动员女工在立宪会议选举中支持布尔什维克候选人。第一次会议上有大概500名妇女强烈支持布尔什维克温和派有关组建政府的立场。富有激情的演说家、《女工》编辑和坚定的列宁派柳德米拉·斯塔利¹⁴⁶说服她们接受，保留目前清一色布尔什维克政府和结束党内争论的极端重要性。¹⁴⁷当日夜，会议选出的妇女代表团来到斯莫尔尼宫，向布尔什维克领导人传达上述态度。¹⁴⁸

从支持布尔什维克温和派的立场转向支持列宁的立场，这在进行中的彼得格勒工会理事会中表现得最为明显。10月31日，由布尔什维克温和派梁赞诺夫和洛佐夫斯基领导的理事会通过了一份措辞强硬的决议，呼吁立即建立一个代表所有苏维埃政党且向中执委负责的清一色社会主义政府。¹⁴⁹参加理事会的大多数工会也已分别通过了类似决议。在列宁严惩温和派以及全铁工执委对话瓦解后的11月6日，工会理事会领导层对于相互斗争的两个社会主义阵营之间迅速达成协议的极端重要性，立场仍然不变。¹⁵⁰但这决不能代表基层工会会员的看法。这在11月9日变得显而易见，当时理事会召集所有成员工会的代表开会。将近200名彼得格

¹⁴²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 67号全宗, 1号目录, 46号案卷, 第173-175张; 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年谱》(Владимир Ильич Ленин, Биографическая хроника), 第5卷, 莫斯科, 1974年, 第32页。

¹⁴³ 《工人与士兵报》(Рабочий и солдат), 1917年11月6日, 第4页。

¹⁴⁴ 彼得格勒女工第一次代表会议(Первой конференции работниц Петрограда)起初定于1917年10月29日(11月11日)召开, 后推迟至11月5日(18日)。——译者注

¹⁴⁵ 《女工》(Работница)是一份面向女性工人的布尔什维克小型期刊。它由数名党的女性领导人编辑, 创刊于1914年2月。截至当年6月, 共出版7期。此后因沙皇当局而中断发行。1917年5月复刊后, 对于酝酿夺取政权期间布尔什维克在彼得格勒工厂妇女当中的工作, 发挥了核心作用。但在1918年1月, 由于新闻用纸和油墨短缺, 被迫停刊。参见芭芭拉·埃文斯·克莱门茨(Barbara Evans Clements):《布尔什维克女性》(Bolshevik Women), 剑桥, 1997年, 第131-132页。(译者注:《女工》杂志于1923年1月再次复刊, 且迄今仍在发行。)

¹⁴⁶ 柳德米拉·尼古拉耶夫娜·斯塔利(Людмила Николаевна Сталь, 1872-1939), 俄国女革命家, 1890年代参加革命, 1907年流亡国外, 二月革命后在彼得格勒为布尔什维克从事鼓动工作, 1918-1920年在红军中从事政治教育工作, 1921-1923年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从事妇女工作, 此后主要从事教育、文化、宣传和研究工作, 1939年病亡。——译者注

¹⁴⁷ 《新生活报》(Новая жизнь), 1918年11月7日, 第4页; 《消息报》, 1918年11月7日, 第3页; 伊丽莎白·安·伍德(Elizabeth Ann Wood):《婆娘与同志:革命俄国的性别与政治》(The Baba and the Comrade: Gender and Politics in Revolutionary Russia), 布卢明顿, 1997年, 第69-70页。(译者注:这里的“婆娘”〔баба/baba〕是对落后女性的蔑称。)

¹⁴⁸ 《消息报》, 1918年11月7日, 第7页。

¹⁴⁹ 《1917年彼得格勒工会理事会会议记录》, 第129-130页。

¹⁵⁰ 《1917年彼得格勒工会理事会会议记录》, 第134-135页。

勒工会会员参会。列宁做了主要的发言《目前形势》。之后，理事会成员严厉指责他将攻击矛头指向孟什维克和社革党而非卡杰特。一位身份不明的孟什维克国际派坚称，列宁和托洛茨基的镇压政策是虚弱而非强大的表现，是在逢迎群众，并且“一个给无产阶级面前摆出不可能之挑战的党不是它的朋友”。从这次会议的记录来看，没人帮列宁说话。但是在会议闭幕时，以 112 票对 33 票通过了一份支持现政府为“真正反映了绝大多数人民利益”的决议。¹⁵¹显然，至少在当时，在工会地方分会和基层工人看来，布尔什维克坚决解决阶级敌人是富有吸引力的。

这是彼得格勒工会理事会最后一次讨论有关创建广泛的清一色社会主义政府的党内谈判问题。在全铁工执委对话瓦解数日后，中执委于 11 月 6 日对该问题做了最后一次讨论，但毫无进展。¹⁵²因此，持续一周、常常夜以继日的政府问题谈判以及布尔什维克党内对此进行的激烈斗争，最终一无所获。如今，人民委员会里全是布尔什维克。

* * *

尽管在彼得格勒苏维埃政权的最初几周里，全铁工执委谈判在重组人民委员会方面毫无进展，但社会主义多党政府的支持者（包括布尔什维克温和派）还是可以有所慰藉的，因为事实上根据创建人民委员会的法令，它向所有（包括那些退出了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或在会上没有代表的）苏维埃党派、团体和机构都有权参加的中执委负责。此间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有关政府问题的决议（无论是由温和派还是列宁派提出的）一直重申，中执委具有超乎人民委员会的至上地位。布尔什维克温和派和左翼社革党都进而认为，这意味着中执委将是最高立法机构，而人民委员会将是首先在于落实中执委政策的执行机关。¹⁵³至少可以理所当然地认为，任何未得中执委批准的政策都不会成为法律。

即便列宁也承认，人民委员会原则上向中执委负责。实际上，人民委员会从一开始就无视对自身独立权力的限制以及中执委的专权和感受。人民委员会是在 11 月中旬之前开始定期开会的。那时，列宁和其他人民委员抛开中执委而自行颁布法令。实际上，在这最初几周里，源源不断地颁布了一系列法令（主要是匆忙草就的革命原则声明）。它们的主要目的在于加强彼得格勒和俄国其他地区对苏维埃政权的支持，并帮助引发国外决定性的革命起义。

军革委的所作所为也有着类似的专横。在推翻克伦斯基后的最初几周里，军革委成了维持彼得格勒安保并在全国扩大苏维埃统治的主要司令机构。除此之外，在彼得堡，由于下一章将考察的原因，军革委开始负责许多民事服务，并迅速演变成了政府内的政府。¹⁵⁴随着临时政府被推翻，军革委在全国和地方政治生活

¹⁵¹ 《1917 年彼得格勒工会理事会会议记录》，第 137 页。

¹⁵² 基普：《争论》，第 91-94 页；《第二届工人、士兵、农民和哥萨克代表苏维埃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记录》，第 35 页。

¹⁵³ 卡姆科夫对这一观点的阐述，参见《左翼社会革命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会议记录》，第 46 页。

¹⁵⁴ 见本书第三章。

中的独立作用已经得到了学界应有的关注。但毫无疑问的是，针对政府各部、金融机构和市政机构不愿承认苏维埃政权的合法性，军革委颁布法令、下达命令，并往往以强力执行。而这些法令和命令并未（并且有时本不会）得到人民委员会的批准，更不用说中执委了。

在 10 月 29 日宣称俄国没有中央政府在运作时，卡姆科夫大体上是正确的。卡姆科夫搞错的地方在于暗示，整个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都会被纳入政府之中。总的来讲，在一段时间内，无论中央委员会还是地方党组织都尚未在政府中发挥重要的决策作用。上述党与政府机构在这一苏维埃统治初始阶段的关系，当时曾得到中央委员会书记处书记斯维尔德洛夫的间接承认。在 10 月 28 日致地方党组织的信中，他建议道：“如果你们要了解中央委员会的路线，我们推荐人民委员会的法令。”¹⁵⁵

十月革命后的最初几天里，在内外反革命的威胁之下，布尔什维克政府或许还有理由具有特设性质。在许多中执委委员（包括大部分布尔什维克和所有左翼社革党人）看来，以人民委员会和军革委的名义发布的第一批镇压法令是临时应急的非常措施。他们继续将中执委视为革命俄国的主要立法机构和政治权威的来源，并预计一旦彼得格勒局势稳定，人民委员会便会作为中执委的执行机关来活动。

到 11 月初，彼得格勒革命克服了所面临的急迫的生存威胁。但以强力推行任意法令的统治方式却没有出现缓解的迹象。中执委 11 月 2 日会议开始时，布尔什维克温和派尤里·拉林在委员中一马当先，正式对此提出异议。拉林曾是颇有影响的左翼孟什维克，在布尔什维克第六次全俄党代会后不久转而加入该党。那时，他就已含蓄地表达出对布尔什维克加米涅夫派的支持，和对“鲁莽的方法”以及主张这种方法的布尔什维克的反对。¹⁵⁶11 月 2 日，拉林在中执委集中谈及穆拉维约夫臭名昭著的《第 1 号命令》。这份命令在未经中执委或人民委员会批准的情况下，便以粗体刊登于《消息报》头版。¹⁵⁷他和看法相似的党内同事（更不用说大部分左翼社革党人）极为厌恶，穆拉维约夫批准私刑司法。拉林注意到，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政府法令明确了中执委的专权。他在梁赞诺夫的支持下，敦促中执委干脆将它废除了事。这一措施得到了严肃的考量。但在这个党内关系和政府内部关系的微妙时刻，大部分中执委委员不愿与列宁和人民委员会直接发生面对面的冲突。在中执委的请求（而非命令）之下，内务人民委员李可夫在几天后废除了穆拉维约夫的法令。¹⁵⁸

¹⁵⁵ 《苏共中央通报》，1989 年，第 1 期，第 229 页。

¹⁵⁶ 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1917 年 8 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第六次代表大会会议记录》（Шестой съезд РСДРП (большевиков), август 1917 года: Протоколы），莫斯科，1958 年，第 69-70 页。《消息报》，1918 年 11 月 2 日，第 1 页。参见上文。

¹⁵⁷ 《消息报》，1918 年 11 月 2 日，第 1 页。参见上文。

¹⁵⁸ 基普：《争论》，第 59-60 页；《第二届工人、士兵、农民和哥萨克代表苏维埃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记录》，第 18 页。

在 11 月 4 日紧接着的下一次中执委会议上，人民委员会和中执委之间的关系问题又浮现了出来。这次是有关列宁的出版控制法令。¹⁵⁹又是拉林发起了讨论。他承认，在十月后最初不稳定的几天里，严控出版或许有其合理性。他坚称，情况已完全不同了，新闻媒体只要不直接煽动颠覆或者暴动，就应当不受限制。他提出一项决议，撤销列宁的媒体法令，并禁止未经中执委为此目的专门设立的特别代表法庭的批准而采取任何镇压行动。¹⁶⁰左翼社革党这次显然准备比上次走得更远。他们敦促以解决出版法令为契机，进一步考量人民委员会篡夺中执委立法权的问题，并要求撤销列宁和其他人民委员十月以来用法令颁布的所有镇压措施。¹⁶¹

作为回应，布尔什维克的中执委秘书、列宁派瓦尔拉姆·阿瓦涅索夫¹⁶²争辩道，人民委员会仍然需要无限权力，因为捍卫革命的斗争尚未结束。他提出了一项决议，禁止恢复出版自由，并承认人民委员会迄今采取的所有措施。¹⁶³此后，听闻中执委正酝酿的冲突，首先是托洛茨基然后是列宁急忙赶到会上，以极端紧急时期的绝对必要性为出版法令辩护。因此，拉林的动议很快就引起了中执委与人民委员会之间结构性的激烈冲突，以及布尔什维克温和派与左翼社革党为一方、布尔什维克列宁派为另一方，围绕根本政府权力的直接冲突。

问题付诸表决时，阿瓦涅索夫的决议胜过了拉林，但事情没有在此打住。在他们拓宽政府组成或使政府行为温和化的希望落空之后，左翼社革党宣布退出军革委和其他所有除中执委之外的政府机构。¹⁶⁴由此造成的轰动，较于之后事情引起的反应，简直小巫见大巫了。诺金情绪激动地恳求就政府问题达成妥协，并紧接着发表了一通其预见性与惊人程度相当的声明。他宣称，舍此以外的唯一可能是“一个由政治恐怖维持的布尔什维克政府……这会使无产阶级群众组织远离那些指导我们政治事务的人物，会导致建立一个不向谁负责的政权，并毁掉革命和俄国。”他宣称布尔什维克温和派不能接受为这样一种进程承担责任，并公开宣布

¹⁵⁹ 见上文。

¹⁶⁰ 基普：《争论》，第 68 页；《第二届工人、士兵、农民和哥萨克代表苏维埃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记录》，第 23 页。

¹⁶¹ 基普：《争论》，第 69 页。

¹⁶² 瓦尔拉姆·亚历山德罗维奇·阿瓦涅索夫（Варлаам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Аванесов，1884-1930），亚美尼亚革命者，出生于今土耳其，1890 年代末加入亚美尼亚革命联合会（即“达什纳克楚琼”），1901 年转入亚美尼亚社会民主党，1903 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并在军队中从事宣传工作，后流亡瑞士，1913 年回到莫斯科从事地下工作，1914 年由孟什维克转为布尔什维克。二月革命后成为莫斯科工兵代表苏维埃执委会主席团成员，后至彼得格勒参与组织十月革命，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当选全俄中执委委员，后成为全俄中执委秘书。1918-1921 年担任民族事务委员会亚美尼亚事务委员，1920-1924 年任副工农检察人民委员、全俄肃反委员会委员，1924-1925 年任苏联副外贸人民委员，1925 年起成为苏联最高国民经济会议主席团成员，1930 年病亡。——译者注

¹⁶³ 基普：《争论》，第 69-70 页；《第二届工人、士兵、农民和哥萨克代表苏维埃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记录》，第 23-24 页。

¹⁶⁴ 基普：《争论》，第 77 页；《第二届工人、士兵、农民和哥萨克代表苏维埃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记录》，第 27 页。

人民委员会的4名人民委员——李可夫、米柳亭、伊·泰奥多罗维奇和诺金自己——以及其它7名重要的布尔什维克官员辞职，以示抗议。¹⁶⁵

固然，辞职的官员中，三人（诺金、李可夫和米柳亭）是在理论和策略问题上与加米涅夫相近的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他们在退出中央委员会后离开政府，是合乎逻辑的。此外，正式支持这一声明但没有辞职的人，大部分属于布尔什维的温和派。但也并非完全如此。例如，劳动人民委员亚·施略普尼柯夫此前常常支持列宁派。

布尔什维克温和派对列宁和托洛茨基此时推动的对政治妥协的强硬路线的最雄辩的控告之一由洛佐夫斯基在11月4日中执委会议之前一次布尔什维克的党团会议上提出。洛佐夫斯基的每一条控诉都反复以“以党的原则的名义，我无法保持沉默”为开头。它攻击列宁派支持表现于穆拉维约夫煽动暴民暴力的军革委的过火行径；镇压反对派媒体，骚扰、检控、搜查和逮捕；限制结社自由；军革委篡夺民事政府的权力；欺骗曾为苏维埃[多党]政府而战的劳动群众，结果他们发现不知为何，成了清一色布尔什维克政府；并且在拖延达成协议的每时每刻都会造成进一步流血的时候，把容纳特殊个人[即列宁和托洛茨基]作为重组政府协议的条件。¹⁶⁶

洛佐夫斯基在布尔什维克党团会议上对列宁派的控告搅动并抓住了那里明显普遍的情绪化的紧张氛围。党团会议无疑讨论了拉林对限制出版的反对，以及人民委员会即将出现的辞职。但对于后来中执委会议上的非布尔什维克来说，诺金辞去政府职务的声明具有爆炸性的作用。突然之间，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看上去处于混乱之中。左翼社革党试图利用这种情况，再次宣示中执委对于人民委员会的权威。在一份给列宁的正式书面质询中，一位身份不明的左翼社革党人直接了当地指出，苏维埃代表大会已经任命中执委为最高权威，人民委员会完全对之负责。他要求立即解释，人民委员会基于何种原因，不经中执委授权和讨论便颁布法令，人民委员会在未来是否有意停止以法令统治的不容许的行为。¹⁶⁷列宁回应称，撤换部长的专权足以使中执委保持对人民委员会政策的监督，所有被质疑的法令都是解决危急情况的关键。如果这还不够，他说道，那么中执委可以在它愿意的任何时候召集另一次苏维埃全国代表大会。¹⁶⁸

¹⁶⁵ 基普：《争论》，第77-78页；《第二届工人、士兵、农民和哥萨克代表苏维埃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记录》，第27-28页。除施略普尼柯夫之外，其他布尔什维克官员还有：尼古拉·杰尔比舍夫（出版事务委员）、阿尔布佐夫（С. В. Арбузов）（国家印刷厂委员）、伊利亚·尤列涅夫（赤卫队委员）（Илья Юренев）、格奥尔吉·费多罗夫（劳动人民委员会部冲突司司长）、拉林和梁赞诺夫。

¹⁶⁶ 《新生活报》，1917年11月6日，第1-2页。

¹⁶⁷ 基普：《争论》，第78-79页；《第二届工人、士兵、农民和哥萨克代表苏维埃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记录》，第28页。

¹⁶⁸ 基普：《争论》，第80-81页；《第二届工人、士兵、农民和哥萨克代表苏维埃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记录》，第28-29页。

左翼社革党立即转而宣称，这一答复并不令人满意。一份针对这一结果的决议以 25 票反对、20 票支持、6 名左翼社革党和 6 名布尔什维克弃权而未得通过。¹⁶⁹这次冲突的高潮是随后由乌里茨基代表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提出的、对列宁政府的信任投票。历史地来看，人们可以发现，这是苏维埃体制初期演变的一个关键时刻。布尔什维克在人民当中的权威，首先来自于它对苏维埃的认同，并将苏维埃作为革命的化身而加以捍卫。此时人民委员会与中执委的公开决裂，即便仅仅是暂时的，也可能极大地破坏前者的权威，并增加恢复全铁工执委对话的可能性。

在这次会议上，以布尔什维克温和派、孟什维克国际派、统一社会民主党人-国际派和左翼社革党为一边，列宁能够依靠的布尔什维克为另一边，双方之间的力量对比是如此接近，以至为了确保获得多数票，列宁被迫坚称，到场的布尔什维克人民委员应当被允许参与投票——这实际上是允许政府成员参与对自己的信任投票。¹⁷⁰唱名表决结果为 29 票对 23 票，另有 3 票弃权。梁赞诺夫和其他与会的布尔什维克温和派领导人（包括拉林、诺金和加米涅夫）没有现身投票，以及 4 名人民委员（列宁、托洛茨基、斯大林和尼古拉·克雷连柯）的“赞成”票，是决定性的。¹⁷¹

* * *

在 11 月 4 日中执委会议上安全过关后，列宁亲自向加米涅夫、季诺维也夫、梁赞诺夫和拉林发出最后通牒，威胁要把他们驱逐出布尔什维克党，除非他们要么立即同意以书面形式表示坚定支持中央委员会的政策，并在他们的所有讲话中提倡这些政策，要么退出一切公众活动，等待党代会的决定。¹⁷²加米涅夫、梁赞诺夫和拉林（尽管不包括季诺维也夫）立刻一道作出了桀骜不驯的回应，质疑列宁坚持要求他们提倡自己极为反对的政策的正当性，因为这种空前的要求是在强迫他们违背良心说话。¹⁷³

同时需要注意的是，在他的几位最杰出的盟友辞去政府职务后，加米涅夫继续留在他那仍然可能有着很大权力的中执委主席职位上，甚至在已有其他几位布尔什维克官员同情他们的时候，还避免正式表示与叛逆者团结一心。但是这种谨慎并不足以使他免于列宁的怒火。一旦列宁决定不惜一切代价与党内温和派决裂，他就一定会寻求将加米涅夫赶出中执委的领导层和布尔什维克中执委党团，并代之以一名更为顺从、更为可靠的党内同志。主要因为其在中央委员会书

¹⁶⁹ 基普：《争论》，第 86 页；《第二届工人、士兵、农民和哥萨克代表苏维埃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记录》，第 31-32 页；拉兹贡：《苏维埃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第 162 页。

¹⁷⁰ 基普：《争论》，第 86 页；《第二届工人、士兵、农民和哥萨克代表苏维埃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记录》，第 32 页；拉兹贡：《苏维埃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第 155 页，可用于分析此次会上的投票力量。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次会议初期人民委员们没投票时，列宁主义者少了一张程序票。

¹⁷¹ 基普：《争论》，第 86 页；《第二届工人、士兵、农民和哥萨克代表苏维埃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记录》，第 32 页。

¹⁷² 这一威胁位于列宁 11 月 5 或 6 日向四人写的正式短信中。《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会议记录》，第 137 页。

¹⁷³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会议记录》，第 142 页。

书记处书记任上对列宁忠心耿耿、毕恭毕敬，斯维尔德洛夫成了这份工作显而易见的人选。

在列宁的倡议下，11月8日晨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会议的与会者决定将加米涅夫赶出中执委领导层。¹⁷⁴当日晚些时候处置该问题的党团会议记录缺失。加米涅夫是否不战而败呢？鉴于其几天前决定留在自己的职位上，这似乎不大可能。从11月9日《新生活报》的一篇报道来看，加米涅夫宣布辞去中执委主席职务时，明确表示自己是被迫下台的。尽管如此，列宁挑选斯维尔德洛夫替代加米涅夫，从而得遂所愿。在左翼社革党的压力下，直接面对人民委员会争取中执委专权的斗争短暂地重新展开，而左翼社革党似乎也取得了一些进展。¹⁷⁵但是长期来看，在斯维尔德洛夫紧紧的控制下，中执委沦为了一片“遮羞布”¹⁷⁶。

* * *

全俄农民代表苏维埃（第二次）非常代表大会¹⁷⁷承认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的纲领，以及之后全俄农民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与全俄工兵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合并，也加强了列宁在11月中旬的战略地位。11月11日在彼得格勒召开的全俄农民代表苏维埃（第二次）非常代表大会的历史是错综复杂的。这里仅极为简单地指出，在很大程度上，代表大会是在布尔什维克和左翼社革党的倡议下，专门为进一步加强苏维埃政权的合法性而召开的——这通过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中执委和全俄农民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的合并而部分得到了实现。记录还表明，与1917年5月的全俄农民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不同，当时的控制会议的是社革党的中派和右派，农民代表们的第二次全国性集会则是左翼社革党拥有稳定的多数。¹⁷⁸

在11月14/15日夜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和左翼社革党中执委党团局的联合会议上，讨论了组建合并的中执委的问题，而在不久后的一次中执委会议和农

¹⁷⁴ 弗·邦奇-布鲁耶维奇（Владимир Дмитриевич Бонч-Бруевич）：《在二月和十月革命的战斗岗位上》（На боевых постах февральской и октябрь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莫斯科，1931年，第164页；《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会议记录》，第146页。

¹⁷⁵ 见下文。

¹⁷⁶ 这是叶连娜·斯塔索娃（Елена Дмитриевна Стасова）的描述（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17号全宗，4号目录，1号卷宗，第24-26张）。（原文为“无花果叶”。在西方传统视觉艺术中，常以无花果叶遮挡裸体形象的私处。故此，无花果叶有遮羞布的意思。——译者注。）

¹⁷⁷ 全俄农民代表苏维埃非常代表大会是农民代表苏维埃第二次召开的全俄代表大会。这次会议于11月25日（公历12月8日）闭幕，并决定于次日召开全俄农民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全俄农民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在代表人数上是非常代表大会的一倍多，并批准了非常代表大会有关执委会合并的决议。因此，非常代表大会不能冠名为第二次代表大会。拉宾诺维奇原文径直称作第二次非常代表大会，易造成混淆。故翻译时，将“第二次”字样放入括号内，以为区分。——译者注

¹⁷⁸ 330名代表中，195人是左翼社革党，65人是右翼社革党，37人是布尔什维克，14人无党派，7人是最高纲领派，4人是人民社会党，3人是左翼孟什维克，另有2人是无政府主义者。（弗·伊·拉夫罗夫〔Владимир Михайлович Лавров〕：《俄罗斯的“农民议会”：1917—1918年的全俄农民代表苏维埃代表大会》〔“Крестьянский парламент” России: Всероссийские съезды Советов крестьянских депутатов в 1917-1918 годах〕，莫斯科，1996年，第130页）。

非常代表大会上，也有此议。在当日夜代表大会主席团和中执委的联席会议上，确定了合并的条件。后者于次日得到整个代表大会的批准，由此使苏维埃政权成了俄国大多数人民象征性的代表。根据合并条件，除现有的 108 名代表外，中执委还将加入同样数目的农民代表大会代表、100 名士兵和水兵委员会代表以及 50 名工会代表。11月 15 日，在盛大的仪式上，农民代表大会的 108 名代表正式加入中执委。¹⁷⁹

在来自农民代表大会的中执委新委员当中，左翼社革党占据优势。因此有将近两周时间，他们在中执委当中的人数是超过布尔什维克的。左翼社革党同意，不利用自己的多数地位来重组政府，以待其他新委员的到来。¹⁸⁰结果，随着工会代表以及士兵和水兵委员会代表的加入，布尔什维克在中执委占据了主导地位。因此到 11 月底，布尔什维克在合并后的中执委中占据多数。鉴于传统上社革党在农民-士兵当中的威信，人们自然会问，在最终组建的新中执委当中布尔什维克重获多数是否合法地表达了人民的态度，还是说是布尔什维克耍手腕的结果，尤其考虑到来自武装力量的新成员。无论这一问题的答案如何，人们必须仔细想一想，为什么左翼社革党在执委会暂时获得多数之后不加以利用，以及（尤其是）为什么他们不试图建立一个左翼社革党占多数的内阁。

至于来自武装力量的新代表的合法性，布尔什维克在加入中执委的士兵代表中占多数，是与 1917 年夏末和秋季军队大规模从支持温和社会主义者转向布尔什维克相符的。¹⁸¹至于第二个问题，左翼社革党看上去有意放弃利用其在合并后的中执委当中的多数，似乎在此时，左翼社革党领导层只是缺乏挑战布尔什维克对政府的领导地位的信心和意愿。就此来讲，需要注意的是，左翼社革党恰在此时召开了建党代表大会（11月 19-28 日）。在 1918 年 10 月的左翼社革党第四次全俄代表大会上，卡列林在谈到这一时期时，将他所谓的左翼社革党在 1917 年末的权力恐惧（властебоязнь）归因于这样的事实：尽管其影响力不断增长，但他们才刚刚开始作为一个独立实体而存在，而且缺乏发达的党组织。“这种权力恐惧及其造成的苦行和隐修，”他回忆道，“是我们[左翼社革党人]很长一段时期的特点。”¹⁸²

这种自我察觉到的弱点的影响和保持对革命的影响的意愿是那样强烈，以至于尽管不断有迹象表明，列宁领导的苏维埃政府将随心所欲地行事，但左翼社革党如今还是就组建联合政府与布尔什维克展开了谈判。在 11 月 14/15 日夜的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和左翼社革党中央执委党团局的联席会议上，首次明确提出了加入政府的问题。¹⁸³两天后再次讨论了这一问题，那时斯维尔德洛夫在合并后的中执

¹⁷⁹ 弗·伊·拉夫罗夫：《俄罗斯的“农民议会”：1917—1918 年的全俄农民代表苏维埃代表大会》，第 169、172-176 页。另参见《苏共中央通报》，1989 年，第 1 期，第 234 页。

¹⁸⁰ 《左翼社会革命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会议记录》，第 46 页。

¹⁸¹ 对于这一点，参见艾伦·凯·怀尔德曼（Allan Kenyon Wildman）：《帝俄军队的终结：通向苏维埃政权与和平之路》（The End of the Russian Imperial Army: The Road to Soviet Power and Peace），普林斯顿，新泽西州，1987 年，尤其是第 9 章。

¹⁸²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564 号全宗，1 号目录，5 号案卷，第 74-75 张。

¹⁸³ 《苏共中央通报》，1989 年，第 1 期，第 234 页；《列宁年谱》，第 5 卷，第 59 页。

委参加了一次左翼社革党党团的会议。¹⁸⁴正是在左翼社革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会议上，玛丽亚·斯皮里多诺娃代表左翼社革党发声，为与布尔什维克的密切合作做了辩护。1906年，22岁的斯皮里多诺娃刺杀了坦波夫省的一位高级警官并因此承受了巨大痛苦，从此以后便成了俄国农民的传奇人物。¹⁸⁵在1917年，她是左翼社革党最为杰出的人物之一。在这次左翼社革党代表大会上，她坚称：“我们正处于历史巨变的起点。我们将经历许多难以预料的事情。正因此我们必须接近布尔什维克。但是我们厌恶他们的粗陋行径。我们之所以和他们保持密切联系，是因为群众……追随他们。”¹⁸⁶另一位左翼社革党领袖将近一年后、上述手段失败后回忆道：“我们加入布尔什维克的阵营，是为了把他们变得更为温和。”¹⁸⁷由于上述原因，到1917年11月中旬，在左翼社革党领导人当中，与布尔什维克合作的意愿是如此强烈，以至对于布尔什维克当局这样或那样的镇压措施的厌恶仅仅加强了它。因此，在11月17日的中执委会议上，斯皮里多诺娃在一次讲话中公开发出了左翼社革党有意加入人民委员会的信号。在这次讲话中，她痛斥布尔什维克不经中执委事前批准便解散彼得格勒市杜马。¹⁸⁸

紧接斯皮里多诺娃之后，在左翼社革党的坚持下，斯维尔德洛夫提出了一份宪法草案，规定了未来中执委与人民委员会之间的关系，以此作为进一步就联合内阁的组成展开谈判的前提条件。根据这部经过最少讨论即通过的宪法，人民委员会将完全向中执委负责。在制定法律之前，“所有立法活动，以及具有重要政治性质的法令将[由人民委员会]提交于执委会审议和批准”。打击反革命的相关措施则可例外，条件是人民委员会应就此向中执委做出解释。每一位人民委员有责任每周向中执委作报告，并对后者的质询必须立刻回复。¹⁸⁹

11月22日，在布尔什维克重获中执委多数派几天前，卡姆科夫在左翼社革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向自己的同事胜利地报告称，今后“没有中执委的进一步批准，一项法令都颁布不了。因此，中执委是立法权威，而人民委员会是执行政权。这是左翼社革党立场的巨大胜利。”¹⁹⁰其实不然。时间会表明，这种看法有赖于对部分布尔什维克的充分信任，并将巨大的任意权力留给了人民委员会。但在一段时

¹⁸⁴ 见上文。

¹⁸⁵ 萨莉·博尼切（Sally Boniece）在《玛丽亚·斯皮里多诺娃，1884—1918：女性殉道与革命神话的创造》（Maria Spiridonova, 1894—1918: Feminine Martyrdom and Revolutionary Mythmaking）（博士论文，印第安纳大学，1995年）中对斯皮里多诺娃神话的产生和发展做了令人信服的分析和阐释。

¹⁸⁶ 《左翼社会革命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会议记录》，第36页。

¹⁸⁷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564号全宗，1号目录，4号案卷，第280张。

¹⁸⁸ 《第二届工人、士兵、农民和哥萨克代表苏维埃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记录》，第71页。

¹⁸⁹ 《劳动旗帜报》（Знамя труда），1918年11月18日，第3页；基普：《争论》，第141-142页；《第二届工人、士兵、农民和哥萨克代表苏维埃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记录》，第71页。

¹⁹⁰ 《左翼社会革命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会议记录》，第46页；另参见拉兹贡：《苏维埃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第203-204页。

¹⁹¹ 参见例如基普：《争论》，第100-108页。

期里，人民委员还会尽责地向中执委报告自己的工作情况。¹⁹¹许多（尽管绝非全部）重要法令也在人民委员会通过后被转交中执委批准。

* * *

1917年10月25日至11月4日标志了俄国革命发展进程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此间，结束了由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创建清一色社会主义多党政的运动，建立了完全由布尔什维克组成政府。苏维埃代表大会采纳布尔什维克革命纲领的大部分内容，以及苏维埃政府对反革命的初步胜利，巩固了彼得格勒人民对布尔什维克的支持。在左翼社革党、孟什维克国际派以及中执委的其他左翼社会主义团体的支持下，布尔什维克温和派试图削弱人民委员会的任意权力，却横遭碰壁。布尔什维克温和派被逼出党的中央委员会，并退出了人民委员会。此外，全俄农民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承认，以及执行委员会的合并，加强了苏维埃政府的合法性。

当然，克伦斯基对左派为时已晚的攻击、温和社会主义者退出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及其在全铁工执委对话中不现实的立场，为上述发展铺平了道路。但显而易见的是，造成它们最重要的因素是（得到了托洛茨基支持的）列宁——他极为自信与自己对俄国和国际革命形势的判断力，他的钢铁意志以及不顾反对力量而达到自己目标的顽强决心，他高超的政治技巧，以及他没有顾虑。尽管彼得格勒十月革命背后有着人民的推动，但1917年10月25日至11月4日彼得格勒的政治发展进程却表明，有时个人会在历史当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

前4章已全部译完，但还有待进一步修订。从目前的四章内容来看，拉宾诺维奇的这部作品有价值，但仍不尽如人意。材料丰富，叙事繁琐，文笔平平，分析浅表，不甚深刻。鉴于仍有一定价值，所以将继续翻译下去。

—译者

二、从造反者到统治者

使人民委员会拓宽成分甚或向多党的中执委负责的努力失败了。与此同时，除布尔什维克和左翼社革党之外，没有哪个俄国政治团体愿意承认苏维埃政权的合法性。这便意味着，紧随十月革命之后，布尔什维克独力承担起维持秩序并向彼得格勒和周边地区提供市政服务、食物和燃料的责任。在宣布俄国全部政府权力转归苏维埃并拒绝广泛的政治联盟的时候，列宁和托洛茨基并没有特别关心自身举动的实用(practical)影响。他们所全神贯注于的，是保卫和巩固苏维埃政权，并以尽量激烈的措施来引起(在他们看来)关乎俄国革命存亡的、决定性的世界社会主义革命。但他们的立场却使彼得格勒市党组织、彼得格勒苏维埃和彼得格勒各区苏维埃的布尔什维克，被迫经历从造反者到统治者的转变、重组或新建地方政府和行政机构。此间雪上加霜的是，他们并未被告知将如何进行治理，同时还担负着为新中央政府机构提供服务人员并在全国传播和保卫革命的责任。这些重担不可避免地彻底改变了彼得格勒布尔什维克党组织的组成、架构、运作方式以及与其支持者的关系。

* * *

在十月的日子里，俄国各地从上到下的政府权力在原则上已转交于苏维埃，由此或许可以想见，彼得格勒的市、区苏维埃会迅速开始接管沙皇时代末期建立的各地方政府机构，如市杜马、区杜马及其所有管理局(управы)。可由于种种原因(这些原因对于理解彼得格勒苏维埃政府的演变及其与布尔什维克党委会对政府的影响之间的关系，有着重要意义)，事情却并未如此。以彼得格勒苏维埃的领导机构为例。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及其主席团(孟什维克和社革党在其中仍有相当力量)早在1917年9月，就开始由于政治内斗以及像托洛茨基这样的布尔什维克权威转任军革委和中央人民委员，而在很大程度上陷于瘫痪，并一直持续到11月末选出新一届执行委员会和主席团(均由季诺维也夫任主席，并被布尔什维克和左翼社革党控制)。直到那时，也就是在布尔什维克正式掌权一个多月后，彼得格勒苏维埃的执行机关才开始在革命俄国首都的治理当中发挥重要作用。¹⁹²作为新当选的执行委员会和主席团主席，此时已抛弃温和派从而使自己恢复了列宁的宠信的季诺维也夫，成了彼得格勒苏维埃的首脑。他将担任此职至1925年末。¹⁹³

¹⁹² 圣彼得堡中央国家档案馆，9618号全宗，1号目录，185号案卷，第1-42张。

¹⁹³ 对于季诺维也夫的彼得格勒政治首脑生涯富有洞见且简明的描述，参见亚·尼·奇斯季科夫(Александр Николаевич Чистиков)，《执掌权力》(У кормила власти)，载《时代转折中的彼得

在苏维埃政权初期，彼得格勒苏维埃定期集会。但由于各工厂和军事单位的千余名当选代表中，有数百人会出席大部分会议，苏维埃便实在太庞大而无法进行有意义的讨论和决策。除了少数例外，它的全体会议都是动员大会而非严肃的事务会议，旨在传播消息并就国内外问题争取人民支持布尔什维克立场的动员大会，而非解决重要问题。¹⁹⁴

军革委于 11 月 9 日以积极反对苏维埃政权为由，首先提出解散市杜马。¹⁹⁵11 月 16 日，人民委员会正式下令解散市杜马。¹⁹⁶次日，彼得格勒苏维埃通过托洛茨基提出的决议，呼吁彼得格勒苏维埃和区苏维埃的代表摒弃“只有资产阶级公务员才能管理国家这一陈腐的资产阶级偏见”，并准备立即创建“负责各种[地方]民事管理事务”的下属部门。¹⁹⁷

但这一指示并未得到落实，人民委员会解散现行杜马的法令反而明确规定，于 11 月 26 日举行新一届市杜马选举，并由后者留用供职于杜马管理局的资产阶级公务员。尽管托洛茨基一厢情愿，但无论彼得格勒苏维埃还是区苏维埃，实际上都没有市政治理和管理所必需的专业且稳定的成员或下属机构。由于显然不可能与其有效合作而解散现行杜马之际，人们还没有想过不选出新杜马。人民委员会首先关心的是尽快选出新一届杜马，以维持杜马管理局及其各级专业部门和委员会的完整性。11 月 27-28 日举行了选举。由于卡杰特和温和社会主义者抵制选举，结果建立了由布尔什维克控制的彼得格勒市杜马。

在十月后努力保留市政府的旧机构，这突出地表明，布尔什维克的苏维埃领导人实际上对日常市政管理兴趣寥寥。献身于革命的他们起初觉得，苏维埃并非人民自治机关，它绝未巩固革命的任务，最多也不过是制定而非执行公共政策的政治机构。当地布尔什维克在私下里坦率地承认了这一点。例如，一位布尔什维克奥赫塔区（Охтинский район）委员会委员在被同事问及为何去苏维埃不直接承担区杜马的工作时，他回答道：“地方自治机构是单纯的经济管理组织，而区苏维埃是政治机构。”他明确说道：“苏维埃不应该承担管理职能，否则会让本来就够困难的政治工作更加复杂。”¹⁹⁸

区一级的布尔什维克活动家自然担心，地方杜马及其管理局本身有可能异常敌视激烈的革命变革，以至苏维埃不得不直接承担市政治理的职责。但他们大都觉得，这是一种非常可厌的、最后的手段。一些党的地方活动家希望重新划分或

格勒》（Петроград на переломе эпох），瓦·亚·希什金（Валерий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Шишкін）主编，圣彼得堡，2000 年，第 35-42 页。

¹⁹⁴ 关于这一点，参见希什金：《时代转折中的彼得格勒》，第 11 页。

¹⁹⁵ 德·阿·丘加耶夫（Дмитрий Агеевич Чугаев）主编：《彼得格勒军事革命委员会：文献与资料》（Петроградский Военно-революционный комитет :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第 1 卷，莫斯科，1966 年，第 277 页。

¹⁹⁶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19 号全宗，1 号目录，2 号案卷，第 2 张。

¹⁹⁷ 《消息报》，1917 年 11 月 18 日，第 4-5 版。

¹⁹⁸ 中央国家历史-政治文献档案馆，1 号全宗，1 号目录，12 号案卷，第 8 张背面-13 张背面。

精简彼得格勒各区，从而避开那些特别不配合的地方杜马和管理局。¹⁹⁹这种想法虽并未付诸实施，但却表明，他们多么希望维持区苏维埃和杜马各自的职能区分，并保留专业的杜马各局来管理日常市政。

在十月的日子之后，卡杰特和温和社会主义者控制着全部区杜马（维堡区杜马除外）和中央市杜马。区苏维埃起初仍自缚手脚，对区杜马和管理局所做的，只是加以密切监视，并试图通过内中的布尔什维克来施以影响。直到 11 月末和 12 月（此时，布尔什维克才真正掌握了全彼得格勒的区苏维埃）公务员罢工时，区苏维埃才开始解散参与指挥罢工的区杜马。

区杜马的解散过程常常发端于当地布尔什维克党委。它根据对公务员怠工的投诉，通过呼吁解散和重选当地杜马的决议，并召开党员扩大会议或召集区内工厂和军事单位的布尔什维克代表就此进行投票表决，再由当地区苏维埃予以执行。²⁰⁰在这个彼得格勒苏维埃政权的初创期，党在市、区两级的决策是去集中化的。各区党组织的架构和（甚至）权力核心差异很大。它们的运作也仍然相对民主且松散。至少在一些区里，布尔什维克党委的决定对当地全体党员大会（党的地方最高权威）是没有约束力的。²⁰¹

区党委和区苏维埃解散区杜马的决议授权重选杜马。选举通常会着手准备，但实际上从未举行。尽管领导人不愿意，但形势逐渐地、程度不一地迫使彼得格勒区苏维埃尽力掌控杜马各局，并将自己转变为地方自治机构。同时到 1 月初，由于大部分老公务员终归依靠工资维生（而非由于像托洛茨基所主张的那样，他们被打垮并由新培训的革命群众代表替代），他们造成的停工也逐渐消失了。财力耗尽后，市雇员们返回了工作岗位。²⁰²从 1917 年 12 月初到整个 1918 年上半年，全彼得格勒的区苏维埃用这些雇员组建了提供关键市政服务的不同部门。

彼得格勒苏维埃政权建立时，人们或许觉得，布尔什维克彼得堡委员会会在制定广泛的公共政策方面发挥中心作用，并和区党委分别监督市、区两级政府。不过，事情朝这一方向进展还有待时日，而这种进展也迁延日久、困难重重，并造成了裂痕。在十月的日子之后，彼得堡委员会开会讨论的首先是全铁工执委对话、立宪会议选举及其命运、评估当前形势和狭隘的组织事务这类议题。至于党委在地方政府中的作用这一可能引起广泛讨论的议题，往往由于时间宝贵而被搁置。

¹⁹⁹ 中央国家历史-政治文献档案馆，1号全宗，1号目录，12号案卷，第 8 张背面-13 张背面。

²⁰⁰ 这一进程在科尔皮诺区的记录，参见中央国家历史-政治文献档案馆，2315 号全宗，1号目录，2号案卷，第 19-20 张，和 3 号案卷，第 48 张；彼得堡区的记录，6号全宗，1号目录，1号案卷，第 31 张背面、32 张背面、39 张及其背面和 40-41 张；奥赫塔区的记录，10号全宗，1号目录，12号案卷，第 4-5 张。

²⁰¹ 参见例如布尔什维克党新村区（Новодеревенский район）1917 年 12 月 11 日全体会议的记录。会议对区委员会的工作提出了一连串的批评，而后拒绝了区委的新村区区苏维埃人选，表明了自己的独立权威（中央国家历史-政治文献档案馆，13 号全宗，1号目录，1号案卷，第 21 张背面）。

²⁰² 关于这一点，参见奇斯季科夫：《执掌权力》，第 43 页。

在这段苏维埃统治的初始时期，布尔什维克的区级党组织，无论其架构如何，也把大量时间用于考量全国性问题。²⁰³在它们的直接参与下，动员了部队阻击预料中的克拉斯诺夫向彼得格勒的进军，组织了党的立宪会议和市杜马选战，还在没有上级指示的情况下，开始分别发展与工厂集体组织（collective）、区苏维埃和区杜马的联系。这些联系在各区不尽相同，而且也不成系统。区委员会向彼得堡委员会的定期报告表明，它们试图使党的高层权威了解基层人民的政治观点。他们最重要的职能是给中央和地方政府、革命法庭、赤卫队、工人民兵²⁰⁴和红军储备和提供人手，以助于革命在全俄的传播，并抵御在俄罗斯中部边缘地区组织起来的、反对苏维埃统治的力量。

甚至在创建社会主义联合政府的全铁工执委对话尚未瓦解之时，这类劲敌便首先在顿河州出现了。米哈伊尔·阿列克谢耶夫将军²⁰⁵曾在二月革命之初数周里担任俄军总司令，并于拉夫尔·科尔尼洛夫将军8月底企图政变之后成了克伦斯基的总参谋长。他于11月底赶到顿河州首府新切尔卡斯克，和顿河哥萨克阿塔曼²⁰⁶阿列克谢·卡列金将军²⁰⁷结成了脆弱的联盟。此后，他立刻着手组建部队²⁰⁸。以之为核心，形成了一支亲协约国的反布尔什维克军队，即后来所谓的“志愿军”²⁰⁹。此

²⁰³对于非常重要的政治问题，一般先由当地权威领导人（有时是该区在彼得堡委员会的代表）就此提交报告，并由当地工厂代表就人民情绪提交报告，然后区委员会再确定相应立场。参见例如布尔什维克第二市区（Второго городского района）委员会就全铁工执委谈判进行的讨论（中央国家历史-政治文献档案馆，1817号全宗，1号目录，3号案卷，第56-57张），以及布尔什维克奥赫塔区委员会就立宪会议的召开和地位以及和谈问题进行的讨论（中央国家历史-政治文献档案馆，10号全宗，1号目录，12号案卷，第1-10张）。

²⁰⁴工人民兵（Рабочая милиция）是二月革命后在俄国各主要城市由工人组成的民兵武装，主要任务为打击反革命和维持秩序，一般由工兵代表苏维埃发起、组织和控制。1917年3-4月，由社革党和孟什维克控制的各地苏维埃相继下令工人民兵并入临时政府内务部下属的民警（Гражданская милиция或Народная милиция）或市警（городская милиция）。此后，作为独立组织而存在的工人民兵逐渐消失。但当年俄历2月底（公历3月中上旬）成立的彼得格勒工人民兵抵制了苏维埃的合并命令，一直存在到七月事件期间，此后并入赤卫队。——译者注

²⁰⁵米哈伊尔·瓦西里耶维奇·阿列克谢耶夫（Михаил Васильевич Алексеев，1857-1918），生于军官家庭，1873年加入沙俄军队。曾参加第十次俄土战争、日俄战争。一战期间，历任俄军西南战线参谋长、西北战线司令和大本营参谋长。二月革命时，曾致电尼古拉二世，敦促其退位。临时政府时期，曾被任命为俄军最高统帅和最高统帅部参谋长。反对苏维埃与军队民主化，并实际上保护了科尔尼洛夫。十月革命后，逃至顿河流域，领导组织了反苏维埃的志愿军。此后一直担任志愿军的高级指挥官。1918年因病死亡。——译者注

²⁰⁶阿塔曼（атаман）即哥萨克首领，在帝俄时期是哥萨克军队最高军事长官的头衔。——译者注

²⁰⁷阿列克谢·马克西莫维奇·卡列金（Алексей Максимович Калядин，1861-1918），出生于顿河哥萨克军官家庭。一战期间曾在西南战线担任师长、军长和集团军司令。二月革命后因不服从临时政府而被解职，后被选为顿河哥萨克军的阿塔曼，积极从事反革命活动。十月革命后，参与领导了顿河流域反苏维埃政权的政治和武装组织，后兵败自杀。——译者注

²⁰⁸即“阿列克谢耶夫组织”（Алексеевская организация）。——译者注

²⁰⁹志愿军（Добровольческая армия）是1917年11月成立于顿河流域的白卫军，主要活动于南俄地区。1920年撤退至克里米亚后并入弗兰格尔指挥的白卫军武装。——译者注

后数周内，不仅安东·邓尼金将军²¹⁰来到新切尔卡斯克，与阿列克谢耶夫共事，而且更重要的是，科尔尼洛夫将军从政变失败后被关押的修道院里逃了出来，并同意与阿列克谢耶夫和卡列金一起领导这第一股重要的白军运动。

或许由于低估了青年哥萨克对结束战争的期望和对卡列金的冷淡，以及工业城镇罗斯托夫的工厂工人、顿巴斯矿工和非哥萨克农民（其中很大一部分是俄罗斯族）对苏维埃政权的潜在支持，列宁夸大了志愿军对革命存亡的威胁。越来越多的军官、士官生、大学生以及保守派和自由派领袖与志愿军建立了联系，这或许也加重了列宁对志愿军的担忧。从 11 月末开始，数千彼得格勒布尔什维克、赤卫队员、波罗的海舰队水兵和普通工人（其中许多人是在区党委的动员下），响应列宁有关镇压顿河州资产阶级反革命的紧急号召，加入了开赴南方的、规模日益壮大的苏维埃部队。1918 年 1 月底和 2 月初，这些杂乱的部队在弗拉基米尔·安东诺夫-奥弗申柯（他在十月的日子里指挥夺取了冬宫，并在随后与其他人一道担任陆海军人民委员）的指挥下，击溃了仍然相对薄弱的志愿军，将它从顿河州赶入冰封的库班草原。

这俄国内战的第一幕具有后十月时期的典型特征：竭尽彼得格勒的人力。在苏维埃政权的这段早期，由于无穷无尽的军事和民事紧急状况，许多区党委的会议和其他地方层级的布尔什维克集会已经将大量精力集中于任命和调动事宜，完全没有考虑过系统控制布尔什维克的杜马和苏维埃党团。即便对彼得格勒工人和士兵群众的政治鼓动也减少了。这种状况对于党控制政府机构来说，具有潜在的灾难性，并正以惊人的速度发展着。

早在 10 月 29 日，区党委代表向彼得堡委员会提交的报告和全彼得格勒基层党会的记录就证实，党的力量在衰落。奥赫塔区称：“作为[政治]生活中心苏维埃，正在进行一场斗争……党组织完全没有发挥作用。”纳尔瓦区的代表报告称：“党务工作在退步，[党务]工作人员已经被调到赤卫队或其他地方工作了。”一位涅夫斯基区（还是涅瓦区？）的代表附和道：“党务工作已经逐渐陷于停顿。”²¹¹

布尔什维克的科尔皮诺区（Колпинский район）委员会在 11 月 11 日为彼得格勒苏维埃物色 12 名人选时，任命名单中包括其数名最有经验的领导人，为首的是区委主席和书记。许多当选者是当地苏维埃或区杜马的成员。但在这次会议上，还为区苏维埃物色了 25 名额外人选。²¹²在该区 11 月 22 日的党委会议上，为当地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物色了 4 名额外委员，为当地粮食管理局物色了 3 人，还

²¹⁰ 安东·伊万诺维奇·邓尼金（Антон Иванович Деникин，1872-1947），出生于军官家庭。1890 年加入帝俄军队，曾参加日俄战争。一战期间，旅长、师长和第 8 军军长。二月革命后，任临时政府的最高统帅部参谋长。后因支持科尔尼洛夫叛乱而被捕。十月革命后，领导了南俄的反苏维埃白卫军，兵败后流亡国外。二战期间，支持卫国战争。——译者注

²¹¹ 《彼得堡委员会》，第 523-524 页。

²¹² 中央国家历史-政治文献档案馆，2315 号全宗，1 号目录，2 号案卷，第 18 张；3 号案卷，第 41 张；和 4 号案卷，第 3 张。

有 1 人成为区杜马和杜马局的首脑。²¹³

记录表明，在彼得格勒苏维埃政权元年，各区都派出了大量最精干的党务工作者，从而造成组织机能障碍。毫无疑问的是，人们起初一般觉得，许多任命是临时或兼职的，并且其中确有一小部分是如此。不过，由于那些被任命的人常在党外身兼数职，再加上布尔什维克在区苏维埃、革命法庭和类似政府机构中的责任以指数级扩大，大部分任命实际上使党员个人完全脱离了积极的党的鼓动和组织工作。在 11 月 16 日的彼得堡委员会会议上，斯卢茨基忧心忡忡地高声谈及这个问题。在关于当前局势的报告中，他提及社会革命党在当年夏季是如何被权力吞没的，并警告称，同样的事情正发生在布尔什维克身上。他问道：“我们在各个区里看到了什么？”他警告道：“所有人都在被政权分散和吞没，我们要采取措施防止被‘十月布尔什维克’[即十月后入党的新人]淹没。”²¹⁴各处的基层老党员都有着同样的担忧，但却无能为力。²¹⁵

最晚在 12 月，彼得堡委员会开始通过区党委召集新党员参加速成党务培训。这项培训在整个 1918 年时断时续地进行着。²¹⁶可是，甚至还没等培训，特别聪明能干的新布尔什维克就被派往非党务岗位。除了派新党员参加党校外，区委员会也试图通过雇佣全职、受薪的负责组织员（организатор）来重建工厂集体组织并在工人中协调招收党员和鼓动工作，以此来弥补老干部的损失。因此毫不巧合的是，在 11 月 11 日，在把许多最称职的党员派往政府机构后，科尔皮诺区委选择 1 名全职组织员来重建由于上述损失而遭到严重削弱的工厂集体组织。但即便这样的做法实际上也起不了实效。区党委及其精心培育的网络很快就陷于紊乱之中，那些对于布尔什维克在 1917 年夏获得普遍支持和在十月革命前后得以制定成功战略战术至关重要的密切的相互联系被打破了。

至于人民委员会，甚至在其开始定期开会（即 11 月 15 日）之前，列宁和其他人民委员就开始以它的名义颁布与彼得格勒有关的法令，例如，有关出版限制的法令。11 月中旬之后，随着彼得格勒市杜马的解散，人民委员会开始毫不犹豫地不与地方当局协商，便颁布有关首都地方政府的法令。但现存证据集中表明，从十月的日子到 1917 年 12 月 5 日其解散时，军革委是彼得格勒的头号政府当局。军革委由彼得格勒苏维埃建立，起初是为了监视临时政府对彼得格勒卫戍部队的部署情况，后被布尔什维克熟练地用于推翻克伦斯基。²¹⁷固然，它在技术上仍然隶属于彼得格勒苏维埃，但在夺取政权之后，实则成了一个在相当程度上不受外部

²¹³ 中央国家历史-政治文献档案馆，2315 号全宗，1 号目录，2 号案卷，第 19 张；和 3 号案卷，第 42 张。

²¹⁴ 《彼得堡委员会》，第 571-572 页。另参见中央国家历史-政治文献档案馆，6 号全宗，1 号目录，1 号案卷，第 39 张。

²¹⁵ 就此可参见布尔什维克彼得堡区 12 月 11 日全体会议的区委报告和有关干部损失的讨论（中央国家历史-政治文献档案馆，6 号全宗，1 号目录，1 号案卷，第 29 张背面-30 张背面）。

²¹⁶ 中央国家历史-政治文献档案馆，1 号全宗，4 号目录，84 号案卷，第 20-25 张；2315 号全宗，1 号目录，4 号案卷，第 3 张；6 号全宗，1 号目录，33 号案卷。

²¹⁷ 参见本书序章。

控制的全国性机构。不论愿意与否，在与反布尔什维克部队交战以及维护安全与秩序的过程中，面对杜马各局老公务员停工和各级政府混乱致使危机连绵所造成的真空，军革委将自己的活动范围从指挥军事行动和警务扩大到这些领域：食物、燃料和其他基本必需品的获取、运输和分配；交通与旅行；劳动关系和工资；公共健康；监狱管理；住房分配。²¹⁸

领导军革委的常务局试图整顿不断变化、职能重叠的各部门的过量情况。它派出的大量人民委员（主要是从党委、工厂和军事单位抽调而来的布尔什维克和左翼社革党人）被授予掌管政府机构、各种企业和军警力量的无限权力。显而易见的是，虽然在不断地努力改进，但军革委的运行仍然混乱而粗陋。11月22日左右，军革委书记处书记谢尔盖·古谢夫由于该组织持续“混乱”而离职。他在一封痛苦的辞职信中，解释了原因：“军革委工作的组织问题是不断讨论过了的，已经通过决议，授权建立部门和委员会，并给它们委派军革委成员……这些决议全都沒有落实，军革委的工作仍旧混乱无序。”他宣称自己完全失去了改革军革委的希望，要求在24小时内解除自己的职务。²¹⁹

古谢夫被说服留任，其中部分原因可能是人民委员会减轻了军革委的职责。²²⁰军革委的组织问题无论如何都不应掩盖，它在十月后的最初几周里，获得了巨大而独立的权力和职权范围。普遍看来，10月28日镇压士官生起义和几天后克拉斯诺夫部队在普尔科沃的失败加强了军革委作为苏维埃政权的地方指挥部的地位。从那时起，布尔什维克控制的区苏维埃开始向军革委寻求帮助和指导。由于配有工人赤卫队、彼得格勒卫戍部队士兵、波罗的海舰队水兵和大量武器弹药储备，它成为彼得格勒唯一能以军事力量建立秩序的机构。此外，尽管存在组织方面的缺点，但布尔什维克的核心领袖时常在军革委中活动。军革委在治理彼得格勒（就其有被治理而言）方面发挥的关键作用是明确无误的。因此，对于紧随十月革命之后的彼得格勒政府，当代彼得堡历史学家亚·尼·奇斯季科夫²²¹所做的结论是无可辩驳的：“军革委是苏维埃政权的化身……占据了彼得格勒苏维埃的位置，并且也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中央市杜马。”²²²

²¹⁸ 目前最好的（尽管还不完全）已刊军革委资料是丘加耶夫：《彼得格勒军事革命委员会：文献与资料》，第1-3卷，莫斯科，1966-67年。20

²¹⁹ 丘加耶夫：《彼得格勒军事革命委员会：文献与资料》，第3卷，第270页。

²²⁰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19号全宗，1号目录，11号案卷，第2张；并参见第3章下文。

²²¹ 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奇斯季科夫（Александр Николаевич Чистиков，1956-），俄罗斯历史学家，在俄罗斯科学院圣彼得堡历史研究所俄国现代史研究室工作。——译者注

²²² 参见奇斯季科夫：《执掌权力》，第10-11页。另参见军革委成员弗拉基米尔·阿尔加索夫在左翼社革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就军革委所做的报告（《左翼社会革命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会议记录》，第47页）。23（弗拉基米尔·亚历山德罗维奇·阿尔加索夫〔Владимир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Алгасов，1887-1938〕，原姓布尔达科夫〔Бурдаков〕，父亲是终身贵族。1903年加入社会革命党，1908年被捕并流放，后在哈尔科夫和彼得格勒工作。一战期间持国际主义立场，二月革命后为哈尔科夫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委员，参与创建了左翼社革党在乌克兰的组织，第一届苏维埃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十月革命后当选第二届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积极支持布尔什维克，并参加了彼得格勒军事革命委员会。参与创建了左翼社革党的独立组织，随后作为左翼社革党代表加入人民

* * *

苏维埃政权最初几周里布尔什维克任意的、无组织的政策和行动（其中许多是由军革委实施的）招惹了所有主要的反对派政治团体。此外，它们还至少在短期内加速并加深了彼得格勒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崩溃。布尔什维克将日益扩大的混乱归咎于前任，并坚称，自己正在采取的坚决措施是使局势好转的最迅速、最保险的办法。但这些政策部分试图吸引的焦躁的工人、农民-士兵和水兵接受这种说法吗？或者说，他们对布尔什维克和苏维埃政权的忠诚，像孟什维克和社革党人所坚称的那样，是动摇不定的吗？

11月12-14日的立宪会议选举充分体现了彼得格勒和附近北方战线部队的政治舆论。²²³就此而言，注意到这一点是重要的：虽然随着布尔什维克夺权出现了广泛的民事混乱，但总体来讲，整个立宪会议选举的公平性是无可质疑的。²²⁴尽管许多选战是消极的，但对传单、海报的出版和发放限制已放松到足以使所有竞选党派和团体能够阐述自己的纲领和未来愿景。如前述，布尔什维克被认为具有这样的优势：能够通过颁布革命法令，得偿所愿，使群众和自己更为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以似乎划时代的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决议为开端，布尔什维克试图全力发挥这一优势。但传播条件限制了它的作用。在十月之后许多周里，俄国大部分地区对彼得格勒局势实际上只有模糊的了解。在11月25日人民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代理财政人民委员维亚切斯拉夫·缅任斯基²²⁵担心道：“政府法令还没通电全国，它们只出现在彼得格勒的出版物上。”²²⁶人民委员会同意采取措施解决这个问题，但无论最后措施如何，显然为时已晚，无法影响全国选举。

在推翻临时政府前夕，布尔什维克彼得堡委员会便组建了一个立宪会议选战

委员会，从事司法工作。1918年左翼社革党暴动后，因反对与布尔什维克决裂而退出左翼社革党，同年9月加入俄共（布）。内战期间在乌克兰从事地下工作，此后在基辅、哈尔科夫和顿涅茨克从事高等教育工作。1930年代，在莫斯科苏维埃工作。大清洗期间被处决，1957年平反。——译者注

²²³对立宪会议选战及其结果和命运最有启发性、最全面的研究是列·格·普罗塔索夫（Лев Григорьевич Протасов）：《全俄立宪会议兴亡史》（Всероссийское Учредительное собрание. История рождения и гибели），莫斯科，2007年。

²²⁴参见奥·亨·拉德基（Oliver Henry Radkey）：《投票的俄国：全俄立宪会议选举》（Russia Goes to the Polls: The Election to the All-Russian Constituent Assembly），伊萨卡，纽约州，1989年，尤其是第87-135页。关于这一点，另参见马·文·维什尼亞克（Марк Веньяминович Вишняк）：《全俄立宪会议》（Всероссийское учредительное собрание），巴黎，1932年，第92页。

²²⁵维亚切斯拉夫·鲁道福维奇·缅任斯基（Вячеслав Рудольфович Менжинский，1874-1934），又译“明仁斯基”，出生于彼得堡信东正教的波兰裔贵族家庭。从彼得堡大学毕业后，在工人夜校从事教学工作。1902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后成为布尔什维克。1903年起，在雅罗斯拉夫尔从事党务、工运和宣传工作。1905年革命期间，在彼得堡从事军事工作，次年被捕。1907年起流亡国外。二月革命后，回国从事宣传工作。十月革命期间参加军事革命委员会，后任历任副财政人民委员和财政人民委员会，参与了银行的国有化工作。1917年末加入契卡，次年短暂在德从事外交工作。1919年领导乌克兰的工农检查院。1923年起，担任国家政治保卫局第一副主席。1926年捷尔任斯基去世后，继任国家政治保卫局主席。1934年因病去世。——译者注

²²⁶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19号全宗，1号目录，11号案卷，第10张背面。

委员会。²²⁷但它的⼯作⾃然被十月的⽇⼦打断了，并且直到选前⼏天才重新恢复。对于党的选举策略，布尔什维克彼得堡委员会只在11月8⽇与积极党务工作者的紧急会议上讨论过一次。沃洛达尔斯基代表委员会领导层，在会上做了开场报告。报告传达了委员会领导层对选战的关切。首都苏维埃政权的巩固或许会削弱布尔什维克的潜在选民对选举的重视。显然出于对这种可能性的不安，沃洛达尔斯基强调了传递这种信息的重要性，即立宪会议能否实现苏维埃的纲领，完全取决于党在选战中的胜利。

如果布尔什维克败了，会怎么样？在报告开头，沃洛达尔斯基宣称，立宪会议选举必然成为各阶级争夺政权的斗争的一部分，因此应当引导革命群众面对这样的事实：如果布尔什维克没有赢得立宪会议代表的多数，那就有必要发动第三次革命。沃洛达尔斯基的这种说法被泄露给媒体之后，引起公众的巨大愤怒。²²⁸不过，对于苏维埃政权的对手在立宪会议占据上风情况下的适当应对措施，与之相关的主要问题，在11月8⽇的彼得堡委员会会议上却被予以搁置。全力进行选战和如期举行选举是根本的头等要务，领导层的这一看法得到了大多数人的赞同。因此，焦点被转移到尽可能地增加布尔什维克的得票数，以使其（如沃洛达尔斯基所言）“反映工人、士兵和农民的意志”²²⁹。

在持续不断的集会和工厂会议上，在遍布工厂区的热烈激昂的传单上，以及尤其在党的报刊上，布尔什维克把自己表现为主张立即媾和、彻底社会革命和坚决行动的党——独自领导着与资产阶级反革命政党卡杰特的战斗的革命无产阶级政党。²³⁰主要的中间派政党，社革党和孟什维克，是无足轻重的。11月10⽇，托洛茨基开始兑现布尔什维克在十月前做出的揭露战争的帝国主义性质的诺言，刊布俄国与其盟国之间有关战争企图的秘密通信。恰在此时，苏维埃政府争取立即媾和的努力似乎有所进展：德国人似乎有意停战。11月13⽇《真理报》的头版头条和社论记录了布尔什维克的主要选战话题之一：每给布尔什维克名单投一票，就给争取立即媾和的努力提供了一份支持，并能最大程度确保近期结束战争。社论称，给4号名单（布尔什维克名单）投票是与十月革命和苏维埃政权团结一致的最好表现。²³¹

彼得格勒布尔什维克专门努力争取工厂⼥性的⽀持。这在布尔什维克发起的彼得格勒女⼯第一次代表会议11月12⽇的会程当中得到了很好的反映。正如上一

²²⁷ 普·弗·库杰莉(Прасковья Францевна Куделли)：《1917年7月与10月的布尔什维克第二与第三次彼得格勒市代表会议：会议记录与资料》(Вторая и третья Петроградские общегородские конференции большевиков в июле и октябре 1917 года. Протоколы и Материалы)，(译者注：拉宾诺维奇原文遗漏“与资料”字样)莫斯科-列宁格勒，1927年，第115-117页。

²²⁸ 普罗塔索夫：《全俄立宪会议》，第266页。

²²⁹ 《彼得堡委员会》，第564页。

²³⁰ 国立社会-政治图书馆，传单特藏。

²³¹ 《真理报》，1917年11月13日，第1版。正如当时俄国的大部分其他选举一样，这次选举是由党派名单决定的。各党在一定选区所赢得的议席数取决于其名单所获票数。党委在党的名单上按位次列出候选人。而位次会严重影响候选人在选举中的前景。

章所述²³²，这次代表会议首先旨在动员工厂女性支持布尔什维克的选举名单。会议主席、印刷工兼《女工》编辑（尽管只接受过4年正规教育）克拉夫季娅·尼古拉耶娃²³³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解释为什么女工只应给布尔什维克投票：在19份选举名单中，只有布尔什维克名单坚定地代表工人，并且会努力巩固她们艰难赢得的革命成果。她特别警告自己的听众，不要受骗、不要给主要由卡杰特的妇女平权同盟²³⁴成员组成的7号名单投票。她解释称，同盟的代言人在工厂选战中保证捍卫女工的利益；可实际上，一旦被选进立宪会议，同盟的代表便会特权妇女代言。“我们这些有[阶级]觉悟的妇女明白，我们没有任何特殊的妇女利益，不应该有单独的妇女组织，”尼古拉耶娃宣称，“只有和所有为社会主义而战的工人团结在一个无产阶级友爱大家庭中，我们才能真正强大起来。”²³⁵

这次会议结束前，妇女平权同盟的多罗舍夫斯卡娅（Дорошевская）公民要求发言。在亚历山德拉·柯伦泰的坚持下，她被给予了一次发言机会。她说，来自世界各地的女性都曾造访同盟来赞扬它的努力；同盟实际上正在革命俄国领导争取女性权利的胜利斗争；男性不可能捍卫女性的利益，因为他们对此一无所知。她最后说道：“我自己是一名劳动妇女、一位医师，我的丈夫抛弃了我，[而]所以我必须用自己的劳动抚养我的孩子们。”²³⁶

集会的工厂女性没人对多罗舍夫斯卡娅表现出丝毫同情。她们显然更同意一位代表的看法。这位代表嘲笑了全体女性有共同利益的说法，并提出，应该就此问问那些给多罗舍夫斯卡娅这样的人干活的“女仆同志”。另一位代表显然也得到了工厂女性的赞同。她大声质问，工厂女性每天工作长达14小时的时候，孕妇在自己的工作台上失去婴儿的时候，妇女平权同盟在哪里。另一位代表也激起了她们的积极共鸣。她坚称，仅仅因为他们是男人就反对男人是不公平的，“没有也不能有跟男工的冲突，我们和他们在一个台子上工作，我们和他们在同一个阶级队伍中一道为自由的生活和诚实民主的和平而战斗”。而柯伦泰对多罗舍夫斯卡娅的富有战斗性的回应表明，后者请求支持妇女平权同盟短暂地掩盖了会议期间产生的这样一种根本分歧：柯伦泰相信女工确实有特殊利益，并因此支持以党的专门机构来推进这些特殊利益；彼得格勒布尔什维克的大部分女性领导人（例如尼古拉耶娃和孔科拉耶娃·萨莫伊洛娃²³⁷）则不考虑性别问题，而主要关注一般的党务

²³² 参见第一章上文。

²³³ 克拉夫季娅·伊万诺夫娜·尼古拉耶娃（Клавдия Ивановна Николаева，1893-1944），生于彼得堡工人家庭。1909年加入布尔什维克，二月革命后任《女工》杂志编辑。十月革命后继续从事妇女工作。1920-30年代，主要从事组织工作和苏维埃工作。——译者注

²³⁴ 全俄妇女平权同盟（Всероссийская Лига равноправия женщин），成立于1907年，初名“俄罗斯妇女平权同盟”（Российская Лига равноправия женщин），二月革命后更名。主要活动于彼得堡和莫斯科，组织了第一次全俄妇女代表大会，与立宪民主党关系密切。十月革命后不久解散。——译者注

²³⁵ 《女工》，1917年12月8日，第10-11页。

²³⁶ 《女工》，1918年1月26日，第10-11页。

²³⁷ 孔科拉耶娃·尼古拉耶夫娜·萨莫伊洛娃（Конкордия Николаевна Самойлова，1876-1921），出生于西伯利亚的教士家庭。1897年参加学生运动，1901年被捕。次年流亡至巴黎，结识列宁

问题，并且对她们来讲，专门的女性出版物或者党的女性部门不过是一种吸引女工参加共同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实用手段。²³⁸

布尔什维克选战传递给女性的信息也见于传单和报纸呼吁。其中就包括《女工》的一篇由萨莫伊洛娃撰写的社论《立宪会议与女工》。她写道，二月革命使革命女工和男工以及士兵一道，赢得了像言论、出版、集会自由以及不分性别的投票权这样的权利。由于立宪会议会规定一种全新的国家秩序，并通过许多新法律。因此这些法律把她们的权利和一般的工人权利一并加以保护，对女工来讲是至关重要的。只有男性和女性工人利益的真正捍卫者——布尔什维克才能确保，通过孕产、健康和养老保险相关的法律，以及建立选举产生的、密切监督女性工作条件的女性工厂监察，来保护女性的劳动。²³⁹

主要的敌人卡杰特也像布尔什维克那样，在自己的选战中，将选举描绘成首先是在两种针锋相对的愿景之间做出抉择。例如当时卡杰特的一篇社论所言：“在国家面前摆着两条路——一条路是深入阶级斗争和国家的毁灭，另一条则是将俄国团结起来并在其中确立强大的国家秩序。第一条路最明确的代表是布尔什维克，第二条则是人民自由党[卡杰特]。必须坚决而明确地做出抉择。”²⁴⁰一份名为《名单》的卡杰特选战传单非常明确地表示，投票给由帕维尔·米留可夫领衔的2号名单（即卡杰特名单）便是投票支持将全部政府权威转交立宪会议，以及反对布尔什维克和苏维埃政权：“立宪会议选举正在临近。这个机构是唯一真正的俄罗斯土地的主人²⁴¹……公民们，你们必须明确表示，不要他们[布尔什维克]——那么些双手被自己兄弟的鲜血弄脏的人来建设新俄国，而要那些天生具有真正的国务活动家品格的人、那些真正热爱自己国家的人、那些准备将她从[外国]敌人手中解放出来的人、那些尊重人民自由的人……把您的票投给人民自由党，唯一国家的、非阶级的和民主的党。”²⁴²

孟什维克也支持立宪会议；他们严辞斥责布尔什维克和卡杰特。11月12日《工人报》的头版头条标题是：“今天是选举日——给16号名单投票——绝不给布

并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3年回国，此后在多地从事革命工作。1912年担任《真理报》编辑部秘书。1914年参与筹办《女工》杂志。二月革命后在彼得格勒从事组织和宣传工作。1917年5月，参与复刊《女工》杂志，此后主要从事女工的宣传和组织工作。1921年因病去世。——译者注

²³⁸ 《女工》，1918年1月26日，第11-12页。关于双方在会上的分歧，参见伍德：《婆娘与同志》，第69-70页。

²³⁹ 《女工》，1917年10月18日，第5-7页。

²⁴⁰ 转引自奥·尼·兹纳缅斯基（Олег Николаевич Знаменский）：《全俄立宪会议：召集与政治崩溃的历史》（Всероссийское учредительное собрание: История созыва и политического крушения），列宁格勒，1976年，第257页。

²⁴¹ 原文为“Lord of Russia”，本书俄译本回译为“Хозяин земли Русской”（俄罗斯土地的主人）。“俄罗斯土地的主人”是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在1897年参加人口普查时对自己职业的描述。——译者注

²⁴² 詹姆斯·布尼安（James Bunyan）和哈·亨·费希尔（Harold Henry Fisher）：《布尔什维克革命，1917-1918年：文献与资料》（The Bolshevik Revolution, 1917–1918: Documents and Materials），斯坦福，1965年，第345-346页。

尔什维克投票！”该报当天的主旨社论解释称，选举是革命俄国最后的生存希望。只有代表真正民主派的党派（即所有社会主义党派）、工人组织、地方自治局、市杜马以及类似实体组成的立宪会议才能结束布尔什维克夺权，并建立一个有权威的、合法的、在国内外得到一致尊重的政府。只有由真正的社会民主党人领导的立宪会议才能带来真正的和平、民主共和国和土地归于农民。卡杰特并不反对复辟君主制；他们继续抵制无偿没收土地，并准备为协约国帝国主义的利益而牺牲俄国。布尔什维克加剧了无政府状态和内斗，并准备接受会使俄罗斯国家完全解体和崩溃的可耻的和平条件。²⁴³

类似孟什维克，社革党人在选战中也把他们的大量攻击火力平均分摊到布尔什维克和卡杰特身上。仿佛之前几个月里从未和俄国头号自由派政党有过密切合作。这种对布尔什维克和卡杰特的恶意在社革党日报《人民事业报》11月12日相邻发表的社论《不要投票给布尔什维克》和《绝不投票给卡杰特》中得到了体现。没人应该投票给布尔什维克，因为他们用武装阴谋手段夺取政权，并已经或正在背弃自己的全部诺言。此外，他们还威胁称，如果不自愿便驱散立宪会议。²⁴⁴不应投票给卡杰特，因为他们已经表明自己并非革命者和真正的民主派，甚至都不是可靠的共和派。卡杰特的理想不是尽早实现无胜败的、民主的和平，而是赢得战争。对他们来说，任何有益于那些在革命前掌握特权和统治地位的阶级的制度都是好的。²⁴⁵

²⁴³ 《工人报》(Рабочая газета), 1917年11月12日, 第1版; 1917年11月13日, 第1版。

²⁴⁴ 《人民事业报》(Дело народа), 1917年11月12日, 第2版。

²⁴⁵ 《人民事业报》, 1917年11月12日, 第2版。



图 2 彼得格勒人阅读立宪会议竞选海报。乔纳森·桑德斯特藏。

虽然否定卡杰特的改良主义，但按当代标准来看，社革党竞选纲领里也没有多少激进的内容。确实，除了土地社会化（即不给所有者补偿而永久没收全部农田供农村“劳动者”使用）的农村革命纲领之外，社革党的主张很少超出现代福利国家的范围。社革党纲领中的关键内容包括：全部国家权威转交立宪会议；迅速达成公正的双边和约（尽管这样的和约具体将如何达成是不清楚的）；批准建立民主共和国；通过保障基本公民权利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律；女性平权（像布尔什维克一样，社革党人也以女性选票为目标）；²⁴⁶颁布自由主义经济和社会法规，例如八小时工作制、最低工资以及国家补贴的失业与事故保险。

与此相反，左翼社革党人的竞选纲领确实号召进行革命性的政治和社会变革。当然，此时的左翼社革党继续支持立宪会议作为革命俄国最高政治权威的神圣性。但是对他们和布尔什维克来说，立宪会议选举和会议本身的进程都是天然的阶级斗争舞台。此外，在罔顾争取实现革命目标的议会制斗争形式的约束这方面，左翼社革党人实际上不逊于布尔什维克。他们的选战承诺包括：立即解散列宁和托洛茨基的政府；最终创建一个清一色广泛的、团结的、向苏维埃负责的社会主义联合政府；立即实现没有胜败的和约（如果有必要，可以直接向交战国人民发出呼吁）；为国际社会主义的胜利而斗争；工人监督工厂。简言之，左翼社革

²⁴⁶ 参见例如传单《妇女们，在立宪会议选举中投票！》，国立社会-政治图书馆，传单特藏。

党人主张消除布尔什维克“过早”夺取政权的政治破坏，并通过立宪会议实现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原则性法令。

对左翼社革党人来讲不幸的是，在立宪会议选举中，他们有着重要的结构性缺陷。在选后刚好一周召开的左翼社革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左翼社革党人把自己组织成为一个单独的党。但在目前情况下，他们的立宪会议候选人被夹在9号名单的社革党中派和右派之间。这份按序排列的名单是在社革党内的分歧变得不可调和之前的9月指定的。选民不能具体指出支持哪位参选人（如果他们明白参选人的差异），并且由于操控着全国大部分社革党名单的组成和排序，社革党中派和右派能够确保最大程度增加他们的候选人。

那么选举结果如何呢？由于在乡村农民当中的优势力量，社革党在全国得票最多。与其他温和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团体一道（得票率相加为62%），他们可以很好地掌控立宪会议。但在彼得格勒及其郊区，体现当地政治态度的选举结果却大相径庭。首都选民的参选率非常高：约94万2333位公民参选，占资格选民的将近80%。卡杰特在首都市中心的资产阶级区中获得了强劲的支持，结果名列第二，得票24万6506张，占总票数的26.3%。²⁴⁷妇女平权同盟得票5231张，占总票数的0.5%。²⁴⁸与此前的全市选举相比，温和社会主义者相当数量的右翼选票流失给了卡杰特，左翼则给了布尔什维克（社革党得票15万2230张，得票率16.2%；孟什维克得票2万9167张，得票率5%）。布尔什维克得票42万4027张，得票率45.2%，是毫无疑问的胜利者。²⁴⁹他们赢得了彼得格勒全部18个选区中的12个，他们完全控制了彼得格勒的工人阶级区。此外，他们在彼得格勒卫戍部队士兵（此前是社革党人的保留地）中也表现得同样优秀，得票率75%。布尔什维克党在波罗的海水兵和战略上至关重要的北方战线士兵中表现出的力量，也同样值得注意。在其余6个选区当中，卡杰特领先。²⁵⁰

总之，彼得格勒地区的立宪会议选举结果表明，革命的布尔什维克的政策和苏维埃政权得到了下层阶级强有力的支持。颇为重要的是，在选举前夕，全铁工执委终于承认失败。它正式承认了中执委的政府权威，并将自己的注意力转向控制交通人民委员部。²⁵¹在评论彼得格勒的选举结果时，一位失望的《新生活报》通讯员恰如其分地写道：“但我们对此或许有所感觉，我们唯一能够承认的是：即便就立宪会议来看，彼得格勒工人也承认布尔什维克是他们的领导者及其阶级利益的代言人。”²⁵²列宁如今可以期望，在关乎苏维埃统治的未来的、与立宪会议的冲突中，彼得格勒的工人、士兵、水兵以及北方战线的部队会支持布尔什维克。

²⁴⁷ 拉德基：《投票的俄国》，第36页。

²⁴⁸ 兹纳缅斯基：《全俄立宪会议》，附录表1。

²⁴⁹ 拉德基：《投票的俄国》，第36页。

²⁵⁰ 兹纳缅斯基：《全俄立宪会议》，第277页和附录表；苏联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十月武装起义：一七年在彼得格勒》（Октябрьское вооруженное восстание: Семнадцатый год в Петрограде），第2卷，列宁格勒，1967年，第491页。

²⁵¹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19号全宗，1号目录，15号案卷，第2、30张。

²⁵² 《新生活报》，1917年11月16日，第1版。

在立宪会议选举结果公布后，列宁派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领导层对此逐渐形成了两手政策。首先，它鼓动召回反对苏维埃政权的立宪会议当选代表。选举结果公布后，中执委迅速通过了一份列宁起草的法令，要求召回选举。它将召回和重选立宪会议代表的权利交予地方苏维埃。²⁵³尽管最近公布的数据表明，召回运动是有希望的，²⁵⁴但距离立宪会议计划中的开幕日太近了，并且无论如何，它太过短命以至实际影响很小。其次，社革党、卡杰特、孟什维克和其他敌视苏维埃政权的团体与机构试图主导立宪会议的准备工作，并努力动员人民对此予以支持和维护。布尔什维克中央领导层试图加以阻挠，因而布尔什维克努力控制一切与立宪会议开幕和进行相关的事务，将苏维埃政权的重要反对者标记为人民公敌并加以监禁，让党组织和彼得格勒下层阶级为立宪会议可能的解散做好准备。

彼得格勒市杜马，这个抵抗苏维埃政权、支持立宪会议的全国中心，²⁵⁵于 11 月 16 日被人民委员会解散了。它的解散引起了新一波自由派和温和社会主义团体以及甚至左翼社革党的抗议浪潮。作为回应，市杜马通过社革党-卡杰特的联合决议，拒绝承认苏维埃政府的权威，并仿佛什么都没发生似的继续运作。事情于 11 月 20 日达到关节点。抵达市杜马参加夜间会议的代表们被武装水兵和赤卫队阻止入内。代表们闯了进去，继续他们的既定议程，但迅速被强行驱散。²⁵⁶他们在另一个地点重启议程，并在最后宣布立宪会议开幕的 11 月 28 日为全国性节日。当夜的晚些时候，军革委搜查了反对派杜马领袖的寓所，并逮捕了其中一些人。除了市长格里戈里·施赖德尔²⁵⁷和他的一名亲密伙伴之外，所有被捕者很快就被免职

²⁵³ 基普：《争论》，第 144-146 页。

²⁵⁴ 泰·瓦·奥西波娃（Таисия Васильевна Осипова）：《革命与内战时期的俄国农民》（Российское крестьянство в революции и гражданской войне），莫斯科，2001 年，第 66 页。奥西波娃表明，由于土地法令已经开始实施，许多农民根本不关心立宪会议，并且他们的决议坚称，如果立宪会议不承认苏维埃政府的法令，就应该被解散。根据 415 个乡（волость）的农民会议数据，她得出结论，这些地区有 53.5% 的农民支持苏维埃政权，30% 的农民仍然支持政权转归立宪会议，而 16.5% 的农民在两者之间摇摆。

²⁵⁵ 解散彼得格勒市杜马和对于立宪会议有关的反革命活动的担忧之间的联系，参见拉兹贡：《苏维埃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第 250 页。

²⁵⁶ 《彼得格勒市杜马日志》（Журнал Петроградской городской думы），彼得格勒，1917 年，第 123 期，1917 年 11 月 20 日会议，第 1-24 页。

²⁵⁷ 格里戈里·伊里奇·施赖德尔（Григорий Ильич Шрейдер，1860-1940），年轻时即参加民意党人的活动，1900 年代初加入社会革命党。1906 年流亡意大利，此后从事新闻工作。1917 年 5 月回国，6 月当选彼得格勒市临时市长，8 月当选正式市长。支持镇压科尔尼洛夫叛乱，但反对十月革命。此后，作为社会革命党人当先立宪会议代表。立宪会议被解散后，在克拉斯诺达尔从事反革命活动。1919 年被邓尼金政权驱逐出境。此后，在侨民当中继续为社会革命党从事政治和宣传工作。——译者注

²⁵⁸ 《彼得格勒市杜马日志》（Журнал Петроградской городской думы），彼得格勒，1917 年，第 123 期，1917 年 11 月 20 日会议，第 3-5 页；圣彼得堡俄罗斯国家图书馆手稿部，《彼得格勒中央市杜马速记记录》（Стенографические отчеты Петроградской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городской думы），第 3 卷，第 21 页。

和释放了。²⁵⁸速记记录表明，至少到1月中旬，旧市杜马还在一些地下场所不定期开会。²⁵⁹

11月22-23日，旧市杜马和全拯委的重要反对派领袖（主要是社革党以及卡杰特、人民社会党和孟什维克护国派）共同组建了一个名为保卫立宪会议联盟（СЗУС）²⁶⁰的组织。联盟的总部设于德高望重的自由经济协会²⁶¹大楼，并在彼得格勒的几个区里设立了分支，还在俄国其他主要城市设立了分部。它的公开目标是成为加强并扩大人民支持立宪会议成为俄国合法的、至高无上的政治权威并组织它的保卫工作的全国中心。这也是半自治的、协助组织了10月29日反苏维埃政权暴动的社革党军事委员会的目标。随着11月28日的临近，在卫宪联盟的牵头下，计划于旧市杜马确定的、庆祝立宪会议开幕的公共节日当天，在全国举行群众游行。大约同时，主要住在沼泽街²⁶²一间过度拥挤的临时宿舍中的社革党代表，开始为立宪会议的工作做准备。²⁶³

* * *

在这些日子里，列宁派布尔什维克领导层实施了立宪会议选举结果公布时制定的总方针，即组织召回选举，尽可能破坏立宪会议在人民当中的声望，并坚持控制会议的安排。与后者相关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如何处置临时政府在8月建立的、旨在协调立宪会议的选举和准备工作的全国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即全俄立宪会议选举委员会²⁶⁴，受到反苏维埃政权团体（首先是卡杰特和社革党）把持。它反对布尔什维克，因而在十月的日子里停止活动。11月6日，在立宪会议选举可能如期举行后，委员会恢复了运作。但是，它坚决拒绝承认苏维埃政权，并抵制人民委员会侵扰其工作的企图。11月23日，作为对该委员会持续阻碍的回应，苏维

²⁵⁹ 圣彼得堡俄罗斯国家图书馆手稿部，《彼得格勒中央市杜马速记记录》，第3卷。

²⁶⁰ 保卫立宪会议联盟（Союз защиты Учредительного собрания）成立于1917年11月23日（12月6日），主要活动于彼得格勒、莫斯科、诺夫哥罗德、敖德萨、萨马拉和其他城市。1918年1月7日（20日），该联盟停止活动，此后其大多数成员被捕。——译者注

²⁶¹ 自由经济协会（Вольное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е общество）是俄国最早的科学学会之一，成立于1765年，主要从事农业和经济学研究，是俄国自由派和民主派的重要学术中心，1919年解散。——译者注

²⁶² 沼泽街（Болотная Улица）是一条远离彼得格勒市中心的小路，始建于19世纪末，因一片沼泽地而得名。——译者注

²⁶³ 鲍里斯·索科洛夫（Борис Фёдорович Соколов）：《保卫全俄立宪会议》（Защита Всероссийского учредительного собрания），载《俄国革命档案》（Архив рус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第13卷，柏林，1924年，第30页。

²⁶⁴ 全俄立宪会议选举委员会（Всероссийская по делам о выборах в Учредительное собрание комиссия），简称“全选”（Всевыборы），于1917年8月1日（14日）正式成立，由15名委员和1名主席组成，主要负责立宪会议选举的组织和监督工作。委员会主席为卡杰特的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阿维诺夫（Николай Николаевич Авинов，1881-1937），但实际上主要由卡杰特领导人弗拉基米尔·德米特里耶维奇·纳博科夫（Владимир Дмитриевич Набоков，1869-1922）领导。15名委员当中，包括5名卡杰特、3名人民社会党人、3名社革党人、2名孟什维克、1名进步党人和1名中央党人。“全选”于1918年2月停止活动。——译者注

埃当局逮捕了几名委员（总共约 12-15 名卡杰特和社革党人），并拘押了 4 天。²⁶⁵同时，时任内务人民委员的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莫伊塞·乌里茨基被任命为专门负责严密控制选举委员会的人民委员。²⁶⁶可是，这一任命仅为时两天。两天后，表面上由于其无意与乌里茨基共事，委员会解散了。²⁶⁷实际上，一两天前，成立了由乌里茨基领导的新机构来负责立宪会议的相关安排。

即便对如今已解散的选举委员会当中的卡杰特和社革党人来说，这一点已是显而易见：全国选举结果的投票和计票工作大大落后于计划，并最终只有一小部分有资格代表能够于 11 月 28 日抵达彼得格勒。在列宁看来，只要缺席情况接近法定人数，就可以成为推迟立宪会议的方便理由。11 月 26 日，他颁布法令，规定只有当 400 名代表——当选代表的约半数——抵达彼得格勒后，立宪会议才能召开。法令还规定，立宪会议的首次会议将由一名人民委员会的指定人员宣布召开。²⁶⁸

同时，军革委在未与人民委员会或彼得格勒苏维埃领导层商议的情况下，组织了自己的游行，以反对旧市杜马计划于 11 月 28 日举行的游行。但人民委员会迫使军革委取消了这次游行。²⁶⁹对军革委来讲不幸的是，《工人与士兵报》忽视了游行已被取消。《真理报》头版开出巨大天窗（那里本来是要登载军革委呼吁支持它的反游行）的当日，《工人与士兵报》的头版却在显眼的地方刊出这样一些未被授权的煽动性游行口号：“打倒卡杰特、科尔尼洛夫党、卡列金党——人民公敌！”、“打倒社革党和孟什维克妥协派——资产阶级的奴仆！”、“打倒立宪会议中的卡杰特！”和“打倒资产阶级！人民万岁！”²⁷⁰

这次游行的计划和取消，以及布尔什维克对待整个立宪会议的态度，使我们得以了解在此关头对重要政策的决策情况，总体上证实了布尔什维克上台后最初几周出现的景象。每天都开会的人民委员会和军革委中的布尔什维克确定列宁派领导层对于立宪会议的政策。不定期会晤的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基本上将自己局限于讨论布尔什维克代表的立场问题。确实，在 11 月 29 日（即立宪会议预定开幕日的次日）之前，中央委员会似乎没有讨论过任何与立宪会议有关的事务。在那天的会上，乌里茨基请求自己的同事指示应当如何对待立宪会议。尼古拉·布哈林则反问到，立宪会议难道应当召开吗？他的回答是需要召开，因为“立宪幻想在群众当中仍然很有市场”。他建议召开立宪会议，赶走卡杰特，并将左翼代表组织为一个“革命大会”。尽管有托洛茨基的支持，但革命大会的想法未有付诸投票表决。由于担心过早地使地区的地区领导人离开边远地区，并且或许也不想使立宪会议

²⁶⁵ 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苏维埃政权法令》，第 1 卷，莫斯科，1957 年，第 167-168 页。

²⁶⁶ 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130 号全宗，1 号目录，10a 号案卷，第 30 张。另参见兹纳缅斯基：《全俄立宪会议》，第 301-302 页。

²⁶⁷ 《苏维埃政权法令》，第 1 卷，第 167 页。

²⁶⁸ 《苏维埃政权法令》，第 3 卷，第 159 页。

²⁶⁹ 柳比莫夫（И. Н. Любимов）：《1917 年革命：事件年表》（Революция 1917 года: Хроника событий），第 6 卷（10 月-11 月），莫斯科，1930 年，第 222 页。

²⁷⁰ 《真理报》，1917 年 11 月 27 日，第 1 版；《工人和士兵报》，1917 年 11 月 27 日，第 1 版。

开幕所需的 400 名代表到齐，一份将党的全体代表召集到彼得格勒的提案也被立刻否决了。但负责确定党对于这样的根本性政治问题的政策的中央委员，却大多满足于要么把对于立宪会议的决策推迟于国内和国际革命局势更加明朗之后，要么等待人民委员会的指示，并在同时骚扰反对派，让它做出第一步动作。

这种等等看的态度在乌里茨基 12 月 12 日向布尔什维克彼得堡委员会提交的有关党的立宪会议政策的报告中得到了反映。“在立宪会议问题上，我们现在还没处于最紧张的关头。……甚至不可能提前一小时确定我们的策略，”他宣称，“我们如何行动，我们怎么做，一切都取决于他们[反对派]如何做，做什么。……我们要召开立宪会议吗？是的。……我们会解散它吗？或许会。一切取决于形势如何发展。”²⁷¹

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在布尔什维克彼得堡委员会和区党委内部，正如在剔除了温和派的中央委员会当中那样，虽然在策略问题上拖延不决，但对于这一根本原则却毫不含糊，即不应当允许立宪会议取代苏维埃政权。11 月 29 日中央委员会会议和 12 月 12 日彼得堡委员会会议的记录在这一点都是明确无疑的。²⁷²

左翼社革党也完全支持这一立场。11 月下半月举行的左翼社革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形成了强烈敌视立宪会议的立场。在 11 月 23 日讨论“当前局势”时，彼得格勒左翼社革党的关键人物叶卡捷琳娜·卡茨²⁷³，代表大多数代表宣称：“立宪会议必须顾及苏维埃的意志和策略。一旦立宪会议反对苏维埃的意志，我们就不会支持它，没有什么偶像能改变我们。”普罗什·普罗尚甚至更具威胁性地宣称：“如果我们相信并目睹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开端，那么国家政权就必须属于工兵农代表苏维埃。……[显]然，我们不能也不应放下自己的武器，把国家政权交还立宪会议……如果立宪会议一开始便试图组织国家权威……我们是不会允许的。”²⁷⁴

尽管在左翼社革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对于立宪会议存在不同的看法，但这些不同很少涉及是否应当尊重它为俄国创建一个永久性的新政治制度（即便这意味着苏维埃政权的终结）的特权，而非在不能说服多数代表支持苏维埃政权的至上地位的时候，解散立宪会议的过程和计时。大部分左翼社革党领导人觉得，应当允许立宪会议按照当选情况召开，除非因为召回而被替换。许多人赞

²⁷¹ 《彼得堡委员会》，第 596-600 页。

²⁷² 根据目前遗失的会议记录，12 月 2 日彼得堡委员会的会议议程上也有关于立宪会议的讨论。12 月 4 日奥赫塔区党委的会议阐述了彼得堡委员会于 12 月 2 日形成的立场。这一阐述毫无疑问地表明，在彼得堡委员会眼中，跟苏维埃政权相比，立宪会议是缺乏合法性的。

²⁷³ 叶卡捷琳娜·瑙莫夫娜·卡茨（Екатерина Наумовна Кац），1917 年 8 月当选社会革命党北方地区委员会委员，当年 9 月起担任社革党中央委员，并加入《劳动旗帜报》编辑部。1917 年 12 月成为左翼社革党中央委员，负责出版工作。1918 年 4-8 月，调任左翼社革党莫斯科委员会。苏维埃政府迁都莫斯科后，在农业人民委员部领导农业统计工作。1918 年 7 月左翼社革党暴动后，反对与布尔什维克决裂，遂与其他持类似观点的左翼社革党人另组民粹派共产党（Партия народников-коммунистов），并在该党临时组织局工作。当年 9 月后，在民共党莫斯科局和中央组织局工作，并参加该党中央机关报《劳动公社旗帜报》编辑部。后随民共党并入俄共（布）。——译者注

²⁷⁴ 《左翼社会革命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会议记录》，第 65-66、108 页。

同沃罗涅日代表叶夫多基姆·穆拉维耶夫²⁷⁵的看法，即如果从一开始就不采取明确反对立宪会议的立场，“群众会和我们拉开距离，就像他们之前离开右翼社革党和孟什维克一样……并且那时我们[也]会没有军队”。但是，在策略上更为谨慎的领导人，如施泰因贝格、卡列林和卡姆科夫，却觉得人民仍然强烈支持立宪会议，以至任何直接反对它的行动必须加以延迟，以待立宪会议有充分时间在群众眼中破产。在立宪会议最初确定的开幕日前一天（11月27日）的大会会议上，卡姆科夫推测，这在短短一周内就会发生。大会决议规定，立即实现实农政权是最重要的，并且只要立宪会议组建这样的政权，并推行全俄工兵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和农民代表苏维埃非常代表大会的基本立场，那么就将全力支持立宪会议。但是，立宪会议只要试图将自己转变为反对工兵农代表苏维埃成为国家政权机关的组织，那么就将被视为攻击革命成果，并需要予以坚决回绝。²⁷⁶

* * *

卫宪联盟中苏维埃政权的反对者充分意识到布尔什维克和左翼社革党对立宪会议的敌意，并得出结论：列宁于11月26日宣布推迟开幕是布尔什维克完全取消立宪会议的阴谋的一部分。因此，虽然担心自己力量和组织的薄弱，但他们继续按计划推动支持立宪会议的人民游行以及会议于11月28日正式开幕。²⁷⁷在11月27日夜卡杰特中央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同意基本按计划推进，只有一点变更：由于已抵达彼得格勒的立宪会议当选代表太少，代表应每日召开预备大会，直到会议召开所需足够数量的代表抵达。²⁷⁸

²⁷⁵叶夫多基姆·费奥多罗维奇·穆拉维耶夫（Евдоким Фёдорович Муравьев，1896-1970），生于梁赞省，后赴沃罗涅日学习。1916年成为左翼社会革命党人。1917年二月革命后加入沃罗涅日苏维埃，并担任当地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1918年担任梁赞省农民代表苏维埃主席和该省军事革命委员会主席。在梁赞省担任军革委主席时，不顾左翼社革党中央委员会禁令，对反革命分子予以处决，因此被左翼社革党中央委员会解职，但随后又被选为该党沃罗涅日省委员会主席。此后在契卡工作。1925年加入俄共（布）。1930年代起，从事文教宣传工作。从1954年起直至去世，在莫斯科大学哲学系宗教与无神论的历史与理论专业担任副教授。——译者注

²⁷⁶《左翼社会革命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会议记录》，第87、91-92、111页。

²⁷⁷兹纳缅斯基：《全俄立宪会议》，第301-302页。11月28日，在许多俄国城市举行了支持立宪会议的游行。

²⁷⁸威廉·戈·罗森贝格（William Gordon Rosenberg）：《俄国革命中的自由派：立宪民主党，1917-1921年》（Liberals in the Russian Revolution: The Constitutional Democratic Party, 1917-1921），普林斯顿，新泽西州，第277-278页；纳·格·杜莫娃（Наталия Георгиевна Думова）：《卡杰特反革命及其失败》（Кадетская контрреволюция и ее разгром），莫斯科，1982年，第54页；叶·瑙·戈罗杰茨基（Ефим Наумович Городецкий）：《苏维埃国家的诞生，1917-1918年》（Рождение совет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 1917-1918 гг），莫斯科，1965年，第276页。



图3 绘有彼得格勒十月革命英雄的明信片。上排：列·达·托洛茨基、弗·伊·列宁、阿·瓦·卢那察尔斯基、玛·亚·斯皮里多诺娃。下排：亚·米·柯伦泰、费·费·拉斯科尔尼科夫、列·鲍·加米涅夫、格·叶·季诺维也夫。洛克哈特特藏，利利图书馆，印第安纳大学。

11月28日支持立宪会议的游行表明，在苏维埃政权建立6周后，彼得格勒人民当中存在着巨大的分裂。大约中午时分，主要由衣着良好的市民组成（许多人刚参加完特别的感恩节宗教活动）的游行队伍（对人数的估算从1万到10万不等²⁷⁹），从市杜马大楼出发，沿涅瓦大街²⁸⁰向东南方响亮的教堂钟声走去。彼得格勒的“第五大道”装点上鲜艳的彩旗和为立宪会议欢呼的标语。领导着队伍的是：刚出狱的旧市杜马首脑格里戈里·施赖德尔和他在市、区杜马中支持立宪会议的同事，以及社革党代表大会全体成员（包括来自51个省的300多名代表）；旧农民苏维埃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工兵代表苏维埃全俄执行委员会的温和社会主义委员（他们继续秘密开会）；重要的孟什维克护国派分子；仍然自由的人民社会主义党和卡杰

²⁷⁹当代俄罗斯首要的立宪会议问题专家列夫·普罗塔索夫的结论是，亲立宪会议的记者所估计的10万人参加游行或许言过其实了，但比苏维埃描述中的1万人参加游行，还是更接近实际数字（普罗塔索夫：《全俄立宪会议》，第271页）。

²⁸⁰涅瓦大街（Невский Проспект）是彼得格勒的重要干道，始建于18世纪，因大街尽头的亚历山大·涅夫斯基修道院的得名。1918年，为纪念十月革命一周年，该街更名为“10月25日大街”（Проспект 25-го Октября）。1944年恢复旧名。涅瓦大街沿途集中了许多重要机构和建筑，因而其在彼得格勒的地位类似第五大道之于纽约。由此之故，拉宾诺维奇接下来称其为“彼得格勒的‘第五大道’”。——译者注

特中央委员会委员。目击记录都指出，很少看到工人、士兵和水兵的身影。²⁸¹

当游行者沿铸造厂大街²⁸²向北行进时，欢迎他们的是铺在街面上的巨大横幅：“给人民选出的代表让路。”抵达塔夫利达宫后，他们发现在铁栅栏的包围下，宫门紧锁，戒备森严。他们翻越宫门，冲入了宫殿花园²⁸³。在那里，他们聆听了社革党人切尔诺夫、皮季里姆·索罗金²⁸⁴（未来哈佛大学社会学系的创建者）以及卡杰特领导人费奥多尔·罗季切夫²⁸⁵发表的要求立即结束苏维埃统治的激烈演讲。人群经过乌里茨基，慢慢进入宫内，并于下午4时，在那里举行了一次由当时在京的约127名立宪会议代表当中的约60人（其中除4人为卡杰特外，都是社革党）参加的会议。在选举切尔诺夫为他们的主席后，代表们聆听了更多的演讲，接着誓言每天在塔夫利达宫开会，直到足够数量的代表出席，那时他们会确定立宪会议开幕的日期，接着名为立宪会议代表第一次非正式会议（частные совещания）就闭幕了。²⁸⁶11月29日，他们设法在塔夫利达宫再次集会。但他们的会议被强行驱散。此后，他们被禁止进入塔夫利达宫。

11月28日夜的晚些时候，人民委员会会议讨论了当日的事件及其影响。托洛茨基成为会议的焦点，他将事件描述成由全国反革命和反苏维埃政权叛乱中心——卡杰特中央委员会领导的反苏维埃统治的武装起义。²⁸⁷布尔什维克领导人获得的情报可能使他们夸大了卡杰特对彼得格勒苏维埃统治的反对力量，和对全国组织抵抗运动的影响。²⁸⁸包括帕维尔·米留可夫在内的卡杰特领导人那时恰好突出地卷入了由科尔尼洛夫、阿列克谢耶夫和卡列金将军领导的顿河反革命。不过，在游行开始数小时前的11月28日晨，携带军革委逮捕令的士兵和赤卫队员就已开始

²⁸¹ 兹纳缅斯基：《全俄立宪会议》，第308页；柳比莫夫：《1917年革命：事件年表》，第6卷，第225页。

²⁸² 铸造厂大街（Литейный Проспект）是一条南北向的宽阔马路，为彼得格勒的重要干道。始建于18世纪，1918年更名为沃洛达尔斯基（Проспект Имени Володарского），以纪念当年背刺身亡的布尔什维克革命家弗·沃洛达尔斯基。1944年恢复旧名。——译者注

²⁸³ 即塔夫利达花园（Таврический сад）。该园位于塔夫利达宫南侧，面积21.1公顷，为彼得格勒的重要公园。——译者注

²⁸⁴ 皮季里姆·亚历山德罗维奇·索罗金（Питирим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Сорокин，1889-1968），反共社会学家。1906年参加社会革命党，同年被捕，后脱逃。1909年起在彼得堡接受高等教育。二月革命后，积极为社会革命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意志报》撰稿。反对十月革命，1918年被苏维埃政权逮捕，被释放后在莫斯科继续从事反苏维埃政权活动。同年10月，组织反革命暴动失败后向契卡投降。投降后，为免于被枪决，向列宁发电表示忏悔，并声明退出社会革命党。此后脱离政治活动，从事高等教育和科学研究工作。1922年，被苏联政府驱逐出境。后移民美国，主持创建了哈佛大学社会学系，并担任系主任。——译者注

²⁸⁵ 费奥多尔·伊萨梅洛维奇·罗季切夫（Фёдор Измайлович Родичев，1854-1933），出生于贵族家庭，1877年参加特维尔省的地方自治局。1898年起积极参与自由派政治活动，1905年参与创建了立宪民主党，并于次年成为该党中央委员。此后成为历届沙俄国家杜马议员。二月革命后参加临时政府，负责芬兰问题，反对芬兰独立。十月革命后被捕。1918年开始积极从事反苏维埃政权工作，曾任志愿军驻波兰代表。苏俄内战结束后，流亡国外，并脱离政治活动。——译者注

²⁸⁶ 兹纳缅斯基：《全俄立宪会议》，第309页；维什尼亞克：《全俄立宪会议》，第95页。

²⁸⁷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19号全宗，1号目录，13号案卷，第2张。

²⁸⁸ 邦奇-布鲁耶维奇：《在二月和十月革命的战斗岗位上》，第187-189页。

围捕卡杰特的高层领导人。²⁸⁹这表明在实际上，人民委员会只是把卡杰特在塔夫利达宫的行动当作镇压他们的借口。

尽管如此，根据托洛茨基报告的结语，11月28/29日夜人民委员会会议的参会者（均为布尔什维克，左翼社革党的农业人民委员安德烈·科列加耶夫²⁹⁰缺席）通过了一项政府公告，将卡杰特定为“组织反革命暴动”的“人民公敌”。²⁹¹他们还通过了一项由列宁提出的法令，授权立即逮捕卡杰特领导人并由革命法庭审判。这项法令规定全国的地方苏维埃负责“密切监视卡杰特党，因为它与科尔尼洛夫-卡列金的反革命内战联系密切”²⁹²。

无论是把卡杰特定为“人民公敌”的公告，还是列宁授权立即逮捕卡杰特的法令，都于次日刊载在《消息报》上。大部分彼得格勒工人和士兵看上去只是从字面上理解这次布尔什维克对卡杰特的攻击。但温和社会主义者（更不必说卡杰特）由此更加确信，布尔什维克有意要么取消立宪会议，要么破坏它的完整性。因此，弗拉基米尔·巴扎罗夫在高尔基的《新生活报》上推测，布尔什维克和他们的“左翼社革党党羽”想要的与其说是整个取消立宪会议，还不如说是把它重塑为自己意志的驯服工具。²⁹³

尽管巴扎罗夫将左翼社革党贬为布尔什维克的“党羽”，但实际上，他们和温和社会主义者一样，被宣布卡杰特非法及其对立宪会议的政治影响所扰乱。他们觉得，这一措施有欠充分考量，因为它使得这一广为流传的设想变得可信起来：苏维埃政权有意在立宪会议有机会暴露自己的真实面貌之前对之加以镇压。布尔什维克已经给苏维埃带来了比立宪会议多得多的伤害，这就加强了这种信念。²⁹⁴左翼社革党中央执委党团立即就逮捕行径侵犯卡杰特代表的豁免权向人民委员会发出紧急质询。²⁹⁵在接下来12月1日的中执委会议上，伊萨克·施泰因贝格²⁹⁶发动左

²⁸⁹ 瓦·瓦·舍洛哈耶夫（Валентин Валентинович Шелохов）总主编：《1915-1920年立宪民主党中央委员会会议记录》（Протоколы центрального комитета конституционно-демокра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 1915-1920 гг.），莫斯科，1998年，第6、412页。

²⁹⁰ 安德烈·卢基奇·科列加耶夫（Андрей Лукич Колегаев，1887-1937），出生于被流放的民意党人家庭。1906年加入社会革命党，并参加该党战斗队。1909年被驱逐出境，后在巴黎成为左翼社会革命党人。二月革命后回国，担任喀山省代表苏维埃主席，并不顾临时政府反对，积极支持该省农民的分地活动。当年10月，赴彼得格勒工作，并参加十月革命。后参与组建了左翼社革党的独立组织，并成为该党中央委员。1917年11月被任命为农业人民委员，12月就任。因左翼社革党中央反对签订《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1918年辞去人民委员职务。后因反对反布尔什维克暴动，于1918年7月与左翼社革党分道扬镳，领导组建了革命共产党（Партия 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го коммунизма）。1918年11月脱党加入俄共（布），后主要从事经济工作。大清洗期间被捕并处决。1957年平反。——译者注

²⁹¹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19号全宗，1号目录，13号案卷，第6-7张；《苏维埃政权法令》，第1卷，第165-166页。科列加耶夫已于几天前入阁。

²⁹²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19号全宗，1号目录，13号案卷，第2张；《苏维埃政权法令》，第161-162页。

²⁹³ 《新生活报》，1917年11月30日，第1版。

²⁹⁴ 《劳动旗帜报》，1917年11月30日，第1版。

²⁹⁵ 基普：《争论》，第172-173页；《第二届工人、士兵、农民和哥萨克代表苏维埃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记录》，第124页；拉兹贡：《苏维埃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第300页。

翼社革党攻击宣布卡杰特非法的法令，辩称像宣布卡杰特非法并加以逮捕的任意镇压措施对发动阶级战争来说，是不可接受的办法。作为一位曾在欧洲接受教育的老革命家、法学家和政论家，施泰因贝格与卡列林和斯皮里多诺娃一道，是最直言不讳地公开批评布尔什维克任意镇压措施的左翼社革党人。如今，他作为这些人的代表，要求公开诚实地进行革命斗争，并旁敲侧击道，人民委员会宣布卡杰特非法的法令反映出扰乱立宪会议召开的意图，并明确表示反对这样的行为。²⁹⁷

列宁亲自起而答复质询，并回应了施泰因贝格。他重申并渲染了如今人们已熟知的指控：卡杰特中央委员会已经成了反革命的总参谋部。他宣称，所有此前比卡杰特还右的政治和社会成分如今都和他们一起参加了一个反苏维埃大阴谋。卡杰特打着支持立宪会议的幌子，公开激起内战。“对此只能有一种回应，”列宁宣称，“监狱！[雅各宾派]在法国大革命中就是这么做的；他们宣布资产阶级政党非法。”²⁹⁸

与托洛茨基简短而夸张的说法相比，列宁对施泰因贝格的回应可谓温和。不久前，托洛茨基曾打断会议，带着溢于言表的愉悦宣布，德国政府刚刚接受了布尔什维克提出的停战条件。²⁹⁹或许德帝国主义这一表面的让步激起了托洛茨基的革命热忱和戏剧性天分。如果说列宁的讲话在很大程度上针对当前任务——面对施泰因贝格的质询和批评而为人民委员会的行动辩护——托洛茨基的讲话却并非如此。对他来讲，镇压卡杰特是更大规模恐怖的前兆。他敲打着讲台以为强调，并吼道：“无产阶级消灭一个正在瓦解的阶级时，没有什么是不道德的……你们[左翼社革党人]变得对我们正加诸我们的阶级敌人身上的赤裸裸的恐怖感到愤怒。但是让我向你们保证，在最多一个月里，将会有更为可怕的、以法国大革命的恐怖为模范的形式。等待着我们的敌人的不仅有[彼得保罗]要塞还有断头台。”³⁰⁰

对于列宁和托洛茨基提及法国大革命，左翼社革党人谢尔盖·姆斯季斯拉夫斯基³⁰¹反驳道，尽管谈的是一场社会主义革命，但布尔什维克实际上却“陷入了政治革命的纯粹资产阶级形式”。同时，他批评温和社会主义者脱离群众运动，而左

²⁹⁶ 伊萨克·纳希曼·施泰因贝格（Исаак Нахман Штейнберг，1888-1957），出生于犹太商人家庭。1905年参加革命活动，次年加入社会革命党。1910年流亡德国，后回国从事新闻宣传工作。一战期间，持国际主义立场。1915年被捕后流放至乌拉尔省，后在当地领导左翼社会革命党人。二月革命后，当选乌拉尔省工兵代表苏维埃执委会委员会和全俄农民代表苏维埃执委会委员。十月革命后，曾任司法人民委员，后为抗议《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的签订而辞职。1919年被契卡逮捕，同年被释放。1923年流亡国外。此后主要从事文字工作，并积极推动建立独立的犹太国家。——译者注

²⁹⁷ 基普：《争论》，第172-173、354页。

²⁹⁸ 基普：《争论》，第175-176页。

²⁹⁹ 基普：《争论》，第177页。

³⁰⁰ 基普：《争论》，第177-178、356页。

³⁰¹ 谢尔盖·德米特里耶维奇·姆斯季斯拉夫斯基（Сергей Дмитриевич Мстиславский，1876-1943），原姓马斯洛夫斯基（Масловский）出生于军校教授家庭，文学家。1904年参加社会革命党，次年革命期间从事武装起义工作。二月革命期间，参与组织了起义，并负责逮捕了沙皇及其家人。社会革命党正式分裂后，成为左翼社革党中央委员。曾参加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谈。左翼社革党刺杀德国驻俄大使后，退出左翼社革党，后主要从事文学创作活动。——译者注

翼社革党感到有责任不能如此。面对列宁和托洛茨基强烈表达的鄙夷，姆斯季斯拉夫斯基暗示，左翼社革党人有意推进他们加入政府的谈判。“我们并没有造成与布尔什维主义的对抗，”他宣称，“我们将尽可能减小它对革命事业的损害。”³⁰²

姆斯季斯拉夫斯基提出一项决议，禁止人民委员会干涉立宪会议按当选情况召开。这项决议授权撤销宣布卡杰特非法的法令，并再次确认 11 月 17 日斯维尔德洛夫宪法体现的人民委员会向中执委负责的原则。³⁰³在敦促通过该项决议时，施泰因贝格真是在乞求布尔什维克“摆脱他们[无意义]的卡杰特梦魇”。但未经进一步讨论，中执委便以 150 票对 98 票和 3 票弃权（显然严格按党派路线划分），通过了布尔什维克的决议，要求 400 名代表报到后再召开立宪会议，支持全面镇压卡杰特，并授权人民委员会在未来采取其他任何必要措施打击反革命。³⁰⁴尽管继续就左翼社革党人加入人民委员会展开谈判，但决议并没有为照顾他们的感受而做出任何让步。

* * *

紧随十月的日子之后，由于列宁和托洛茨基成功推行的政策，彼得格勒布尔什维克独力担负起彼得格勒政府各方面的工作。但是，他们缺乏承担这一任务所需的培训、经验或兴趣。在这种形势下，他们试图通过现存政治机构——首先是彼得格勒市杜马和区杜马及其管理局和机构网络——来进行统治。直到这一方法显然不会奏效之后，政府和管理职能才被逐渐转交给苏维埃。在此期间，军革委超乎其他任何机构，填补了地方政府的真空。无论愿意与否，它成了彼得格勒市的头号政府机构。

同时在彼得格勒的布尔什维克党组织中，最称职的人被越来越多地委以苏维埃或军事职务，或者被调任他地，以在全国巩固革命。因此在彼得格勒工厂工人和下层军事人员当中，党的活动实际上陷于停顿。当然，人民对布尔什维克纲领的持续支持，以及最后关头的突击宣传，使布尔什维克在彼得格勒及周边地区的立宪会议选举中取得了不俗的表现。而对于（作为左翼社革党盟友的）布尔什维克掌控立宪会议的召开来讲，这种力量具有无可估量的价值。但长远来看，布尔什维克组织日益孤立于其社会基础将造成最不幸的结果。

³⁰² 基普：《争论》，第 177-179 页。

³⁰³ 参见第 1 章上文。

³⁰⁴ 基普：《争论》，第 181 页；《第二届工人、士兵、农民和哥萨克代表苏维埃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记录》，第 121-122 页。

三、集合力量

尽管由于布尔什维克的强硬政策有悖左翼社革党的理想，而在镇压卡杰特和人民委员会与中执委之间的结构性关系等方面出现龃龉，但在 1917 年 12 月，左翼社革党还是同意加入人民委员会。与惯常看法相反，这一发展直接关系到早期苏维埃镇压活动的支柱之一——全俄肃清反革命、投机及怠工非常委员会（契卡）³⁰⁵ 的建立。

根据对契卡创建史的传统解释，到 1917 年 12 月的首周，军革委承认已完成在彼得格勒夺取和巩固苏维埃政权的任务，从而自愿关门歇业。12 月 5 日的人民委员会议将上述愿望付诸实施，并建立了负责统筹 7 日内解散军革委的团队。根据这种解释，次日，在全国公务员大罢工的刺激下，列宁向人民委员会提议，由费利克斯·捷尔任斯基组建一个特别委员会，来探索以有力的革命措施与这类政治怠工斗争的办法。任务极为紧迫。所以在 12 月 7 日的会议上，当了解到捷尔任斯基的委员会仍在运行时，人民委员会同意在其工作完成之前，不解散该委员会。当日夜，捷尔任斯基呼吁成立一个强有力的、隶属于人民委员会的临时机构，以肃清反革命和怠工。他的想法被当场接受，契卡诞生了。³⁰⁶ 苏联档案馆藏有的文献揭示了，军革委在其生命的最后几周里，所经历的发展变化及其与人民委员会的关系。这些文献使我对上述解释心生疑窦。在十月的日子之后，军革委填补了政府机构停工造成的空白，承担起提供基本市政服务和协调彼得格勒安全工作和革命防务的职责。特别是在 11 月 4-17 日，随着李可夫辞职和内务人民委员职务空缺，军革委积累起了打击反革命、怠工和投机的巨大权力。

此外，在 11 月中旬，全俄农民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与全俄工兵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完成了合并工作，就人民委员会之中建立布尔什维克-左翼社革党联盟的谈判也开始了。³⁰⁷ 在接下来的两周里，哪个左翼社会主义政党（布尔什维克还是左翼社

³⁰⁵ 契卡的全称多有变化。1917 年 12 月 7 日（20 日）成立时，全称“人民委员会下属全俄肃清反革命及怠工非常委员会”（Всероссийской чрезвычайной комиссией при Совете Народных Комиссаров по борьбе с контрреволюцией и саботажем）；此后不久更名为“人民委员会下属全俄肃清反革命、怠工及投机非常委员会”（Всероссийская чрезвычайная комиссия по борьбе с контрреволюцией, саботажем и спекуляцией при Совете Народных Комиссаров）；1918 年又先后更名为“人民委员会下属全俄肃清反革命、投机及怠工非常委员会”（Всероссийская чрезвычайная комиссия по борьбе с контрреволюцией, спекуляцией и саботажем при Совете Народных Комиссаров）和“人民委员会下属全俄肃清反革命、投机及职务犯罪非常委员会”（Всероссийская чрезвычайная комиссия по борьбе с контрреволюцией, спекуляцией и преступлениями по должности при Совете Народных Комиссаров）。——译者注

³⁰⁶ 参见例如乔治·莱格特（George Leggett）：《契卡：列宁的政治警察，全俄肃清反革命及怠工非常委员会》（The Cheka: Lenin's Political Police: The All-Russian Extraordinary Commission for Combating Counterrevolution and Sabotage），牛津与纽约，1986 年，第 15-18 页；亚·弗·库图佐夫（Александр Владиславович Кутузов）、弗·费·列佩秋欣（Владимир Федорович Лепетюхин）、弗·费·谢多夫（Владимир Федорович Седов）和奥·尼·斯捷潘诺夫（Олег Николаевич Степанов），《捍卫革命时的彼得格勒契卡工作者》（Чекисты Петрограда настраже революции），列宁格勒，1987 年，第 53-56 页。

³⁰⁷ 参见上文，第 1 章。

革党)会最终掌控合并后的中执委，尚存变数。在这段间隔期内，相对于布尔什维克，左翼社革党有着特别巨大的影响。如今，布尔什维克接受了左翼社革党包括平分军革委在内的种种要求。这并非布尔什维克领导人所乐见的让步。³⁰⁸在紧随十月的日子之后，左翼社革党激烈抨击军革委加诸政治对手的暴力及其对民事权利的限制。如今，在军革委中占据等额的左翼社革党威胁约束布尔什维克镇压政敌的行动自由。在11月15日的人民委员会会议上，有人表达了废除军革委的意思。中执委主席斯维尔德洛夫对此表示强烈反对。作为替代，他提议大幅削减军革委的职责，并将打击反革命的资金和其他无需说明的资金由内务人民委员部转交军革委。为使对政敌的镇压活动免受占据军革委半壁江山的左翼社革党的干涉，他还要求军革委的军事委员会（这是布尔什维克会试图保持控制的部门）有权不受全体军革委干涉而独立进行逮捕活动。³⁰⁹

对于上述提议，11月15日人民委员会会议的记录未见有何举措。但在11月21日的军革委会议上，军革委的布尔什维克领导层发起组建一个全新的、摒除了左翼社革党人的打击反革命机构。次日，左翼社革党人迫使布尔什维克将他们吸纳入该机构，从而使上述措施归于乌有。³¹⁰布尔什维克的军革委领导层认识到，军革委已成为组建布尔什维克-左翼社革党联合政府的谈判筹码，从而推迟了它的重组工作。³¹¹

尽管左翼社革党在这几周里对布尔什维克“恐怖”的批评力度不减，尽管如今左翼社革党人在军革委及其打击反革命的特别机构当中得到了显而易见强有力代表，但在11月25日的人民委员会会议上，列宁仍将军革委视为初生的苏维埃政府的头号国内安全机关。对于军革委的未来安排，会上有三种提案。列宁重复斯维尔德洛夫15日的提议，敦促将军革委所有与打击反革命没有直接关系的职责立即移交给相应的政府人民委员部。马丁·拉齐斯³¹²提议将军革委并入中执委的打击反革命部门，而乌里茨基则主张取消军革委。在围绕预定的立宪会议开幕以及公务员停工日益严重的激烈的政治氛围中，乌里茨基的主张可能被认为时尚早。而拉齐斯的动议不被采纳，则或许缘于重组后的中执委仍然未有确定将由哪个党控制。列宁削减军革委任务的提议被采纳了。³¹³

³⁰⁸直到此时，左翼社革党人仅占军革委成员的20%。

³⁰⁹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130号全宗，1号目录，1号案卷，第10张背面。

³¹⁰丘加耶夫：《彼得格勒军事革命委员会》，第3卷，第232、259页。

³¹¹丘加耶夫：《彼得格勒军事革命委员会》，第3卷，第285页。

³¹²马丁·伊万诺维奇·拉齐斯（Мартын Иванович Лацис，1888-1938），原名扬·弗里德里霍维奇·苏德拉布斯（Ян Фридрихович Судрабс），生于拉脱维亚雇农家庭。1905年加入拉脱维亚边疆区社会民主党（Социал-демократическую партию Латышского края），从事革命宣传工作。1915年因组织地下印刷所，被捕流放至西伯利亚。前往流放地途中，脱逃至彼得堡，并成为俄社民工党彼得堡委员会委员，后又任俄社民工党（布）彼得堡委员会委员。二月革命后，在维堡区从事布尔什维克和赤卫队的组织工作，并参加了彼得格勒军事革命委员会。参与组织十月革命。1918-1921年，在契卡担任领导工作。此后，从事经济、党务和科研工作。大清洗期间被捕，并被判处死刑。1956年平反。——译者注

³¹³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19号全宗，1号目录，11号案卷，第2张。

可大概两周之后，军革委被取消，代之以新生的契卡。为什么会这样？军革委的一些主要领导人是思想独立的布尔什维克狂热分子。对列宁和人民委员会限制自己的行动自由，他们很快就反感起来了。他们极为讨厌人民委员会为迎合左翼社革党人而削弱军革委打击反革命的能力。更激进的军革委和策略上更谨慎的人民委员会之间的矛盾，在这件事上得到了反映：军革委未经人民委员会授权便着手组织武装游行，以应对定于 11 月 28 日举行的支持立宪会议的游行。³¹⁴对于这样的正面攻击，人民委员会是毫无准备的。它担心相互敌对的游行队伍之间可能流血的肢体冲突会使自己受害，于是取消了反游行。这种公开的羞辱显然惹怒了军革委中的许多布尔什维克。而《工人与士兵报》刊出后者呼吁工人和士兵参加反游行的文字，以及弗·邦奇-布鲁耶维奇在人民委员会的指示下正式提出责难，更是火上浇油。³¹⁵根据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在 11 月 29 日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议上的说明，要么当日要么前一日夜，军革委决定解散自己。³¹⁶

布尔什维克-左翼社革党关系问题与解散军革委和组建契卡有什么关系？现在，军革委决定解散似乎不是因为它自认为已完成了任务，而是由于它的激进布尔什维克领导层对人民委员会大失所望。人民委员会同意军革委自行解散并创建契卡的决定性因素也显而易见：它意识到，有必要建立一个不受左翼社革党干预的临时机构，来坚决地解决公务员全国罢工的威胁，以及甚至更为根本性的立宪会议支持者对苏维埃政权存亡的威胁。1922 年，契卡的主要领导人之一拉齐斯就契卡的组织问题准备了一份内部报告。在这份长期保密的报告中，他承认了“左翼社革党问题”对于决定组建契卡的意义。据他说，左翼社革党人“表现了他们的‘普世’道德、人道主义，并抵制限制反革命的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权，这严重阻碍了打击反革命的斗争。对于苏维埃领导人来说，左翼社革党人越来越明显地使打击反革命变得不可能。这就使得人们想要创建一个新的、独立于军革委且排除了左翼社革党人的打击反革命机构。”³¹⁷

要了解左翼社革党因素对于解散军革委和创建契卡的意义，有必要重建布尔什维克和左翼社革党之间围绕组建联合政府问题的谈判进程。11 月 16 日，就组建布尔什维克-左翼社革党联盟，斯维尔德洛夫在新合并的中执委与左翼社革党团进行了磋商。在当日的人民委员会议上，斯维尔德洛夫就此做了鼓舞人心的报告。被对付立宪会议的日子临近之时扩大政府成分的前景所吸引，又受到中执委

³¹⁴ 参见上文，第 2 章。

³¹⁵ 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1236 号全宗，1 号目录，3 号案卷，第 149 张。到那时，军革委与人民委员会之间的矛盾已经严重到这种程度，以至它的消息被泄露给了非社会主义媒体。1917 年 12 月 1 日，《我们的时代报》(Наш век) 报道称，军革委中的一个不满于列宁试图将布尔什维克内部政策引导如合法框架的左翼宗派已经占据上风，军革委当时的运作是“完全自主的，并且不征求人民委员们的意见便做出决定。”(第 3 版)

³¹⁶ 圣彼得堡中央国家档案馆，9618 号全宗，1 号目录，186 号案卷，第 11 张。

³¹⁷ 马·拉齐斯：《全俄非常委员会关于其四年活动的报告，1917 年 12 月 20 日—1921 年 12 月 20 日：1. 组织篇》(Отчет Всероссийской чрезвычайной комиссии за четыре года ее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20 декабря 1917 г. – 20 декабря 1921 г.: 1. Организационная часть)，莫斯科，1922 年，第 8 页。

中左翼社革党人的合作的鼓舞，人民委员会委派一个代表团继续斯维尔德洛夫的磋商。³¹⁸

代表团于次日展开磋商。布尔什维克前一日解散彼得格勒市杜马的举措激怒了左翼社革党人。他们确信，中执委完全重组后，自己仍能在合并后的新中执委中占据多数。此外，他们还希望赢得足够多的、名义上属于社革党的立宪会议农民代表，从而对会议产生决定性影响。因此，他们明确表示，要让他们参加人民委员会，价码不低。一开始，他们坚持要求任命左翼社革党人领导内务、军事、铁道和司法委员部（此外，农业委员部已由左翼社革党人科列加耶夫领导）。除农民和土改相关问题之外，左翼社革党人最关心的问题是建立军事力量，在国内捍卫革命，在国外支持社会主义起义。这使他们特别强烈地提出，要掌控军事人民委员部。类似于此，他们也重视建立一套公正的革命法律体制，因此觉得任命施泰因贝格为司法人民委员意义重大。

对于布尔什维克谈判团队来讲，让出所有这些关键职位显然是不可接受的。同时，布尔什维克在11月下半月采取的许多进一步的挑衅举动加剧了左翼社革党人的不安，使政府对话频繁地陷入僵局，并不时使对话险些彻底瓦解。这些举动——包括拘捕全俄立宪会议选举委员会成员、将所有卡杰特打成“人民公敌”、逮捕卡杰特领导人以及动用武力驱散立宪会议代表非正式会议——都遭到了左翼社革党人的强烈抗议。因此，对话进行了将近3周。最后，作为12月7日的第一要务，人民委员会得出结论，左翼社革党给入阁开出的条件，稍加修订便能接受。俄国侨民历史学家阿纳托利·拉兹贡空前详尽地重构了这些谈判。他认为，左翼社革党要求在关键委员部的分配上与布尔什维克等额，这一点在当时仍未谈拢。³¹⁹尽管或许如此，但那时显而易见的是，布尔什维克将恢复中执委中的多数地位。左翼社革党领导人的活动基于这样的想法：参加列宁内阁使他们（或许唯一）有可能软化布尔什维克的行为，并在国内外推动革命当中发挥突出的作用。支持左翼社革党人的彼得格勒工人、士兵和水兵迫使他们加入人民委员会。³²⁰此外，他们的一个主要条件，即支持他们的土地改革纲领，得到了布尔什维克的接受。³²¹由于这些原因，他们于12月9日接受了布尔什维克的、相当不等额的加入人民委员会条款。此后不久，施泰因贝格（司法人民委员）加入科列加耶夫（农业人民委员）和其他6名³²²左翼社革党人的行列，成为人民委员。³²³左翼社革党人还被派往所有其他人民委员部的部务委员会（коллегий）和其他中央政府机构。结果，在

³¹⁸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19号全宗，1号目录，2号案卷，第13张背面；拉兹贡，《政府阵营》，第121页。

³¹⁹ 拉兹贡，《政府阵营》，第128页。

³²⁰ 参见例如，11月中旬卫戍部队单位的一次会议上，通过的一项决议。在听取了各中执委、市杜马和所有社会主义党派的代表的陈述后，士兵们通过决议，宣布信任苏维埃政府，并宣称左翼社革党代表进入政府是“至关重要的”（圣彼得堡中央国家档案馆，9618号全宗，1号目录，53号案卷，第376张）。

³²¹ 尼·尼·斯米尔诺夫（Николай Николаевич Смирнов），《全俄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Третий Всероссийский съезд Советов），列宁格勒，1988年，第111页。

³²² 原文如此，应为其余5人。——译者注

立宪会议开幕前夕，左翼社革党人占据了人民委员会当中约四分之一的职位、中执委中约三分之一的席位，并在其他关键的苏维埃机构中拥有相当地位。

在这样的背景下，就能清楚放弃军革委而创建契卡以及人民委员会在 12 月 7 日（当日，左翼社革党重组政府的条件“稍加修订”后得到了接受）匆匆组建新机构的首要原因了。很快，施泰因贝格将领导可能麻烦重重的司法委员部。对列宁来说，在此之前，仅由可靠的布尔什维克组成并直接向布尔什维克控制的人民委员会负责的契卡正常运转是至关重要的。创建契卡的官方公告于 12 月 10 日刊于《消息报》。³²⁴它告诉读者，新机构的总部位于豌豆街³²⁵2 号。在沙皇时代，豌豆街 2 号驻有彼得格勒省省长、市警察和臭名昭著的沙皇安全部门“暗探局”（Охрана）的官员。

值得注意的是，列宁对施泰因贝格的担忧是完全有理由的。12 月 15 日，就职还不到一周的施泰因贝格没和人民委员会商量，就发布了一项法令，规定监禁于斯莫尔尼宫或革命法庭的囚犯立即转移至五座彼得格勒的主要监狱中的一座。在那里，由彼得格勒苏维埃和区苏维埃同意特设的临时委员会将审查这些囚犯被捕的正当性，并要么要求加以审判要么在 24 小时内予以释放。这些委员会也将立即对彼得格勒其他监狱中的所有囚犯进行类似审查。³²⁶这一法令如被允许实行，将会使发端于契卡的、聚合并孤立政治反对派以防其制造麻烦而非特定反革命行径的努力付诸东流。因此，在列宁、捷尔任斯基和看法相近的布尔什维克看来，施泰因贝格法令的发布相当于宣战。此外，在当天的媒体采访中，施泰因贝格宣布自己有意造访斯莫尔尼宫和革命法庭，以实现所宣称的释放对特定犯罪不负责的囚犯。³²⁷

次日，施泰因贝格发布了另一项法令，列出了被允许授权和执行搜查与逮捕的机构，并下令这些调查机构向他和它们的上级部门报告自己的不当行径。³²⁸契卡在列。但是，投诉应向他报告的规定明确表明，施泰因贝格有意根据司法人民委员部设立的标准来监督契卡。不久后，这一目的变得更加明白：施泰因贝格下令，契卡的全部办案材料都需交给他审查。³²⁹该要求被否决后，施泰因贝格正式请求人民委员会授权对契卡进行一次检查。这一请求也被拒绝了。³³⁰之后，施泰因贝格再次本着消灭革命司法实务中的任意性的目的，而指派他的副手和左翼社

³²³他们包括：普罗什·普罗尚（邮电人民委员）；弗拉基米尔·特鲁托夫斯基（地方自治人民委员）；亚历山大·伊斯梅洛维奇（共和国宫馆人民委员）；弗拉基米尔·卡列林（军事与海军事务人民委员兼共和国财产人民委员）；弗拉基米尔·阿尔加索夫（在内务人民委员部工作的无所任人民委员）。

³²⁴ 《消息报》，1917 年 12 月 10 日，第 7 版。

³²⁵ 豌豆街（Гороховая Улица）始建于 18 世纪，苏联时期曾更名为“捷尔任斯基街”（Улицу Дзержинского），1991 年恢复旧名。——译者注

³²⁶ 《劳动旗帜报》，1917 年 12 月 16 日，第 2 版。

³²⁷ 《劳动旗帜报》，1917 年 12 月 16 日，第 3 版。

³²⁸ 《劳动旗帜报》，1917 年 12 月 19 日，第 3 版。

³²⁹ 拉齐斯：《报告》，第 14 页。

³³⁰ 拉齐斯：《报告》，第 14 页。

革党同僚亚历山大·施赖德尔³³¹监督俄国革命法律和革命法令指导方针汇编的准备工作（旨在将它们的结构和程序系统化）。

与此同时，随着推迟立宪会议和与德国开始单独和谈造成的矛盾愈演愈烈，契卡加强了对政治反对派的骚扰。于是在 12 月 16 日，15 名温和社会主义者在保卫立宪会议联盟总部被捕。³³²24 小时有余之后，在契卡的主持下，逮捕并监禁了尼古拉·阿夫克先季耶夫。³³³次日，捷尔任斯基下令立即逮捕并由革命法庭审讯 11 名其他反对派领袖和立宪会议代表，包括伊拉克利·策烈铁里、维克托·切尔诺夫、费奥多尔·唐恩、列·莫·布拉姆松³³⁴、马特维·斯科别列夫³³⁵、阿布拉姆·戈茨³³⁶和弗拉基米尔·罗扎诺夫³³⁷。³³⁸18 日夜，一名契卡工作人员率领武装分遣队，突袭了由约 135 名反对党代表和来自工厂、工会、部队、区杜马和彼得格勒苏维埃的温和社会主义者代表在卫宪联盟总部召开的工人大会。这次行动显然是为了抓捕一些

³³¹ 亚历山大·阿布拉莫维奇·施赖德尔（Александр Абрамович Шрейдер，1895-1930），左翼社革党领导人，生于医生家庭。早年留学法国，二月革命后回国。1917 年末开始在苏维埃政权中从事司法工作，后因抗议布列斯特-利托夫斯克和约而辞职。1919 年被捕，获释后流亡国外，继续从事左翼社革党的党务工作。1930 年在巴黎自杀。——译者注

³³² 加利利和涅纳罗科夫：《1917 年的孟什维克》，第 3 卷，第 2 分册，第 559 页。

³³³ 《我们的时代报》，1917 年 12 月 19 日，第 3 版。

³³⁴ 列昂季·莫伊谢耶维奇·布拉姆松（Леонтий Моисеевич Брамсон，1869-1941），生于犹太商人家庭。大学毕业后，定居圣彼得堡，从事法律工作，并为犹太人权利奔走。1903 年起，参加自由派政治活动。1906 年当选首届国家杜马代表，并参与组建和领导民主派政党“劳动团”（Трудовая группа）。二月革命后，被选入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参与立宪会议的筹备工作。6-7 月，随劳动团一道并入民粹派的劳动人民社会党，并当选第一届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中执委委员。十月革命后，反对苏维埃政权，参加保卫立宪会议联盟。12 月被契卡逮捕，次月释放。后流亡国外，继续从事政治活动。——译者注

³³⁵ 马特维·伊万诺维奇·斯科别列夫（Матвей Иванович Скобелев，1885-1938），生于巴库的产业家家庭。1903 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参加了 1905 年革命。后流亡国外，为社会民主工党从事出版工作。期间曾与托洛茨基密切合作。1912 年回国后，当选国家杜马代表，并逐渐成为孟什维克。1914 年，参与领导了巴库罢工，后被捕入狱。一战爆发后，持护国派立场。二月革命期间，积极组织苏维埃，并在此后相继当选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副主席、第一届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中执委副主席。5 日，成为临时政府的劳动部长，9 月辞职。十月革命后，接受苏维埃政权，脱离孟什维克，但反对解散立宪会议。1920 年侨居巴黎，次年开始为苏维埃政权从事对法商贸和外交工作。1922 年回国，加入俄共（布），后在伦敦和巴黎从事商贸和外交工作。1925 年再次回国后，主要参与领导外贸工作。大清洗期间被处以死刑。1957 年平反。——译者注

³³⁶ 阿布拉姆·拉斐洛维奇·戈茨（Абрам Рафаилович Гоц，1882-1940），右翼社会革命党人，生于犹太商人家庭。1906 年加入社会革命党专门负责恐怖主义活动的“战斗组织”。次年被捕后，被判处苦役，后又流放西伯利亚。二月革命后，移居彼得格勒，领导彼得格勒苏维埃的社会革命党党团，后当选第一届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中执委主席团主席。反对十月革命，担任全俄拯救祖国与革命委员会主席。内战期间，组织社会革命党援助白军。1920 年被捕，1922 年被判处死刑，1924 年减为五年徒刑，次年被流放至乌里扬诺夫斯克。大清洗期间，再次被判处有期徒刑。——译者注

³³⁷ 弗拉基米尔·尼古拉耶维奇·罗扎诺夫（Владимир Николаевич Розанов，1876-1939），生于贵族家庭。1890 年代开始参加政治活动，1899 年被流放至斯摩棱斯克。后参与组织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二大，并成为孟什维克。1904 年当选俄社民工党中央委员。1908 年流亡国外。二月革命后，成为彼得格勒苏维埃孟什维克党团成员。反对十月革命，并参加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政治活动。1919 年被捕后，脱离政治生活，从事医疗工作。大清洗期间，未受波及。——译者注

³³⁸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5 号全宗，1 号目录，2565 号案卷，第 1 张。

名列捷尔任斯基指令的反对派领导人。大会的组织者事先已达成共识，不会表明自己的身份，并且在发生另一次突袭的情况下，会继续他们的讨论。因此，他们拒绝遵命书面登记自己的姓名和住址，并镇定自如地继续自己的事情。契卡工作人员于是宣布，全体与会者被捕，并在门口设岗，以防有人离开。

卫宪联盟总部的逮捕是由列宁在人民委员会早些时候的一次夜间会议上宣布的。³³⁹尽管这次会议的记录未载，但显然人民委员会决定，在被扣留者表明自己身份后，释放所有未名列捷尔任斯基逮捕令的人。³⁴⁰带着这一授权，施泰因贝格和卡列林急忙赶赴事发地，试图解决正迅速演变为高度爆炸性局势的事件。他们无视契卡工作人员及其分遣队，解释称，自己的团体也反对“恐怖”，但有责任执行合法政府的法令，并请求与会者表明身份，这样就能和平解决这次显而易见的误会。他们的请求也遭到了拒绝，与会代表坚持入狱，以为蔑视。接着，施泰因贝格转而要求大会主席即便口头证明，捷尔任斯基逮捕令上的人并不在场。遭拒后，施泰因贝格和卡列林个人负责做出这样的证明，并释放所有人，从而结束了僵局。

如今，以施泰因贝格及其政府内的左翼社革党同事为一方，以捷尔任斯基和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人民委员为另一方，在契卡特权问题上的摊牌必然为时不远，并随着列宁在12月19日的人民委员会会议上，为时已晚地给满当当的议程加上议题“12月18日人民委员施泰因贝格释放捷尔任斯基下令逮捕的保卫立宪会议联盟成员”而发生了。³⁴¹政府里的7名左翼社革党人中有6人参加了这次会议——异常高的出席率。可布尔什维克的人数（包括列宁和托洛茨基）超出他们一倍有余。捷尔任斯基宣称，施泰因贝格昨日夜的行为羞辱了自己的机构，打击了它的士气，由此开启了讨论。³⁴²这次会议的简短记录掩盖了当时的激烈争论。会议最终不出意外地通过决议，声明捷尔任斯基的委员会的指令只能向人民委员会申请修订。并训斥了施泰因贝格和卡列林。³⁴³

左翼社革党人民委员予以还击。在会上，施泰因贝格一度威胁辞职。³⁴⁴左翼社革党人能得到的最好的结果，仍然是同意搁置实施包括训斥施泰因贝格在内的动议。³⁴⁵这次失败没有阻止施泰因贝格。例如随后，他电告全国各地的苏维埃，以苏维埃政权已稳，因此是时候将对反革命的控制纳入一个新的革命法律体制为

³³⁹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年谱》，第5卷，第142页。

³⁴⁰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5号全宗，1号目录，2565号案卷，第1张背面。

³⁴¹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19号全宗，1号目录，30号案卷，第2张。

³⁴² 伊·纳·施泰因贝格，《我的人民委员岁月：俄国十月革命片段》(Als ich Volkskommissar war: Episoden aus der russischen Oktoberrevolution)，慕尼黑，1929年，第35-37页。

³⁴³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19号全宗，1号目录，30号案卷。

³⁴⁴ 施泰因贝格，《我的人民委员岁月》，第35-37页。

³⁴⁵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19号全宗，1号目录，30号案卷，第2张背面。

由，指示他们停止系统性的镇压活动。³⁴⁶但人民委员会继续努力束缚他。仅在 12 月和 1 月的人民委员会会议中，就有 11 次讨论过施泰因贝格提出的契卡行为问题——没有任何积极结果。³⁴⁷

可最终，布尔什维克对于将契卡保持为该党近卫队的愿望是短命的。在 1918 年 1 月初，施泰因贝格试图通过迫使布尔什维克允许左翼社革党参与领导契卡，来从内部软化未能使之向自己负责的契卡的行为。1 月 4 日，在个别试图参加契卡的左翼社革党人因成员仅由选举产生而被刷掉后，施泰因贝格致信捷尔任斯基，客气但坚决地要求，彼得格勒苏维埃和中执委当中的左翼社革党人有权不经选举而立即在契卡领导层就职。³⁴⁸人民委员会于 1 月 7 日考虑了施泰因贝格的要求。当时，全俄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将要召开。会上，左翼社革党人的支持对于布尔什维克的政策来讲是至关重要的。或许由于这一点，以及感谢左翼社革党协同解散立宪会议（1 月 5/6 日），布尔什维克不顾捷尔任斯基的反对，向施泰因贝格让步。³⁴⁹次日，4 名左翼社革党人加入契卡委员会。维亚切斯拉夫·亚历山德罗维奇³⁵⁰，一位杰出的全国左翼社革党人，成了捷尔任斯基的副手。³⁵¹

* * *

在 1917 年 12 月的第一个半周里，布尔什维克和左翼社革党人凑活着结盟了，契卡得以建立。此时，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着手控制自己可观的立宪会议代表团。乍一看，这似乎是它最微不足道的问题了。不过，只要熟悉整个 1917 年布尔什维克领导层对与革命发展相关的关键问题的激烈讨论，并且了解当时主要的、名义上的党的下级机构的相对独立性，任何人都不会吃惊于党内有关立宪会议地位的严重冲突。在这个问题上，列宁和他的中央委员同志们，与仍然由加米涅夫领导的布尔什维克温和派之间，也存在着巨大的理论和策略分歧。

正如我们此前所见，在 10 月末 11 月初，温和派促成建立广泛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联合内阁、甚至使人民委员会实际上向中执委负责的努力已然失败。由此，他们要么退出要么被迫离开党和中央政府的高级职位。但是，对于自己事业的至关

³⁴⁶ 瓦·瓦·舍洛哈耶夫总主编，雅·维·列昂季耶夫（Ярослав Викторович Леонтьев）主编，《左翼社会革命党：文献与材料》（Партия левых социалистов-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ов: 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第 1 卷，莫斯科，2000，第 179 页。

³⁴⁷ 这是拉兹贡的看法（拉兹贡：《政府阵营》，第 135 页）。

³⁴⁸ 俄罗斯联邦联邦安全局中央档案馆，1 号全宗，10 号目录，52 号案卷，第 5-6 张。

³⁴⁹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19 号全宗，1 号目录，42 号案卷，第 1 张背面。

³⁵⁰ 维亚切斯拉夫·亚历山德罗维奇·亚历山德罗维奇（Вячеслав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1884-1918），原名彼得·亚历山德罗维奇·德米特里耶夫斯基（Петр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Дмитриевский），生于七等文官家庭。中学时即参加社会革命党组织，此后多次被捕，并流放西伯利亚。一战爆发后，持国际派立场，为社会革命党左派。1915 年流亡国外，次年秘密回国，在彼得格勒从事地下工作。二月革命后，当选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执委会委员，负责出版工作。此后连续三次当选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中执委委员，并积极参加十月革命。1917 年 12 月参加契卡，次月担任该组织副主席。1918 年 7 月在莫斯科参加左翼社革党暴动。暴动失败后被捕，并被处以死刑。——译者注

³⁵¹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19 号全宗，1 号目录，42 号案卷，第 1 张背面。

重要，对于尽一切必要努力来使党变得不那么极端和暴力的决心，他们并没有丧失信念。真要有什么的话，11月之后的日子里日益加深的政治冲突和经济混乱使他们越发确信，列宁和托洛茨基正把革命和国家引向不可避免的毁灭。他们把最后的希望寄托于立宪会议，后者一直被其视为革命俄国未来的政治和社会秩序能够得到合法确定的唯一机构。

到11月末，随着立宪会议命运问题开始占据中心地位，加米涅夫、李可夫、米柳亭和诺金向中央委员会声明，要求恢复职务。无论“四人书”（Письмо 4-х，人们这样称呼温和派的这份声明）还是列宁的书面回应，都没有发表或解密。但是鲜有疑议的是，温和派寻求复职，是为了在党的高层领导层中为自己关于立宪会议的看法而战。11月29日讨论了温和派要求的中央委员会会议的记录表明，他们的诉求被否决了，因为他们显然没有改变立场，正如乌里茨基所言：“我们没有得到保证，如果成为少数派，他们不会以[与他们在十月革命前全铁工执委对话期间]同样的方式行事。”³⁵²

但是，四人仍然有牌可打。实际上，所有的温和派领导人都当选了立宪会议代表。布尔什维克代表团是根据温和派影响最大的9月末的选举名单组建的。在当时形势下，整个代表团会如何看待立宪会议，这是无法预计的。但这样的事实鼓舞了温和派：在1917年9月末的民主会议期间，关于党参加预备议会的问题，在党的全国领导人的最后一次正式集会（数量上相当于一次党代会）上，相当大部分人和他们站在一起，反对托洛茨基和列宁派。³⁵³

此时布尔什维克温和派在党内维护立宪会议神圣地位的运动，仍然还有许多内容不明朗。明朗的是，12月初布尔什维克立宪会议代表于塔夫利达宫举行的首次组织会议上，在列宁评论了中央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对立宪会议的态度后，温和派在选出的党团临时局当中赢得了多数。其中有加米涅夫、诺金、李可夫、米柳亭、梁赞诺夫和拉林，即很大一部分曾在11月初抛弃高级党政职务的党内温和派要人。³⁵⁴

在温和派控制的临时局的指导下，党团开始按照这条原则独立行事：立宪会议应当是俄国政治命运的最终仲裁者。党团无视11月29日中央委员会会议的决定（肯定是由列宁传达的）——大部分布尔什维克立宪会议代表目前不应被召集至彼得格勒，党团授权临时局要求缺席代表立即来京。同时，它还授权临时局开始为立宪会议的讨论做立法方面的准备。党团也投票呼吁立即召开一次党的全国

³⁵²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会议记录》，第154页。另参见《苏共中央通报》，1989年第1期，第236页。

³⁵³ 拉宾诺维奇：《走向政权的布尔什维克》，第188页。

³⁵⁴ 叶·戈罗杰茨基（Ефим Наумович Городецкий）和尤·沙拉波夫（Юрий Павлович Шарапов，原文此处误为沙帕罗夫）and Iu. Shaparov, 《斯维尔德洛夫》（Свердлов），莫斯科，1971年，第233-234页；弗·伊·列宁：《全集》（Сочинения），第3版，第22卷，莫斯科，1931年，第130页、第593页注释62；《苏共中央通报》，1989年第1期，第236页；《新生活报》，1917年12月2日，第3版；《我们的时代报》，1917年12月2日，第3版。

代表大会或代表会议，以决定党如何对待立宪会议。在这次党代会决定之前，代表团反对人民委员会控制立宪会议的召开和架构的努力。³⁵⁵

党内温和派上述行径所反映的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与该党立宪会议党团之间的政策分歧，是12月11日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会议的主要议题。³⁵⁶会议决定立即召集党的立宪会议代表赶赴彼得格勒。会议还同意，列宁起草的《关于立宪会议的提纲》所体现的党的立宪会议政策将于次日（12月12日）交于党团采纳。根据这份提纲，如今的苏维埃共和国是比资产阶级共和国以及立宪会议远为高级的民主形式。解决由立宪会议选举总体结果与人民热望之间矛盾所引起的危机的唯一可能，在于尽可能广泛地改选立宪会议代表，并且立宪会议明确承认苏维埃政权。³⁵⁷简言之，这份提纲坚决禁止像布尔什维克温和派那样，将立宪会议当成人民意志的合法表达。立宪会议将被边缘化，但不会被消灭。尼古拉·布哈林和格里戈里·索科利尼科夫被授权确保此后布尔什维克立宪会议党团的工作贯彻这一精神。在12月11日休会前，中央委员会还通过了一份由列宁起草的决议，呼吁重选临时局。老临时局召开党的代表大会或代表会议的要求甚至都没有得到讨论。³⁵⁸绝非巧合的是，同日（12月11日），加米涅夫、梁赞诺夫、李可夫、拉林和米柳亭被清洗出了布尔什维克中执委党团的局。³⁵⁹

布尔什维克立宪会议代表团12月12日会议的信息不多。根据斯维尔德洛夫给临时局的一份通告，这次会议是在斯莫尔尼宫而非塔夫利达宫举行的，以便中央委员能够参会。³⁶⁰由于这种状况，再加之尚未在彼得格勒的代表没有足够的时间抵达会场，列宁派获得了巨大的优势。12月11日中央委员会通过的会议议程明确规定，代表团应当听取中央委员会的报告（无疑是一通训斥）、考虑列宁的提纲并按照那样的顺序重选临时局。³⁶¹列宁亲自提交了自己的提纲，并得到通过。³⁶²对于重选临时局的结果，人们只知道，选举了亚历山大·施略普尼柯夫替代加米涅夫，担任新主席。³⁶³党内温和派又遭遇了一次重大打击。

³⁵⁵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会议记录》，第160-161页、第279页注释192；《苏共中央通报》，1989年第1期，第237页；列宁：《全集》，第35卷，第469页注释70；《列宁年谱》，第5卷，第125页。

³⁵⁶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会议记录》，第160-161页；《苏共中央通报》，1989年第1期，第237-238页。

³⁵⁷ 列宁：《全集》，第35卷，第162-166页。

³⁵⁸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会议记录》，第161页。

³⁵⁹ 贝斯特罗娃（Л. Быстрова，译者注：原文此处误为A），《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战：无产阶级专政的初期措施》（Борьба за укрепление диктатуры пролетариата: Первые шаги диктатуры пролетариата），载奥·奥·利达克（Ото Августович Лидак）编，《十月在彼得格勒》（Октябрь в Петрограде），列宁格勒，1933年，第325页。

³⁶⁰ 戈罗杰茨基和沙拉波夫：《斯维尔德洛夫》，第234页。有关此次会议的媒体简讯，参见《人民事业报》，1917年12月14日，第2版；以及《社会民主报》（Социал демократ），1917年12月14日，第2版。

³⁶¹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会议记录》，第161页。

³⁶²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会议记录》，第280页。

³⁶³ 《十月武装起义》，第2卷，第493页。

* * *

在1917年12月下半月和次年起初几天里，布尔什维克和左翼社革党人在彼得格勒工厂工人和卫戍部队当中进行了一场强劲的宣传运动。它的中心主题是列宁在《关于立宪会议的提纲》中的主要论点，即任何由立宪会议组建的政府，都必然造成从人民在十月革命进程中建立的苏维埃共和国的倒退。在这场运动之初的12月20日，由于左翼社革党的压力，人民委员会决定于1月5日召开立宪会议，并要求400名代表于当日到场。³⁶⁴两天后，中执委认可了这一决议。同时，作为对立宪会议的必要平衡，中执委计划分别于1月8日和12日召开工兵代表苏维埃全国代表大会和农民代表苏维埃全国代表大会。³⁶⁵

人民委员会计划于1月2日讨论立宪会议的开幕和进程。但讨论被推迟到定于当日夜晚些时候召开的布尔什维克和左翼社革党中央委员会联席会议上。³⁶⁶关于会议进程的信息很少，但列宁的《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及其相伴随的法令一定在会上得到了讨论。二者都于1月3日在中执委获得一致通过，并在4日刊于《真理报》。《宣言》准备使自己的通过成为立宪会议的第一要务，并旨在形成苏维埃与立宪会议之间直接的、决定性的对立，并消除后者巩固权力的一切可能性。因此，《宣言》明确表示，俄国是且将继续保持为一个苏维埃共和国，全国的政府权威仅仅属于苏维埃。它无条件支持苏维埃政府在内政外交领域的一切重大法令和措施，并不留余地地拒绝立宪会议声索政府权威。相伴的法令明确支持，任何个人或机构（包括立宪会议）擅用国家政府职能的，将被视为反革命行径，并采取一切可能手段（包括动用武装力量）加以镇压。³⁶⁷总之，信息明确——立宪会议要么让权滚蛋，要么被强迫这么做。这是这份宣言与列宁之前《关于立宪会议的纲领》之间的重要策略差异，后者曾预想这一机构有可能发挥较大的支持作用。

* * *

当布尔什维克和左翼社革党人为立宪会议的迅速死亡预备条件时，他们的对手（最重要的是社革党人，仅有少数当选代表是孟什维克）继续为会议议程做准备。固然，在11月28日事件之后，对于会议是否真得会被允许召开，社革党中央委员会已经有所怀疑。³⁶⁸可在12月上半月，已抵达彼得格勒的外省社革党代表仍然定期会面，并且常常是在他们位于沼泽街的临时宿舍。³⁶⁹到月中，已有150余名社革党代表到场，党团每天都开会审查、讨论并修订立法草案，选取并指示议场领袖，甚至指导主要的发言者。一些委员会聚焦于这样的特定任务：协调彼得格勒的鼓动和宣传工作；建立并保持与外省苏维埃和党组织的联络；协调与立宪会

³⁶⁴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19号全宗，1号目录，31号案卷，第2张背面。

³⁶⁵基普：《争论》，第247页。

³⁶⁶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19号全宗，1号目录，39号案卷，第1张。《劳动旗帜报》，1918年1月4日，第3版；《苏共中央通报》，1989年第2期，第176页。

³⁶⁷基普：《争论》，第257-258页；列宁：《全集》，第35卷，第221-224页。

³⁶⁸哥伦比亚大学，巴赫梅捷夫档案馆，津济诺夫特藏（社革党中央委员会会议记录），第19页。

³⁶⁹见上文，第2章。

议中包括左翼社革党在内的其他党团的活动（这将成为跨党团委员会的任务）；准备并出版每日公报、小册子和传单；起草有关如新俄国的政治形式和架构、基本的经济和社会改革这类问题相关之基本法律的草案。尽快揭露立宪会议中多数派的真实面目的关键重要性，首先在12月初社革党四大通过的一份决议中得到了承认。³⁷⁰

因此，和基本法律委员会（комиссией по фундаментальным законам）一道，最重要的专门委员会是首日委员会，其专门目的在于制宪会议开启首次会议的计划，并统筹相关政策和策略。³⁷¹社革党党团早在12月18日就通过了由首日委员会提出的一份宣言草案。该草案正式支持推翻沙皇政治和法律制度；永远否定君主制；宣称俄国是一个民主联邦共和国；并明确规定，在基本法律通过之前，全国国家权力归立宪会议。³⁷²

当月末，基本法律委员会起草的大部分改革立法草案得到了由中派控制的党团领导局的审查和通过，其要点被吸收进了一份广为流传的、简短的纲领宣言。³⁷³这份宣言强调，由党团为立宪会议立即实行而准备或正在准备的措施。和平政纲准则允许任命一个高级代表团，与各交战国展开旨在尽快达成没有胜败的普遍和约的谈判。即便在谈判结束前，所有希望离职的军事人员都将离职，俄国武装力量实行志愿服役。有关民族问题的政纲准则允许少数民族在俄罗斯联邦民主共和国中行使自决权。至于对社革党人至关重要的农业改革，宣言则明确规定，所有私人土地的秋季收获将由土改机构根据这条原则加以重新分配：劳动农民平等使用土地，并且无需补偿土地所有者。在工业领域则规定，对工业实行工人组织尽可能广泛参与的国家管制和监督。宣言还要求：通过立法，将战争债务的偿还者由劳动者转为有产阶级；八小时工作日、最低工资以及各种社会保险立法；有力打击失业的立法；向群众供应基本必需品的立法。宣言表明，党团和领导局中的多数人为夺取苏维埃政权对人民的吸引力，准备极左到怎样的程度。与推翻临时政府前后布尔什维克温和派的纲领相较，这份宣言只是少了明确将非社会主义党

³⁷⁰ 瓦·瓦·舍洛哈耶夫总主编，德·鲍·帕夫洛夫（Дмитрий Борисович Павлов，译者注：原文如此，可能有误）主编，《社会革命党：文献与材料》（Партия социалистов-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ов：Документы и материалы），第3卷，第2分册，莫斯科，2000年，第197页。

³⁷¹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274号全宗，1号目录，45号案卷，第1-340张；尼·斯维亚季茨基（Николай Владимирович Святыцкий），《社革党立宪会议党团及其活动》（Фракция партии С.Р., учредительного собрания и ее деятельность），载《党的消息》（Партийные известия），1918年第5期，第32-42页；尼·奥加诺夫斯基（Николай Петрович Огановский），《一位立宪会议代表的日记》（Дневник члена Учредительного собрания），载《过去的声音》（Голос минувшего），1918年第4-6期，第145-148页；索科洛夫，《保卫全俄立宪会议》，第33-34、58页。

³⁷²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274号全宗，1号目录，45号案卷，第15、45-46张。

³⁷³ 《社会革命党》，第3卷，第2分册，第197页。

³⁷⁴ 《社会革命党》，第3卷，第2分册，第271-274页。

³⁷⁵ 尼古拉·彼得罗维奇·奥加诺夫斯基（Николай Петрович Огановский，1874-1938），民粹派农业经济学家，生于军官家庭。1905年革命期间，参与创建全俄农民联盟。此后，反对斯托雷平改革，并长期在学术机构从事农业经济研究。二月革命后，从事土改工作，主张废除土地私有制，

派排除于政府之外。³⁷⁴难怪死硬的社革党右派、农业专家尼古拉·奥加诺夫斯基³⁷⁵将领导局的努力蔑称为“全铁工执委模样的”（викжелистой）。³⁷⁶

大约在公布立宪会议开幕日期的12月20日，社革党跨党团委员会的密使会晤施泰因贝格、卡列林和科列加耶夫，就可能的合作试探他们的口风。作为密使之一的尼古拉·斯维亚季茨基³⁷⁷后来回忆道，在经过漫长而激烈的争论后，左翼社革党人明确表示，他们会在“街垒的另一边[布尔什维克一边]”。³⁷⁸这是毫无疑问的！同时应当注意到，许多左翼社革党人希望吸引足够多名义上属于社革党的农民代表，以便在立宪会议上发挥决定性的独立作用。这次挫折前后，社革党领导层支持公务员要求立即召开立宪会议的罢工，并（通过例如保卫立宪会议联盟）试图在彼得格勒工人、士兵和水兵当中为自己扩大鼓动。³⁷⁹它还试图通过支持立宪会议的农民向布尔什维克施压。因此在12月末，社革党控制的农民代表苏维埃旧中执委以切尔诺夫的名义向农村地区发出电报称，苏维埃政权之所以将全俄农民代表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安排在立宪会议（1月5日）和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1月8日）很久之后的1月15日，是为了将农民边缘化，并打压立宪会议。旧农民中执委无视新合并的中执委，将全俄农民代表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改定于1月8日，以便和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同日召开。他还进而向忠于立宪会议的农民苏维埃发出呼吁，请求它们指示其在京代表于1月5日支持立宪会议的神圣性，这显然是要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支持者对会议的各种攻击。³⁸⁰

但也仅止于此。虽然卫宪联盟和社革党军事委员会努力确保立宪会议的安全，但社革党领导层难以释怀地害怕准备进行或许可能引起政府回击的防卫。当被自己的军事委员会迫使从听报告和准备决议转到安全问题时，它的回应是，既然是人民选举立宪会议来为俄国建立新的政治制度和生活，那么保卫它就是人民

反对农民擅自夺地。6月当选劳动人民社会党中央委员，9月脱离该党而加入社会革命党，11月当选立宪会议代表。十月革命后，反对苏维埃政权，曾与白卫政权合作。1920年代，在苏维埃政权的农业部门工作，并从事农业学术工作。1931年被捕，1933年被流放，1935年获释后定居乌法。——译者注

³⁷⁶ 奥加诺夫斯基，《一位立宪会议代表的日记》，第113、151页。

³⁷⁷ 尼古拉·弗拉基米罗维奇·斯维亚季茨基（Николай Владимирович Святыцкий，1886-1937），生于贵族家庭。1900年代参加革命活动，1906年被捕，次年被流放。二月革命后，当选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代表。后在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会负责立宪会议选举工作。1918年参加反苏维埃政权的政治活动，次年又倒向布尔什维克。1920年代，在哈萨克斯坦从事经济工作。大清洗期间被处以死刑。1959年平反。——译者注

³⁷⁸ 尼·斯维亚季茨基，《1918年1月5-6日：一位前社会革命党人的回忆》（5-6 января 1918 года: Из воспоминаний бывшего эсера），载《新世界》（Новый мир），1928年第2期，第220-221页；索科洛夫，《保卫全俄立宪会议》，第31、35页。

³⁷⁹ 哥伦比亚大学，巴赫梅捷夫档案馆，津济诺夫特藏（社革党中央委员会会议记录），第18-19页。

³⁸⁰ 俄罗斯联邦联邦安全局中央档案馆，1号全宗，1号目录，5号案卷，第144张。

的责任。³⁸¹

当时，许多社革党领导人也觉得，立宪会议是如此神圣，以至对它的攻击是不可想象的。³⁸²军事委员会成员鲍里斯·索科洛夫后来承认，像他这样倾向于能动地甚至主张先发制人地采取措施保卫立宪会议的人，在社革党立宪会议党团中仅占很小一部分，并且被大多数人侧目而视。所以，在军事委员会通过了由另一名委员费多特·奥尼普科³⁸³提出的绑架或刺杀布尔什维克领袖的计划后，社革党中央委员会立即以“疯狂的恐怖主义行径”将“引起工人和士兵的巨大愤怒，以至最终会造成对知识圈的集体总迫害”为由，否决了这种想法。³⁸⁴早在12月12日，社革党中央委员会就开始非常担忧，像索科洛夫这样的人的攻击性举动可能给人民委员会提供取消立宪会议的口实，因而专门禁止恐怖主义行径，并组织了特别委员会“以调查参与协调立宪会议保卫工作的同志们[军事委员会]的活动”。³⁸⁵

不过同日（12月12日），谢苗诺夫斯基团通过决议，拥护立宪会议成为“俄罗斯土地的全能主人”³⁸⁶，这或许使军事委员会受到了鼓舞。大约同时，卫宪联盟设法组织出版了日报《全俄保卫立宪会议联盟公报》（Бюллетень всероссийского союза защиты учредительного собрания）。此外到该月底，军事委员会设法面向士兵，出版了几期自己狂热的反布尔什维克报纸《灰色军大衣报》（Серая шинель）。³⁸⁷许多彼得格勒工厂的代表定期参加由卫宪联盟组织的工人大会、讲座和工作坊。尽管不能把这些措施视作政治行动准备就绪，但社革党人显然在几座关键工厂（其中包括政府印刷厂、奥布霍夫钢铁厂和军工厂）有着相当的影响。12月28日，奥布霍夫厂的工人否决了一份宣誓无条件支持苏维埃政权的决议，并在此前通过声明，谴责人民委员会的内外政策正把国家和革命引向不可避免的毁灭。声明宣称立宪会议是革命最后的希望，并要求它立即召开。³⁸⁸

军事委员会希望组建某种自己的赤卫队，但正如索科洛夫抱憾承认：“我们或

³⁸¹ 索科洛夫：《保卫全俄立宪会议》，第31、35页。另参见斯维亚季茨基，《1918年1月5-6日》，第222页。

³⁸² 瑙·雅·贝霍夫斯基（Н. Я. Быховский），《1917年全俄农民代表苏维埃》（Всероссийский совет крестьянских депутатов 1917 г.），莫斯科，1929年，第34页。

³⁸³ 费多特·米哈伊洛维奇·奥尼普科（Федот Михайлович Онипко，1880-1938），生于农民家庭。1905年革命后，当选首届国家杜马代表，后在喀琅施塔得为社会革命党从事鼓动和组织工作。1906年被流放至西伯利亚，后从流放地逃脱，流亡巴黎。一战期间，参加法军的外籍军团。二月革命后回国，在波罗的海舰队从事兵运工作。后当选全俄农民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代表和立宪会议代表，并从事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活动。1925年宣布承认苏维埃政权。——译者注

³⁸⁴ 索科洛夫：《保卫全俄立宪会议》，第48页。1月1日刺杀列宁的企图是否与奥尼普科的计划有关，尚不确定。

³⁸⁵ 哥伦比亚大学，巴赫梅捷夫档案馆，津济诺夫特藏（社革党中央委员会会议记录），第19页。

³⁸⁶ 俄罗斯联邦联邦安全局中央档案馆，1号全宗，2号目录，7号案卷，第42张。

³⁸⁷ 索科洛夫：《保卫全俄立宪会议》，第42页。

³⁸⁸ 《全俄保卫立宪会议联盟公报》，1918年1月3日，第2版。

许已经征召了 2000 队员，但这一数字只存在于纸面上。”³⁸⁹社革党军事委员会设法将数百军官和士兵从前线调到彼得格勒，试图利用他们中的一些人来加强谢苗诺夫斯基团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团对立宪会议的支持，并让其余人正式加入子虚乌有的士兵大学，他们在那儿将组建供 1 月 5 日使用的巡查战斗队。这些措施也被社革党中央委员会视为太危险而取消了。³⁹⁰

与此同时，卫宪联盟领导层开始计划在 1 月 5 日立宪会议开幕时，组织一场支持会议的军民和平群众游行。这一计划在 12 月 29 日卫宪联盟支持的工人大会第四次会议上得到通过。它们在这次会议上就开始实施，并在 1 月 3 日的另一次会议上继续。³⁹¹显而易见，至少这次游行的部分鼓动者希望它或能发展为以“全部政权归立宪会议”为口号的武装起义。鲍里斯·索科洛夫相当详尽地描述了计划，宣称随着立宪会议开幕时间的临近，相当一部分工人和士兵有望参与。后者集中于谢苗诺夫斯基团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团以及第 5 装甲车师。但即便他也承认，没什么是确保的。³⁹²无论如何，当这些计划被提交给社革党中央委员会审议时，完全未被计划潜能说服的后者宣布严禁武装游行，并坚持即便士兵也不应携带武器，以禁绝流血的可能。³⁹³

* * *

与此同时，苏维埃政权请求工人和士兵勿要参加任何支持立宪会议的游行。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机构没有对安全问题做出决定。彼得堡委员会跟中央委员会一样，注意力完全集中在正由苏维埃和德国谈判人员讨论的可能的单独和约对国外社会主义前景的意义。³⁹⁴政府掌管的安全机构和部队总体上缺乏组织。军革委已经解散，而契卡的组建工作尚初具雏形。即便被设计为中央机构，但它的活动范围不出首都之外。并且即便在首都，它的影响也由于种种原因而受到限制。在彼得格勒，存在几家其职权与契卡有所重叠的常设机构。其中包括彼得格勒苏维埃革命法庭的调查委员会（此前是军革委的军事-调查委员会）³⁹⁵、格里戈里·布拉贡拉

³⁸⁹ 索科洛夫：《保卫全俄立宪会议》，第 44 页；格·谢苗诺夫（Григорий Иванович Семёнов），《社会革命党的军事与战斗活动》（Военная и боевая работа партии социалистов-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ов），莫斯科，1922 年，第 13 页。

³⁹⁰ 索科洛夫：《保卫全俄立宪会议》，第 41、44 页。另参见薇·弗拉基米罗娃（Вера Владимирова），《“社会主义者”给资本家效劳的年代》（Год службы «социалистов» капиталистам），莫斯科-列宁格勒，1927 年，第 106 页；谢苗诺夫，《社会革命党的军事与战斗活动》，第 10-11 页。

³⁹¹ 《全俄保卫立宪会议联盟公报》，1917（原文此处误为 1918）年 12 月 31 日，第 2 版；1918 年 1 月 5 日，第 2 版。另参见贝霍夫斯基，《1917 年全俄农民代表苏维埃》，第 349 页。

³⁹² 索科洛夫：《保卫全俄立宪会议》，第 50 页。

³⁹³ 索科洛夫：《保卫全俄立宪会议》，第 60 页。关于这些事件略有不同的版本见于谢苗诺夫，《社会革命党的军事与战斗活动》，第 13 页。另参见弗拉基米罗娃，《“社会主义者”给资本家效劳的年代》，第 109-110 页。

³⁹⁴ 因此在 12 月最后 2 周里，彼得堡委员会的会议看上去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花在这个问题上了（《彼得堡委员会》，第 607-623 页）。

³⁹⁵ 圣彼得堡中央国家档案馆，143 号全宗，1 号目录，52 号案卷，第 29 张及其背面。

沃夫³⁹⁶领导的彼得格勒安全紧急委员会、邦奇-布鲁耶维奇的反迫害委员会——所有这些都是最近组建的³⁹⁷——以及各种区级调查委员会，还有一些仍在筹划当中的机构。这些安全机构和其它机构各自独立运作，并且处于各式各样的混乱之中。

此时，契卡也实际上没有直属军事力量。即便是温和的行动，它也得首先依靠纪律松懈、很大程度上缺乏训练并且控制松散的赤卫队分遣队（其中许多隶属于区苏维埃）。起初，包括捷尔任斯基在内的契卡领导人也在原则上避免使用“暗探局方法”——利用秘密特工、特工煽动以及类似者。他们希望，对于充当契卡的耳目来讲，警惕的工人已经足够了。³⁹⁸因此，即便对于情报工作而言，契卡的价值也是有限的。这种起初对于任何可憎的暗探局色彩的厌恶也解释了，契卡在其早期（尤其是1918年大部分时间里）在征召合格且忠诚的人员方面遭遇的巨大困难。当然，严重缺乏可靠的干部是所有苏维埃机构的通病。1918年仍是契卡主席团成员雅科夫·彼得斯³⁹⁹后回忆了契卡征召困难的一个独特特征。他回忆到，对于老布尔什维克来说，重新征集为无产阶级而战的特别安全特工、进行搜查、把受害者送到西伯利亚、把他们送进监狱以及绞死他们，仍然是非常新鲜的经历。并且在这里组织了一种新权力，而且又一波搜查、逮捕和暴力的轮回开始了。许多人只是无法区分过去和现在的镇压行径，不情愿在契卡组织中服务。⁴⁰⁰征召布尔什维克党员以及甚至不隶属的工厂工人进入契卡的困难，帮助解释了，为什么如此多的前暗探局特务和明显的罪犯钻进了契卡，以及它起初在苏维埃政府看来作为安全机构的限度。在数月后的一份官方报告中，契卡高官伊万·波卢卡罗夫⁴⁰¹回忆

³⁹⁶ 格里戈里·伊万诺维奇·布拉贡拉沃夫（Георгий Иванович Благонравов，1896-1938），生于职员家庭。大学期间，参加革命活动。1915年起被征召入伍。二月革命后，加入布尔什维克，并当选叶戈里耶夫斯克工兵代表苏维埃主席，后又被选入第一届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中执委。十月革命期间，掌控彼得保罗要塞，并在此后负责彼得格勒的保卫工作。1918年起，先后在契卡和格别乌的铁道部门工作。1929-1932年，担任苏联副铁道人民委员。此后继续从事交通工作。大清洗期间被捕，并被枪决。1956年平反。——译者注

³⁹⁷ 彼得格勒苏维埃革命法庭调查委员会建立于11月24日。其他两个机构——彼得格勒安全紧急委员会和反迫害委员会——创建于12月初。

³⁹⁸ 拉齐斯：《全俄非常委员会报告》，第11页。另参见谢·维·列昂诺夫（Сергей Викторович Леонов），《苏维埃帝国的诞生》（Рождение Советской империи），莫斯科，1997年，第248-249页。

³⁹⁹ 雅科夫·赫里斯托福罗维奇·彼得斯（Яков Христофорович Петерс，1886-1938），生于农民家庭。1904年加入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工党，参加了1905年革命。1907年被捕，次年被无罪释放，1909年侨居国外。一战爆发后，持国际派立场。二月革命后回国，主要在里加为布尔什维克从事革命活动，后至彼得格勒，并作为军事革命委员会成员参与组织了十月革命。此后，一直在契卡和格别乌等苏维埃政权的秘密警察部门工作。大清洗期间被处以死刑。1956年平反。——译者注

⁴⁰⁰ 雅·赫·彼得斯，《忆革命第一年的契卡工作》（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о работе в ВЧК в первый год революции），载《无产阶级革命》（Пролетарская революция），1924年第10期（总第33期），第10页。

⁴⁰¹ 伊万·尼古拉耶维奇·波卢卡罗夫（Иван Николаевич Полукаров，1895-1920），生于农民家庭。1915年入伍参战，次年开始参加革命活动。1917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后成为彼得格勒军事革命委员会成员。当年末至1918年末，在契卡工作。此后至1919年4月，在军校学习。毕业后，在红军中任职。1920年12月因伤寒病逝。——译者注

称，在这段时期里，“我们没有力量、能力或知识，委员会的规模是微不足道的”。⁴⁰²

由此，在立宪会议期间保护彼得格勒苏维埃政权的主要责任就落到了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团身上，后者依次向区苏维埃、赤卫队、拉脱维亚步兵团、彼得格勒卫戍部队和波罗的海舰队水兵寻求军事支持。1917年12月末和1918年1月初的主席团会议记录反映了这种状况。⁴⁰³12月31日，在离立宪会议预定开幕日还不到1周的时间里，主席团开会讨论了安保工作的安排问题。该主题的主要发言者坦率地得出结论称，现存军事力量是不能依靠的。由此，会议决定不顾节日，开始在1月2日前为所谓柯尔特营⁴⁰⁴紧急征召500名最可靠、坚定和富有经验的同志服役。这次会议的意义在于，如以这种方式补充官兵，那便能依靠该营执行特别重要的任务。主席团成员、布尔什维克彼得·扎卢茨基⁴⁰⁵被委派毫不迟疑地警告区苏维埃注意安保危机。⁴⁰⁶

后来在1918年元旦夜，发生一起令彼得格勒苏维埃当局更加不安的事件，后者进一步点燃了已经高度爆炸性的政治局势。列宁在向将被派往顿河流域打击科尔尼洛夫、阿列克谢耶夫和卡列金将军的部队的赤卫队员发表了演说后，返程时所乘车辆遭到枪击。无论列宁还是他的乘客——妹妹玛丽亚和瑞士社会民主党领导人弗里茨·普拉廷⁴⁰⁷——都没有严重受伤，而作案人逃之夭夭。但是，苏维埃当局立刻得出结论认为，右翼社革党人对未遂刺杀负责。次日，右翼社革党人的主

⁴⁰² 俄罗斯联邦联邦安全局中央档案馆，1号全宗，2号目录，25号案卷，第1张。

⁴⁰³ 圣彼得堡中央国家档案馆，9618号全宗，1号目录，185号案卷，第1-26张。

⁴⁰⁴ 即第1革命柯尔特机枪营（1-й революционный пулеметный батальон Кольта）。这里的“柯尔特”指柯尔特M1895机枪。1915年，为了给沙俄军队培训柯尔特机枪小组，在彼得格勒的军官射击学校（Офицерская стрелковая школа）成立了“柯尔特机枪小组营”（Батальон пулеметных команд Кольта）。二月革命后，该营逐渐由布尔什维克掌握，成为彼得格勒军事革命委员会的预备队，装备有80余挺机枪。军官射击学校迁往莫斯科后，该营留驻彼得保罗要塞，并在十月革命后更名为“第1革命柯尔特机枪营”。——译者注

⁴⁰⁵ 彼得·安东诺维奇·扎卢茨基（Пётр Антонович Залуцкий，1887-1937），生于农民家庭。1904年参加革命活动，后参加1905年革命。1907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11年成为布尔什维克，此后在圣彼得堡活动。1916年成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彼得堡委员会执委会委员。二月革命后，当选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执委会委员。十月革命期间，为彼得格勒军事革命委员会成员。此后至1920年，在红军中从事政治工作。1920年起，成为全俄苏维埃中执委委员。1923年起成为俄共（布）中央委员。后长期从事党务工作，并积极参与党内反对派。1927年，作为托洛茨基反对派成员被驱逐出联共（布），次年承认错误后又重新加入。此后至1934年，主要从事经济管理工作。1934年因牵涉季诺维也夫反对派集团，次年被判处有期徒刑。1937年被处以死刑。1962年平反。——译者注

⁴⁰⁶ 圣彼得堡中央国家档案馆，9618号全宗，1号目录，185号案卷，第19张；《1917年12月的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主席团》，载《红色编年史》，1932年第1-2期（总第46-47期），第111页。

⁴⁰⁷ 弗里茨·普拉廷（Fritz Platten，1883-1942），生于信奉天主教的瑞士木匠家庭。1904年起参加工人运动，1905年赴俄参加革命，次年在里加参与武装起义。1908年逃回瑞士。1911年加入瑞士社会民主党，参与领导了次年的苏黎世总罢工。第二国际瓦解后，参加齐美尔瓦尔德运动，并帮助列宁由瑞士返回俄国。1919年成为第三国际主席团成员。次年因参与领导瑞士全国总罢工而被捕。1921年参与创建瑞士共产党，并成为其领导人。1923年起，移居苏联，主要从事农业工作。大清洗期间被捕，后被处决。1956年平反。——译者注

要报纸《人民意志报》的办公室被搜查，该纸编辑部成员兼立宪会议社革党党团局成员皮季里姆·索罗金和安德烈·阿尔古诺夫⁴⁰⁸被捕下狱。⁴⁰⁹

在列宁的要求下，对该事件的调查被委派给邦奇-布鲁耶维奇的反迫害委员会，而非契卡或彼得格勒安全紧急委员会。⁴¹⁰有关这次调查的结果，原始案卷中的信息并不完备。1935年，应内务人民委员部要求，邦奇-布鲁耶维奇就当时被捕的据称反列宁阴谋参与者做出了说明。他在一份秘密书面备忘录中回复该部称，组织和实施未遂刺杀的是一小撮来彼得格勒保卫立宪会议的、理想主义的前线青年军官。⁴¹¹他们于1月22日被成功围捕。那些直接参与者做出忏悔，而其他人（包括几名活跃的圣乔治勋章获得者协会[Союза кавалеров ордена Св. георгия]会员）很快获释。革命法庭调查委员会将调查忏悔者的案情，但在1918年2月末德国人向彼得格勒进军期间，这些囚犯正式要求给予机会上前线战斗，来救赎自己。在列宁的同意下，他们被特赦并被允许赴前线参战。⁴¹²

在1918年1月初，大批彼得格勒工人和基层军事人员认为，刺杀列宁的企图是立宪会议和苏维埃政权之间斗争的一个方面。但即便现在，一些重要的卫戍部队仍然重申支持立宪会议。由于其营地与塔夫利达宫相距甚近，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团宣称支持立宪会议，或许是最令布尔什维克头痛的了。⁴¹³尽管它对立宪会议的支持是有条件的（即通过立即实现民主的和平、无偿均分土地和人民监督工业生产和分配的法令），但大部分立宪会议社革党党团成员对颁布这些措施的承诺已得到了广泛的宣传。

1月2/3日夜，主要围绕立宪会议问题，布尔什维克和左翼社革党中央委员会召开了一次紧急联席会议。⁴¹⁴之后的左翼社革党中央委员会、该党中执委党团和左翼社革党立宪会议代表的联席会议“几乎一致”同意，面对右翼社革党会议代表对苏维埃政权的攻击，“革命民主派”有必要予以坚决的、有组织的回击，并且“鉴于立宪会议隶属于革命，实现它的胜利，它不应当与苏维埃决裂”。否则，“与

⁴⁰⁸ 安德烈·亚历山德罗维奇·阿尔古诺夫（Андрей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Аргунов，1866-1939），生于贵族家庭。学生时代即参加民粹派运动，1890年参加学生运动，后参与创建社会革命党。1901年被流放至西伯利亚。1905年从流放地逃回，并当选社会革命党中央委员，为社革党战斗队筹集资金，后流亡国外。一战爆发后，持护国派立场，成为社革党右派。二月革命后回国，参与编辑《人民意志报》，并当选立宪会议代表。反对十月革命，积极参加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活动。1918年末高尔察克政变后，被白卫政权驱逐出境。1922年退出社会革命党，此后主要在侨民当中从事媒体工作。——译者注

⁴⁰⁹ 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337号全宗，1号目录，4号案卷，第1、13、17张。

⁴¹⁰ 俄罗斯联邦联邦安全局中央档案馆，第H-972号，第8卷，第23张。

⁴¹¹ 俄罗斯联邦联邦安全局中央档案馆，第H-972号，第8卷，第23张。

⁴¹² 俄罗斯联邦联邦安全局中央档案馆，第H-972号，第1卷，第1-2张；第2卷，第30张；第8卷，第24-25张；第10卷，第169-176张。

⁴¹³ 中央国家历史-政治文献档案馆，1号全宗，1号目录，273号案卷，第2张。

⁴¹⁴ 《劳动旗帜报》，1918年1月4日，第3版；《苏共中央通报》，1989年第2期，第176页。

⁴¹⁵ 《劳动旗帜报》，1918年1月4日，第3版。

立宪会议，或者更准确来讲，与右翼社革党党团的冲突不可避免”。⁴¹⁵显然，左翼社革党领导层所关注的，是旨在确立苏维埃政权至上地位的政治活动。

布尔什维克也是如此。1月3日，在听取了季诺维也夫关于卫宪联盟计划中的1月5日游行的情报报告后（在报告中，季诺维也夫将之描述为推翻苏维埃政权阴谋的一部分），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团同意，不会试图禁止游行。同时，它公开呼吁工人和士兵不要参加，同时警告全体市民，如果游行不是和平的，预计将采取最极端的措施。⁴¹⁶

1月3日晚些时候，季诺维也夫向彼得格勒苏维埃发表了重要讲话。在讲话开头，季诺维也夫宣称，布尔什维克并不因企图杀害列宁而责备哪个党派。但在长篇讲话中，他实际上这么做了，将责任直接归于右翼社革党人。据季诺维也夫说，在个人恐怖主义行径和枪击背后，打着他们的记号。右翼社革党媒体明确支持，在反对布尔什维克的生死斗争中，可以采取一切战斗形式。这是可以理解的，他解释道，因为右翼社革党人已经如此地使自己在革命群众面前破产了，以至留给他们的唯一策略是拿起武器反对工人阶级的领袖。邦奇-布鲁耶维奇紧随季诺维也夫来迫害，煞有介事地说明试图刺杀列宁的事实。看是，或许由于他1月1日在芬兰，并且对案件的调查甚至还没开始，他在很大程度上略过了枪击事件，而是代之以冗长地述说右翼社革党人的威胁举动。“将尽全力避免[1月5日]流血，”他宣称，“但我们确实准备好无情地打击一切反对我们的攻击。”他还补充道，每一位工人和士兵都应该准备好，如有必要，用自己的双手捍卫革命。⁴¹⁷

在邦奇-布鲁耶维奇的长篇大论之后，欢呼通过了一份决议，谴责右翼社革党媒体煽动对苏维埃政权代表的恐怖行径。决议暗示，对于“资产阶级及其奴仆”的进一步暴力，将报以群众恐怖。⁴¹⁸会上通过的第二份决议，则呼吁1月5日，工人留在工作岗位上，士兵待在兵营里。会议接近尾声时，几个军事单位的代表前来否认，卫戍部队正动摇对苏维埃政权的支持并倒向支持立宪会议的报道。代表们一致投票同意，由布拉贡拉沃夫全权采取他认为的一切必要措施，来维持1月5日的秩序。⁴¹⁹中执委不经过讨论通过的一项决议也有着类似的毫不含糊。“俄罗斯共和国的全部政权归苏维埃和苏维埃机构，”中执委决议写道，“任何人或任何机构篡夺这种或那种国家政府职能的企图将被视为反革命行径……并将由苏维埃政府采取一切措施予以粉碎。”⁴²⁰

当日夜（1月3/4日），布拉贡拉沃夫以保护苏维埃政权免受计划于1月5日的攻击为由，宣布彼得格勒戒严。他的公告警告市民，一切迫害企图将被武装力量镇压；违反政府指令者将遭受严厉惩处；从1月5日起，反革命团体任何进入塔夫

⁴¹⁶ 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9618号全宗，1号目录，185号案卷，第20张。

⁴¹⁷ 《消息报》，1918年1月5日，第3版。对于彼得格勒当局在立宪会议准备期间采取的安全措施，详见《十月武装起义》，第2卷，第496-500页。

⁴¹⁸ 《消息报》，1918年1月5日，第3版。

⁴¹⁹ 《消息报》，1918年1月5日，第3版。

⁴²⁰ 《消息报》，1918年1月4日，第1版。

利达宫和斯莫尔尼宫区域的企图，都将遭到武装力量的阻止。⁴²¹显然此时，苏维埃当局决心不惜一切代价，避免如 11 月 28 日那样，面临大规模敌对集会的压力。参加卫宪联盟游行的指示明确规定，他们将不停歇地游行经过塔夫利达宫。⁴²²可是，对于甚至进入塔夫利达宫区域的禁令会不可避免地造成亲立宪会议力量和亲苏维埃力量之间的流血冲突。

据《消息报》1月 5 日的报道，前一日彼得格勒卫戍部队各单位的群众大会最终宣誓，在任何与立宪会议的冲突中支持苏维埃政府。现实并没有那么令人信服。谢苗诺夫斯基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团的士兵对于苏维埃政权来讲，仍然有可能制造麻烦。例如在正式记录中，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团已决定不参加支持立宪会议的游行；同时，它又发誓，如有必要，会站出来打击任何扰乱游行的企图。⁴²³

鉴于这样持续不断的威胁，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团于 4 日下午，组织了一次区苏维埃和工厂委员会代表的紧急大会。⁴²⁴会议伊始，布尔什维克军事委员、与布拉贡拉沃夫密切共事的米哈伊尔·拉舍维奇⁴²⁵说道：“绝没有禁止游行的企图，因为它们无论如何都会发生。”“我们的总体政策，”他解释道，“是将力量高度集中在各[具有战略意义的]地点，这样一来，如果他们[立宪会议的支持者]试图夺取设施，我们就能够[打退他们]。”“已采取特别措施来保护斯莫尔尼和塔夫利达宫，”他继续说道。“从早上开始，我们空中会有侦察机，并且他们会和海军保持联络。”为了避免恐慌，拉舍维奇敦促各区对侦察飞行保持警惕。“我们在明天或许会面对进攻，”他警告道，“我们需要随时为麻烦做准备。”⁴²⁶

拉舍维奇讲完后，季诺维也夫带着由于惊慌而比平常更尖锐的高音，喊着“我们正在经历第三次革命”，并补充说，为了避免工人参加游行，鼓动员必须在工厂之间穿梭。参会的区苏维埃代表则跟他相反，总体上是平静的。固然，其中一些人传递了令人不安的消息。偏远的科尔皮诺区代表警告道：“没人保护我们，因为我们最好的赤卫队员已被派往前线。……有人会参加游行，但不知道是带着武装还是和平进行。”涅瓦区代表带着类似的烦扰情绪，称自己的区域是“护国派巢穴”，

⁴²¹ 《消息报》，1918 年 1 月 4 日，第 1 版。这份公报被广为刊印，还在 1 月 4-5 日得到广泛传播。

⁴²² 《全俄保卫立宪会议联盟公报》，1918 年 1 月 4 日和 5 日，第 1 版。

⁴²³ 《彼得格勒回声报》(Петроградское эхо)，1918 年 1 月 5 日，第 1 版。

⁴²⁴ 圣彼得堡中央国家档案馆，9618 号全宗，1 号目录，185 号案卷，第 26-30 张；中央国家历史-政治文献档案馆，1 号全宗，4 号目录，121 号案卷，第 1-4 张。

⁴²⁵ 米哈伊尔·米哈伊洛维奇·拉舍维奇 (Михаил Михайлович Лашевич, 1884-1928)，生于犹太商人家庭。中学时即参加革命活动。曾加入锡安主义组织，后在 1901 年末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3 年成为布尔什维克。积极从事革命活动，多次被捕和流放，曾在《真理报》编辑部工作。一战期间入伍参战，在士兵当中进行革命宣传活动。二月革命后，被派往彼得格勒，在卫戍部队中进行宣传鼓动工作，并当选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和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布尔什维克党团主席。作为彼得格勒军事革命委员会成员，参加了十月革命。此后，当选第二届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中执委委员和俄共（布）中央委员。1918-1925 年，主要从事军队工作。1920 年代下半叶，积极参加联共（布）党内反对派，并因此被开除出党，在声明退出反对派后恢复党籍。1928 年病逝于哈尔滨。——译者注

⁴²⁶ 中央国家历史-政治文献档案馆，1 号全宗，4 号目录，121 号案卷，第 1 张。

并警告道，一些工人将参加亲立宪会议游行。据他说，当地赤卫队受无政府主义影响，最后会既不攻击也不保卫彼得格勒苏维埃。⁴²⁷

令与会者轻松一些的是，明显的问题点仅止于此。彼得堡区的代表告诉会议，尽管支持立宪会议的街头集会和学生游行当时就在进行，但不用担心工人参加抗议活动。市中心的第一城区报告称，尽管当地安保力量充足，但由于该区距离塔夫利达宫很近，为谨慎起见，向那里派遣了一辆装甲车和一架机枪。第二城区的代表也叫人放心地认为，那个高度资产阶级化的区域目前局势良好。当地警察已被解除武装，赤卫队保持警戒，工厂工人不会游行。

最叫大家放心的是，关键的维堡工人区的代表自信地宣称，一切平静，预计不会“出来”。类似于此，新乡区（Новодеревенский район）代表的话也令人鼓舞：“[该区]不会有游行，”他坚决地声称，“[甚至]警察也在我们这边。”坐落有几家主要工厂的瓦西里岛的代表报告称，昨日呼吁支持召开立宪会议的请愿书已经在社区教堂流传，但是它们被制止了。5日亲苏维埃会议的公告已在当地工厂张贴。工人会去参加这次会议，他暗示道，而不会参加支持立宪会议的游行。根据奥赫塔区发言人的说法，当地局势也类似地平静。来自城郊谢斯特拉区（Сестрорецкий）的代表带着显而易见的骄傲指出，在一次工厂工人全体大会上，“护国派”甚至都没被允许发言。“民兵是我们的，”他继续补充道，“什么游行都不会有，雪太多了。”⁴²⁸

总体情况尽管鼓舞人心，却显然也无法使季诺维也夫平静下来。谢斯特拉区代表刚结束发言，季诺维也夫就催促禁止街头集会。此外，在他费尽心机的说服之下，代表们承认，次日保持尽可能密切的联络是很重要的。“我们的计划会变，”他说道，“我们或许会决定组织自己的游行。”季诺维也夫突然作出了这番评论。鉴于他的焦虑，同意各区代表于次日下午1点回到斯莫尔尼宫，来获取最新信息。⁴²⁹

⁴²⁷ 中央国家历史-政治文献档案馆，1号全宗，4号目录，121号案卷，第2-4张。

⁴²⁸ 中央国家历史-政治文献档案馆，1号全宗，4号目录，121号案卷，第2-4张。

⁴²⁹ 中央国家历史-政治文献档案馆，1号全宗，4号目录，121号案卷，第4张。另参见《布尔什维克的彼得格勒苏维埃在1917年的初步措施：会议记录》（Первые шаги большевистского Петроградского Совета в 1917 году: Протоколы заседаний），载《红色编年史》，1927年第3期（总第24期），第80-82页。

⁴³⁰ 尼古拉·伊里奇·波德沃伊斯基（Николай Ильич Подвойский，1880-1948），生于乌克兰教士家庭。1901年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后成为布尔什维克，从事学生工作。1905年革命期间，领导工人罢工，组织战斗队。1906年流亡国外，次年回国从事革命工作。1910年代，主要从事布尔什维克的出版和财政工作。1916年被捕，次年被判处流放西伯利亚，但二月革命被释放。此后，当选布尔什维克彼得堡委员会委员和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代表，参与组织赤卫队，领导兵运工作。作为军事革命委员会副主席，参与组织了十月革命，并领导了攻打冬宫。十月革命后至次年初，担任军事人民委员，领导组建了红军。内战期间，从事军队工作。内战结束后，主要从事体育文化工作。1935年退休。卫国战争期间，从事军队宣传工作。——译者注

⁴³¹ 康斯坦丁·亚历山德罗维奇·梅哈诺申（Константин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Механошин，1889-1938），又姓“梅霍诺申”（Мехоношин），生于教师家庭。1906年参加革命活动，1913年加入布尔什维克。一战期间，被征召入伍，并在军中从事革命工作。二月革命后，当选彼得格勒工兵代表苏维埃代表和布尔什维克彼得堡委员会委员，主要从事军事工作。1917年7月，被临

数小时后，军事人民委员尼古拉·波德沃伊斯基⁴³⁰及其副手康斯坦丁·梅哈诺申⁴³¹组建紧急军事指挥部，以便在立宪会议期间指挥苏维埃政府的保卫工作。⁴³²指挥部立即颁布《第1号令》⁴³³，禁止遵守其他安全机构的军事命令（邦奇-布鲁耶维奇的命令在斯莫尔尼区域、布拉贡拉沃夫的命令在塔夫利达宫周边和彼得保罗要塞除外）。⁴³⁴但为抵御立宪会议期间对彼得格勒市苏维埃政权的攻击，而控制其他已运作机构和势力的努力，在这最后关头为时已晚。

* * *

在左翼社革党人进入人民委员会前夕，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解散军革委，并将契卡作为左翼社革党无法插手的可靠安全机构而建立起来。12月下半月，当契卡骚扰著名的卡杰特和温和派社会主义立宪会议代表时，伊萨克·施泰因贝格决心约束契卡的任意权力，但最终失败。这种努力印证了列宁的担忧。此后在1月初，施泰因贝格决定迫使布尔什维克允许左翼社革党人加入契卡领导层，试图以此来控制该机构。尽管布尔什维克希望在立宪会议前夕维持左翼社革党的支持，从而被迫同意施泰因贝格的要求，但数量相对有限的左翼社革党人的加入并不足以对契卡的政策产生重大影响。左翼社革党领导层对参加人民委员会的期许——它的代表（即便仅占少数）能够使政府的政策变得更为温和——也遭遇了同样的情形。在负责领导契卡的人民委员会中，多数派统治。因此，在与布尔什维克意见相左的问题（例如镇压立宪会议中的反对派）上，左翼社革党人一定会失败。

与此同时，在左翼社革党人入阁谈判的最后阶段，布尔什维克温和派由于掌控了该党立宪会议代表团临时局的领导层，重新作为具有潜在重要的政治力量而出现。他们背离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和左翼社革党人的立场（即不应允许立宪会议取代苏维埃政权），开始在整个布尔什维克代表团中恢复立宪会议的合法性。但是，中央委员会将他们的努力扼杀于萌芽之中。此外，中央委员会主张苏维埃政权具有超乎立宪会议的至上地位的立场，社革党甚至不愿为保障立宪会议的安全而有所准备，以及大多数俄国人对其命运的漠不关心，几乎确保了它的迅速灭亡。

时政府逮捕，后释放。作为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积极参加十月革命。革命胜利后，当选第二届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中执委委员，并担任副军事人民委员。此后，主要从事军队工作。1920年代末起，从事经济工作。大清洗期间，被处以死刑。1956年平反。——译者注

⁴³² 《消息报》，1918年1月5日，第1版；《劳动旗帜报》，1918年1月5日，第4版；亚·费·伊利英·热涅夫斯基（Александр Фёдорович Ильин-Женевский），《掌权的布尔什维克：1918年回忆》（The Bolsheviks in Power: Reminiscences of the Year 1918），布赖恩·皮尔斯（Brian Pearce）译注，伦敦，1984年，第18-19页。

⁴³³ 指《紧急军事指挥部第1号令》（Приказ № 1-й чрезвычайного военного штаба）。——译者注

⁴³⁴ 《消息报》，1918年1月5日，第1版。

四、立宪会议的命运

1918年1月5日到了。对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来说，这一天将标志着俄国建立西式多党民主制努力的终结。立宪会议定于下午1点召开。根据卫宪联盟制定并广为流传的计划，当天上午，该联盟群众游行的参与者将在9个集会点集合。他们从那里出发，游行至战神广场的集体墓地⁴³⁵，汇合为一支庞大的队伍，马不停蹄地经过塔夫利达宫那白雪覆盖的大花园，然后继续前行至涅瓦大街，并在返回起点前穿过首都的心脏地带。

前一日夜的晚些时候，苏维埃政权听闻了令人不安的流言，称卫戍部队的一些单位有在最后关头倒向立宪会议的情绪。⁴³⁶这似乎印证了彼得格勒驻军情况不稳，于是疯狂地从外地搜寻其他忠诚的部队。11月28日塔夫利达宫之乱尤在脑际的彼得格勒苏维埃当局相信，存在一个推翻苏维埃政权的阴谋，而卫宪联盟计划中的游行正是其中一部分。对前者来讲，首先要维持对关键政府建筑、国家银行和通讯设施的控制。他们还决心防止游行人员在塔夫利达宫附近聚集，以便控制那里的局势。在铸造厂大街的各个十字路口、塔夫利达宫的东西通路（壁毯街⁴³⁷、撒迦利亚街⁴³⁸、谢尔吉街⁴³⁹、辎重队街⁴⁴⁰和路德宗教堂街⁴⁴¹的拐角）和宫外小广场的战略要点，树起了圆木街垒。清晨，政府军——主要由工人赤卫队员、波罗的海舰队水兵和为数不多的彼得格勒卫戍部队士兵组成——进驻工事；武装分遣队

⁴³⁵这里指二月革命后在战神广场中央新建的、埋葬革命牺牲者的集体墓地。该墓地几经改建，今仍存。——译者注

⁴³⁶《新生活报》，1918年1月6日，第2版。

⁴³⁷壁毯街（Шпалерная Улица）是一条东西向马路，塔夫利达宫即坐落于该街南侧，在19世纪因迁于附近的彼得堡壁毯场（Петербургская шпалерная мануфактура）而得名。十月革命后，更名为“沃伊诺夫街”（Улицей Воинова），以纪念布尔什维克烈士伊万·阿夫克先季耶维奇·沃伊诺夫（Иван Авксентьевич Воинов，1885-1917）。1991年恢复旧名。——译者注

⁴³⁸撒迦利亚街（Захарьевская Улица）是一条东西向马路，位于壁毯街以南，西端与铸造厂大街相交。始建于18世纪初，该世纪末因坐落于该街的近卫骑兵团撒迦利亚与以利沙伯教堂（Церковь Захарии и Елизаветы Кавалергардского полка）而得名。1923年更名为“卡利亚耶夫街”（Улица Каляева），以纪念成功刺杀莫斯科总督谢尔盖·亚历山德罗维奇大公的社会革命党烈士伊万·普拉托诺维奇·卡利亚耶夫（Иван Платонович Каляев，1877-1905）。1991年恢复旧名。撒迦利亚是《圣经》中的犹太先知。——译者注

⁴³⁹谢尔吉街（Сергиевская Улица），今柴可夫斯基街（Улица Чайковского），是一条东西向马路，其西端与铸造厂大街相交，东端接近塔夫利达花园。该街始建于18世纪，后因道旁的谢尔吉大教堂得名，1923年更为现名。这里的“谢尔吉”指东正教圣徒拉多涅日的谢尔吉（Сергий Радонежский，1314-1392）。——译者注

⁴⁴⁰辎重队街（Фурштатская Улица），是一条东西向马路，西端与铸造厂大街相交，东端直抵塔夫利达花园西门。始建于18世纪，1806年因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团辎重队驻扎于此而得名。1923年更名为“彼得·拉夫罗夫街”（Улицей Петра Лаврова），以纪念民粹派思想家和革命家彼得·拉夫罗维奇·拉夫罗夫（Пётр Лаврович Лавров，1823-1900）。1991年恢复旧名。

⁴⁴¹路德宗教堂街（Кирочная Улица），是一条东西向马路，位于辎重队街以南，西端与铸造厂大街相交，塔夫利达花园坐落于该街北侧。始建于18世纪，因坐落于该街的圣亚纳路德宗教堂（Лютеранская церковь Святой Анны）而得名。1939年更名为“萨尔蒂科夫-谢德林街”（Улица Салтыкова-Щедрина），1998年恢复旧名。——译者注

开始在临近的大街小巷巡逻；附近建筑的楼顶架起了机枪。那些被发现力量薄弱的地点，则于当日晚些时候，匆忙部署上从赫尔辛基和喀琅施塔得赶来的水兵。

由于大量最称职可靠的军事力量已经乘船离开首都，或者去外省帮助巩固革命，或者南下和安东诺夫-奥弗申柯的部队一道打击反革命，这些安保部队便大多是在匆忙之间征召和集结起来的。他们毫无控制人群或对付民事动乱的经验或训练，被派遣时仅配备了武器和足量的弹药供应，并被灌输了这样的观念：聚集在立宪会议周围的敌人决心恢复过去的不公，要保卫苏维埃政权免受他们的危害。他们那些一样缺乏技术准备的指挥官，也接受了相同的倾向，并且只被给予了不可靠的指示。他们被组织起来，在指定区域周边巡逻，预备迅速增援出现麻烦的地点，并且不能让任何人未经许可进入塔夫利达宫和斯莫尔尼地区。一位“自由曙光”号战列舰⁴⁴²的水手的未刊回忆确证了这些事实。1月5日黎明，他受命指挥一支由几百人混编而成的部队，并且每隔一定时间，便收到若干简短的、更适于部队前线临敌而非维持本土秩序的命令。游行人员如执意前行，则将被解除武装，并加以逮捕（假定游行人员携有武器）。如发生枪击，将“毫不留情地”开火还击。工人则另当别论。对于他们，一切可能的说服办法用尽之后，才能诉诸暴力。⁴⁴³这些指示没有说明，如果大量**非武装**人群试图冲破⁴⁴⁴或绕过街垒，应采取何种适当措施。此外，各安保部队（或它们与为时已晚的紧急军事指挥部）之间几乎没有建立通讯体系。

当日清晨起，立宪会议的支持者唱着革命歌曲，高举像“全部政权归立宪会议！”、“不要政治恐怖！”和“人民的兄弟情谊万岁！”这样的横幅，涌向卫宪联盟指定的9个集会点。参加游行的大多是大学生、公务员、办公室职员（许多是女性）、小店主和专家。所有记录都表明，除了零星例外（例如来自政府印钞厂、奥布霍夫工厂和涅瓦区其他工业企业的工人），工厂工人和士兵都遵照彼得格勒苏维埃的请求，待在了自己的工厂和兵营里。游行人员也按照游行组织者坚持的禁令，没有携带武器。即便要给游行人员提供护卫的装甲车也被布尔什维克工人征用，从而使他们毫无防卫。⁴⁴⁵

与政府巡逻队最初的冲突，是在郊区游行人员被禁止进城的时候发生的。⁴⁴⁶但规模最大、最血腥的冲突，却爆发于封锁着战神广场通向塔夫利达宫主干道的圆木街垒处，以及塔夫利达宫和周边公园所在区域的小街巷。当时（大概上午10

⁴⁴² “自由曙光”号（Заря свободы）原名“皇帝亚历山大二世”号（Император Александр II），是一艘列装波罗的海舰队的铁甲舰。该舰始建于1883年，1887年下水，排水量9392吨，主炮口径305毫米。二月革命期间，该舰水兵在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下发动起义，击毙舰长，并将舰名更名为“自由曙光”号。1921年喀琅施塔得起义期间，该舰遭受炮击，次年被拆解。——译者注

⁴⁴³ 中央国家历史-政治文献档案馆，4000号全宗，5号目录，2365号案卷，第1-12张。

⁴⁴⁴ 原文为 breech，不通，疑为 breach 之误。——译者注

⁴⁴⁵ 普罗塔索夫，《全俄立宪会议》，第306页。

⁴⁴⁶ 《我们的时代报》，1918年1月6日，第3版。

点左右），一支赤卫队把约千余名从彼得格勒⁴⁴⁷一侧跨过了涅瓦河的游行人员挡了下来。被勒令停止前进、打道回府的游行人员，唱着《马赛曲》，高举红旗，继续前行。赤卫队向空中鸣枪示警。这并未使游行队伍停止前行。于是他们向游行人员胡乱开火。⁴⁴⁸1小时后，赤卫队员和士兵突然从铸造厂大街和壁毯街拐角处的街垒跳出来，打开步枪扳机，勒令约200名来自维堡区、刚跨过涅瓦河的游行人员原路返回。但几乎紧接着，他们便向空中鸣枪，驱散了游行人员。他们没收了游行人员的旗帜，把它们从旗杆上扯下来，或者丢进火堆里或者扔下铸造厂桥。⁴⁴⁹法国使馆武官路易·德·罗比昂⁴⁵⁰伯爵看到旗帜飘入“涅瓦河闪耀的冰封河面，宛如巨大的红蝴蝶”⁴⁵¹。杰出的未来主义作家维克托·什克洛夫斯基后来看到，守院子的人（дворники）把旗杆当做扫帚把用。⁴⁵²一方面游行者故意使用红旗这样的革命符号，另一方面苏维埃政权的卫兵带着胜利的情绪，自发地将这些旗帜占为己用，是1918年1月5日彼得格勒主要冲突中的突出现象。



图4 在宫殿广场支持立宪会议的游行队伍，1918年1月5日。俄罗斯国家政治史博物馆，圣彼得堡。

⁴⁴⁷这里应该是指彼得格勒区（Петроградский район）。从该区前往塔夫利达宫，需跨过涅瓦河。——译者注

⁴⁴⁸《新生活报》，1918年1月6日，第2版。

⁴⁴⁹《新生活报》，1918年1月6日，第2版。

⁴⁵⁰路易·德·罗比昂（Louis de Robien, 1888-1958），法国外交官，1914-1918年在法国驻俄使馆担任武官。——译者注

⁴⁵¹路易·德·罗比昂，《一位外交官的俄国日记，1917-1918》（The Diary of a Diplomat in Russia, 1917-1918），纽约和华盛顿特区，1969年，第196页。

⁴⁵²维·什克洛夫斯基，《感伤的旅行》（Сентиментальное путешествие），莫斯科，1990年，第144-145页。（参见什克洛夫斯基：《感伤的旅行》，杨玉波译，兰州：敦煌文艺出版社，2014年，第140页。——译者注）

以这样一些无人丧生的事件为前奏，大约同一地点发生几起对和平示威者更为血腥的攻击。下午，铸造厂大街北端，尤其是与通向塔夫利达宫周边地区的東西向要道交叉的拐角处，着实成了战区。在那里，倒下的游行人员的鲜血迅速染红了齐膝深的、晶莹的积雪。大约1万名在路德宗教堂被街垒挡住去路的游行人员高举旗帜、唱着革命歌曲，试图通过辎重队街冲向塔夫利达宫，但被全副武装的赤卫队员和士兵拦了下来。后者实际上未加警告，便用步枪和机枪开火驱散了他们。密集的射击持续了足有15分钟，期间有数名游行者中弹。⁴⁵³

第一批为人所知的死者当中包括有格·洛格维诺夫⁴⁵⁴。他从坦波夫来到彼得格勒，参加支持立宪会议的全俄农民代表苏维埃代表大会。⁴⁵⁵在下午1点过后不久，许多游行队伍离开了战神广场。洛格维诺夫便扛着巨大的红旗，走在其中一支队伍的前头。抵达铸造厂大街和路德宗教堂街的拐角处时，他和自己的同志被勒令返回。随后，街垒后面的步枪和附近一栋建筑楼顶的机枪几乎立刻向他们开火。据报道，这次事件中有5名示威者被杀（洛格维诺夫、2名学生和2名红十字救护员）、8人受伤。⁴⁵⁶大约同时，从位于南面市中心莫斯科区的皇村火车站和亚历山大剧院的集合点向战神广场进发的游行人员，在经过花园街⁴⁵⁷和涅瓦大街的拐角处时，遭到了杜马大楼附近狙击手的射击。不久后，约1.5万名从东南面涅夫斯基区⁴⁵⁸出发的游行人员（包括了相当数量来自奥布霍夫工厂、帕利工厂⁴⁵⁹和该区其他工业企业的工人）在继续向战神广场进发前，于征兆广场⁴⁶⁰停了下来，举行即兴集会。城市远郊的示威者频繁受到亲苏维埃政权的士兵和工人（有些人还和家人一

⁴⁵³ 《新生活报》，1918年1月6日，第2版。

⁴⁵⁴ 格里戈里·洛格维诺夫（Григорий Л[亦有文献作 И]. Логвинов），第一届全俄农民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委员，社会革命党人，死后被葬于易圣容公墓（Преображенском кладбище）。——译者注

⁴⁵⁵ 见上文，第3章。

⁴⁵⁶ 《我们的时代报》，1918年1月6日，第3版。

⁴⁵⁷ 花园街（Садовая Улица）是彼得格勒的重要干道，始建于18世纪，因当时附近花园林立而得名。1923年更名为“7月3日街”（Улицу 3-го Июля），以纪念俄历1917年7月3日爆发的、反对临时政府的大规模游行示威。1944年恢复旧名。——译者注

⁴⁵⁸ 涅夫斯基区（Невский район）位于彼得格勒东南部，因当地的涅夫斯基关卡（Невская застава）而得名。涅夫斯基关卡设于1730年代，最初位于邻近亚历山大·涅夫斯基修道院（Александро-Невская лавра）和涅瓦河的地方，故此而得名。后来随着彼得堡城区的扩大，该关卡不断南移，故此关卡名逐渐演变为移驻所经地区的代称。当时，涅夫斯基区是彼得格勒重要的工业区。——译者注

⁴⁵⁹ 帕利工厂（Фабрики Палля）是由产业家卡尔·雅科夫列维奇·帕利（Карл Яковлевич Паль，1845-1910）创办的棉纺织厂。该厂在1900和1910年代，是工人运动和革命活动的重要中心。1919年，该厂被苏维埃政府收归国有。1922年更名为“无产阶级纺织印花厂”（Прядильно-ткацкой и ситценабивной фабрики «Пролетарий»）。1941年更名为“维·帕·诺金国营全联盟自动纺织厂”（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ую Всесоюзную Автономную прядильно-ткацкую фабрику им. В. П. Ногина）。——译者注

⁴⁶⁰ 征兆广场（Знаменская Площадь）是圣彼得堡的主要广场，始建于1840年代，起初取名自该广场最古老建筑“征兆教堂”（Знаменская церковь），十月革命后更名为“起义广场”（Площадь Восстания），并沿用至今。征兆教堂的名称源于东正教中描绘圣母玛利亚举手祈祷、胸中孕有婴儿耶稣的“征兆圣母圣像”。这里的“征兆”出自《圣经·以赛亚书》第7章第14节：“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знамение），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译者注

道) 的骚扰和咒骂, 而在这个更为繁荣的商业区, 他们获得的却是欢呼。这支由奥布霍夫工厂的黄铜厂徽引领的队伍两次遭遇枪击。第一次攻击没有造成伤亡, 政府的巡逻人员只是朝天鸣枪。第二次是在当天大部分最血腥事件的发生地——铸造厂大街北端, 9 名游行者中弹, 其中 7 人伤势严重。⁴⁶¹

试图绕道绕过这一区域的游行人员的进展也好不到哪儿去。例如, 数千试图沿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街⁴⁶²从南面进抵塔夫利达宫的游行人员在工兵胡同⁴⁶³被士兵挡住去路。当他们拒绝返回的要求时, 士兵开火, 致 2 死 11 伤。⁴⁶⁴大约同时, 当天最大的游行队伍之一也试图沿铸造厂大街北端的街垒边缘行进, 并试图从南面(这次是走池塘街⁴⁶⁵)进抵塔夫利达宫。最初的鸣枪示警没有止住游行人员。但在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街和格罗德诺胡同⁴⁶⁶的交叉口, 几乎在塔夫利达宫视野之内, 雪地壕沟里的赤卫队员用步枪开火, 驱散了他们。这次, 数名游行者被杀或重伤, 另有人被殴。⁴⁶⁷

入夜, 塔夫利达宫的社革党和孟什维克立宪会议党团收到了描述这些冲突的签名书面投诉。其中之一被著名的孟什维克马特维·斯科别列夫宣读, 并记录在案。“下午 4 时, 我驾车沿着铸造厂大街行驶, 在潘捷列伊蒙拐角⁴⁶⁸, 我亲眼目睹了数队赤卫队员向毫无防卫的人群开枪, 这些人中有士兵、妇女和儿童……他们和平地向塔夫利达宫游行, 来表达自己的诉求,”这份投诉写到, “开火是没有警告的, 直接瞄准人群。我看到那些伤员——1 名士兵、2 名工人和一些妇女——被担架和出租马车送走。”⁴⁶⁹

尽管对于 1918 年 1 月 5 日的枪击事件, 现存描述不准确、不完整、多有重复且不可确证, 但加在一起已足够把握对支持立宪会议的游行队伍的攻击的诸多首

⁴⁶¹ 《新生活报》, 1918 年 1 月 6 日, 第 2 版。

⁴⁶²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街 (Преображенская улица), 今拉季舍夫街 (Улица Радищева), 是一条南北向的马路, 南面与池塘街 (今涅克拉索夫街) 相交。该街始建于 19 世纪, 初名“医院街” (Госпитальная улица), 1858 年由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团更名。1935 年, 为纪念俄国革命思想家和文学家拉季舍夫而更为现名。——译者注

⁴⁶³ 工兵胡同 (Саперный переулок), 是一条东西向的小街, 东端与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街相交, 附近曾驻有工兵近卫营而得名。——译者注

⁴⁶⁴ 《新生活报》, 1918 年 1 月 6 日, 第 2 版。

⁴⁶⁵ 池塘街 (Бассейная улица), 今涅克拉索夫街 (Улица Некрасова), 为一条东西向马路, 西端与铸造厂大街相交。该街起初因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团的连队驻扎当地而得名“9 连街” (Улица 9 роты), 后由于该街通向一方人工池塘而更名为“池塘街”。1918 年为纪念涅克拉索夫而更为现名。——译者注

⁴⁶⁶ 格罗德诺胡同 (Гродненский Переулок) 是一条东西向的小马路, 西端是死胡同, 东端与普列奥布拉任斯基街 (今拉季舍夫街) 相交。该胡同始建于 18 世纪, 名字几经变更, 现名取自白俄罗斯城市格罗德诺。——译者注

⁴⁶⁷ 《我们的时代报》, 1918 年 1 月 6 日, 第 2 版。

⁴⁶⁸ 这里当指潘捷列伊蒙街的拐角。潘捷列伊蒙街 (Пантелеимоновской улицей), 今佩斯捷利街 (Улица Пестеля)。起初得名于潘捷列伊蒙教堂, 1920 年代为纪念十二月党人帕维尔·伊万诺维奇·佩斯捷利 (Павел Иванович Пестель, 1793-1826) 而更为现名。——译者注

⁴⁶⁹ 米·尼·波克罗夫斯基、雅·阿·雅科夫列夫编, 《全俄立宪会议》(Всероссийское учредительное собрание), 莫斯科-列宁格勒, 1930 年, 第 68 页。

要特征。首先，游行人员显然远超苏维埃当局估计的 1 万人，但也远低于卫宪联盟后来宣称的 10 万人。其次，尽管不像苏维埃当局所暗示的那样，工厂工人和士兵一道抵制了游行，但显然，他们在游行人员中相对来讲仅占少数。第三，尽管游行的领导者及其参与者显然不愿遵守苏维埃政府对塔夫利达宫周边区域下达的游行禁令，但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他们中有人携带武器或做出威胁举动。即便遭遇开火，他们也未加抵抗，而是试图躲避。最后，赤卫队员、水兵和士兵的行为非常野蛮。他们从街垒背后向游行人员开火，并在窗口和屋顶用机枪射击；他们还殴打游行人员，夺取并破坏他们的旗帜，以示胜利。同样显而易见的是，苏维埃当局得悉流血事件后，既没有取消塔夫利达宫周边的游行禁令，也没有下令停止射击，而是无所作为。据斯维尔德洛夫在 1 月 11 日全俄第三次苏维埃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1 名游行人员被杀。由于这一数据高于高尔基的亲立宪会议报纸《新生活报》根据冲突结束后彼得格勒医院的排查估算的 15 人身亡，斯维尔德洛夫的统计显然更接近事实。⁴⁷⁰

* * *

随着立宪会议开幕的日子临近，在塔夫利达宫毗邻地区建立了第二条军事防线。这里的人群更为稀疏，在又矮又长的暗黄色宫殿外，布满了赤卫队员、士兵、野战炮、机枪阵地和弹药。围绕宫殿的铁栅栏锁上了所有豁口。⁴⁷¹宫殿一楼的临街窗口架上了机枪。

下午 1 点左右，打开了宫殿的一扇侧门，以便代表进入。这些代表都在身着粗呢上装、胸前挂着机枪带的水兵的严密掩护之下。同样被允许进入的还有大批客人——大部分是遴选出来的工人、士兵和水兵，他们中的许多人带着上了刺刀的步枪和手榴弹，并挂有弹药。首批抵达的代表中，有上午开完会后直接赶来的整个社革党党团。代表们六人一排，神奇地佩戴着与众不同的玫瑰花结，手持蜡烛和三明治。大概半数人西装革履，用厚大衣和胶鞋御寒。其余人则是身着羊皮夹克和毡靴。尼古拉·斯维亚季茨基后来注意到，他的同事们看上去毫无生气，“仿佛判了刑的囚犯”⁴⁷²。弗拉基米尔·津济诺夫⁴⁷³后来回忆道：“我们走进大楼时，确定布尔什维克会强力反对会议……[而且]我们不会活着回家。”⁴⁷⁴

⁴⁷⁰ 《新生活报》，1918 年 1 月 6 日，第 2 版。

⁴⁷¹ 马·文·维什尼亞克，《全俄立宪会议》，巴黎，1932 年，第 99 页。

⁴⁷² 尼·斯维亚季茨基，《1918 年 1 月 5-6 日：一位前社会革命党人的回忆》，载《新世界》，1928 年第 2 期，第 223 页。

⁴⁷³ 弗拉基米尔·米哈伊洛维奇·津济诺夫（Владимир Михайлович Зензинов，1880-1953），生于商人家庭，1901 年留学期间加入社会革命党，并于 1904 年回国。1905 年革命之初被捕，流放西伯利亚，后脱逃至西欧。次年返回俄国，继续为社会革命党工作，并当选该党中央委员。此后，多次被捕、流放和脱逃。一战爆发后，持革命护国派立场。1917 年参加二月革命，并支持克伦斯基临时政府。此后，反对十月革命，并当选立宪会议代表。立宪会议被驱散后，参加反苏维埃的白色政权。1918 年被高尔察克当局驱逐出境。后主要在侨民当中从事出版和文字工作。——译者注

⁴⁷⁴ 弗·米·津济诺夫，《自革命者的生涯》（Из жизни революционера），巴黎，1919 年，第 99 页。另参见维什尼亞克，《全俄立宪会议》，第 100 页。

塔夫利达宫华丽的白厅⁴⁷⁵——一间走廊环绕、有着玻璃穹顶的宽敞的阶梯大厅——的入口还要被另一队赤卫队员封锁一段时间。沙皇时代末期帝国国家杜马的集会地，在二月革命后成了全俄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的会址。为了迎接立宪会议，这里“像办丧事一样”（季诺维也夫语），挂上了黑色横幅。横幅的颜色可能是苏维埃当局故意这么选的，以示立宪会议的反动性。社革党代表尽管占据多数，却被转到一间后室。在前日夜和当日上午，他们为会议首日微调了自己的纲领。从党的纲领中删去压舱石，并进一步精简了有关和平和土改的立法内容，以便其能够得到迅速提交和通过。⁴⁷⁶剩下就没什么可做了。于是社革党代表四下忙乱，紧张地哀叹自己的孤立无援，听着周期性地、有时歇斯底里地描述街头的屠杀。规模小得多的布尔什维克代表团在社革党之后抵达，进驻了一间被窗外晶莹的积雪照亮的宽敞客厅。⁴⁷⁷

有关布尔什维克立宪会议党团会议（包括一次和左翼社革党的联席会议⁴⁷⁸，以及立宪会议正式开幕前的一次漫长 的单独会议）记录要么尚未刊布，要么不见于俄国档案馆之中。据事后回忆，尽管列宁参加了布尔什维克会议，但主席是斯维尔德洛夫。加米涅夫参加了布列斯特-利托夫斯克和谈代表团。他的缺席妨碍到了布尔什维克温和派。苏维埃方面宣称，会议进展迅速且顺利。这种说法是假的，因为实际上会议持续时间远超预期，并造成立宪会议推迟开幕了很长一段时间。党团会议一开始讨论了立宪会议的日程和议程。一些迹象表明，与立宪会议的地位以及立宪会议与苏维埃政权之间关系相关的基本问题似乎也得到了讨论。通讯困难以及（更重要的是）列宁在11-12月成功阻止党内温和派筹备全国党代会，使得全国各地的布尔什维克领导人此前未能讨论如何对待立宪会议。许多外省的布尔什维克代表一抵达彼得格勒，就直奔党团会议，并且无论如何都没有系统地向他们更新（更不用说叫他们讨论）最近有关立宪会议的政策变化。⁴⁷⁹于是，由于像梁赞诺夫和洛佐夫斯基这样头脑独立的布尔什维克出席党团会议，列宁的立场肯定会遭受挑战。对于这次会议，拉斯科尔尼科夫回忆称，至少一些党代表考虑过立宪会议会的长期存在。他注意到，当时放弃了组建决裂式的革命会议的主意的布哈林，嘲笑了这样的看法。他说，立宪会议或将有三天的生命。⁴⁸⁰

正在单独举行会议的左翼社革党不时要求修订《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尽管这些要求的具体内容尚不为人知，但似乎可以合理地推断，它们旨在满足左翼社革党此时的首要关切，即让《宣言》更合乎仍然有可能支持它的社革党农民

⁴⁷⁵ 即杜马厅（Думский зал），因该厅的墙体和立柱为白色，故又得名白厅（Белый зал）。——译者注

⁴⁷⁶ 奥加诺夫斯基，《一位立宪会议代表的日记》，第148页。

⁴⁷⁷ 费·费·拉斯科尔尼科夫，《海军准尉伊利英的故事》(Tales of Sub-Lieutenant Ilyin)，布赖恩·皮尔斯（Brian Pearce）译注，伦敦，1982年，第2页。

⁴⁷⁸ 《社会民主党报》，1918年1月6日，第3版。

⁴⁷⁹ 在一份写于1920年代的未刊回忆文章中，波德沃伊斯基指出，布尔什维克的大部分外省代表并没有察觉到列宁关于立宪会议的最新想法。（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146号全宗，1号目录，47号案卷，第12-14张）

⁴⁸⁰ 拉斯科尔尼科夫，《海军准尉伊利英的故事》，第2-5页。

代表的口味，并让立宪会议一直开下去，直到其自坏名声。无论内容如何，修订被拒绝了。在《宣言》——其专为阻挠达成妥协，并在一开始就挑起与立宪会议的决定性决裂而设计）——由斯维尔德洛夫宣读之后，让立宪会议至少开到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开幕时的想法被抛弃了。⁴⁸¹取而代之的是，同意斯维尔德洛夫作为中执委代表，在正式宣布立宪会议开幕的声明中，宣读（以求立即落实）《宣言》。在《宣言》被置之不理后，布尔什维克（并且他们希望左翼社革党一道）肯定会退出会议，以防带着自己“全铁工执委式的”新纲领的社革党得以消耗苏维埃政权所获得的支持。⁴⁸²

* * *

下午3点半左右，白厅打开了大门。半小时后，约400名代表在指定区域就座，布尔什维克在最左面，右翼社革党和孟什维克在最右边，左翼社革党被中央走道⁴⁸³分割开来、居中而坐，卡杰特则被悉数排除在外。一方面，党内温和派遭到严厉约束的布尔什维克党团准备按预定剧本行事，左翼社革党坚持苏维埃对于立宪会议的至上地位。另一方面，对于大部分社革党人来讲，苏维埃仿佛并不存在，他们准备着手建设一种新民主秩序，并在当天通过有关和平、土地和未来俄国政治制度的法律。

⁴⁸¹关于这一点，参见奥·尼·兹纳缅斯基，《全俄立宪会议：召集与政治崩溃的历史》，列宁格勒，1976年，第339页。

⁴⁸²奥·尼·兹纳缅斯基，《全俄立宪会议：召集与政治崩溃的历史》，列宁格勒，1976年，第339页。另参见波克罗夫斯基、雅科夫列夫，《全俄立宪会议》，第203页。

⁴⁸³原文为 isle，当为 aisle 之误。——译者注



图 5 在塔夫利达宫白厅的左翼社革党立宪会议代表，1918 年 1 月 5 日。玛丽亚·斯皮里多诺娃在底部中间。普罗什·普罗尚在她右边。俄罗斯国家政治史博物馆，圣彼得堡。

这种立宪会议观上的针锋相对，以及当时形势下会议的社革党多数派根本上的虚弱无力，在起初围绕应当由谁正式开启会议的冲突中体现了出来。社革党自然希望从开幕铃起就控制住会程。自视为俄国唯一合法革命当局代表且认为现行立宪会议过时落伍的布尔什维克和左翼社革党，也注意要从一开始就控制会议。所以一到下午 4 点，来自顿河流域的前民粹派、地方自治局工作人员谢尔盖·什韦佐夫⁴⁸⁴作为最年长的与会代表，便在社革党议场领袖的指示下，利用斯维尔德洛夫的缺席，走上讲台，要求代表遵守秩序。右边的议席鼓起掌来，布尔什维克和左翼社革党代表则一片抗议。后者涌向讲台，包围了倒霉的什韦佐夫。正在此刻，斯维尔德洛夫现身，把什韦佐夫挤到一旁，摇动起光亮的镀镍主席铃。之后，走道两边的代表斗了起来。曾管理列宁办公室的邦奇-布鲁耶维奇回忆称，在这段混乱的间隙期，立宪会议似乎即将解体为混战。此时，列宁突然表现出他⁴⁸⁵前所未见的忧虑和失色。⁴⁸⁶但不知何故，在右边震耳欲聋的反对和嘲弄声中，在左边轰鸣的欢呼声中，在走廊里挥舞着步枪的士兵、水兵和工人的高声赞同之下，斯维

⁴⁸⁴ 谢尔盖·波尔菲里耶维奇·什韦佐夫（Сергей Порфириевич Швецов，1858-1930），出生于贵族家庭。早年即参加民意党人的革命活动。1870 年代末被捕，后被流放。社会革命党成立后，为该党在托木斯克从事宣传工作。积极参加 1905 年革命，革命失败后流亡国外，回国后多次被捕。二月革命后当选立宪会议代表。立宪会议被驱散后，脱离政治生活。此后，主要从事科研工作。——译者注

⁴⁸⁵ 这里指邦奇-布鲁耶维奇。——译者注

⁴⁸⁶ 邦奇-布鲁耶维奇，《在二月和十月革命的战斗岗位上》，第 248 页。

尔德洛夫“像一座大理石纪念碑”那样伫立在讲台上，设法使人们安静下来，以便开启会议。⁴⁸⁷手无寸铁的社革党多数派别无选择，只能接受这种不祥的开端。

起初就是这么不体面的场景，俄国首次立宪会议激烈而短促，便也不足为奇了。斯维尔德洛夫立即利用自己的临时主席身份，宣读了《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并以中执委的名义提议将讨论这份《宣言》作为第一项议程。⁴⁸⁸据报在列宁的怂恿下，斯维尔德洛夫话刚落音，左翼便劲头十足地唱起了《国际歌》。即便右翼社革党也显然感到有责任假装在唱。⁴⁸⁹

在这支音乐插曲之后，社革党决定在阐述自己的纲领之前，避免不必要的挑衅，并对《宣言》不予置评。当维克托·切尔诺夫击败玛丽亚·斯皮里多诺娃当选会议主席时，他们获得了一次皮洛士式的胜利⁴⁹⁰。布尔什维克提名斯皮里多诺娃的本意或许是向左翼社革党做出让步。后者希望有足够的名义上社革党的农民代表给她投票，以抵消社革党的多数地位。无论如何，投票结果——切尔诺夫得 244 票，斯皮里多诺娃得 153 票⁴⁹¹——准确地表明了竞争双方的力量对比。

⁴⁸⁷ 邦奇-布鲁耶维奇，《在二月和十月革命的战斗岗位上》，第 248 页。另参见费·拉斯科尔尼科夫，《白花了的一天的故事》(Рассказ о потерянном дне)，载《新世界》，1933 年第 12 期，第 97-98 页；姆斯季拉夫斯基，《改变俄国的五天》，第 141-142 页；奥加诺夫斯基，《一位立宪会议代表的日记》，第 154-155 页；斯维亚季茨基，《1918 年 1 月 5-6 日》，第 225 页。

⁴⁸⁸ 波克罗夫斯基、雅科夫列夫，《全俄立宪会议》，第 4-5 页。

⁴⁸⁹ 斯维亚季茨基，《1918 年 1 月 5-6 日》，第 225 页。斯维亚季茨基理想化地描述了这件事：“这是个重要的场面。整个立宪会议不分派别，一道唱起了这首革命社会主义的圣歌。”

⁴⁹⁰ 皮洛士式的胜利指代价惨重的胜利。皮洛士是古希腊摩罗西亚的国王，曾两次打败罗马军队，但自身也损失惨重。这里所以说切尔诺夫当选会议主席对于社革党而言代价巨大，大概指斯皮里多诺娃的落选表明，左翼社革党不足以左右立宪会议，会议的主导力量是社革党右翼，由此便进一步促成了布尔什维克迅速解散立宪会议。——译者注

⁴⁹¹ 波克罗夫斯基、雅科夫列夫，《全俄立宪会议》，第 9 页。



图 6 立宪会议开幕时的雅科夫·斯维尔德洛夫（左）和谢尔盖·什韦佐夫。尤·康·阿尔齐布舍夫绘。

傍晚时分，灯火悉明（这让社革党白拿了蜡烛），切尔诺夫开始了他的主旨讲话。他极为宽泛地简述了一项野心勃勃的改革计划。后者听上去和十月革命前布尔什维克的纲领极为相似——乃至于坚持要求“立刻行动，不要只是言辞”⁴⁹²（“杂耍一般地操弄布尔什维克口号，”奥加诺夫斯基这样说它⁴⁹³）。切尔诺夫小心翼翼地避免直接批评布尔什维克或苏维埃（这让许多投票支持他和他的言论的人感到不安）。他说，在世界上，革命俄国的社会主义者所控制的立宪会议是全世界具主办国际和平大会的声望和权威的机构，这次大会将在不久后带来普遍、民主和公正的和平。为了照顾疲于战争的俄军部队，他呼吁组织一支全新的革命志愿军，来担负改造过时的机构和生活方式的任务，接替前线士兵，保家卫国。谈及工业领域的混乱和日益恶化的失业问题（复员使之雪上加霜）时，切尔诺夫提出了一项公共工作和对工业生产暂时实施国家监督（直到工人有能力自行监督工业）的宏大计划。在民族政策方面，在以个人名义向各少数民族代表恭顺地致敬之后，切尔诺夫描绘了一幅平等的、半独立的民族和区域自由联合为俄罗斯联邦共和国的

⁴⁹² 波克罗夫斯基、雅科夫列夫，《全俄立宪会议》，第 17 页。对切尔诺夫讲话的高度批判性的评价，见奥加诺夫斯基，《一位立宪会议代表的日记》，第 156-171 页；维什尼亞克，《全俄立宪会议》，第 108-109 页；以及姆斯季拉夫斯基，《改变俄国的五天》，第 146 页。32（此处原文为“immediate deeds, not just words”，当本于切尔诺夫讲话中的“народ хочет не слов, а дела… из области голых лозунгов и общих формул перейти в область осуществления”，即“人民需要的不是言辞，而是行动……从空洞的口号和一般的公式转向落实”。——译者注）

⁴⁹³ 奥加诺夫斯基，《一位立宪会议代表的日记》，第 157 页。

图景。在这个共和国当中，各区域立宪会议和地方自治机构的网络与全俄立宪会议一道，设计保护少数民族权利且合乎人民意愿的新政治制度。

在至关重要的土地问题上，切尔诺夫支持立即系统地、无偿地将所有土地重新分配给“劳动农民”。此外，针对苏维埃政府指控立宪会议缺乏代表性，以及甚至列宁此前强调召回代表以重新选举，切尔诺夫机智地加以反击，提议大方地信赖全民公决，以保证立宪会议的行动合乎人民的意志。他确实向布尔什维克发出挑战，要求他们如果怀疑立宪会议是否有权表达人民的意志，便立即就如何对待立宪会议举行全民公决。⁴⁹⁴

尽管在演说中，切尔诺夫恳求民主力量团结一致、退让妥协和结束内战，但他丝毫没有提到跟卡杰特或其他自由主义团体结盟。他的言下之意是，尽管主导革命俄国的仍将是社会主义势力，但苏维埃的统治时期结束了，将由立宪会议创建的新机构开始统治。

在左翼社革党的谢尔盖·姆斯季斯拉夫斯基看来，切尔诺夫的讲话是“书生气的引文、诗句和学究化习语的毫无生气的杂烩”⁴⁹⁵。对于切尔诺夫模糊他们和布尔什维克之间的路线，右翼社革党人感到愤怒。研究社革党的西方历史学家奥利弗·拉德基⁴⁹⁶分析这份讲话时，得出了截然不同的结论。在他看来，通过帮助早应在案的立法提案付诸记录，切尔诺夫大大地帮助了自己的党。⁴⁹⁷或许如此。关键问题是，如今，随着布尔什维克温和派的衰落和列宁派控制该党，已为时太晚。即便在切尔诺夫结束之前，人民委员会中的布尔什维克成员就溜出自厅，在一间休息室开会，并再次确认，立宪会议应在当日中断。⁴⁹⁸

托洛茨基正从布列斯特返回彼得格勒途中，列宁则更愿意待在幕后，策划而不是参与正式会程。由此，30岁的布哈林承担起回应切尔诺夫的责任。⁴⁹⁹在一份时长与切尔诺夫讲话相当的热烈讲话中，他呼吁立即通过《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并辩称，尽管很难不同意切尔诺夫所勾勒的崇高目标，但问题的关键在于，努力实现这些目标的时候，哪个阶级掌权。临时政府的经验明确表明，对于任何由中派社会主义政党控制的政府，大资产阶级都能发挥决定性的影响，由此就切尔诺夫谈及的各关键领域而言，立宪会议的统治只会使工农重新遭受奴役，陷入

⁴⁹⁴波克罗夫斯基、雅科夫列夫，《全俄立宪会议》，第9-23页；维·米·切尔诺夫，《风暴前》(Перед бурей)，纽约，1953年，第362-380页。

⁴⁹⁵姆斯季拉夫斯基，《改变俄国的五天》，第146页。

⁴⁹⁶奥利弗·亨利·拉德基 (Oliver Henry Radkey, 1909-2000)，美国历史学家，主要研究俄国社会革命党的历史。——译者注

⁴⁹⁷奥·亨·拉德基，《锤子下的镰刀：苏维埃统治最初数月的俄国社会主义革命者》(The Sickle under the Hammer: The Russian Socialist Revolutionaries in the Earliest Months of Soviet Rule)，纽约，1963年，第394页。

⁴⁹⁸圣彼得堡中央国家档案馆，1000号全宗，1号目录，7号案卷，第27张。

⁴⁹⁹对于布哈林及其在布尔什维克以及苏维埃历史当中的地位，一项富有启发性的研究见斯蒂芬·弗·科恩 (Stephen Frand Cohen)，《布哈林与布尔什维克革命：政治传记》(Bukharin and the Bolshevik Revolution: A Political Biography)，纽约，1973年。

如同他们在沙皇时代那样的奴役地位。布哈林坚称，革命俄国所要求的不是在立宪会议支持的民族团结政府之下的国内和平（civil peace），而是像斯维尔德洛夫提交的《宣言》所提出的那样的纯粹的苏维埃工农专政。⁵⁰⁰

之后，尼古拉·蓬皮扬斯基⁵⁰¹简述了由首日委员会制定的会议日程。⁵⁰²于是，委员会的看法被立即公之于众：休会前，立宪会议的首次会议将就革命的核心问题（首先是和平、土地和中央政府架构的问题）采取预备措施。作为对蓬皮扬斯基的答复，左翼社革党的司法人民委员施泰因贝格要求立宪会议不要打太极，而是讨论并支持斯维尔德洛夫的《宣言》。“现行苏维埃政权承认并不断解决着革命面临的所有问题，”他说道，“立宪会议如果希望与劳动人民的苏维埃同心同德，就不能逃避立即讨论和承认中执委《宣言》这一首要责任。”⁵⁰³

紧接施泰因贝格走上讲台的是格鲁吉亚的孟什维克伊拉克利·策烈铁里。自俄国社会民主主义运动之初，策烈铁里就参与其中，是作风稳重、直言不讳的老资格。在1907年6月斯托雷平对第二届杜马的臭名昭著的攻击中，他是令人尊敬的受害者。二月革命后，他从西伯利亚流放地获释，理所当然地成了1917年温和社会主义苏维埃领导层中最具威信的人物，以及后者与自由派合作的最有影响力倡导者，并坚决反对布尔什维主义。“敌对阵营当中少数惯常诚实的人之一，”姆斯季斯拉夫斯基如是回忆他。⁵⁰⁴很大程度上由于其坦率的名声和对布尔什维主义的敌意，并且或许也因切尔诺夫之外的其他著名“护国派”要么入狱要么躲了起来，策烈铁里成了苏维埃政权的主要敌人的典型。他的出现使左边的议席和走廊陷入一片狂乱之中。⁵⁰⁵

这种骚动一点也没吓住策烈铁里。要说真有什么的话，似乎倒给他以动力。之前的温和社会主义的发言者们，遵循切尔诺夫的方针，有意避免与布尔什维克正面交锋。对于这一策略，奥加诺夫斯基写到，我们觉得“首先必须让自己在塔夫利达宫扎下根来，只有在这之后，才应该攻击”。⁵⁰⁶策烈铁里以他惯常的直接方式，对此不予接受。他嘲笑立宪会议应当盲目支持苏维埃统治的建议，坚称必须向代表们阐释苏维埃纲领正发挥积极作用。掌权两个多月后，布尔什维克仍试图将所有问题归咎于资产阶级的破坏，并尽可能压制合法的批评。

对于左翼“你恢复了死刑”的吼声，策烈铁里承认道：“或许我们犯了错误或更

⁵⁰⁰波克罗夫斯基、雅科夫列夫，《全俄立宪会议》，第25-31页。

⁵⁰¹尼古拉·彼得罗维奇·蓬皮扬斯基（Николай Петрович Пумпянский，1881-1932），生于革命者家庭。1900年代初加入社会革命党，曾参与刺杀斯托雷平。长期在远东地区从事社会革命党的领导工作。二月革命后，当选全俄农民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委员和立宪会议代表。立宪会议被驱散后，主要在远东从事铁路工作。——译者注

⁵⁰²波克罗夫斯基、雅科夫列夫，《全俄立宪会议》，第32-34页。

⁵⁰³波克罗夫斯基、雅科夫列夫，《全俄立宪会议》，第35-36页。

⁵⁰⁴姆斯季斯拉夫斯基，《改变俄国的五天》，第147页。

⁵⁰⁵波克罗夫斯基、雅科夫列夫，《全俄立宪会议》，第36页。

⁵⁰⁶奥加诺夫斯基，《一位立宪会议代表的日记》，第150页。

糟，但我们掌权时，至少知道如何回答各种问题，并且无畏地论证我们的行动。”⁵⁰⁷但通常，他不顾震耳欲聋的诘难和侮辱性地提及临时政府各种政策，勇敢地一个接一个攻击他认为的苏维埃政策的主要失败。“你们向全体人民承诺了面包，但现在你们能把手放在心上，担保彼得格勒即便几周免于饥荒吗？”他问道。“你们给人民以土地，”他评论道，“但你们确定贫农得到了革命没收的土地吗？”“在对外政策方面，你们对局势的发展满意吗？”他质问道。“如果你们打赌会来帮助俄国革命的外部力量没有出现，那你们关于俄国社会主义的根据、关于巩固和加强俄国民主化的基础的观点会在后面几年落空吗？”“你们真的相信，德国人会觉得，你们是一个有着普遍代表性和被普遍承认的最高权威，而非有赖一场漫长的内战来维持存在，因而不得不加以尊重？”⁵⁰⁸

每次质问者试图阻止策烈铁里时，他都有一个准备好了的答复，并且重新聚焦于手头的问题。因此，他强调苏维埃当局在和谈方面的固有弱点，因而引起一位特别刺耳的代表大叫着“我想你是要我们找克伦斯基帮忙吧”后，他回击道：“让我们假设克伦斯基比你还糟，但是这并不证明你比立宪会议好。现在你在与之战斗的不是克伦斯基，也不是策烈铁里，而是全体人民表达的意志。”⁵⁰⁹

在演说结尾，策烈铁里就像切尔诺夫那样，拒绝在未来和民主阵营之外的力量合作（对策烈铁里和切尔诺夫来说，这是与其1917年立场的重大决裂）。策烈铁里还觉得，资产阶级的力量太过薄弱，以至不能对革命构成威胁。对革命来说，真正的危险来自布尔什维克在民主阵营当中制造的分裂。结束乱局、确保革命完成的希望在于立宪会议中“所有负责任的民主人士”的团结。

孟什维克的官方宣言《关于立宪会议的任务》，全面阐释了该党对立宪会议在创建民主共和国当中的重大作用的看法。策烈铁里以这份宣言结束自己的讲话。这份宣言在某些方面主张的改革，与此前社革党的说法类似。不过，这些改革向苏维埃政权提出了正面的挑战。它们明确拒斥了《被剥削劳动人民宣言》当中的设想和政策，并直接请求俄国工人拒绝苏维埃专政，并代之以誓死捍卫立宪会议的无上权力和权威。它们不是像列宁在12月初要求的、大部分左翼社革党领导人仍然支持的那样，让立宪会议支持苏维埃政权，而是呼吁将苏维埃和其他工人阶级机构转变为立宪会议的强大支持堡垒。⁵¹⁰

策烈铁里强有力的讲话得到了（甚至对手的）广泛赞誉。姆斯季斯拉夫斯基后来回忆道：“那天在塔夫利达宫做的讲话当中，策烈铁里的显然无论内容还是说服力都是最好的。”奥加诺夫斯基则评之为“人民的真正护民官在他的威严中显现

⁵⁰⁷ 波克罗夫斯基、雅科夫列夫，《全俄立宪会议》，第38页。

⁵⁰⁸ 波克罗夫斯基、雅科夫列夫，《全俄立宪会议》，第41-44页。

⁵⁰⁹ 波克罗夫斯基、雅科夫列夫，《全俄立宪会议》，第45页。

⁵¹⁰ 波克罗夫斯基、雅科夫列夫，《全俄立宪会议》，第50-53页。

了自己”。美国记者和社会主义者艾伯特·里斯·威廉斯⁵¹¹回忆到，策烈铁里刚开口讲话，同样也是美国记者的路易丝·布莱恩特⁵¹²就对自己的丈夫约翰·里德（三人都坐在走廊里）耳语道：“他是那样的威严。”⁵¹³讲话结束后，甚至列宁都似乎不情愿地向策烈铁里致以敬意。策烈铁里的孟什维克同事尤里·杰尼克⁵¹⁴称，实际上，几天后，在两名卡杰特领导人（费奥多尔·科科什金⁵¹⁵和安德烈·申加廖夫⁵¹⁶）被一队喝醉了的水兵和赤卫队员杀死后，列宁通过中间人，建议策烈铁里返回安全的格鲁吉亚。⁵¹⁷

策烈铁里结束讲话、走下讲台时，议席的中间和右边爆发出欢呼声——这是他们的时刻。不久后，津济诺夫要求对蓬皮扬斯基提出的议程建议作出决定，并试图证明，在决定政府架构之前，应在和平和土地问题上有所作为。他的目的显然在于，在与布尔什维克和左翼社革党就苏维埃政权问题展开决定性交锋之前，确保通过社革党有关和平和土改问题的立场。莫斯科的布尔什维克、前《社会民主党报》(Социал Демократ) 编辑伊万·斯克沃尔佐夫-斯捷潘诺夫⁵¹⁸宣布，他的党不

⁵¹¹ 艾伯特·里斯·威廉斯 (Albert Rhys Williams, 1883-1962)，出生于牧师家庭。曾担任记者和牧师，并参加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俄国革命期间结识列宁，并在此后成为苏维埃政权的支持者。——译者注

⁵¹² 路易丝·布莱恩特 (Louise Bryant, 1885-1936)，出生于记者家庭。1912 年起参加女权运动，后结识约翰·里德，并与其结婚。俄国革命爆发后，与里德一道赴彼得格勒报道革命进程，并成为苏维埃政权的支持者。1918 年返回美国后，继续从事记者工作。——译者注

⁵¹³ 姆斯季拉夫斯基，《改变俄国的五天》，第 148 页；奥加诺夫斯基，《一位立宪会议代表的日記》，第 158 页；艾伯特·里斯·威廉斯，《革命之旅：彼得格勒，1917-1918》(Journey into Revolution: Petrograd, 1917–1918)，芝加哥，1969 年，第 200 页。参见维什尼亞克，《全俄立宪会议》，第 152 页；以及利奧波德·海姆松 (Leopold Haimson)，《十月革命后的孟什维克》(The Mensheviks after the October Revolution)，《俄国评论》(Russian Review)，1980 年 7 月号，第 467-469 页。

⁵¹⁴ 尤里·彼得罗维奇·杰尼克 (Юрий Петрович Денике, 1887-1964)，生于辛比尔斯克省，中学时即接触社会民主主义思想。1905 年参加布尔什维克，后多次被捕，主要在喀山从事革命活动。十月革命后，在教育人民委员部任职，1921 年在莫斯科大学担任教授，后流亡国外。——译者注

⁵¹⁵ 费奥多尔·费奥多罗维奇·科科什金 (Фёдор Фёдорович Кокошкин, 1871-1918)，生于贵族家庭。1903 年起积极参加自由派政治活动，并参与创建了立宪民主党。1906 年当选沙俄第一届国家杜马代表。二月革命后，参与临时政府的法律工作，并当选立宪会议代表。1917 年末被苏维埃政府逮捕，囚禁期间被杀。——译者注

⁵¹⁶ 原文此处人名为“亚历山大·申加廖夫”，系误，应为安德烈·申加廖夫。安德烈·伊万诺维奇·申加廖夫 (Андрей Иванович Шингарёв, 1869-1918)，生于商人家庭。1905 年起参加自由派政治活动，后参加立宪民主党，并多次当选沙俄国家杜马代表。二月革命后，曾任临时政府的农业部长和财政部长。1917 年末被苏维埃政府逮捕，囚禁期间和科科什金一道被杀。——译者注

⁵¹⁷ 尤·彼·杰尼克，《伊·格·策烈铁里》(И. Г. Церетели)，载《新评论》(Новый журнал)，1959 年，第 52 期，第 284 页。

⁵¹⁸ 伊万·伊万诺维奇·斯克沃尔佐夫-斯捷潘诺夫 (Иван Иванович Скворцов-Степанов, 1870-1928)，生于职员家庭。1890 年代初，开始参加政治活动，并自视为民粹派。1895 年，因卷入刺杀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密谋而被捕，后流放至图拉。流放期间，参加社会民主主义政治活动。1901 年，参与创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莫斯科地方组织，并因此而被捕，后被流放西伯利亚。流放结束后，主要在莫斯科为布尔什维克从事宣传工作，并参与翻译了《资本论》。二月革命时，为布尔什维克莫斯科委员会委员，并当选莫斯科市杜马代表。十月革命期间，为莫斯科军事革命委员会成员，后被任命为苏维埃政府的财政人民委员，但固辞不就。1918 年初，为左翼共产主义者，反对与德国签署和约。后主要从事理论、宣传、出版和教育工作。1928 年病故。——译者注

会在中执委的《被剥削劳动人民宣言》之外另提出一份宣言。但是令大多数代表吃惊的是，左翼社革党不接受这一立场。与之相反，一位来自远东阿穆尔区的老农费多尔·索罗金⁵¹⁹拄着拐杖，蹒跚地走上讲台，不顾左翼社革党向布尔什维克誓言支持斯维尔德洛夫宣读的中执委《宣言》，提交了一份左翼社革党自己的宣言。⁵²⁰索罗金提交的宣言在诸多关键方面与中执委的《被剥削劳动人民宣言》相吻合。它明确承认十月革命和苏维埃政治制度的合法性，并完全否认立宪会议具有独立政治权威。但是，它没有要求立宪会议立即投票解散自己，而是设想它会长期成为苏维埃指导下的革命重建工作的促进者。

两份宣言的上述差异或许仅仅表明，策略上温和的左翼社革党仍然拒绝立即强行解散立宪会议。因为他们坚信，假以机会，立宪会议会迅速败坏自己的名声；他们更希望这种自然的、和平的进程，而非像普罗什这样更为激进的左翼社革党人主张的进程；并且他们有意把自己与在他们看来布尔什维克的过分死板、独裁的趋势区别开来（他们或许已经说服了左翼社革党团的大部分人接受这一点）。或许由于希望坚持独立身份，索罗金提交的宣言强调个人人权，即尽可能坚定地支持献身于有意义劳动的个人的解放，这样的个人实现自身全部潜能的权利，以及他们获得适宜的生活条件以及必要社会福利的权利。⁵²¹索罗金所提出的权利当中，并不像中执委《宣言》和列宁派思想中所暗含的那样，不顾其行为而将全体人民严格划分好坏。

但是，索罗金陈述当中最有意思的方面或许是他在读完左翼社革党宣言后的个人评论。对于右边雷鸣般的欢呼和左边爆发的抗议声，他故意将两边混为一谈，毫不含糊地宣称，所有立宪会议的农民代表，无论来自哪个党，被派到彼得格勒时，都是带着获得土地与自由的指示。只有这件事完成了，他们才能光彩地回到自己的村庄。就此， he说道：“在我们农民当中，是没有分歧的。左边和右边的我们都是相似的。”“农民同志们，我的希望，”他补充说道，“是我们将把自己的任务完成到底。”在大部分人看来，这表明决心在立宪会议之中解决土地问题，而对于他的大部分左翼社革党同仁（更不用说布尔什维克）来讲则是“破坏！”⁵²²即便如此，索罗金的宣言和评论突然引起了走道两边社革党和左翼社革党的农民代表之间的激烈讨论，并重新造成了妥协的可能性。⁵²³

⁵¹⁹勿将这位索罗金与当时尚在狱中的皮季里姆·索罗金混为一谈。51 (费多尔·伊万诺维奇·索罗金[Федор Иванович Сорокин, 1888-1954], 生于哥萨克家庭。1916年被征召入伍, 次年参加社会革命党。二月革命后, 当选全俄农民代表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和立宪会议代表。1918年末退出政治生活, 后被苏维埃政府逮捕。1925年公开宣布退出左翼社革党。此后在莫斯科从事农业和食品工作。大清洗期间再次被捕, 并被判处5年徒刑, 1946年获释。1948年被捕, 并被流放至西伯利亚。1956年平反。——译者注)

⁵²⁰波克罗夫斯基、雅科夫列夫, 《全俄立宪会议》, 第61-64页; 奥加诺夫斯基, 《一位立宪会议代表的日记》, 第158页。

⁵²¹波克罗夫斯基、雅科夫列夫, 《全俄立宪会议》, 第62-63页。

⁵²²波克罗夫斯基、雅科夫列夫, 《全俄立宪会议》, 第63-64页。

⁵²³奥加诺夫斯基, 《一位立宪会议代表的日记》, 第158页。

对于在他结束讲话后立宪会议和党团会议对索罗金陈述的讨论，资料阙如。《劳动旗帜报》在对立宪会议会程的详细报道中甚至都没提到索罗金的评论，这表明后者令左翼社革党领导人大为难堪。⁵²⁴他所谓农民代表不分政治归属都有共同性的评论，只是在自发地、激烈地表达数百万农民对派别斗争的厌倦以及对立实现和平和获得土地的渴望？抑或其讲话所代表的不仅于此？这一点是无法弄清的。实际上只有两份日程提案被付诸表决：《被剥削劳动人民宣言》无条件支持苏维埃政权和政策；蓬皮扬斯基提出的首日日程提案则完全忽视了苏维埃，间接地承认立宪会议是俄国的最高政治权威，并呼吁立即讨论社革党有关和平、土地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国家政权的立法。尽管有策烈铁里激动人心的讲话和索罗金的评论，但主要竞争各方之间的投票力量对比仍然未有改变。不经讨论，以 237 票对 146 票通过了蓬皮扬斯基的提案。⁵²⁵

紧接上述表决之后，首先是左翼社革党然后是布尔什维克要求休会；据姆斯季斯拉夫斯基称，这与其说是要去决定“怎么办，还不如说是要决定以怎样的秩序退出[立宪会议]”⁵²⁶。随后左翼社革党和布尔什维克的党团会议，相关信息匮乏。据《新生活报》对于前者的报道，布尔什维克提议左翼社革党团立刻退出立宪会议，遭到了农民代表的坚决反对。后者提出，他们的选民不会理解，为什么仅仅因为它不首先讨论中执委的《宣言》就必须解散立宪会议。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激烈讨论。一些农民代表威胁称，如果接受了布尔什维克退出立宪会议的提议，他们会继续留在自己的席位上。最终达成了妥协：施泰因贝格会仅仅把《宣言》中有关和平的条款作为最后通牒加以提交。要么接受通牒，要么整个左翼社革党党团也退出立宪会议。⁵²⁷

布尔什维克党团的会商显然受到列宁的主导。在此前 8 个小时的大部分时间里，他躲开公众视线，和人民委员会以及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挤在一起，从挂着窗帘的走廊观察会议议程。⁵²⁸切尔诺夫和蓬皮扬斯基勾勒的改良主义轨迹，或者索罗金强调的农民代表的共同点，是否使他更难以忍受立宪会议？我们也不得而知。党的领导层不遗余力地将这次党团会议保持为隐秘的闭门会议。会议开始前，布尔什维克的会议室被清空，只有党团成员在检查了证件后才被允许进入。⁵²⁹根据现存资料只能知道，列宁来到时做好了充分准备，他以中央委员会的名义要求布尔什维克立即退出，并在第一次会议后解散立宪会议。

与会者极不可能都赞同这一策略。党团成员梁赞诺夫和洛佐夫斯基一定会再次加以反对。但最终，列宁的提议被接受了。来自喀琅施塔得和莫斯科的拉斯科

⁵²⁴ 《劳动旗帜报》，1918 年 1 月 7 日，第 4 版。

⁵²⁵ 波克罗夫斯基、雅科夫列夫，《全俄立宪会议》，第 64 页。

⁵²⁶ 姆斯季拉夫斯基，《改变俄国的五天》，第 148 页。

⁵²⁷ 《新生活报》，1918 年 1 月 7 日，第 2 版。

⁵²⁸ 拉斯科尔尼科夫，《海军准尉伊利英的故事》，第 16 页。

⁵²⁹ 《新生活报》，1918 年 1 月 7 日，第 2 版。

尔尼科夫和洛莫夫⁵³⁰分别受命返回大厅，提交了列宁起草的、打好交给党团的退出声明⁵³¹。⁵³²据报为了避免可能的混乱，整个党团不会返回会场。据拉斯科尔尼科夫说，党团会议结束后，他和现任政府成员被叫到塔夫利达宫的内阁大臣侧楼⁵³³，参加人民委员会的紧急会议。他回忆道，在这次会议上，列宁提议并经所有人同意，无论发生何种情况，都不应强行驱散留下来的代表；此外，还应该允许他们想说多久就说多久，然后再“让他们回家去”（列宁语），此后便不会允许他们重回会场。⁵³⁴

同时在凌晨 1 点左右，立宪会议终于复会。在布尔什维克和左翼社革党仍然缺席的情况下，代表们开始讨论占据蓬皮扬斯基日程首位的和平问题。讨论不断地被各种异乎寻常的声明所打断——乌克兰社革党人阿法纳西·谢韦罗夫-奥多耶夫斯基⁵³⁵宣布了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和苏维埃当局就乌克兰未来的冲突；来自沃罗涅日的社革党农民党员宣称，农民急不可待地要求立即实现和平和解决土地问题；最后是拉斯科尔尼科夫声明布尔什维克退出会议。⁵³⁶

发表之前的声明时，人们在大厅中不断地说话和活动，代表们和观察员们对会程的反应，要么是懒散地交头接耳，要么是游荡到附近的餐台喝茶、吃点心。但随着拉斯科尔尼科夫走上讲台，大厅里突然变得忙碌起来，空荡荡的布尔什维克席位明确无误地表明了他的目的。一些布尔什维克聚在门口仔细听着，拉斯科尔尼科夫传达了列宁的退出声明：

⁵³⁰ 格里戈里·伊波利托维奇·奥波科夫（Георгий Ипполитович Оппоков，1888-1938），化名“阿·洛莫夫”（А. Ломов）。1903 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并成为布尔什维克。参加了 1905 年革命，此后在莫斯科从事组织工作，曾持召回派立场。1910 年代多次被捕，并被流放至西伯利亚。二月革命后，返回莫斯科，并当选布尔什维克中央候补委员和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十月革命后，短暂担任司法人民委员。1918 年初，成为左翼共产主义者，反对签署《布列斯特-利托夫斯克和约》。此后主要从事经济工作。大清洗期间被捕后枪决。1956 年平反。——译者注

⁵³¹ 即《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立宪会议党团声明》（1918 年 1 月 5 日〔18 日〕）。

⁵³² 拉斯科尔尼科夫，《海军准尉伊利英的故事》，第 16 页；维什尼亞克，《全俄立宪会议》，第 112-113 页。

⁵³³ 即内阁大臣馆（Министерский павильон），是 1907 年建于塔夫利达宫白厅东侧的附属小楼，以封闭走廊与白厅相连。沙俄时期，这座小楼专供参加杜马会议的内阁大臣（即各部部长和首相）会前等候和休息之用，故名。会议开始后，内阁大臣再从该楼直抵白厅，从而避免其在会议前后私晤杜马代表。二月革命后，这里一度用于监禁沙皇政权的高官显贵。——译者注

⁵³⁴ 拉斯科尔尼科夫，《海军准尉伊利英的故事》，第 17 页；斯维亚季茨基，《1918 年 1 月 5-6 日》，第 227 页。

⁵³⁵ 阿法纳西·谢梅诺维奇·谢韦罗夫-奥多耶夫斯基（Афанасий Семенович Северов-Одоевский，1884-1938），生于铁匠家庭。1902 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后成为布尔什维克。1906 年加入社会革命党。1908 年被流放，后脱逃，流亡国外。二月革命后返回俄国，当选乌克兰社会革命党中央候补委员和立宪会议代表。1918 年成为左翼社会革命党人，次年加入俄共（布）。大清洗期间被捕，后被枪决。1956 年平反。——译者注

⁵³⁶ 波克罗夫斯基、雅科夫列夫，《全俄立宪会议》，第 85-90 页。

俄国绝大多数的劳动人民——工人、农民和士兵，要求立宪会议承认伟大的十月革命的成果，……并且首先要承认工兵农代表苏维埃政权。……然而，立宪会议的多数竟按照资产阶级的要求，否决了这个提议，这就向俄国全体劳动人民提出了挑战。……我们一分钟也不愿意掩饰人民公敌的罪行，我们声明退出立宪会议，以便把怎样对待反革命的那部分立宪会议代表的问题提交苏维埃政权作最后决定。⁵³⁷

拉斯科尔尼科夫的最后几句话被社革党人的怒吼声淹没了。“一派胡言！”“谎言，全是谎言！”“蠢货”“搞迫害”，他们这样叫道，同时左翼社革党和走廊里爆发出欢呼声和掌声。⁵³⁸在继之而起的混乱中，一位负责保卫工作的水兵举起自己的步枪，瞄准来自莫斯科的、粗壮的社革党代表奥西普·米诺尔⁵³⁹，只是在更冷静的战友最后关头的阻止下，才没有扣动扳机。⁵⁴⁰不久后，左翼社革党代表猛扑向一位激动的年轻乌克兰同僚阿列克谢·费奥菲拉克托夫⁵⁴¹，他的勃朗宁手枪已准备就绪，要对付身边右翼议席的一位质问者。⁵⁴²在恢复了秩序的模样之后，另一位农民代表、前国家杜马代表拉尔夫·叶夫列莫夫⁵⁴³请求布尔什维克和左翼社革党在人民的意愿得以实现之前，不要抛弃立宪会议。除了立宪会议，谁还能实现我们的全部梦想，谁能够结束内战？他绝望地喊道。⁵⁴⁴

接着，在其党团的指示下，施泰因贝格要求代表们立即表示支持《被剥削劳动人民宣言》。他辩称，为了采纳蓬皮扬斯基的日程，甚至拒绝讨论《宣言》，这便使立宪会议的多数代表显得仿佛反对苏维埃，并意图创建自己的、旨在反对革命所取得的诸多胜利的国家权威。但是，施泰因贝格说到，多数代表的立场并没

⁵³⁷ 波克罗夫斯基、雅科夫列夫，《全俄立宪会议》，第 88-90 页。

⁵³⁸ 波克罗夫斯基、雅科夫列夫，《全俄立宪会议》，第 89 页。

⁵³⁹ 奥西普·所罗门诺维奇·米诺尔（Осиp Соломонович Минор，1861-1932），生于犹太教拉比家庭。1880 年代初加入民意党，此后屡次被捕、流放。参与创建了社会革命党，并参加 1905 年革命。一战爆发后，持护国主义立场。二月革命后，当选莫斯科市杜马主席和立宪会议代表，反对十月革命和苏维埃政权。1919 年流亡国外，此后主要从事著述工作。——译者注

⁵⁴⁰ 拉斯科尔尼科夫，《海军准尉伊利英的故事》，第 18 页。

⁵⁴¹ 原文此处人名为“瓦西里·费奥菲拉克托夫”，系误，立宪会议代表中无此人。阿列克谢·叶夫根涅维奇·费奥菲拉克托夫（Алексей Евгениевич Феофилактов，1886-1919），生于乌克兰的贵族家庭。1900 年代中期加入社会革命党。二月革命后，加入左翼社会革命党，并当选全俄农民代表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和立宪会议代表。后在农业人民委员部工作，参与起草了土地社会化的法律。1919 年被高尔察克政权枪杀。立宪会议期间，费奥菲拉克托夫举枪欲杀策烈铁里，被卡列林夺下手枪。——译者注

⁵⁴² 波克罗夫斯基、雅科夫列夫，《全俄立宪会议》，第 90 页；姆斯季拉夫斯基，《改变俄国的五天》，第 149-150 页。

⁵⁴³ 拉夫连季·亚历山德罗维奇·叶夫列莫夫（Лаврентий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Ефремов，1878-1921），亦名“拉夫尔”（Лавр），出生于农民家庭。1905 年革命期间，在农民当中从事鼓动和组织工作，并加入社会革命党。1907 年当选沙俄第二届国家杜马代表。二月革命后，参加了喀山工兵代表苏维埃，并当选立宪会议代表。立宪会议解散后，被苏维埃当局逮捕，后在左翼社革党的要求下获释。1918 年参加白卫政权，不久后脱离政治生活，返乡务农。——译者注

⁵⁴⁴ 波克罗夫斯基、雅科夫列夫，《全俄立宪会议》，第 90-91 页。

有那么明确，事情尚有余地。因此，他提出自己党团的最后通牒：立宪会议应当搁置社革党的日程，立即讨论和表决《被剥削劳动人民宣言》有关和平问题（当时正在讨论的问题）的部分，以示与苏维埃政权和十月革命的成果团结一致；否则，对左翼社革党和俄国人民来说，多数会议代表具有反革命的性质和意图，有必要与之分道扬镳，将得到决定性的证据。⁵⁴⁵

尽管社革党的立宪会议领导层如今承认，立即实现和平至关重要，但可以理解的是，他们不愿向施泰因贝格的“最后通牒”退让，后者正如施泰因贝格自己承认的那样，意味着实质上承认苏维埃当局。这点一经表露，不久后的1月6日凌晨4点左右，左翼社革党便像布尔什维克那样，以立宪会议构成不合理、无意支持苏维埃政权为由，离开了大厅。在左翼社革党人鱼贯而出之时，卡列林宣布：“我们走了，这样在俄国大革命的这个关键时刻，我们能尽全力为苏维埃机构……为各劳动阶级的事业而工作……以确保他们的胜利。”⁵⁴⁶

在最后几名左翼社革党人离开后，阳台上的杂音震耳欲聋。观众们占据了左边如今空空如也的议席。在上刺刀的铿锵声和开关枪栓的撞击声中，他们叫道：“够了——你们都走吧！”在不断的喧闹声中，切尔诺夫竭尽全力地使人们听到自己的声音，开始疯狂地念起一份有关土地问题的决议草案——这是社革党党团土地委员会（它由许多俄国杰出的农学家组成）数周悉心研究和讨论的成果。宣读时，卫队长、后来被认出是臭名昭著的喀琅施塔得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者阿纳托利·热列兹尼科夫⁵⁴⁷轻拍着切尔诺夫的肩膀。“卫兵们累了，”热列兹尼科夫宣称，“我们受命清空大厅！”⁵⁴⁸在走廊里哄堂的同意声中，切尔诺夫答道：“立宪会议的代表都累了，但无论多累，都不能打断宣读全俄罗斯翘首以盼的土地法。”“立宪会议，”他补充道，“只能被武力驱散。”⁵⁴⁹

可以理解的是，留下来的200余名代表以更大的急迫性继续他们的工作。一位乌克兰社革党人代表被热列兹尼科夫的无礼粗野激怒了，宣称由于刚发生的事情，他所在的人数80的党团不再拥护《被剥削劳动人民宣言》有关和平和土地的条款，转而支持社革党的相应决议。切尔诺夫于是把此前所有为第一天准备的法案匆匆付诸表决。其中包括事先准备的附属于社革党和平纲领和土地纲领的声明，以及俄国重组为“联邦共和国”的法案。⁵⁵⁰所有这些措施都不经讨论而被

⁵⁴⁵波克罗夫斯基、雅科夫列夫，《全俄立宪会议》，第91-94页。

⁵⁴⁶波克罗夫斯基、雅科夫列夫，《全俄立宪会议》，第108-109页。

⁵⁴⁷阿纳托利·格里戈里耶维奇·热列兹尼科夫（Анатолий Григорьевич Железняков，1895-1919），生于小市民家庭。1915年被征召入伍，在波罗的海舰队服役。二月革命后，成为无政府主义者，反对临时政府，并当选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十月革命期间，参与攻打冬宫，并参加了粉碎克拉斯诺夫攻势的战斗。后主要从事打击白卫军的军事工作，1919年在战斗中受伤，不治牺牲。——译者注

⁵⁴⁸波克罗夫斯基、雅科夫列夫，《全俄立宪会议》，第110页。另参见姆斯季拉夫斯基，《改变俄国的五天》，第152-154页；奥加诺夫斯基，《一位立宪会议代表的日记》，第150页；维什尼亞克，《全俄立宪会议》，第115页。

⁵⁴⁹波克罗夫斯基、雅科夫列夫，《全俄立宪会议》，第110页。

⁵⁵⁰波克罗夫斯基、雅科夫列夫，《全俄立宪会议》，第110-113页。

一致通过，烦恼的代表们不顾一切地表明自己的意图，并在某种意义上，想在几分钟之内获得他们与卡杰特共同掌权的7个月里没有实现的东西。“我们只是必须结束会议，这样结束便会留下某些有形的东西。”右翼社革党和律师马克·维什尼亞克⁵⁵¹后来评论道。⁵⁵²

最后在1月6日凌晨接近5点的时候，立宪会议休会，代表们被允许离开。这显然叫许多代表吃了一惊。当他们在刺骨的寒冷中匆匆回家时，仅有教堂的钟声在打破清晨的静寂，斯维亚季茨基和一位社革党同仁思考着白天的事件。“我们会看到——或许这不是结局，”两人闷闷不乐地总结道。十年后回忆起这个时刻时，斯维亚季茨基评价道，立宪会议在那晚就死了，不是因为部分代表缺乏为之而死的勇气，也不是由于水兵们的要求，而是“人民对我们的解散的漠不关心的结果，这使列宁能够挥手解散我们：‘让他们回家去！’”⁵⁵³

* * *

当日（1月6日）晚些时候，人民委员会接受、中执委批准正式解散立宪会议。人民委员会会议还通过了另一套由列宁起草的、有关立宪会议的论纲⁵⁵⁴。这套作为呈交给中执委的法令而被准备的论纲，支持以这样的理由解散立宪会议：布尔什维克和左翼社革党退出后，立宪会议不过是反革命推翻苏维埃政权企图的烟幕。左翼社革党提出了一项修订，呼吁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考虑建立一个全新的常设立法机构——联邦议会（Федеральный конвент）。这项修订的目的在于，最终将人民委员会转变为一个执行机构，扩大苏维埃政府的基础并由此改善左翼社革党较于布尔什维克的力量对比，并软化人们对解散立宪会议的观感。它被占据多数地位的布尔什维克否决了。⁵⁵⁵施泰因贝格还在其司法人民委员的职权范围内，敦促任命委员会调查前一日的枪击事件。

由于梁赞诺夫的紧急发言，中执委推迟解散立宪会议（这是其1月6日会议的第一项议程）。在发言中，他以最强烈的措辞抗议前一日的枪击事件，并要求中执委中止会商，直到即将召开的苏维埃代表大会对人民委员会允许这些过激事件是否得当相机做出决定。梁赞诺夫也像施泰因贝格那样，敦促在此期间任命委员会调查枪击事件。这一点不经讨论便得到通过。但梁赞诺夫要求中执委暂停活动

⁵⁵¹ 马克·韦尼阿米诺维奇·维什尼亞克（Марк Вениаминович Вишняк，1883-1976），生于商人家庭。大学期间开始接触民粹派，1905年加入社会革命党，并积极参加了莫斯科的武装起义。此后多次被捕流放。1912年起，在俄军服役。一战爆发后，持护国主义立场。二月革命后，当选莫斯科市杜马代表和全俄农民代表苏维埃执委会委员。十月革命后，反对苏维埃政权，并当选立宪会议代表。立宪会议解散后，被苏维埃政权通缉。1919年流亡国外，此后主要从事教育和科研工作。——译者注

⁵⁵² 维什尼亞克，《全俄立宪会议》，第105页。

⁵⁵³ 斯维亚季茨基，《1918年1月5-6日》，第228页。

⁵⁵⁴ 即《解散立宪会议的法令草案》。——译者注

⁵⁵⁵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19号全宗，1号目录，41号案卷，第1张；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130号全宗，2号目录，1号案卷，第9-10张。另参见拉兹贡，《苏维埃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第287页。77基普，《争论》，第260页；《劳动旗帜报》，1918年1月7日，第4版。

则被不予理会——或许部分原因在于，即便施泰因贝格也觉得，枪击事件正被夸大。⁵⁵⁶

在梁赞诺夫干预后，列宁发言为解散立宪会议申辩。“苏维埃政权和立宪会议的冲突蒙着整个俄国革命史的阴影。”他一开始宣称道。认为革命的进一步发展仅靠一个党或一个人的工作的看法是“可笑的”。“革命的烈火完全是俄国在战争中蒙受的巨大痛苦的结果。”他承认：“在深化革命的过程当中，会犯各种错误。”他坚称：“任何革命运动都会伴随着混乱、破坏和无序。”“社会主义革命不可能整洁、平滑地包裹着交给人民，”他继续说道。“一定会伴随内战、怠工和反抗……人民曾希望召开立宪会议。但他们迅速意识到，它意味着什么……立宪会议已经表明，它会拖延对苏维埃向它呈交的一切紧要问题做出决定。”⁵⁵⁷因此，推迟解散立宪会议是不可容忍的。⁵⁵⁸

据《真理报》称，列宁的演说赢得了“雷鸣般的掌声，接着又是长时间的欢呼”⁵⁵⁹。代表统一社会民主党人-国际派的瓦西里·斯特罗耶夫⁵⁶⁰指控列宁违背了支持立宪会议特权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意志时，则相反招致了嘲笑。斯特罗耶夫一面躲开推搡自己的代表，一面设法脱口说出要求中执委坚持允许立宪会议不受干涉地继续进行的决议。这份决议没有付诸表决。梁赞诺夫同样勇敢地宣称，他从不崇拜立宪会议，可是一旦它召开了，就应当假以时日让它暴露出自己的真实面目。苏汉诺夫这样的观点在技术上是有效的：说立宪会议拒绝承认十月革命的成果并不准确的。他还敦促不批准解散立宪会议。洛佐夫斯基同样如此，坚称支持解散立宪会议“将是一个错误，实际上是一种犯罪”——无助益。左翼社革

⁵⁵⁶ 基普，《争论》，第 260 页；《劳动旗帜报》，1918 年 1 月 7 日，第 4 版。

⁵⁵⁷ 本书作者在此的英译文与中央编译局的译文略有差异，这里据英译文译出。参见《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关于解散立宪会议的讲话》：“苏维埃政权和立宪会议的冲突是由俄国革命的全部历史造成的，……说革命的进一步发展和群众愤怒的加剧是某一个党、某一个人引起的，……这再可笑不过了。革命的烈火完全是由俄国所遭受的难以想象的痛苦和战争所造成的种种条件点燃起来的，……在苏维埃的力量所唤起的革命的发展过程中，一定会出现各种错误和失策，……任何革命运动都免不了会产生暂时的混乱、破坏和无秩序的现象。……社会主义革命不可能一呈现在人民面前就那样纯洁、平稳和完美无缺，不可能不引起内战、怠工和反抗。……人民要求召集立宪会议，……但是，人民立刻就感觉到这个名声显赫的立宪会议究竟是怎么回事了。……立宪会议再次表示要拖延苏维埃向它提出的一切迫切的、亟待解决的问题和任务……”
——译者注

⁵⁵⁸ 列宁，《全集》，第 3 卷，第 238-242 页；基普，《争论》，第 260-264 页。

⁵⁵⁹ 基普，《争论》，第 264 页。

⁵⁶⁰ 瓦西里·阿列克谢耶维奇·杰斯尼茨基（Василий Алексеевич Десницкий，1878-1958），化名“瓦西里·斯特罗耶夫”（Василий Стroeв），生于教士家庭，1897 年参加社会民主主义运动，曾为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1900 年代初在下诺夫哥罗德从事俄社民工党的组织工作，后加入布尔什维克。1905 年末至 1906 年初，在莫斯科从事党报编辑工作。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四大上当选该党中央委员。1900 年代末曾短暂加入前进派。此后至 1917 年，主要在爱沙尼亚的塔尔图从事党报编辑工作。二月革命后，当选彼得格勒的区杜马代表。列宁回国后，反对布尔什维克，加入“新生活派”及其后的统一社会民主党人-国际派。全俄工兵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全俄中执委委员。1918 年退出中执委，次年脱离政治生活。此后主要从事文化和教育工作。——译者注

党的卡列林不情不愿地提交了列宁解散立宪会议的法令，并在 1 月 7 日清晨，以压倒性多数通过。⁵⁶¹梁赞诺夫和洛佐夫斯基投了反对票。⁵⁶²

这一历史性的步骤，和人民委员会以及中执委的所有其他措施一道，得到了 1918 年 1 月 10-18 日于彼得格勒召开的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的事后批准⁵⁶³。这次大会在 1918 年 1 月 13 日与全俄农民代表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合并。合并后的大会通过了有关政府架构的法令，再次将合并后的中执委批准为苏维埃全国代表大会休会期间的最高中央政府机关。但是，人民委员会和中执委之间的系统性关系又被搞模糊了。法令仅仅规定，中执委有权任命或撤回后者（全部的或部分的）。⁵⁶⁴在左翼社革党的坚持下，建立了隶属于合并后的中执委的、半自主的农民部，以替代全俄农民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⁵⁶⁵农民部将改进中执委批准的土地改革计划（“土地的社会化”），监督其执行，并更为广泛地通盘协调与农民相关的各项计划。⁵⁶⁶斯皮里多诺娃领导的这个部门注定会成为左翼社革党的堡垒，它甚至没有在有关政府架构的法令中被提及。在法令中，制定更为细致的宪制结构的任务被留给了新中执委（在其中布尔什维克占据绝对多数）和下届苏维埃全国代表大会。⁵⁶⁷或许由于它注目于更加紧迫的、有关或者进行革命战争或者接受“下流的”和平的问题，由全俄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选出的中执委从未抽空考虑修改苏维埃政府的架构。

* * *

1917 年 12 月中旬，布尔什维克温和派尊重立宪会议特权的努力被列宁粉碎了，由此标志着前者不再成为一股有影响力、有凝聚力的党内势力。不到一个月后，列宁解散立宪会议，从而破灭了俄国自由派和温和社会主义者这样的希望：1917 年革命会随着在俄国建立西式民主政治制度而达到顶峰。自然，布尔什维克在彼得格勒地区获得的强大民意支持（这在 11 月中旬的立宪会议选举中得到了反映），社革党领导层拒绝为立宪会议提供军事保障而同时布尔什维克和左翼社

⁵⁶¹ 基普，《争论》，第 265-266 页。

⁵⁶² 《劳动旗帜报》，1918 年 1 月 9 日，第 3 版。

⁵⁶³ 《全俄工农代表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Третий всероссийский съезд советов рабочих, солдатских и крестьянских депутатов），圣彼得堡，1918 年，第 43-44（译者注，原文此处为“43-34”）、87 页。

⁵⁶⁴ 《全俄工农代表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圣彼得堡，1918 年，第 93-94 页。

⁵⁶⁵ 《左翼社会革命党：文献与材料》，第 1 卷，第 235-237 页。

⁵⁶⁶ 《左翼社会革命党：文献与材料》，第 1 卷，第 235-237 页。关于农民部，参见下文，第 11 章；塔·亚·西沃希娜（Татьяна Александровна Сивохина），《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农民部的形成与活动》（Образование и деятельность крестьянской секции ВЦИК），载《莫斯科大学学报》（Вестник Московск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1969 年第 2 期，第 14-16 页；以及斯皮里多诺娃在全俄苏维埃第五次代表大会上有关农业部的报告（《全俄工人、农民、士兵和哥萨克代表苏维埃第五次代表大会》[Пятый всероссийский съезд советов рабочих, крестьянских, солдатских и казачьих депутатов : стенографический отчет]，第 50-59 页）。

⁵⁶⁷ 《全俄工农代表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第 87、94 页。全俄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组建的中执委由 160 名布尔什维克、125 名左翼社革党人、2 名孟什维克国际派、3 名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者、7 名社革党最高纲领派、7 名右翼社革党人和 2 名孟什维克组成。

革党准备诉诸武力捍卫苏维埃政权，造成了这一结果。但最重要的是，正如斯维亚季茨基或许切中要害地指出的那样，俄国人民根本上对立宪会议的命运漠不关心，使列宁得以命令会议代表们统统打道回府。

第二部：战还是和？

五、战列宁

对疲于战争的俄国农民、工人和士兵来说，在广受欢迎的 1917 年布尔什维克纲领中，最吸引人的内容之一便是承诺立即实现不割地不赔款的和平。温和社会主义者曾试图在 1917 年夏的斯德哥尔摩召开一次和会。这一努力失败后，在俄国各主要政党当中，只有布尔什维克主张立即实现和平。由于对尽快结束世界大战噩梦的持久关切，像达维德·梁赞诺夫、所罗门·洛佐夫斯基和尤里·拉林这样的左翼孟什维克在 1917 年夏加入了布尔什维克党，并且尽管与占中央委员会多数的列宁派就政府组成问题存在根本的分歧，他们和像加米涅夫那样的布尔什维克温和派领导人在 11 月初没有退出布尔什维克。

作为 10 月 26 日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最早一批法令之一，列宁的和平宣言呼吁各交战国立即展开和谈。在协约国未能积极回应苏维埃政府最初的和平倡议后，人民委员会与同盟国单独停战并举行和谈。谈判于 1917 年 11 月 20 日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城展开，那里是波兰德战区的总部；两天后（11 月 22 日），双方同意实施为期 10 天的停火，之后又顺延 28 天，且附有条件：除非一方在此后 7 天内提出异议，否则停火将自动延期。休战期间，将就永久性和约展开谈判。

苏维埃政府与同盟国单独展开和谈，这在俄国的前盟友之中，在苏维埃政权的国内批评界当中，在布尔什维克党的重要成分当中，引发了巨大的担忧。一般据信，激进的布尔什维克莫斯科区域局的领导人首先就此表示关切。⁵⁶⁸但与此同时，在彼得格勒也出现了类似的反感。在彼得堡委员会 11 月 16 日的会议上，起初关注于解散和重选市杜马的相关问题，一名委员对于即将到来的对同盟国谈判表示关切。斯卢茨基在报告当前局势时，提出列宁和克雷连科有意单独与兴登堡达成和约。此后，维堡工人区的布尔什维克委员会代表维克托·纳尔丘克⁵⁶⁹警告称，如果党不兑现实现普遍和平的承诺，便将丧失人民的支持。但对于大部分与会者来说，认为列宁和托洛茨基在对德谈判时会背信弃义，则未免荒谬。他们仍然表露出这样的看法，即通过选举新一届由单独媾和的激烈反对者（后来的“左翼共产主义者”）掌控的执行委员会（他们的主要领导机关）来实现和平。⁵⁷⁰

彼得格勒布尔什维克担心，在与同盟国和谈进程中，可能背离“普遍的无产阶级和平”的目标。和谈期间没有出现任何英法参加的迹象，或者国外工人对于

⁵⁶⁸ 参见列宁，《全集》，第 35 卷，第 253 页。（《〈关于立刻缔结单独的兼并性和约问题的提纲〉的补充说明》，《列宁全集》第 33 卷，中央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年，第 256 页。——译者注）

⁵⁶⁹ 维克托·尼古拉耶维奇·纳尔丘克（Виктор Николаевич Нарчук，1882-1920），早年为工人，1915 年加入布尔什维克，次年开始在维堡区从事地下工作。二月革命后，在工厂从事组织动员工作，曾担任《工人与士兵报》的名义主编，并积极参加十月革命的准备工作。1918 年末开始在沃罗涅日从事工人工作。次年秋参加红军，前往南方战线与白卫军作战。1920 年因伤寒病逝。——译者注

⁵⁷⁰ 《彼得堡委员会》，第 571-576 页。

苏维埃呼吁他们将媾和掌握在自己手中反应平平，加剧了这种担忧。这种越发严重的关切在 11 月 23 日彼得堡委员会与区鼓动员的会晤中得到了体现。会议邀请了卡尔·拉狄克就对外事务阐述他的看法。以国际主义著称的拉狄克作为党的杰出领导人，因为自己战时在中欧的经历而相信，德国和奥匈帝国的工人和士兵已经成熟到足以追随革命俄国的领导，并且整个欧洲确实处于决定性的革命动乱的边缘。11 月 23 日他向彼得堡委员会传递的信息是热烈呼吁反对一切“与资本家达成协议”。俄国如今为全世界群众指明了道路，他宣称并强调道，俄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命运是不可分割的。只有同时伴随着使外国工人革命化的激烈运动，并在党内发起反对妥协派的无情斗争，政府与德国人单独对话才是正确的。⁵⁷¹

大部分参加此次会议的地方领导完全同意拉狄克的结论，即与资本家的协议是不可接受的。但在他的论述中，拉狄克想当然地认为，相当一部分俄国前线士兵仍然能够打一场革命圣战。在之后的讨论中，德米特里·马努伊尔斯基（别兹拉博特内）⁵⁷²对这一想法提出了挑战。他明确宣称，“不可能继续为俄国而战了”。但他并不觉得，这是值得担心的事情，因为不利的和约所带来的后果会迅速被国际革命会所消除。马努伊尔斯基对动员俄国士兵和工人进行革命战争之可能性的悲观态度，遭到了许多人的反对，其中就包括另一位维堡区代表格里戈里·叶夫多基莫夫⁵⁷³和第 2 城区的帕维尔·帕霍莫夫⁵⁷⁴。叶夫多基莫夫觉得，在必须重启军事行动的情况下，遣散不可靠分子，并为剩下的部队提供更好的补给，能够提升军队的士气。他强调指出，重要的是坦率地提出可能爆发革命战争，从而使工人、士兵和水兵能为此做好准备。帕霍莫夫附和着这种看法，坚称：“如果革命战争不可避免，那群众将会理解。”另一方面，对于或许必须进行革命战争的想法，帕霍莫

⁵⁷¹ 《彼得堡委员会》，第 579-593 页。

⁵⁷² 德米特里·扎哈罗维奇·马努伊尔斯基 (Дмитрий Захарович Мануильский, 1883-1959)，化名“别兹拉博特内” (Безработный，意为“失业的”)，生于今乌克兰境内的东正教教士家庭。1903 年进入圣彼得堡大学学校，同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5 年在圣彼得堡从事鼓动工作，次年参与组织了喀琅施塔得和斯韦阿堡要塞的武装起义。被捕后越狱，并于 1910 年流亡法国。1912 年在圣彼得堡和莫斯科从事地下工作，次年再次流亡法国。二月革命后作为区联派成员返回俄国，后加入布尔什维克。十月革命时，担任彼得格勒军事委员会委员，年底开始在食品人民委员部工作。1918 年被派往乌克兰从事革命工作。1922 年起，长期在共产国际工作，1924 年当选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成员。卫国战争期间及其后，主要在乌克兰从事外交工作。1953 年退休。——译者注

⁵⁷³ 格里戈里·叶列梅耶维奇·叶夫多基莫夫 (Григорий Еремеевич Евдокимов, 1884-1936)，生于小市民家庭，15 岁时成为水手，1903 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此后因参加革命工作而数次被捕。1917 年成为布尔什维克彼得堡委员会的鼓动员，并参与了赤卫队的组建工作，后当选立宪会议代表。内战期间主要在彼得格勒从事军队政治鼓动和工会工作。1925 年当选联共 (布) 彼得格勒省委第一书记，此后积极参与了季诺维也夫的反对派活动。1926 年被选入联共 (布) 中央委员会，次年因托季反对派的失败而被开除出党。1928 年因承认错误而恢复党籍，此后主要从事农业和食品工作。1934 年被捕，1936 年被处以死刑。1988 年平反。——译者注

⁵⁷⁴ 帕维尔·列昂季耶维奇·帕霍莫夫 (Павел Леонтьевич Пахомов, 1890-1943)，生于农民家庭，1911 年加入布尔什维克。1914 年因在造船厂工人当中从事宣传工作而被捕，并流放西伯利亚。二月革命后返回彼得格勒，在第 2 城区从事鼓动工作，并积极参加了十月革命。1918 年起担任彼得格勒省苏维埃执委会主席，1920 年被派往西伯利亚工作。——译者注

夫在第 2 城区的同事莫伊塞·哈里托诺夫⁵⁷⁵含蓄地表示反对，指出他无法想象德国人会坚持不利的和平条件。尽管这次会议并未就和平问题做出正式决议，但讨论表明，彼得堡委员会的大多数人以及区级活动分子强烈反对单独媾和。⁵⁷⁶

* * *

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的正式和谈始于 12 月 9 日。⁵⁷⁷当天，俄国代表团团长阿道夫·越飞重申苏维埃政府坚决要求实现不割地不赔款的和平。他随后阐述了苏维埃政府所认为的和谈主要基本原则。其中包括，外国军队迅速撤出所有被占领土；恢复 1914 年以来许多国家丧失的独立地位；就所有被统治民族是否从其现今所在国独立而出进行完全自由的公投。它们还规定保护各地少数民族的权利，并排除任何形式的割地和赔款。

对于上述原则，代表同盟国的奥匈帝国外交大臣采尔宁伯爵⁵⁷⁸在 12 月 12 日的一次谈判会议上予以了回应。起初，他的说法令苏维埃方面欢欣鼓舞。他宣称，同盟国希望尽快达成公正全面的和约，并且越飞所说的、包括禁止割地和赔款在内的原则，为讨论这样的和平提供了基础。但采尔宁有两点至关重要的保留，尽管它们的实际意义似乎未得到越飞的理解：第一，接受苏维埃方面的原则，条件是所有交战国均不过分拖延地接受这些原则；并且第二，同盟国不能无条件接受所有被统治民族自决的原则。这些民族的未来必须由各国根据其自身宪法加以解决。

尽管对上述保留意见感到失望，但在采尔宁的回复当中，越飞和他的同事们觉得有积极友好的调子，并为此感到高兴。它不仅似乎能够使人民进一步施压，促使协约国加入和谈，而且还意味着无论协约国有何举动，同盟国都准备从前俄罗斯帝国的被占领土撤军。为了纠正苏维埃方面的这种理解，同盟国在两天后一份澄清被占领土地位的声明中，重申他们撤出俄罗斯领土的责任取决于协约国全面的对等行为。但是，他们出人意料地补充道，基于自决原则，被占领的波兰、立陶宛和拉脱维亚大部的各民族已经表示了从俄罗斯分离的意愿（这几乎意味着宣布他们有意将这些国家转变为保护国）。

革命和平原则得到了貌似积极的回应——越飞的这一消息已于 12 月 12 日电告斯莫尔尼，并按其字面意思而被理解为一种惊人的胜利。12 月 14 日《真理报》

⁵⁷⁵ 莫伊塞·马尔科维奇·哈里托诺夫（Моисей Маркович Харитонов，1887-1948），生于职员家庭，1905 年加入布尔什维克，次年被捕后流放。后从流放地逃脱，1912 年流亡瑞士，在苏黎世从事布尔什维克的党务工作。1917 年同列宁一道回国，担任布尔什维克彼尔姆省委书记。1918 年起在红军中从事政治工作。1921 年起，分别在乌拉尔和萨拉托夫担任地区党委领导。1927 年因参加左翼反对派而被开除党籍，次年声明退出反对派后恢复党籍，后从事外贸工作。1934 年被捕，并被判处有期徒刑。1948 年死于服刑期。1958 年平反。——译者注

⁵⁷⁶ 《彼得堡委员会》，第 581-587 页。

⁵⁷⁷ 对于这次和谈富有洞见的分析，见理查德·肯·迪博（Richard Kent Debo），《革命与生存：苏维埃俄国的对外政策，1917-1918 年》（Revolution and Survival: The Foreign Policy of Soviet Russia, 1917-1918），多伦多，1979 年，第 45-112 页。

⁵⁷⁸ 奥托卡尔·切尔宁（Ottokar Czernin，1872-1932），生于贵族家庭，1916 年起任奥匈帝国外交大臣。——译者注

头版头条宣布，德国人已接受俄方的原则作为和谈基础，并且已同意达成不割地不赔款的全面和平。这篇文章要求法国、意大利和英军士兵响应这些让步，起来反抗自己的政府。

在当日（12月14日）夜晚些时候的中执委会议上，苏维埃领袖们仍然兴高采烈。当托洛茨基起来报告谈判进程时，人们报以长时间的喝彩，而他也没有试图抑制这种兴奋情绪。他反而提出，布列斯特的发展给予革命外交以一次出色的证明。“德国已经完全接受了由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设定的和平条件，”他高声赞扬道。“即便敌人们……最近曾预言德国外交官甚至不会跟我们对话，还会向我们开战。他们如今反而看到德国的提议成了我们政策的巨大胜利。”惯常在讲台上斥责布尔什维克的伊萨克·施泰因贝格也大加赞赏起他们的革命促和活动。“这是我们外交的第一个巨大胜利，”他宣称。“我们手无寸铁地走入敌营，不是以平等的而是以优越的口气说话。帝国主义遭受了致命一击。”他提出动议，热烈支持人民委员会的和平努力。动议得到了一致通过。季诺维也夫不甘人后，提议周日（12月17日）在全国举行“和平大游行”，以纪念布列斯特的伟大胜利。他的决议也得到一致通过。⁵⁷⁹

斯莫尔尼宫可能是在16日夜才初步获悉采尔宁于12月14日做出的澄清，尤其是其中否定苏维埃代表团起初对同盟国谈判立场的乐观理解的内容。当时，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的对话已暂停，苏维埃代表团正在返回彼得格勒途中。代表团次日（12月17日）晨抵京后，径直来到斯莫尔尼宫，向人民委员会的晨会作报告。政府的大部分重要成员都在场。⁵⁸⁰对于代表团的陈述，人民委员会的相关会议记录记得并不清楚。但在12月19日的中执委扩大会议上的长篇讲话中，加米涅夫透露了代表团2天前与人民委员会会晤时不得不说的内容。⁵⁸¹同盟国初步愿意以越飞提出的原则为基础进行谈判，这一点仍被视为卓越的胜利，尽管这些原则的落实显然会是假心假意的。关于未来的经济关系，代表团或许传达了其这样的印象，即德国人觉得，它们不会由于单独的协定而获得任何特殊好处或特权。但是，在软化德方对于至关重要的被占俄国领土问题的立场——尤其是德国人显然有意操弄自决原则，以保持对波兰、立陶宛和拉脱维亚大部的控制——方面，代表团无能为力。正如加米涅夫在其报告中向中执委所解释的那样：“德国人把自决原则从民族解放的公式转变为吞并的假面。”⁵⁸²

在得悉代表团的报告后，人民委员会要求尽快发来德方条件的准确文本，并在同时继续讨论德国人的用意。⁵⁸³似乎可以想见，基于间接的证据，加米涅夫和托洛茨基怀疑德国人是否有能力强行实现其吞并意图（他们都觉得，任何这样做

⁵⁷⁹ 基普，《争论》，第213-217页；《第二届工人、士兵、农民和哥萨克代表苏维埃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记录》，第152-155页。

⁵⁸⁰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19号全宗，1号目录，28号案卷，第2张。

⁵⁸¹ 基普：《争论》，第223-239页。

⁵⁸² 基普：《争论》，第228页；《第二届工人、士兵、农民和哥萨克代表苏维埃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记录》，第164页。

⁵⁸³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19号全宗，1号目录，28号案卷，第2张。

的企图都会导致德皇被推翻）。两人似乎进一步地表达了这样乐观的愿景，即欧洲盟国不久会转向妥协，以及在其他努力失败后成功发动一场革命战争。

仍有一点不明的是，在和平进程的这一节点上，列宁是否也怀有类似的希望。但可以肯定的是，在同日（12月17日）晚些时候与当时在京参加复员问题大会的俄军前线部队、主要城市卫戍部队以及海军的代表进行的漫长会议上，他对革命战争的效力或许还抱有的一切期望遭受了严重打击。恰在同时，顿河流域的主要反革命威胁变得显著起来，以至要用火车将彼得格勒的赤卫队运往当地，与安东诺夫-奥弗申柯的部队并肩作战。⁵⁸⁴由于尚未开始组织一支社会主义的军队，因而对列宁来讲，前线“旧军队”的战斗力至关重要。他不断地向军事代表提出口头问话，并让他们填写了有关如下问题的问卷：德军发动新一轮攻势并进军彼得格勒的可能性和可能结果，以及俄方一旦打破和谈，前线俄军战斗力会如何。⁵⁸⁵

根据现存所有资料，列宁的调查结果是惊人的。大部分代表的回复是，如果战事重启，他们所能求得的最好结果是，俄军会有序撤退。但即便在这种最好的情况下，它也将损失炮兵部队，并在同时，复员会加速。大部分代表似乎觉得，如果德国人展开新一轮进攻，俄军部队将无法组织起认真地地方，也不能组织彼得格勒的迅速沦陷。因此，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要求，尽量把布列斯特的谈判往后拖，并且如果必要的话，不惜一切代价达成和约。⁵⁸⁶

这次调查的结果在当时鲜为人知。但及早以俄方条件达成和约的前景变得暗淡，这令中执委计划的和平游行的组织者们大为窘迫。他们已开始积极筹备12月15日的游行，并且次日更甚。单纯取消游行在政治上是尴尬的。因此，鉴于当时彼得格勒驻有德国高级代表团，决定将游行的主题从庆祝和平转为展示军事力量、人民对苏维埃政策的支持以及对革命的国内敌人的广泛敌视，以此给德国人留下深刻印象。于是在人民委员会听闻布列斯特代表团不祥地描述德方的领土野心时，约6000名彼得格勒卫戍部队的武装士兵、数百工厂代表和一些游行队列成群结队地穿过彼得格勒市中心，此后在战神广场列队经过站满苏维埃要人的检阅台。写有和平口号的横幅淹没于红旗和标语牌——其中的内容或是赞美苏维埃

⁵⁸⁴ 参见上文，第2章。

⁵⁸⁵ 米·克德罗夫（Михаил Сергеевич Кедров），《红色笔记本中关于伊里奇的片断》（Из красной тетради об Ильиче），载《回忆弗拉基米尔·伊利奇·列宁》（Воспоминания о Владимире Ильиче Ленине）第2卷，莫斯科，1957年，第97页；尼·伊·波德沃伊斯基，《从赤卫队到红军》（От красной гвардии к красной армии），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Историк-марксист），1938年第1期，第16-34页。列宁问卷的文本收于列宁，《全集》第35卷，第179-180页。（克德罗夫的中译文见《回忆列宁》第3卷，南京大学外语系俄罗斯语言文学教研室《回忆列宁》翻译组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60-161页。这里所说的问卷文本中译见《向为复员军队而召开的全军代表大会的代表提出的问题》，《列宁全集》第33卷，中央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82-183页。——译者注）

⁵⁸⁶ 参见迪博，《革命与生存》，第60页；以及叶·瑙·戈罗杰茨基，《1917-1918年的军队复员》（Демобилизация армии в 1917-1918 гг.），载《苏联历史》（История СССР），1958年第1期，第15-19页。

政府，或是谴责立宪会议、各色“人民公敌”、“怠工分子”、“阿夫克先季耶夫分子和切尔诺夫分子”以及“科尔尼洛夫的卡杰特”——的海洋中。⁵⁸⁷

鉴于列宁的调查所暗示的东西，无怪乎在 12 月 18/19 日深夜人民委员会的下一次会议上，与德方要求的意思相关的军队状况，成为主要的讨论话题。⁵⁸⁸会上，列宁询问当时的军队总司令克雷连科⁵⁸⁹，在他以及士兵委员会代表看来，德国人如果进攻，俄军士兵是否会作战。就像前一天被列宁询问的军事代表一样，克雷连科直言不讳地回答到，军队已丧失战斗力，且不能容忍推迟结束战争——简言之，除了接受德国人提出的所有条件之外，别无其他选择。⁵⁹⁰

会前，列宁已经看过了军事代表昨日对其问卷的书面答复。就其个人而言，这些答复是极为可悲的。他让与会者（包括波德沃伊斯基和帕维尔·德边科⁵⁹¹这样的战争人民委员部官员）传阅了这些答复。⁵⁹²虽然人民委员会 12 月 18/19 日会议的会议记录丝毫未有提及此后的讨论性质如何，但这一事实表明它是活跃的：参加讨论的有多名左翼社革党人（包括科列加耶夫、卡列林、施泰因贝格和特鲁托夫

⁵⁸⁷ 《晚报》(Вечерний час), 1917 年 12 月 18 日, 第 2 版。

⁵⁸⁸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 19 号全宗, 1 号目录, 29 号案卷, 第 2 张。

⁵⁸⁹ 尼古拉·瓦西里耶维奇·克雷连科 (Николай Васильевич Крыленко, 1885-1938), 生于前民粹派革命者家庭, 1903 年进入圣彼得堡大学学习。1904 年加入布尔什维克, 此后主要在工人当中从事鼓动工作。1907 年两次被捕后, 脱党。1911 年重新开始为布党从事宣传工作, 此后当选杜马代表。1912-1913 年在沙俄军中服役, 一战前夕流亡国外。1915 年返回莫斯科从事地下工作, 不久后被捕, 次年被送上战场。二月革命后, 在沙俄军队中从事宣传鼓动工作, 后参与了十月革命的准备工作。十月革命后, 担任陆海军人民委员和俄军总司令。1918 年起, 开始从事司法工作, 历任苏俄总检察长和司法人民委员。大清洗期间被枪决。1955 年平反。——译者注

⁵⁹⁰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 19 号全宗, 29 号案卷, 第 2 张; 5 号全宗, 1 号目录, 2424 号案卷, 第 19 张; 马·尼·西蒙尼扬 (Марина Николаевна Симонян), 《他的职业是革命: 以文献为基础的尼·瓦·克雷连科生平与著作概述》(Его профессия революция: Документальный очерк о жизни и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Н.В. Крыленко), 莫斯科, 1985 年, 第 93-94 页。在一封 1920 年代写给十月革命史与俄共(布)党史委员会的信中, 克雷连科指出, 军事代表会议过后, 他向列宁提交了一份书面报告。他在报告中强调, 依靠旧军队进行战斗是完全无望的。因为在旧军队看来, 休战和开始和谈即表明战争结束了 (十月革命史与俄共(布)党史委员会, 《全联盟共产党[布]代表大会与代表会议会议记录: 第七次代表大会, 1918 年 3 月》[Протоколы съездов и конференций Всесоюзной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 (б): Седьмой съезд, Март 1918 года], 莫斯科-列宁格勒, 1928 年, 第 261-262 页, 注释 48)。16 (十月革命史与俄共(布)党史委员会[Комиссия по истории Октябрь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 и РКП(б)], 简称 Истпарт, 拉丁化 Istpart], 是负责搜集和出版十月革命史和俄共[布]党史资料的研究机构, 成立于 1921 年, 前身为 1920 年建立的苏俄国家出版社党史委员会。该委员会起初隶属于苏俄教育人民委员部, 后转归俄共[部]中央委员会管辖。1928 年转为列宁研究院下辖, 1939 年解散。——译者注)

⁵⁹¹ 帕维尔·叶菲莫维奇·德边科 (Павел Ефимович Дыбенко, 1889-1938), 柯伦泰的第二任丈夫, 生于农民家庭, 1907 年参加布尔什维克的活动。1908 年起在里加当工人, 1911 年开始在波罗的海舰队服役, 此后在水兵中从事地下革命工作。1916 年因从事反战宣传活动而被捕, 获释后继续从事地下革命工作。二月革命后, 成为波罗的海舰队中央委员会主席, 后参加了十月革命。1917 年 11 月当选立宪会议代表, 并直接参与解散了立宪会议。此后, 主要从事军事工作。大清洗期间被枪决, 1956 年平反。——译者注

⁵⁹² 列宁, 《全集》, 第 35 卷, 第 472 页; 亚·丘巴良 (Александр Оганович Чубарьян), 《布列斯特和约》(Брестский мир), 莫斯科, 1964 年, 第 106 页。(《全集》中译见《列宁全集》第 33 卷, 中央编译局编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5 年, 第 486 页。——译者注)

斯基⁵⁹³) 以及像柯伦泰、卢那察尔斯基、瓦列里·奥辛斯基(瓦·瓦·奥博连斯基)⁵⁹⁴和乌里茨基那样未来的左翼共产主义者。最终决定，列宁问卷的结果“明确了”目前军队的状态。但也通过列宁提出的决议：进一步展开针对德国扩张主义的宣传鼓动并为此追加经费，和谈地点移至斯德哥尔摩，拖延对话并反对德方终结对话的企图，加强增加军队战斗力的措施，采取措施防范德军向彼得格勒突破，以及在国内宣传革命战争的必要性。⁵⁹⁵

* * *

当时，虽然普遍认为旧军队完全丧失了士气，但人民委员会还是在为可能的重新开战做准备。在此节点上，克雷连科命令他的指挥官们，为可能重启的战事做准备。与此同时，他呼吁志愿者参加一支社会主义新军队。⁵⁹⁶但布尔什维克的彼得堡委员会绝不是这样看待人民委员会的军事政策的。彼得堡委员会极为警惕政府的失败主义。在此节点上重要的是，12月19和21日的委员会会议上，最主要的议题是拉狄克有关“西欧与和谈”以及“国际形势”的报告。⁵⁹⁷鉴于11月23日拉狄克向彼得堡委员会做的报告以及此后他的讲话和著述，几乎毫无疑问的是，在这次报告中，他会强烈要求在布列斯特的谈判中保持强硬，并且如有必要，抵抗德军的一切军事威胁。此时，拉狄克一门心思地劝阻苏维埃政府，不要采取任何可能有损中欧和西欧革命运动的措施。同样显而易见的是，彼得堡委员会的执行委员会以及整个委员会的多数派与拉狄克一样，坚决反对与帝国主义分子做任何交易。

在12月21日会议之后，执行委员会起草了一份和谈纲领，以备12月28日下一次彼得堡委员会例会的通过。尽管纲领文本目前下落不明，但其主旨和要点可见于那次会上雅科夫·费尼格施泰因(在介绍纲领时)代表执委会发表的讲话以及随后的讨论。在讲话开头，费尼格施泰因解释道，执行委员会决定将俄国的和平策

⁵⁹³ 弗拉基米尔·叶夫根耶维奇·特鲁托夫斯基(Владимир Евгеньевич Трутовский, 1889-1937)，生于贵族家庭，1907年加入社会革命党，此后主要从事报刊文宣工作。1917年成为左翼社革党中央委员，并当选全俄农民代表苏维埃执委会委员和立宪会议代表。1918年任地方自治人民委员，并参加了左翼社革党暴动。暴动失败后转入地下，1920年被捕后旋即释放，但次年再次被捕。1926年被流放至阿拉木图，并在当地从事经济工作。大清洗期间再次被捕，并被处以枪决。

——译者注

⁵⁹⁴ 瓦列里安·瓦列里安诺维奇·奥博连斯基(Валериан Валерианович Оболенский, 1887-1938)，名字亦作“瓦列里”(Валерий)，化名“尼古拉·奥辛斯基”(Николай Осинский)，生于激进民主主义者家庭。在莫斯科大学学习时，参加了1905年革命。1907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后成为召回派。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被征召入伍。二月革命后，在莫斯科活动。十月革命后，担任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并成为左翼共产主义者。1920年代主要从事经济工作，并参加了当时的党内左翼反对派。1930年代主要从事学术工作。大清洗期间被处以枪决。1957年平反。——译者注

⁵⁹⁵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19号全宗，1号目录，29号案卷，第28张；列宁，《全集》，第35卷，第181页。(《人民委员会关于同德国和谈等问题的决议草案》，《列宁全集》第33卷，中央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84页)。——译者注

⁵⁹⁶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5号全宗，1号目录，2423号案卷，第19张背面。

⁵⁹⁷ 《彼得堡委员会》，第607、608页。

略问题付诸投票，因为它坚信，这样至关重要的问题不应单由政府自行决策，广大群众通过其革命领导机构所进行的监督将会提供必要的指导。

在讲话的其余部分，费尼格施泰因不断攻击现行的和谈方式，并热烈呼吁追求革命目标。德军士兵，他说道，并没有战斗的意愿。另一方面，俄国武装力量坚决捍卫革命。在这种情况下，苏维埃政府应该怎么办？对于费尼格施泰因以及（进而言之）他在执委会的同事们来讲，答案是显而易见的。无论如何，绝没有理由在革命原则上做出妥协。“在我们公式[不割地不赔款的普遍和平]上的每一次退让，都将损害工人和农民，”他坚称。“我们只想为这种和平而战。”“如果我们无法在和谈中实现[我们的]目标，那我们该怎么办？”他反问道。“我们应该中止谈判。”由此，德国帝国主义者的吞并企图将暴露于全世界人民面前。“由这种政策造成的战争将不同于之前的一切战争，”费尼格施泰因继续说道。“政治上觉悟的工农兵群众将明白，别无其他选择。”“向群众灌输和谈的开启保证了和平的希望，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巨大的错误，”他补充道。“我们现在必须发起一场广泛的运动，说服群众不能接受德国的和平条件，并表明可能[进行]反德革命战争。”⁵⁹⁸

接着，费尼格施泰因向执行委员会提交了纲领。从对这份纲领的活跃讨论来看，它的主旨在于提醒中央委员会，彼得堡委员会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让步。讨论中最引人注目的或许是，所有代表都像执行委员会那样，担忧与德皇代表的勾连。一些来自各区的发言者对于俄国资兵和工人有意打一场革命战争，其乐观程度不亚于费尼格施泰因。但大多数人主要还是寄希望于欧洲无产阶级（如萨拉·拉维奇⁵⁹⁹和费多尔·丁格尔施泰特⁶⁰⁰）的及时援助，或者至少布列斯特和谈能够拖得足够晚，以为革命战争提供有利条件（如谢苗·谢姆科夫⁶⁰¹和莫伊塞·戈列利克⁶⁰²）。

实际上，所有人全都要么直接要么间接地反对与同盟国的妥协。维堡区的伊万·瑙莫夫⁶⁰³最担忧这样的危险，即俄国的前盟友或许会试图将自己与反对德国帝

⁵⁹⁸ 《彼得堡委员会》，第 609-611、621-622 页。

⁵⁹⁹ 萨拉·瑙莫夫娜·拉维奇（Сарра Наумовна Равич，1879-1957），生于小店主家庭，1903 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6 年离开俄国，后成为季诺维也夫的第一任妻子。二月革命后，与列宁一同乘车返回俄国，并成为布尔什维克彼得堡委员会委员。次年成为左翼共产主义者。1920 年代参加了党内反对派活动，并因此而被开除出党，1928 年又恢复党籍。大清洗期间及其后，数次被捕，1954 年被释放。——译者注

⁶⁰⁰ 费多尔·尼古拉耶维奇·丁格尔施泰特（Федор Николаевич Дингельштедт，1890-1938），生于作家家庭，1910 年加入布尔什维克。二月革命后，在喀琅施塔得从事宣传鼓动工作。十月革命后，从事学术教育工作。1920 年代参加了左翼反对派活动，后因此被捕、流放。大清洗期间，被处以枪决。——译者注

⁶⁰¹ 谢苗·莫伊谢耶维奇·谢姆科夫（Семён Моисеевич Семков，1885-1928），1902 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9 年流亡国外，次年返回俄国领导，1913 年被捕后逃亡国外。1917 年 11 月返回俄国。后主要从事工会工作。——译者注

⁶⁰² 莫伊塞·萨穆依洛维奇·戈列利克（Моисей Самуилович Горелик，1891-1920），化名“维克托”（Виктор），曾为沙俄军队士兵。二月革命后任彼得霍夫区苏维埃副主席和邮电委员、布尔什维克彼得堡委员会纳尔瓦区代表。在克里米亚从事地下工作时被白卫军杀害。——译者注

⁶⁰³ 伊万·库普里亚诺维奇·瑙莫夫-戈列洛夫（Иван Куприянович Наумов-Горелов，1895-1938），生于农民家庭，后在莫斯科当工人。1913 年加入布尔什维克，1915 年参与创建了布党在图拉的

国主义的革命战争联系起来。一些人已经开始关心，在反帝战争中接受资本主义列强的援助是否恰当，而瑙莫夫觉得，这个问题原理当由费尼格施泰因来回答。大家也似乎都同意，彼得堡委员会有必要直接干预，以使政府和党的领袖挺直脊梁。正如来自纳尔瓦区的斯坦尼斯拉夫·科肖尔⁶⁰⁴所言：“我们有足够的理由相信，党的上层在动摇。”局势呼唤着勇敢：“我们应该攻击帝国主义分子，而不是跟他们讨价还价。”“一些同志[如列宁]说，守住一些东西是好过战败，”科肖尔补充道，“我相信，就是战败也比妥协好。”⁶⁰⁵

沃洛达尔斯基，这位彼得堡委员会在普通党员中最权威和最有人气的人物，或许最热烈地请求传统上激进的彼得堡委员会坚决维护革命原则。他有着费尼格施泰因和科肖尔那样的看法：觉得似乎随着新一轮和谈即将展开，上层显然正在发生一些没有被告诉彼得堡委员会的事；政府当中存在的极度危险的、接受下流的和平的倾向，会使全世界和平运动对布尔什维克感到愤慨；并且彼得堡委员会有必要像在 1917 年关键时刻所做的那样，加以干涉，以挽回局面。

这一次，沃洛达尔斯基出乎意料地对抵抗德国人以及在国外激起决定性的革命乐观起来了。与此同时，他抱持着宿命论，看到人们将经济混乱以及不可能供养 1100 万人的军队作为不惜一切代价接受和平的理由。他对此回应称，供养两三百万士兵跟供养 1100 万士兵不是一回事。布尔什维克已经摧毁了现行经济机构，而如果他们无法重新建立起一套经济机构，那么无论战争与否，他们都完蛋了。“进行妥协和指望两周内签署和约当然更容易得多，”他最后说道，但“这会把我们引向何方？”⁶⁰⁶

接下来发言的拉维奇驳斥了她认为沃洛达尔斯基的评论中所包含的这种看法，既进行一场革命战争是容易的。但她随即补充道：“这不应当使我们停顿下来。”在她看来，革命俄国的生存希望与其说在于自己的力量，还不如说在于世界无产阶级。主要的任务是尽可能地引发国际革命。在她看来，执委会的纲领对于正在布列斯特谈判的和谈代表团是有帮助的。在 12 月 28 日会议的最后，彼得堡委员会通过了纲领。稍加编辑后，纲领被转交中央委员会。与此同时，彼得堡委员会考虑召集全国党大会“以明确党的政策路线”。但沃洛达尔斯基透露称，讨论目下争

地方组织，后进入彼得堡的工厂从事工运活动。二月革命后，当选彼得格勒苏维埃代表，并任布尔什维克彼得堡委员会执委会委员和维堡区代表。积极参加了十月革命的组织工作。后曾从事军队政治工作，担任党、苏维埃和工厂的领导职务。1934 年被捕，大清洗期间被枪决。1963 年平反。——译者注

⁶⁰⁴ 斯坦尼斯拉夫·维肯季耶维奇·科肖尔（Станислав Викентьевич Косир，1889-1939），生于波兰工人家庭。1907 年在乌克兰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并在工厂从事革命活动。二月革命后，迁徙至彼得格勒，并在纳尔瓦区从事党务工作，后任彼得格勒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谈判期间，为左翼共产主义者。1918 年起，主要在乌克兰从事组织和领导工作。1930 年当选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1934 年就任乌克兰共产党（布）第一书记/总书记。1938 年成为苏联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大清洗期间被处以死刑，1956 年平反。——译者注

⁶⁰⁵ 《彼得堡委员会》，第 611-618 页。

⁶⁰⁶ 《彼得堡委员会》，第 615-616 页。

议问题的全国党代会已开始筹备，于是呼吁召开全国党大会的决定被推迟了。⁶⁰⁷

* * *

12月24-27日，俄国史上最重要年份之一过去之时，列宁在芬兰休息。⁶⁰⁸他于立宪会议开幕一周前的12月28日返回彼得格勒，并坚信：革命战争意味着自杀，接受一份合乎德方条件的割地合约是绝对至关重要的。历史学家们曾探讨过列宁在和平问题上的思想演变。一些历史学家认为，不仅列宁在1917年春季和夏季接受了德国人的条件，而且十月以及甚或布列斯特的出卖都不过布尔什维克和德国人共同搞乱俄国并结束东线战事的做法的一部分。⁶⁰⁹且不论十月革命前德方金援布尔什维克的问题，通过阅读现存证据，我得出的结论是，列宁在走向政权时就相信，革命俄国要生存下去，就必须立即实现和平，但这种关切并没有令他多么烦心，因为对于国外即将发生决定性的社会主义革命，他抱有绝对的信心。可是到12月，对于能否寄希望于这些革命，和是否可能在短期内尽早实现普遍和平，他开始有所怀疑。在逗留芬兰之后，他做出了特有的180度转变，得出结论说，无论德国人提出怎样的和平条件，都只能接受。列宁担任苏维埃国家首脑期间最深刻的党内危机蓄势待发。

此时，同盟国已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正式宣告，他们此前对于和平原则的谅解是无效的，因为协约国未能对此作出回应。此外，他们还向托洛茨基提交了一份有待签署的协议文本。实际上，他们甚至向他提交了一份地图，上面明确标出了那些将继续为德方占领的前俄国领土。此外，同盟国还私下与乌克兰拉达单独展开了和谈。在经数日而未能使对手作出让步后，托洛茨基电告列宁，不可能签署呈交给他的和约，并要求授权在未签署和约的情况下宣告战争中止、俄军复员。在电报中，托洛茨基信心满满地宣称，由于其国内局势困难，德国人无法重启战事，并请求列宁在回电当中作出决断。⁶¹⁰但在列宁看来，托洛茨基的设想是错误的。他判断，唯有立刻签署一份德方可以接受的正式和约，才能避免新一轮的德军攻势以及对布尔什维克的俄国事业的不可避免的破坏。1月3日，他回复托洛茨基，要求后者暂停谈判，并返回彼得格勒会商。⁶¹¹

⁶⁰⁷ 《彼得堡委员会》，第619页。

⁶⁰⁸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年谱》，第5卷，第156-157页。25（《列宁年谱》目前仅第1-4卷有中译本。——译者注）

⁶⁰⁹ 参见如德米特里·沃尔科戈诺夫（Дмитрий Антонович Волковонов），《列宁：一部新传记》（Lenin: A New Biography），纽约，1994年，第109-128页；理查德·派普斯（Richard Pipes），《俄国革命的三个“为什么”》，纽约，1995年，第45-46页；理查德·派普斯，《俄国革命》（The Russian Revolution），纽约，1994年，第410-412、431-438和612-624页；以及理查德·派普斯编，《不为人知的列宁：来自秘密档案》（The Unknown Lenin: From the Secret Archive），纽黑文，1996年，第6、15-16页。

⁶¹⁰ 列·托洛茨基，《著作集》（Сочинения），第17卷，第1册，莫斯科-列宁格勒，1926年，第631页注释38。

⁶¹¹ 列宁，《全集》，第35卷，第225页。（《同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的苏维埃和谈代表团团长列·达·托洛茨基在直达电报中的谈话》，《列宁全集》第33卷，中央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32页。——译者注）

立宪会议的燃眉之急一俟结束，列宁便在《关于立刻缔结单独的兼并性和约问题的提纲》中概述了自己关于绝对需要立即缔结和约的看法，并安排 68 名来京参加全俄工兵农代表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党的重要领导人于 1 月 8 日召开一次非正式会议。列宁在提纲中提出，打败苏维埃政府的国内敌人、在社会主义基础上组织国家尚需时日，而社会主义革命虽然将不可避免地席卷欧洲，但其何时发生则无法预料。这是从十月及其后的立场上的重要退却。他因而提出，俄国有两种选择——要么立即展开一场革命战争，要么单独签署一份损失大量领土和赔款的和约。

支持立即进行革命战争的说法自始至终都是错误的，列宁接着说道。与他们的观点相反，只要利用和约所提供的时间来为革命战争做准备，苏维埃政府通过单独媾和，就既没有背叛国际社会主义事业，也没有违背十月前的诺言。最重要的是，正如列宁在提纲中所论述的那样，革命战争的拥护者们未能考虑到，前线的农民军队完全没有战斗力，并且无论如何都不会支持一场革命战争。同时，一支由工人和贫农组成的社会主义军队的组建工作才刚刚开始。没有欧洲的社会主义革命，俄国就会被击溃，苏维埃政府就会在几周内垮台，之后俄国将被迫接受一份甚至比如今更具有羞辱性的和约。革命战争不是一种选项；立即按照德方条件媾和虽然痛苦，却符合国际革命的利益。⁶¹²

提交了自己的提纲后，列宁遭到了革命战争支持者们——他们已被称为“左翼共产主义者”——的批判。在匆匆写成的说明中，他指出，莫斯科区域局的洛莫夫和瓦列里·奥辛斯基采取了与 12 月 28 日彼得堡委员会提纲相似的观点。⁶¹³在说明为何应结束和谈并展开革命战争时，奥辛斯基坚称，德国士兵会拒绝进攻俄国，并且德国即将发生一场反帝起义。来自萨拉托夫的瓦尔瓦拉·雅科夫列娃⁶¹⁴提出，要尽一切可能点燃欧洲的革命烈火，并且她已准备带着高扬的革命旗帜而为此牺牲。显然是在针对列宁担心俄国在军事上的虚弱，来自乌拉尔的叶夫根

⁶¹²列宁，《全集》，第 35 卷，第 243-252 页。（《谈谈不幸的和约问题的历史》，《列宁全集》第 33 卷，中央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年，第 247-255 页。——译者注）

⁶¹³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列宁文集》（Ленинский сборник），第 11 卷，莫斯科，1929 年，第 43-44 页；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俄共（布）第七次特别代表大会，1918 年 3 月：速记记录》（Седьмой экстренный съезд РКП(б), март 1918 года: Стенографический отчёт），莫斯科，1962 年，第 216-218 页。（《〈关于立刻缔结单独的兼并性和约问题的提纲〉的补充说明》，《列宁全集》第 33 卷，中央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年，第 256 页。——译者注）

⁶¹⁴瓦尔瓦拉·尼古拉耶夫娜·雅科夫列娃（Варвара Николаевна Яковлева，1885-1941），出生于信仰东正教的犹太商人家庭。1904 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在莫斯科从事鼓动和组织工作，次年参加莫斯科的武装起义。后多次被捕、流放，二月革命后在布尔什维克的莫斯科区域局从事党务工作，并参与组织了十月革命期间莫斯科的武装起义。契卡成立后，在该组织中担任领导职务。1918 年初，为左翼共产主义者。次年就任苏俄粮食人民委员。在 1920 年代的布尔什维克党内斗争中，参加领导了左翼反对派，但 1926 年宣布退出反对派。1930 年起，先后就任苏俄教育副人民委员和财政人民委员。大清洗期间被捕并被判处有期徒刑。1941 年被枪决，1958 年平反。——译者注

尼·普列奥布拉任斯基⁶¹⁵宣称，无法在前线保卫自己的革命就已经死亡了，法国大革命表明，在这种形势下必胜的信心是关键，并且无论如何，德国人是没有能力进攻的，因为俄国的冬季会使道路无法通行。⁶¹⁶

在这次大会上，托洛茨基持中间立场。这在他从布列斯特寄给列宁的信中得到了体现。他同意列宁的看法，即俄国不可能进行一场革命战争。但是，他和左翼共产主义者一样，怀疑德国人重启攻势的能力。因此他建议，干脆宣布结束战争，[俄国]军队复员并返乡建设社会主义俄国。在回忆录中，托洛茨基解释道，他并不确定德国人没有进攻的能力，但在（如有必要）签订一份割地和约前进行欺骗，是至关重要的；如有必要，在那之后也还来得及协商投降。⁶¹⁷一位与会者回忆称，对自己观点的无情攻击使列宁那样地沮丧，以至怒气冲冲地离开了会场。⁶¹⁸大会最后进行了投票，左翼共产主义者牢牢地战胜了列宁和托洛茨基（32名与会者投票支持革命战争，16人支持托洛茨基，仅有15人投票支持列宁）。⁶¹⁹

彼得堡委员会（更不要说莫斯科区域局）的成员无疑对这一投票结果感到欢欣鼓舞。但它不具有约束力。根据党的规则，正式全国党代会休会期间，决定全国性重要政策的最高权威是中央委员会。因此，在中央委员会1月11日的会议上，列宁发起另一次攻击，来赢得党的领导权。在这次会议之前，据托洛茨基说，他和列宁达成了谅解，如果尝试“不战不和”策略并归于失败，那么托洛茨基将支持“立即缔结和约”。⁶²⁰1月11日中央委员会会议的大部分与会者参加了1月8日的非正式会议。因此，列宁能够继续自己未尽的事情。讨论开始时，他重申了自己纲领——它认为革命战争是无望的——的根据以及托洛茨基的提议，并最后总结称，后者是国际政治姿态，并不能阻止德国的扩张主义。如果苏维埃共和国不按照德方条件同意立即缔结和约，他补充道，就有德方发动攻势的危险，并且在

⁶¹⁵叶夫根尼·阿列克谢耶维奇·普列奥布拉任斯基（Евгений Алексеевич Преображенский，1886-1937），生于教士家庭，1904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后成为布尔什维克，并参加了1905年革命的武装起义。1906年被捕，次年出狱后被派往乌拉尔从事党务工作。二月革命后，当选赤塔工兵代表苏维埃副主席，并作为代表参加了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十月革命后，主要在乌拉尔地区从事党务和苏维埃政权的组织工作。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谈判期间，为左翼共产主义者。1919年与布哈林合著了《共产主义ABC》。1920年代初，主要从事财政、教育和农业工作。1923年起，成为托洛茨基反对派的主要理论家，期间著有《新经济学》一书，提出了以工农剪刀差为基础实现快速工业化的“社会主义原始积累”理论。苏联工业化开始后，于1929年宣布与托派脱离关系。此后主要从事经济工作。1933年被捕，大清洗期间被处决。——译者注

⁶¹⁶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俄共（布）第七次特别代表大会，1918年3月：速记记录》，莫斯科，1962年，第216-218页。

⁶¹⁷列·托洛茨基，《我的生平》，纽约，1970年，第382-383页。32（《托洛茨基：我的生平》，赵泓、田娟玉译，郑异凡校，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334-335页。——译者注）

⁶¹⁸克德罗夫，《红色笔记本中关于伊里奇的片断》，第10页。33（《回忆列宁》第3卷，南京大学外语系俄罗斯语言文学教研室《回忆列宁》翻译组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61页。——译者注）

⁶¹⁹《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会议记录》，第168页。另参加尼·尼·斯米尔诺夫，《全俄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列宁格勒，1988年，第98页。

⁶²⁰就此参见迪博，《革命与生存》，第79页。

那种情况下，俄国会不得不接受更为苛刻的和平条件。⁶²¹

令列宁气馁的是，与 3 天前全国各地党代表召开的扩大会议相比，中央委员会对他的论述的反应并没有更为积极。在与会的 16 名中央委员中，仅有 3 人——阿尔乔姆（费奥多尔·谢尔盖耶夫）⁶²²，索科利尼科夫和斯大林——站在列宁一边。此外，相较于左翼共产主义者的热情，他们的评论仿佛例行公事。但这并不意味着 1 月 8-11 日之间，列宁敌手的看法没有发生变化。在 1 月 8 日，获得绝对多数票的是这种观点：立即停止与德国人和谈，宣布展开反资本主义的普遍革命战争。在 3 天后的中央委员会会议上，即便最热忱的左翼共产主义者也似乎在托洛茨基的主意——在宣布“不战不和”后离开谈判桌，以便尽可能拖延谈判；努力壮大国外革命运动，并加强国内军事力量——里面看到了可取之处。

在 1 月 11 日的讨论中，左翼共产主义者公认的领袖布哈林直截了当地宣称“托洛茨基的立场是最正确的”，并补充道：“德国人打击我们又如何，他们前进了一百俄里又如何——我们关心的是，这对国际[工人]运动的影响。”维也纳正在发生与布列斯特谈判有关的总罢工，而签订和约会对其造成严重的破坏。关键是要抓住一切机会拖延谈判，并且不签订一份下流的和约。这样便会将西欧的群众会鼓动起来。⁶²³尽管承认革命俄国尚未准备好立即进行革命战争，但同样也是热忱的左翼共产主义者的乌里茨基补充称，接受一份割地和约将疏远彼得格勒无产阶级。“通过拒绝签署和约[并]复员军队……我们自然是在给德国人开道，”他观察到，“可那时，必定会在人民当中激起自我保存的本能，革命战争将开始。”⁶²⁴

洛莫夫反对列宁的论点，认为喘息之机并不能实现社会改革，并坚称德国的反对会阻止它的发生。他宣称，缔结和约将使革命俄国向德国帝国主义投降，并提出：“我们不得不接受托洛茨基的立场，但同时要尽全力为革命战争做准备。”捷尔任斯基毫不含糊地插嘴道，签署和约意味着放弃整个布尔什维克纲领，并指责列宁是在“带着假面做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在十月做的事情”，即仅仅考虑俄国，而忽视俄国各种事件的伟大国际影响。只有作为彼得堡委员会代表参会的科肖尔似乎仍然坚持左翼共产主义者的初衷——要求立即展开革命战争。他以 12 月 28 日彼得堡委员会纲领为指导，宣称：“彼得堡组织正在并将继续尽可能长地抗议列宁的看法，并认为革命战争的立场是唯一可能的立场。”⁶²⁵科肖尔或许并没有意

⁶²¹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会议记录》，第 168-169 页。

⁶²² 费奥多尔·安德烈耶维奇·谢尔盖耶夫（Фёдор Андреевич Сергеев，1883-1921），化名“阿尔乔姆”（Артём），生于农民家庭。1901 年加入社会民主工党，次年因参加学运而流亡巴黎。1903 年返回俄国，相继在顿巴斯和哈尔科夫从事农民和工人的组织工作。1905 年革命期间，在哈尔科夫领导了武装起义。起义失败后，在乌拉尔地区从事党务工作，1910 年流亡国外。二月革命后返回俄国，主要在乌克兰领导革命工作，并当选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1920 年在螺旋桨驱动火车测试事故中身亡。——译者注

⁶²³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会议记录》，第 169-170 页。

⁶²⁴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会议记录》，第 170 页。

⁶²⁵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会议记录》，第 172 页。列宁对该次会议的评注收于《弗·伊·列宁：不为人知的文献，1891-1922》（В. И. Ленин. Неизвестные документы, 1891-1922），莫斯科，1999 年，第 223-224 页。

识到，此话并不全然为真。彼得格勒的一些区党委已更为接近托洛茨基而非彼得堡委员会的看法。⁶²⁶

到 1 月 11 日中央委员会讨论结束时，列宁立场所获支持之微弱已是那样明显，以至它甚至未能付诸表决。以 11 票反对、2 票支持和 1 票弃权，否决了立即展开革命战争。反之，以 9 票支持和 7 票反对，党的最高领导层采用了托洛茨基“不战不和”的公式，并且复员[旧]军队。同时，以 12 票支持和 1 票反对，采纳了列宁提出的、重在尽可能拖延和谈的决议。⁶²⁷据报纸报道，当日夜，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的左翼社革党团局和左翼社革党中央委员会表决通过，如未达成令人满意的和约，便采取一切可能之手段继续战争。⁶²⁸但这一立场迅速发生了变化。1 月 12 或 13 日夜，在布尔什维克和左翼社革党中央委员会的联席会议上，大部分与会者对立即按德方条件接受和约不予理会，拒绝宣布革命战争，并且投票支持采取托洛茨基的策略。如今，这一决议是各方乐见的。在列宁看来，它意味着如果不能在布列斯特进一步拖延下去，那么将签署和约；左翼共产主义者和左翼社革党则认为，已经允许他们为革命战争做准备；而托洛茨基的结论则是，他现在被授权宣布“不战不和”。他还设想，万一德国重启战事，按德方条件签署和约将被拖延下去，直至德国表明有能力进行一次成功的进攻，以及欧洲工人的反应变得明确起来。

* * *

1 月 11 日夜，列宁向全俄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报告了其政府的目标和成就。在这份报告中，他回避了和谈相关问题，而将其留给了托洛茨基。⁶²⁹因此在 13 日发言时，托洛茨基重点重述了布列斯特的谈判。据他说，通过明确暴露德国的帝国主义企图，他们将奥地利和德国的革命危机提升到了新的高度。⁶³⁰加米涅夫在有关布列斯特的进展及其国际影响的补充发言中，重复了这一说法。⁶³¹根据已出版的记录，无论托洛茨基还是加米涅夫的讲话，抑或大会有关和谈的决议，都没有甚至提及“不战不和”的策略，以及可能有必要发动一场革命战争。大会于 1 月 14 日通过了布尔什维克和左翼社革党有关和约政策的联合决议，后者支持并且赞赏苏维埃政权为实现普遍的、民主的和平而做出的一切声明和采取的一切措施。决议明确表示，中欧的革命工人运动是达成反帝和约的最大保障，并指示俄国和谈代表坚持俄国革命纲领所体现的和平原则。⁶³²人们可以得出结论说，未能如布尔

⁶²⁶ 例如，在奥赫塔区的布尔什维克当中就发生了这样的转变（中央国家历史-政治文献档案馆，10 号全宗，1 号目录，1 号案卷，第 1-2 张）。

⁶²⁷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会议记录》，第 173 页。

⁶²⁸ 《彼得格勒回声报》，1918 年 1 月 12 日，第 2 版；《我们的消息报》（Наша ведомость），1918 年 1 月 13 日，第 2 版。

⁶²⁹ 《全俄工农代表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第 21-34 页。

⁶³⁰ 《全俄工农代表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第 48-55 页；托洛茨基，《著作集》，第 17 卷，第 1 册，第 53-69 页。

⁶³¹ 《全俄工农代表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第 56-58 页。

⁶³² 《全俄工农代表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第 71、92-93 页。

什维克和左翼社革党中央委员会建议的那样，为托洛茨基的“不战不和”公式背书，是姗姗来迟地承认，在布列斯特进一步公开俄国的谈判立场会破坏这一策略。但造成这种沉默的原因更为复杂。当时一些左翼共产主义者（包括彼得堡委员会的领导层）⁶³³认为，列宁派占多数的布尔什维克党团有意使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含糊其辞，以便将是否签署割地和约，留给列宁和人民委员会自行做出最终决断。正如我们会看到的，列宁和斯维尔德洛夫接下去正是这样解读决议的。⁶³⁴

在他的讲话中，或许是出于对列宁的尊重，托洛茨基暗示道，布列斯特的工人代表会继续揭露德国人的假心假意，同时不能排除这样的可能，即俄国代表将被迫与资本主义代表签署一份明显背离工人利益的和约。⁶³⁵在后来的一次大会讲话中，季诺维也夫也提高了俄国人或许被迫签署一份割地和约的可能性，但他立刻补充称，这份和约实际上只会是一份休战协定。⁶³⁶尽管这些对俄国可能接受一份割地和约的暗示无疑增加了左翼共产主义者和左翼社革党的担忧，但它们却并不被局外人所了解。因此，尽管厌恶布尔什维主义（毕竟解散立宪会议仅一周有余），但即便马尔托夫在听了托洛茨基的讲话后，都称赞起“世界国际革命的培育者”为实现普遍和平而采取的“惊人的措施”。⁶³⁷

马尔托夫如此评论，或许是对欧洲革命骚动短暂加剧的反映，而后者似乎与俄国的和谈政策相关。正当彼得格勒的苏维埃代表大会代表试图确定革命和谈政策之际，有那么短暂的一段时间，维也纳、布达佩斯特、华沙、赫尔辛克斯、柏林和其他欧洲主要城市传来的最新消息似乎表明，人们焦急等待着的、决定性的西方社会主义革命可能即将到来。对于国外各种革命骚动迹象的新闻，其中的只言片语都得到了彼得格勒的布尔什维克媒体狂热的追捧，并向欣喜的代表大会代表加以宣布。

彼得格勒人在 1 月 13 日阅读布尔什维克的《红色公报》⁶³⁸时，遇到了下面巨大的加粗标题：

在奥地利、匈牙利和华沙，革命工人正在组建他们自己的工人代表苏维埃……一团巨大的火焰包裹着全世界！⁶³⁹

而在 1 月 17 日：

⁶³³ 参见《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会议记录》第 180-183 页的执行委员会声明。

⁶³⁴ 参见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1235 号全宗，18 号目录，7 号案卷，第 31 张。

⁶³⁵ 《全俄工兵农代表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第 52 页。

⁶³⁶ 《全俄工兵农代表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第 64 页。

⁶³⁷ 《全俄工兵农代表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第 59 页。

⁶³⁸ 《红色公报》（Красная газета）由沃洛达尔斯基创办于 1918 年 1 月，是一份在彼得格勒出版的日报。曾为彼得格勒苏维埃的机关报，1939 年并入《列宁格勒真理报》。——译者注

⁶³⁹ 《红色公报》，1918 年 1 月 13 日，第 1 版。

当工人、士兵和农民在十月推翻地主和产业家的时候，他们只知道一件事：没有其他国家的革命，我们的革命就不会取得胜利……仅仅几天之前，全世界的目光就转向了奥地利、匈牙利和波兰，那里的人民起义撼动着当地沙皇的王冠。

现在我们有了更好的消息：

在维保、赫尔辛弗斯、坦佩雷和芬兰的其他几座城市，芬兰的赤卫队正在对芬兰资本家发起一波又一波的打击……在法国南部也发生了同样的事情……[而]在英国已经爆发了数次大罢工……世界革命近在咫尺。⁶⁴⁰

最令人充满希望的则来自 1 月 19 日：

据电报消息，德国的革命运动已经开始，并正在飞速发展……世界革命正胜利前进，并且现在毫无疑问，最后的胜利即将到来。⁶⁴¹

这一好消息的浪潮在 1 月 21 日达到了顶峰，当日《红色公报》的加粗标题是：

各国和各民族的人民起义继续发展……

仅仅几天前，俄国革命似乎遭到了可怕的孤立……

而如今呢？

如今新生的力量正在打击我们共同敌人的后方……使世界革命的打击力量前所未有地加强了。⁶⁴²

欧洲革命骚动扩大的迹象令左翼共产主义者激动不已，它似乎印证了他们对和谈的立场。1月 15 日人民委员会决定开始组建“工农红军”，并在军事人民委员部中设立一个部务委员会（collegium）来协调执行该决定，这或许也使他们大受鼓舞。⁶⁴³同时，苏维埃代表大会对和谈问题的处置令他们大为光火，因为这可能使列宁不顾大多数党员的看法和国外似乎决定性的事件，而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其与帝国主义德国单独缔结和约的目标。他们不能允许缔结这种和约。1月 15 日，12 名

⁶⁴⁰ 《红色公报》，1918 年 1 月 17 日，第 1 版。

⁶⁴¹ 《红色公报》，1918 年 1 月 19 日，第 1 版。

⁶⁴² 《红色公报》，1918 年 1 月 21 日，第 1 版。

⁶⁴³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19 号全宗，1 号目录，47 号案卷。

最有影响力的左翼共产主义者联署声明，要求在一周内召开一次全国党大会，以就和谈问题做出明确的决定。如果在这次大会之前签署和约，那么他们将宣布辞去党和政府的领导职务。⁶⁴⁴

同日（1月15日），彼得堡委员会执行委员会签署了一项类似的强硬宣言。这份由科肖尔、格列布·博基、费尼格施泰因、拉维奇和阿法纳西·普卢日尼科夫⁶⁴⁵（都是左翼共产主义者）联署的宣言反映了彼得格勒组织对中央委员会深深的不信任：

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中央委员会：

据[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布尔什维克党团的动议可知，如今中央委员会[在和谈问题上]遵循的政治路线倾向于达成所谓“下流的”和平，这会使我们的原则遭到放弃……并使我们党必定不再成为革命先锋队……执行委员会代表彼得格勒组织，强烈抗议[我们的和谈的]基本方向以及甚至我们最大党组织的负责机构都在秘而不宣地行事。

我们有充分理由可以断言，签署一项“下流的”和约悖乎党内多数人的意见……如果我们继续选用当前的和谈政策……我们党将面临分裂的危险。由此，执行委员会要求立即召开一次特别党员大会。[在]当前形势下，只有它能确定我们的和谈立场。⁶⁴⁶

在大约1月18日与“积极党务工作者”举行的一次会议上，彼得堡委员会全体成员就和平问题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此后在1月下半月，彼得堡委员会连续召开的几次讨论“战争还是和平”问题的会议。在第一次会议上，布哈林就该问题做了主旨报告。从同一时期他的其他声明和著述来看，在这次报告中，他显然强烈反对签署一项割地和约，并可能支持“不战不和”策略，同时又呼吁加紧准备为期不远的革命战争。他或许还想向中央委员会施压，以在不久召开一次党大会。可布哈林向中央委员会发表的一份声明则显示，他不同意执行委员会1月15日宣言所谓之党存在分裂的隐患。⁶⁴⁷

1月18日左右的会议上，除1票弃权之外，彼得堡委员会对和平问题的讨论最终一致通过了布哈林就该问题起草的另外一份纲领。这份纲领并未直接提及托洛茨基的“不战不和”公式抑或立即展开革命战争。也没有呼吁就和谈政策召开一次全国党大会。它们反而从国际角度出发，根据国外的最新消息，集中驳斥了

⁶⁴⁴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会议记录》，第181页。

⁶⁴⁵ 阿法纳西·米罗诺维奇·普卢日尼科夫（Афанасий Миронович Плужников，1882-1946），生于农民家庭，木工，1913年加入布尔什维克。二月革命后，当选彼得格勒赤卫队主席团成员、布尔什维克彼得堡委员会彼得格勒区代表。1919年参加契卡，此后一直在苏维埃政权的秘密警察部门工作。大清洗期间被解除职务并开除党籍，1939年恢复党籍。——译者注

⁶⁴⁶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会议记录》，182-183页。

⁶⁴⁷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会议记录》，第176页；特别参见论题5至8。

列宁有关立即单独媾和的论点。和谈正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进行，而这成为布哈林的首要关切。

这份纲领明确指出，接受还是拒绝不利的割地和约，其唯一有效标准在于，是否最有利于无产阶级革命的发展；国际无产阶级运动此时正经历一次决定性的突破，而和谈进一步推动了它，可接受一份“可耻的和约”将破坏它；即便革命俄国在前线的失败，也能通过进一步革命化敌军而有利于世界革命；和约能够提供喘息之机，从而确保苏维埃政权在俄国的存续，这种想法是一种幻想，国际帝国主义会尽快攻击革命俄国。⁶⁴⁸

在 1 月 19 日（2 月 1 日）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对于召开党大会的要求如何回应成了头等议题。⁶⁴⁹这次会议的所有与会者都承认，围绕战争还是和平的问题，党内存在着严重危机，并似乎决心阻止危机发展为正式的分裂。此外，对于下一步最宜采取何种措施，异议是很少的。此前，列宁提议称，他的政府最终可能按照德方条件签署一份和约，并且就他本人而言，他从全俄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那里获得了如此行事的授权。⁶⁵⁰对于立即召开正式党大会的要求，列宁在这次会上采用的应对策略是，一面呼吁中央委员会尽早与仍然在京参加苏维埃代表大会的主要区域组织领导人召开一次会议，一面维持召开决定性的全国党代会的前景。尽管党代会的决定对于新当选的中央委员会有权威性和约束力，但筹备一次代表大会至少需要一个月的时间。因此，党代会最早的开会日期可能太晚，以至无法在对德谈判中束缚住列宁的手脚。

斯大林、斯维尔德洛夫、斯塔索娃⁶⁵¹、阿尔乔姆和索科利尼科夫支持列宁的看法。此时，托洛茨基回到了布列斯特。与会的左翼共产主义者并不承认列宁所谓之其政府获得了和谈的授权。甚至列宁还没开口讲话，洛莫夫就表示，由于托洛茨基以及尤其是季诺维也夫在苏维埃代表大会上的讲话让许多党员怀疑已确定与德国单独媾和，故而有必要召开一次大会。因此，洛莫夫说道，有“必要倾听[全]党的声音，它已经沉默了很久”。⁶⁵²而列宁刚要发言，乌里茨基便坚称，“托洛茨基的看法赢得了苏维埃代表大会”，并“得到了中央委员会的采纳”。左翼共产主义者一致同意，布尔什维克的和谈政策处于混乱之中，只有一次正式党大会才能将它确定下来。1 月 19 日的中央委员会会议上，布哈林和洛莫夫最有力地表达了这一点。最终，中央委员会计划于 2 月 20 日（3 月 5 日）召开一次紧急全国

⁶⁴⁸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会议记录》，第 183-184 页。

⁶⁴⁹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会议记录》，第 174-180 页。

⁶⁵⁰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会议记录》，第 175-175 页、第 283-284 页注释 207。

⁶⁵¹ 叶连娜·德米特里耶夫娜·斯塔索娃（Елена Дмитриевна Стасова，1873-1966），生于贵族家庭，1898 年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和工人阶级解放斗争协会。1903 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分裂时，成为布尔什维克。后长期从事地下工作和布尔什维克地方党务的领导工作，期间多次被捕。二月革命后，被任命为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书记。十月革命后，主要从事彼得格勒地方党务和共产国际工作。1946 年退休。——译者注

⁶⁵²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会议记录》，第 175 页、第 283 页注释 206。

代表大会，并在 1 月 21 日召开一次非正式大会，会上将公开和平问题上的所有主要分歧。

中央委员会 1 月 21 日大会的 14 名与会者就 10 个问题进行了表决。仅有 5 名与会者——列宁、斯大林、穆拉诺夫、阿尔乔姆和索科利尼科夫——支持立即签署一份割地和约。包括列宁在内的大部分人，可能暂时受到国外革命事件的影响，⁶⁵³支持拖延和谈。仅有因诺肯季·斯图科夫⁶⁵⁴希望立即结束和谈。大多数人觉得，如果割地和约是作为最后通牒而提出的，那便可以允许签署。在这个问题上，只有左翼共产主义者奥辛斯基和斯图科夫投了反对票。布哈林和乌里茨基似乎在投票前离开了会场，但即便他们投票反对，就此的结果也还是一样的。基于提出的问题，有人推测在布列斯特指导托洛茨基的“不战不和”政策根本没有争议。此外，投票结果准确地反映出当时围绕分裂着党的和平问题的尖锐分歧。⁶⁵⁵

如今似乎一切都取决于欧洲的革命进展，以及（当然还有）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的和谈。托洛茨基于 1 月 17 (30) 日返回布列斯特。重启和谈时，正好碰上布尔什维克在芬兰和乌克兰的军事胜利。再加之欧洲的革命骚动——所有这些似乎都是俄国人的好兆头。但这暂时前途在望的局势并没有持续很长时间。最重要的是，德国所有重要的罢工和革命抗议运动都迅速遭到严厉镇压。局势的此种发展使列宁重新坚信，有必要尽快接受德国的和平条件。此时克雷连科向人民委员会书面报告了俄军前线和后方卫戍部队的最新状况，这进一步坚定了列宁的想法。同时在布列斯特，托洛茨基和他的同事们正同自己的同级别者争吵。而德国总参谋部越发不耐烦。在 1 月 23-24 日（2 月 4-5 日）的休会期间，一方面是德国与奥匈帝国政府之间的商议，另一方面，德军高级司令部与前者达成共识，加快与乌克兰代表团单独缔约的步伐，并且一俟完成便向托洛茨基提出最后通牒，即在一周内结束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的和谈。托洛茨基要么不得不接受向他提出的条件，要么重启战事——这是德国外交大臣里夏德·冯·屈尔曼⁶⁵⁶将向托洛茨基提出的最后通牒。

⁶⁵³就此，参见列宁于 1 月 21 日给他的《关于战争的提纲》补充的第 22 点。（列宁，《全集》，第 35 卷，第 251-252 页）。（这里《关于战争的提纲》即《关于立刻缔结单独的兼并性和约问题的提纲》。补充之第 22 点的中译见《列宁全集》第 33 卷，中央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年，第 255 页。——译者注）

⁶⁵⁴因诺肯季·尼古拉耶维奇·斯图科夫（Иннокентий Николаевич Стуков，1887-1936），生于教士家庭，1905 年参加布尔什维克。二月革命时，为布尔什维克莫斯科区域局成员，后当选立宪会议代表。1918 年参加红军，次年担任乌法革命委员会主席。1920 年加入民主集中派，1926 年参加托季反对派。此后被开除出党，在莫斯科从事军事和经济工作，大清洗期间被处以枪决。——译者注

⁶⁵⁵《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会议记录》，第 190-191 页。另参加《弗·伊·列宁：不为人知的文献》，第 225-227 页。

⁶⁵⁶里夏德·冯·屈尔曼（Richard von Kühlmann，1873-1948），生于律师家庭，1917 年 8 月至 1918 年 7 月任德国外交大臣。1944 年，因涉嫌卷入刺杀希特勒而被捕。——译者注



图 7 苏方代表团抵达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在德国军官中间的是列夫·托洛茨基。戴维·金特藏。

尽管为使本国政府的吞并政策具有某种合法性，奥匈帝国和德国方面的温和派最后还争辩了一番，但马克斯·霍夫曼⁶⁵⁷所代表的德军总参谋部对和谈的影响与日俱增，因此对俄方谈判人员来说，进一步拖延和谈显然不再可能。1月27日（2月9日），同盟国与乌克兰单独签署了一项协定。托洛茨基此前兴致盎然地预测的时刻紧随次日1月28日（2月10日）到了。在同盟国代表似乎被哄骗得相信俄国将要有条件投降之后，托洛茨基扔出了他的“炸弹”。他宣布，尽管俄国拒绝签署正式和约，但它认为它与德国、奥匈帝国、保加利亚和土耳其的战争状态已告结束，并在复员自己的军队。⁶⁵⁸

当日晚些时候，同盟国的首席代表们最后开了一次会。除霍夫曼将军外，所有人都强烈地处于得过且过状态。屈尔曼和切尔宁的立场是，既然俄国人的宣言已默认被占领领土继续为德方控制，那就不需要费什么劲了。但霍夫曼将军在其军事首长的指示下，坚称与俄国休战的目的在于达成和约，而这一点尚未实现，因此休战告于结束，需按休战协定的规定，在7天内重启战事。⁶⁵⁹

⁶⁵⁷ 卡尔·阿道夫·马克西米利安·霍夫曼 (Carl Adolf Maximilian Hoffmann)，生于法官家庭，1917年被任命为德军总参谋长。——译者注

⁶⁵⁸ 托洛茨基，《著作集》，第17卷，第1册，第103-104、106页；马克斯·霍夫曼，《战争日记及其他文章》，埃里克·萨顿 (Eric Sutton) 译，第2卷，伦敦，1939年，第218-219页。

⁶⁵⁹ 霍夫曼，《战争日记》，第2卷，第219页；约翰·惠·惠勒-贝内特 (John W. Wheeler-Bennett)，《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被遗忘的和约，1918年3月》，伦敦，1963年，第229页。

德国人争论到晚上，而俄国代表们自信于（如果不是完全确信的话）对俄国来讲，漫长而可怕的大战梦魇结束了，他们去往火车站，预备返回彼得格勒。就在离开布列斯特之前，托洛茨基匆匆地将当时的情况电告了正在莫吉廖夫的俄军最高统帅部的克雷连科，并指示其下令复员。克雷连科迅速执行了托洛茨基的指示。在列宁的坚持下，复员令于次日撤回，但它们在心理上进一步瓦解了彻底丧失士气的俄军，这是不可挽回的。离开前，德国和奥匈国外交官们正迫使军方温和下来的消息，使俄国代表团进一步增强了对和平的希望。于是，他们带着欢声笑语走进自己的火车车厢，相互祝贺他们向德帝国主义施展的非凡妙计，并放松了下来。“在返回彼得格勒途中，我们都觉得，德国人不会展开攻势。”托洛茨基在数年后回忆道。⁶⁶⁰

* * *

在 1917 年 9 月末和 10 月最初几周里，对于立即夺取政权，列宁的主要理由之一是，所有欧洲国家都处于无产阶级革命的分水岭，而俄国的布尔什维克，由于他们的有利状况，有机会和责任引发这场革命。他坚称，布尔什维克如果坐等苏维埃代表大会推翻临时政府，那就是背叛国际革命事业。

1917 年 12 月初，德国与苏维埃政府开始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单独和谈。此时，列宁仍然相信欧洲即将爆发决定性的社会主义革命。但到当月底，他曾自信满满地预测的回应性的（answering）革命并没有发生，前线俄军士气的极端低落得到了证实，且反革命军队开始在顿河流域扩张。有鉴于此，列宁得出结论，立即按德方条件签署和约，对革命俄国来说是生死攸关的。但对他而言不幸的是，党在彼得格勒、莫斯科和全国各地的领导机构中，许多最亲密的同志仍然保持着他先前热烈的国际主义（这在布尔什维克彼得堡委员会的领导人那里是最确定无疑的）。由于坚信与德皇政府单独媾和会破坏将于几年内爆发的德国革命，革命战争虽然痛苦但却可行，以及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不能独力维生，他们拒绝接受列宁所坚持的不惜一切代价达成和约。

在这种情况下，托洛茨基的“不战不和”策略——前提是，一旦革命俄国干脆单方面宣布终战和复员，德皇的政府便无法让自己的部队上阵作战，从而对俄国来讲，战争终结——在布尔什维克和左翼社革党当中得到了广泛的认同。在 1 月中旬，两党的大部分领导人（尽管不包括列宁）接受了托洛茨基的办法。在欧洲一阵起初充满希望的劳工骚动浪潮被镇压下去后，1 月 28 日（2 月 9 日）托洛茨基突然在布列斯特向吃惊的德国谈判人员提出自己的宣言，然后带着智取敌手的乐观想法返回了彼得格勒。但理所当然，一切都取决于德方的回应。

⁶⁶⁰ 托洛茨基，《我的生平》，第 386 页。（《托洛茨基：我的生平》，赵泓、田娟玉译，郑异凡校，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年，第 338 页。——译者注）

六、“社会主义祖国在危急中”

最早于1月28/29日午夜，斯莫尔尼经专线得悉，托洛茨基以轰动性的方式宣布结束战争，并且似乎得到了同盟国的接受。季诺维也夫立刻向新闻界发表了一份欣喜的声明。对于这份声明，记者们必定像面对托洛茨基声明的布列斯特同盟国代表那样，是大惑不解的。当被一位困惑不已的记者问及“不战不和”的实际含义时，季诺维也夫信心满满地解释道，这相当于延长休战。“在我们看来，同盟国将无法发动攻势，因为它们的劳动群众是不会支持这样做的，”他说道，并迅速补充称，“不断并吞他国领土，不符合德奥两国的利益。”⁶⁶¹施泰因贝格回忆称，“自豪而忧虑的平静笼罩着彼得格勒”。⁶⁶²

次日晨，布列斯特空前事变的消息传遍彼得格勒。布尔什维克和左翼社革党的中央委员会都召开紧急会议，支持托洛茨基的举动。⁶⁶³在彼得格勒苏维埃的会议上，时任军事人民委员之一的布尔什维克军事组织前成员米哈伊尔·拉舍维奇直接宣称：“德军不会攻击那些已向全世界宣布无意让自己兄弟流血的人。”⁶⁶⁴会议通过了季诺维也夫的动议《关于结束战争》。这份动议支持俄方在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的立场；呼吁德国、奥国、保加利亚和土耳其工人阻止帝国主义列强向波兰、立陶宛和库尔兰⁶⁶⁵人民施暴；并宣布当前主要任务是新建一支社会主义红军。但动议首先关心的，与其说是招募一支新军，还不如说是让如今数以十万计乱哄哄地从前线涌回家乡的复员旧军人显得多少有点秩序。⁶⁶⁶

可以想见，对于托洛茨基在布列斯特所作所为意义几何，彼得格勒新闻界看法不一。自由派和温和社会主义派的日报自始便对单独媾和态度谨慎。它们将托洛茨基的举动斥为一场灾难，称其注定要给饱受摧残、毫无防备的俄国带来新的考验、痛苦和沉沦。“革命开始走向终结，”孟什维克的《新光线报》就此如是说。另一方面，布尔什维克媒体则带着不加抑制的喜悦，欢迎布列斯特的消息。《红色报》的一条标题称，战争结束了：

在战争结束的次日

⁶⁶¹ 《新公报》(Новые ведомости)，1918年1月29日，第2版。

⁶⁶² 伊·纳·施泰因贝格，《在革命的作坊里》(In the Workshop of the Revolution)，纽约，1953年，第237页。

⁶⁶³ 《社会民主党报》，1918年2月13日，第2版。

⁶⁶⁴ 《消息报》，1918年1月31日，第3版。

⁶⁶⁵ 库尔兰(Kurland)是拉脱维亚西部一片地区的旧称，历史上曾在此建立库尔兰公国。——译者注

⁶⁶⁶ 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1235号全宗，18号目录，4号案卷，第1张。

⁶⁶⁷ 《红色公报》，1918年1月31日，第1版。

我们正经历战争结束的次日……俄国的犁田人现在可以回到他梦寐以求的田地。俄国工人可以回到他离开已久的城市。全体俄国人民如今可以投身建设他们的自由新生活。⁶⁶⁷

左翼社革党的媒体像布尔什维克的日报那样，倾向于认为，无论德国政府多么希望重启东线攻势，它都没有能力得偿所愿。“在发布[托洛茨基]这样的宣言后，由于无法给出侵略的理由，德军总参谋部难以让自己的部队攻击俄国，而德国士兵将明白，他的战斗只是有利于资产阶级吞并领土，”一位《劳动旗帜报》编辑在1月30日写到。“如今只是由于同盟国，和谈才破裂，革命运动自然将空前剧烈地爆发出来。”⁶⁶⁸

当然，对于准备在西线进行一次决定性春夏攻势的西方盟国来说，东线停战可谓一种全然不妙的景象。例如两周前，英国外交部派了年轻而老练的俄国事务专员罗伯特·布鲁斯·洛克哈特⁶⁶⁹作为特使前往彼得格勒。洛克哈特的首要任务是说服苏维埃政府继续与盟国协同作战。同时，英国海军当局委派新任驻彼得格勒海军随员弗朗西斯·克罗米⁶⁷⁰上校负责从波罗的海地区撤出盟国战争物资。克罗米不久前负责指挥一支在波罗的海与俄国海军协同行动的潜艇编队。⁶⁷¹作为海军随员，他向海军情报部（Naval Intelligence）部长雷金纳德·“闪光灯”·霍尔⁶⁷²上将报告。可是，克罗米此前并无谍报、颠覆甚或外交方面的经验。在8月的西北地区，曾为拉脱维亚军官的契卡线人将背叛他的信任，泄露其推翻苏维埃政权的努力。克罗米或许也受到了玛丽亚（穆拉）·本肯多尔夫⁶⁷³（一位有魅力的俄国人，受雇担任

⁶⁶⁸ 《劳动旗帜报》，1918年1月30日，第1版。

⁶⁶⁹ 罗伯特·汉密尔顿·布鲁斯·洛克哈特（Robert Hamilton Bruce Lockhart, 1887-1970），英国外交官、记者和间谍。1912年首次担任英国驻俄外交官，十月革命前离开俄国。1918年作为英国特使返回俄国，并从事间谍工作。其间因被控谋刺列宁而被苏维埃政权逮捕，后经囚犯交换而返英。此后，主要从事外交、记者和写作工作。——译者注

⁶⁷⁰ 弗朗西斯·牛顿·艾伦·克罗米（Francis Newton Allen Cromie, 1882-1918），英国海军军官，情报人员。生于军官家庭，1897年参加英国王家海军，1900年参与八国联军侵华。一战期间，作为潜艇指挥官在波罗的海参加军事行动。1917年5月被任命为英国驻俄使馆海军随员。1918年4月，负责撤离和造成滞留波罗的海的英军潜艇。是年8月，契卡以联络和窝藏反革命分子为由搜查英国使馆，随后与使馆人员交火。此间，克罗米中弹身亡。——译者注

⁶⁷¹ 克罗米的最新传记，见罗伊·班顿（Roy Bainton），《为陌生人荣耀：王家海军杰出服役勋章与三等巴斯勋章获得者弗朗西斯·克罗米上校生平》（Honored by Strangers: The Life of Captain Francis Cromie CB DSO RN），什鲁斯伯里，2002年。

⁶⁷² 威廉·雷金纳德·“闪光灯”·霍尔（William Reginald “Blinker” Hall, 1870-1943），英国海军军官。生于高级军官家庭，1884年参加王家海军。1914年起担任海军情报部部长，1919年退休后从政，成为保守党议员。因面部痉挛而致经常眨眼，仿佛闪烁的海军信号灯，故得绰号“闪光灯”。——译者注

⁶⁷³ 玛丽亚（穆拉）·伊格纳季耶夫娜·扎克列夫斯卡娅-本肯多尔夫-布德贝格（Мария (Мура) Игнатьевна Закревская-Бенкендорф-Будберг, 1892-1974），生于贵族家庭，父姓扎克列夫斯基（Закревский）。1911年与贵族外交官本肯多尔夫结婚，次年其随夫在俄国驻德使馆工作，后返回俄国。1918年成为英国间谍洛克哈特的情妇，同年因协助英方间谍的嫌疑被契卡逮捕，不久后获释。次年成为高尔基的秘书和情人，此后主要从事高尔基作品和其他俄国文学作品的英译工作。

英国使馆的文书和翻译）的欺骗。有证据强烈地倾向于，成为洛克哈特情人的穆拉是一名契卡线人。⁶⁷⁴“播放使馆里各种可恶流言的留声机”，她在一封致洛克哈特的信中如此描述克罗米。⁶⁷⁵

1920 年结识英国科幻作家威尔斯，并成为其情妇，次年与尼古拉·冯·布德贝格男爵结婚，不久后离婚。高尔基去世后，离开苏联，并定居英国。她被怀疑为苏联和英国情报机构的双面间谍。——译者注

⁶⁷⁴尼娜·别尔别罗娃（Nina Berberova/Нина Николаевна Берберова）的经典作品《铁娘子，1892-1974》（Железная женщина, 1892-1974），纽约，1991，尽管多少有些陈旧，但仍然是对穆拉·本肯多尔夫最好的研究，这部作品杰出的英文缩译本见玛丽安·施瓦茨（Marian Schwartz）和理查德·迪·西尔维斯特（Richard “Dick” Sylvester）译，《穆拉：布德贝格男爵夫人的危险人生》（Moura: The Dangerous Life of the Baroness Budberg），纽约，2005 年。（书名中的“布德贝格男爵夫人”，拉宾诺维奇原文为“穆拉·布德贝格”，系误。——译者注）

⁶⁷⁵胡佛研究所，洛克哈特特藏，6 号盒，悉尼·赖利（Sidney Reilly）。



图 8 1917-1918 年冬，乘坐雪橇的英国驻彼得格勒海军随员弗朗西斯·克罗米上校。左侧是据称为契卡线人的穆拉·本肯多尔夫。蒙戈斯波特的王家海军潜艇博物馆允许使用。

1917-1918 年冬，乘坐雪橇的英国驻彼得格勒海军随员弗朗西斯·克罗米上校。左侧是据称为契卡线人的穆拉·本肯多尔夫。蒙戈斯波特的王家海军潜艇博物馆允许使用。

托洛茨基、拉狄克和卡列林于 1 月 31 日清晨 5 点自布列斯特抵达彼得格勒。托洛茨基立刻来到斯莫尔尼，向列宁简要汇报了谈判最后阶段的情况。托洛茨基和卡列林还于当日晚些时候向布尔什维克-左翼社革党中央执委联席党团和人民委员

会、于次日（即采用新历的首日——2月1日[14日]）⁶⁷⁶夜向中执委特别全会汇报了谈判情况。⁶⁷⁷

托洛茨基向中执委详细描述了他在布列斯特采取的策略。在谈判地位方面，1月袭击德国和奥匈国的罢工浪潮暂时地加强了俄国、削弱了德国。但在这一骚动被镇压下去后，德国代表团强势地（powerfully）重新提出自己的割地要求。在谈判的最后阶段，独立的乌克兰代表团和俄国媒体对俄军不断瓦解的生动报道进一步打击了俄国代表团。在1月27日（2月9日）同盟国与乌克兰代表团达成协议后，德国人显然不会就他们的要求作出退让，因此再也不能拖延结束谈判。在这种情况下，托洛茨基作出了他的退出声明。

托洛茨基带着毫不掩饰的欣喜，描述了对手震惊的反应，以及精挑细选后驻于布列斯特的德军士兵的看法。他说，后者向他全力保证，革命俄国不必担心会有一场德军攻势。即便他们的军官也宣称，无法令他们进军俄国。尽管托洛茨基警告称，不排除德方重新展开军事行动的可能，但他明确表示，这似乎不大可能。他此前已亲自巡视过俄军战线，在部队中目睹的混乱无序令他大失所望。由此，他不像左翼共产主义者那样，幻想如果德军进攻，俄军士兵会保卫革命。他的直接目标在于，公开且全面的复员将向全世界展示苏维埃俄国这样的坚定决心：退出战争，并使欧洲革命群众适当地承担起保卫俄国革命（如有必要）的负担。⁶⁷⁸

卡列林向中执委强调指出，俄国代表团在布列斯特面临的基本问题，不是在于揭露同盟国提出的掠夺性条件（这是容易的），而是在于要求不仅仅单纯恢复战前领土状态。后者⁶⁷⁹在本质上不符合要求实现不割地不赔款和约和各民族（无论它们何时丧失了独立地位）自决权的社会主义原则——这些原则由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的《和平法令》所规定，并在后来得到重申。⁶⁸⁰托洛茨基在布列斯特的最终声明自然源于上述难题。俄国在布列斯特的立场使俄国革命成为各地被奴役人民的灯塔，卡列林继续说道。为了阐明这一点，他描述了自己和托洛茨基在布列斯特和谈间隙造访华沙时受到的友好欢迎。在人民当中，对俄国革命的崇敬替代了此前对俄国的敌意。卡列林和托洛茨基一样，承认单纯宣布战争结束并拒绝签署和约——这一冒险有挑起新一轮攻势的风险，但怀疑东线德军士兵是否可被用于进攻。⁶⁸¹

⁶⁷⁶ 幸运的是，这次中执委特别会议留存了一份详细记录（见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1235号全宗，18号目录，5号案卷，第1-25张。）。这份记录原本准备于1918年付梓，但终未公布。我对2月1日（14日）会程的重建即以该档案记录为基础，并补充以《新生活报》1918年2月15日号第2版、《我们的时代报》1918年2月15日号第2版和《劳动旗帜报》1918年2月15日号第4版的描述。

⁶⁷⁷ 这一天（2月1日[14日]），俄国由儒略历转而使用格里高利历。此后日期，除标明为“旧历”[o.s.]者之外，均为西方使用的“新式”格里高利历的日期。

⁶⁷⁸ 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1235号全宗，18号目录，5号案卷，第1-4张。

⁶⁷⁹ 当指“单纯恢复战前领土状态”。——译者注

⁶⁸⁰ 见前文，第1章；《苏维埃政权法令》，第1卷，第39-41页；以及《全俄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第43-44页。

⁶⁸¹ 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1235号全宗，18号目录，5号案卷，第4-11张。

作为对托洛茨基和卡列林的回应，社革党代表蓬皮扬斯基赞扬了布列斯特代表团没有单独媾和；但他仍然认为，谈判的结果并不令人满意，因为它们使前线向德军的入侵门户洞开。正如自己此前在立宪会议上那样，蓬皮扬斯基在一片哄堂嘲笑中，呼吁在斯德哥尔摩组织一次国际社会主义和平大会，并通过立宪会议组织一个联合人民阵线政府。

代表左翼社革党发言的施泰因贝格给予苏维埃外交手段以更高的评价，辩称欧美劳工是俄国的天然盟友，而布列斯特使他们之间的纽带变得空前强大。对于蓬皮扬斯基的要求，施泰因贝格表示反对重新召集立宪会议，但却支持在斯德哥尔摩立即召开一次有广泛基础的社会主义和平大会，并停止不必要的国内倾轧以备同盟国或将重启战端。他警告称，俄国必须准备进行适当的防御战。“有鉴于此，首先必须结束目前正撕裂我国的民主派内战。”

对于托洛茨基所暗示的布列斯特削弱了奥-德方面，马尔托夫是不同意的。在他看来，一切迹象都指向相反的方向。尽管含蓄地支持“不战不和”公式，但他坚称，有必要考虑到同盟国会更为自信地面对俄国，并且首先需要创造条件，使全体俄国公民可能在德军入侵时参与保家卫国。

在他的结语中，托洛茨基回应马尔托夫，坚称防止俄国毁于德国人之手的主要责任在于德国人民。但他总结道，“如有必要，我们将不得不展开自卫”。这次会议通过了一份布尔什维克的决议。决议支持俄国代表团在布列斯特采取的立场，并相信这一立场会为各国社会主义工人所接受。决议相信，奥-德工人和士兵会争取已在维也纳和柏林开始的反对帝国主义分子和篡夺者的斗争的最终胜利。决议还警告称，俄国革命被敌人环伺，并指出当前的关键任务之一在于，组织一支自由的社会主义红军。⁶⁸²加米涅夫现被派往英国和法国，以帮忙向西欧社会主义者解释俄国的和平政策。⁶⁸³

次日（2月15日），托洛茨基看上去空前地相信，德国人不会进攻。他在彼得格勒苏维埃的晚间全会中提出，德国人有一成可能发起进攻，不进攻的可能性则有九成。⁶⁸⁴在彼得格勒布尔什维克当中，广泛存在着这种想法：对俄国来说，战争已经结束；目下最重要的是解决国内危机。这一点在这一事实当中得到了反映：当日，托洛茨基承担起指挥食品采购和分配工作（这是当时革命俄国最棘手、最可怕的国内问题）的职责。⁶⁸⁵

托洛茨基确实不大明白，他的预言会有多快遭受考验。围绕如何应对托洛茨基的“不战不和”宣言，德国民事和军事当局之间的争斗实际上在两天前（2月13日）的御前会议（Kronrat）上就决出了结果。会上，对于以何种政策对付革命俄

⁶⁸²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1235号全宗，18号目录，5号案卷，第11-21、23张。

⁶⁸³加米涅夫的任务惨遭失败。他在英国没待多长时间。离英后，他悄然返回俄国时被芬兰白军逮捕，并在奥兰群岛一直被关到了1918年8月。

⁶⁸⁴《消息报》，1918年2月19日，第2版。

⁶⁸⁵据斯维尔德洛夫称，不仅托洛茨基，而且许多政府成员都觉得，在经过了三个月的休战后，德国和俄国土兵都不可能参战了。

国的争论最终决定，在东线展开一次有限的攻势。此次攻势的目的在于，将德军战线推进至纳尔瓦和普斯科夫，并（更重要的是）让“布尔什维克回到自己的位置”。攻势定于2月18日开始。⁶⁸⁶

斯莫尔尼宫最早于2月16日得悉，德俄停战期已满并于18日中午重新恢复战争状态。⁶⁸⁷收到载有这条消息的电报时，托洛茨基正在列宁的办公室，与列宁、卡列林和身份不明的卡列林党内同僚开会。显然对此深感不安的列宁悄悄地将电报递给了托洛茨基。在后来回忆这一幕时，托洛茨基写到，列宁迅速结束了会议，匆匆地把左翼社革党人弄出他的办公室，并脱口而出：“他们还是骗了我们……这头野兽不会放过任何东西。”⁶⁸⁸

列宁提醒托洛茨基，根据他们之间的协议，他有责任支持立即达成和约。之后，托洛茨基回答到，德国人对俄国发动攻击的能力仍然有待考验。或许因此，消息暂时没有公布。⁶⁸⁹它既没有被用于提醒负责俄国防务的高级军官，也没有告知人民委员会。⁶⁹⁰18日夜，俄国情报机关截获一份发给德军指挥官的电报，内中宣布由于托洛茨基打破停战协议，德国人将重启攻势。直到此时，俄国军方才了解到正在发展的紧急事态。⁶⁹¹

* * *

德军重启攻势的消息立刻再次提出了那个为托洛茨基的“不战不和”策略所规避的、极具争议性的问题，即是否与同盟国单独媾和。实际上在2月17-24日之间，对这一问题重新展开的讨论（不断受到前线态势的影响，并且不确定德方的最终目的）不断地蔓延开来。新闻界、布尔什维克和左翼社革党中央委员会、人民委员会、布尔什维克和左翼社革党中执委党团、中执委全会、彼得格勒苏维埃、布尔什维克彼得堡委员会、彼得格勒布尔什维克第四次全市代表大会、彼得格勒各区苏维埃和布尔什维克各区委员会，以及工厂普通工人、兵营中的士兵、波罗的海舰队设施和舰艇上的水兵，都在进行这样的讨论。

⁶⁸⁶ 迪博，《革命与生存》，第116-120页；兹·安·博·泽曼（Zbyněk Anthony Bohuslav Zeman）编，《德国与俄国革命：来自德国外交部档案馆的文献》（Germany and the Revolution in Russia: Documents from the Archives of the German Foreign Ministry），第274-275页；惠勒-贝内特，《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第229-232页；戈登·克雷格（Gordon Craig），《德国，1866-1945》（Germany, 1866-1945），纽约，1959年，第391页；托洛茨基，《我的生平》，第386页。

⁶⁸⁷ 苏联外交部，《苏联对外政策文件》（Документы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СССР），第1卷，莫斯科，1957年，第105页；谢·米·马约罗夫（Семен Михайлович Майоров），《苏维埃俄国争取退出帝国主义战争的斗争》（Борьба Советской России за выход из империалистической войны），莫斯科，1959年，第217页；亚·萨莫伊洛（Александр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Самойло），《两重人生》（Две жизни），莫斯科，1958年。

⁶⁸⁸ 托洛茨基，《我的生平》，第387-388页。（《托洛茨基：我的生平》，赵泓、田娟玉译，郑异凡校，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338页。——译者注）

⁶⁸⁹ 直到19日，彼得格勒的报纸才开始报道战事的重启，那时德国人已全力进军。

⁶⁹⁰ 这在2月17日发布的紧急军事指令中显而易见（俄罗斯国家海军档案馆[РГА ВМФ]，P-342号全宗，1号目录，144号案卷，第1张）。至于人民委员会，萨莫伊洛的消息或许是在2月16日的一次人民委员会会议后送达的，并且据档案记录来看，取消了一次原定于17日的内阁会议。

⁶⁹¹ 见俄罗斯国家海军档案馆，P-342号全宗，1号目录，20号案卷，第14张。

讨论始于 2 月 17/18 日夜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的一次会议。已刊的当时中央委员会文献中有一份表格，表明了与会的 11 名委员就一系列战争与和平相关问题的表决情况。在列宁看来，这些问题中最重要的是，政府是否应当提出重启和谈，他将之理解为意味着请求立即按德方条件缔结和约。在这一问题上，列宁以 6 票对 5 票而失败。⁶⁹²同样重要的是最后一个问题——如果德军果真发起攻势，且德、奥两国没有发生革命起义，那么是否应当缔结和约？列宁赢得了这次投票；托洛茨基兑现自己的承诺，投票支持列宁。

次日（2 月 18）上午，在德军军事行动预定展开前不久的会议上，中央委员会重新评估了发展中的局势。那时，前线附近已报告了许多密集的德军军事活动迹象。在正好切断德军战线的明斯克上空发现了敌机，似乎很快就将攻击雷韦尔⁶⁹³重要的波罗的海海港。德方广播已经开始注重采取必要的保护措施，以防范东边的“传染病”。在中央委员会看来最糟糕的是，无论德军前线部队还是德国后方，都丝毫不见抗议迹象。不过，攻击尚未开始。结果，由于前一夜已花费那么多时间在偶发事件上，斯维尔德洛夫提议休会，直至实际情况变得更加明朗。列宁不许如此。出于对他的尊重，同意继续会议，并仅只集中讨论立刻电告德方、建议立即缔约是否可取。在上述讨论结束时，列宁的要求，即毫不迟疑地接受德方和平条件，再次以 1 票之差被否决。⁶⁹⁴

这有助于解释出席当日夜（2 月 18/19 日）早些时候开始的人民委员会会议的布尔什维克籍人民委员的言行。⁶⁹⁵除了布尔什维克和左翼社革党阁员外，参加会议的还有中执委主席团、布列斯特和谈代表团、“旧”军队和酝酿中的红军和红海军总参谋部的代表。人民委员会的这次会议几次中断（以便许多与会者能够参加各自政党中央委员会的会议），并持续了整个晚上和清晨。很多讨论看上去集中于，如何克服实际上没有常设武装力量的困难，以及如何在国外援助到来之前保卫革命免于德国人的伤害。会议讨论的问题还包括：立刻宣布总动员（被认为时机尚不成熟，因为德国无产阶级或帝国议会的“干预”似乎还有希望）；游击战的可行性（被认为非常可行，因为“实际上人人都有武器”）；开始疏散彼得格勒（并不推荐，因为这有损防务）。

随着时间的推移，有关德军正展开攻势的报告变得益发渗人。敌人在几小时内夺取了德文斯克和明斯克，并在宽阔的战线上向彼得格勒进军。尽管组成攻击

⁶⁹²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会议记录》，第 194-195 页。

⁶⁹³ 雷韦尔（Revel/Ревель）是塔林旧称。——译者注

⁶⁹⁴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会议记录》，第 197-199 页。

⁶⁹⁵ 有关这次会议的信息简略而矛盾。我的重建基于一份非常简略的会议记录（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19 号全宗，1 号目录，64 号案卷）和如下报纸的报道：《新生活报》，1918 年 2 月 20 日，第 3 版；《暮星报》，1918 年 2 月 19 日，第 1 版；《新日报》（Новый день: орган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ой мысли），1918 年 2 月 20 日，第 3 版；《新晚间报》（Новый вечерний час），1918 年 2 月 20 日，第 1 版；《新光线报》（Новый луч），1918 年 2 月 20 日，第 1 版；《Новые ведомости》，1918 年 2 月 19 日，第 1 版；《彼得格勒回声报》，1918 年 2 月 19 日，第 1 版，和 1918 年 2 月 20 日，第 1 版；《红色公报》，1918 年 2 月 20 日，第 1 版。

部队的是匆匆集结的非常规小分队，但惊慌失措的俄国士兵不做抵抗，一见德军逼近，连铁路线和桥梁都不加破坏，便仓皇逃窜。拿下德文斯克的部队规模还不到百人。

约莫午夜时分，人民委员会休会。在最后一刻，或许部分由于列宁急着电告宣布接受德方和平条件（以免德军进军彼得格勒），安排了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不久后召开一次深夜会议。这是中央委员会在 24 小时内召开的第三次会议。会上，列宁无情地请求立即实现有条件投降。⁶⁹⁶ “我们再也不能等下去了，因为局势已经明朗，”他坚称。“事情已经到了这种地步，如果我们继续坐以待毙，革命就一定会被摧毁。……如果德国人要求推翻布尔什维克政权，那么我们自然不得不战斗。[但]进一步拖延现在已经不是问题之所在了。”



图 9 1918 年 1 月，人民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从左至右分别是：伊·扎·施泰因贝格、伊·伊·斯克沃尔佐夫-斯捷潘诺夫、格·费·费奥多罗夫⁶⁹⁷、弗·德·邦奇-布鲁耶维奇、弗·叶·特鲁托夫斯基、亚·加·施略普尼柯夫、普·佩·普罗尚、弗·伊·列宁、约·维·斯大林（站立者）、亚·米·柯伦泰、帕·叶·德边科（站立者）、伊·康·科克莎罗娃⁶⁹⁸、尼·伊·波德沃伊斯基、尼·彼·戈尔布诺夫⁶⁹⁹、弗·伊·涅夫斯基⁷⁰⁰、亚·瓦·绍特曼⁷⁰¹和格·瓦·契切林。乔纳森·桑德斯特藏。

⁶⁹⁶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会议记录》，第 197-199 页，第 200-205 页。亦参见《彼得格勒之声报》（Петроградский голос），1918 年 2 月 21 日，第 2 版；以及《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年谱》，第 5 卷，第 263 页。

⁶⁹⁷ 格里戈里·费奥多罗维奇·费奥多罗夫（Григорий Фёдорович Фёдоров，1891-1936），生于工人家庭，1907 年成为工人，并参加布尔什维克地下组织，从事宣传和工运工作。1911 年被捕，后

正如在整个布列斯特危机期间一样，这次会上列宁的主要对手是布哈林。他虽然年轻，却最为镇定。他在讲话时提出，列宁和那些倾向于不惜一切代价达成和约的人是惊慌失措，那时发生的事情实际上都在预料之中。帝国主义势力一心要在革命进一步传播之前将其镇压下去。现在，关键是要进行不可避免的战斗。布哈林说道：“事情的发展恰如它所注定的样子。……一切都在我们的预料之中。我们说过，要么俄国革命传播开来，要么它会在帝国主义的压力下死亡。”

在列宁看来，布哈林所论是无望的空想。“如果我们没有[为一场革命战争]做好准备，我们就必须签订和约，”他愤怒地说道。“即便德国人增加例如不干涉乌克兰、芬兰、利沃尼亚和爱沙尼亚事务的要求，”他最后说道，“也绝对必须无条件接受。”⁷⁰²对列宁来说，这是生存的代价！最重要的是拯救作为国际革命滩头堡的俄国革命。

尽管同意列宁所谓之苏维埃政府指挥的乌合部队不堪与德国人一战，但托洛茨基仍然期望欧洲工人会前来相救。在2月18/19日夜的中央委员会会议上，他敦

被驱逐至赫尔辛基。1912年返回彼得堡，继续从事革命工作，此后多次被捕。积极参加了二月革命，并当选彼得格勒苏维埃的代表和执委会委员。1917年5月当选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后作为彼得格勒军革委委员参加了十月革命。1917年末至1918年初，在劳动人民委员部工作。内战期间，在红军中从事政治工作。1934年，因参加托派而被开除党籍，后死于大清洗。1959年平反。——译者注

⁶⁹⁸伊丽莎白·康斯坦丁诺夫娜·科克莎罗娃（Елизавета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на Кокшарова，1892-1973），1917年3月加入布尔什维克，后参加布尔什维克。1917年末至1918年8月，在人民委员会担任第二秘书，后在坦波夫省从事党务工作。1923-1930年担任苏俄小人民委员会顾问，后在最高苏维埃工作。——译者注

⁶⁹⁹尼古拉·彼得罗维奇·戈尔布诺夫（Николай Петрович Горбунов，1892-1938），生于工程师家庭，1917年8月加入布尔什维克。1917年10月至1920年12月，担任苏俄人民委员会秘书和列宁的私人秘书。期间，曾负责领导苏俄最高经济委员会的科技部门，并在红军中从事政治工作。内战结束后，主要从事经济和科技工作。1935年当选苏联科学院院士。大清洗期间被处以死刑，1954年平反。——译者注

⁷⁰⁰弗拉基米尔·伊万诺维奇·涅夫斯基（Владимир Иванович Невский，1876-1937），生于富商家庭，中学期间即接触革命思想。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次年被捕，并被流放至顿河畔罗斯托夫监视居住。1904年流亡至日内瓦，并在当地会见了列宁。在列宁的建议下，回国继续从事革命工作，此后多次被捕、流放和逃亡。1913年被增补为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1917年3月，被党组织调至彼得格勒从事军事工作，当选布尔什维克彼得堡委员会执行委员和彼得格勒军革委委员。十月革命后，调入铁道人民委员部工作。1918年6月起，担任铁道人民委员。1919年4月起，从事动员、宣传、教育和党务工作，曾参加工人反对派。1922年起，担任俄共（布）中央下属的十月革命史与俄共（布）党史委员会副主席，此后一直从事历史研究工作。1925年后，担任苏联国立图书馆馆长。大清洗期间，被处以死刑，1955年平反。——译者注

⁷⁰¹原文为“弗·伊·绍特曼”（V. I. Shotman），系误。亚历山大·瓦西里耶维奇·绍特曼（Александр Васильевич Шотман，1880-1937），生于工人家庭，1899年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地下组织，并从事工运工作。1903年作为彼得堡地方组织代表参加在国外召开的俄社民工党二大，并迅速加入布尔什维克。回国后，继续从事革命工作，并多次被捕。1913年被增补为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不久后被捕，流放至托木斯克。二月革命后，相继在托木斯克、芬兰和彼得格勒工作。十月革命后，担任副邮电人民委员和最高经济委员会主席团成员。1920年后，主要从事经济、地方和纪检工作。大清洗期间，以参加托派组织的罪名而被处以死刑。1955年平反。——译者注

⁷⁰²参见《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会议上的讲话》，《列宁全集》第33卷，中央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351-352页。——译者注

促俄国不必立即投降，而是应致信柏林和维也纳，调查它们所提要求的性质——这显然是为了拖延时间。托洛茨基似乎相信，明示这些要求会有宣传价值。但在争论双方明确表示不接受这一想法后，他再次履行了自己与列宁达成的部分协议。在托洛茨基投出关键一票后，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以 7 票对 5 票以及 1 票弃权，转而建议立即通知德国政府，俄国准备签署和约。列宁和托洛茨基被授权按上述意思起草一份电文。不久后，左翼社革党中央委员会在 15 名委员中仅有 6 人到场的情况下，投票支持和约，并同意发送列宁和托洛茨基起草的投降电文。⁷⁰³

尽管做出了上述决议，但一般而言，人民委员会在复会后，反对列宁的力量似乎没有发生明显的变化。有关德军进军速度的报告日益黯淡，重点却仍然在于抵抗。⁷⁰⁴临近早晨的时候，第一次明确提出立即请求媾和，从而开启了新一轮激烈争论。列宁现在和托洛茨基一道，领导着争取立即投降的战斗。施泰因贝格和帕维尔·德边科成了革命战争的主要倡导者。有时，气氛变得如此对立，双方对于根本原则的分歧是如此巨大，以至在一位观察家看来，一些人民委员将不得不辞职。会议结束时，仍在会场的人民委员减少到 9 人，并以 1 票之差同意“立即签署和约”。⁷⁰⁵在未与中执委协商的情况下，列宁和托洛茨基立刻向柏林发电，表示人民委员会准备按照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提出的条件签署和约。⁷⁰⁶

布尔什维克和左翼社革党之外的政治团体作何反应？实际上面对德军进攻的消息，它们都宣布准备捐弃前嫌，一致对外、保家卫国。于是难怪乎，对于俄国在 24 小时出头的时间里投降的消息，它们是一片愤怒。卡杰特、社革党和孟什维克报刊以极为尖锐的措辞，谴责政府接受德方和平条件，并要求立即重开立宪会议。

对列宁来讲，自由派和温和社会主义团体对于自己政策的激烈反对是可以想见的。更大的麻烦和更具潜在灾难性的是，对于未经一战便接受德方要求的决议，左翼社革党和很多布尔什维克关键人物所表现出的那种愤怒。这一问题持续而来的爆炸性立刻在 2 月 19 日下午召开的布尔什维克和左翼社革党中执委团会议上表现了出来。召开这些会议是为了确定对于政府和平政策（这一点将在当日夜的中执委全会上加以讨论）的立场。除了耳熟能详的列宁派和左翼共产主义者之间、左翼社革党类似集团之间在立即签署割地和约与革命战争之争中的分歧之外，在这些党团会议上，还就发送已经声名狼藉的列宁-托洛茨基电讯相关的程序问题，出现了激烈的抱怨。布尔什维克和左翼社革党当中对有条件投降的批评者，都反对人民委员会在未达法定人数的情况下，对这一关键的基本政策以一票之差并抛开中执委而作出决定。即便正常来讲列宁最信赖、最顺从的副手——斯

⁷⁰³ 《新生活报》，1918 年 2 月 20 日，第 3 版。

⁷⁰⁴ 《俄罗斯新闻》(Русские ведомости)，1918 年 2 月 21 日，第 2 版；《彼得格勒回声报》，1918 年 2 月 19 日，第 1 版。

⁷⁰⁵ 《新生活报》，1918 年 2 月 21 日，第 3 版；《新日报》，1918 年 2 月 20 日，第 3 版；《我们的消息报》，1918 年 2 月 20 日，第 2 版；《俄罗斯新闻》，1918 年 2 月 21 日，第 2 版；《彼得格勒之声报》，1918 年 2 月 21 日，第 2 版。

⁷⁰⁶ 《彼得格勒之声报》，1918 年 2 月 21 日，第 2 版。

维尔德洛夫也抗议未经中执委同意便发送列宁-托洛茨基电报。⁷⁰⁷庞大的左翼社革党党团是如此愤怒，以至立即重新试图从根本上加强中执委对人民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个人举动的控制权。尽管左翼社革党中央委员会已同意发送列宁-托洛茨基电报，但许多左翼社革党代表仍然愤怒于本党领导层的行动被其中一小撮成员所决定。⁷⁰⁸

因此，在2月19日下午的布尔什维克和左翼社革党团会议上，关键问题在于接受德方和平条件的列宁-托洛茨基电报是否应当予以撤回，以及是否应当对整件事予以重新讨论。这一问题在布尔什维克和左翼社革党那里都造成了巨大的分歧。起初，革命战争（或者像左翼社革党更爱用的说法“反帝起义”）的提倡者在左翼社革党党团比在布尔什维克党团更为强大。2月19日夜，两党党团内部持续进行的激烈争论的结果是，让全体中执委赞同立即按德方条件媾和的可能性是如此之小，一场血战给布尔什维克-左翼社革党执政联盟以及甚至现行政府架构带来灾难性结果的可能性是如此之大，以至布尔什维克中执委领导层在最后关头取消了夜间全会。取而代之的是极不寻常的布尔什维克与左翼社革党中执委党团闭门联席会议。⁷⁰⁹

在会上，列宁发表了时长2小时的讲话。其间，他穷尽了一切可以想见的、立即媾和的理由。可是，他的论说并没有说服以谢尔盖·姆斯季斯拉夫斯基（来自左翼社革党）和拉狄克（来自布尔什维克）为首的反对者，并且据报，在大约午夜时分联席会议休会时，是反列宁派得势。整夜和次日，两党党团断断续续地或分别或联席开会。两党党团都收到了坚决要求立即投降的克雷连科的秘密简报。他的简报似乎没有多大影响。目前，两个党团都无法达成共识。⁷¹⁰

如果说塔夫利达宫的布尔什维克和左翼社革党中执委党团仍然争论不休、犹疑不决，那么在彼得格勒其他地方也是如此。在德军重启攻势后不久，布尔什维克彼得堡委员会询问了下辖所有区委员会的意见。除维堡区党委意见不一之外，所有其他党委都压倒性地反对投降。⁷¹¹在这次军事危机新爆发之际，正在召开彼得格勒市布尔什维克第四次代表会议。这次由彼得堡委员会和区党委当选代表参加的会议，是在2月17日开幕的。当时，党员计有36000人，比年初少了12000人。⁷¹²但这是一个概数，因为尚无任何追查党员人数的措施——最重要的是，没有追

⁷⁰⁷ 《彼得格勒之声报》，1918年2月21日，第2版；和《新日报》，1918年2月21日，第3版。

⁷⁰⁸ 《社会民主报》，1918年2月20日，第2版；《彼得格勒回声报》，1918年2月19日，第1版。

⁷⁰⁹ 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1235号全宗，33号目录，10号案卷，第1张。

⁷¹⁰ 此间布尔什维克和左翼社革党中执委党团会议以及布尔什维克-左翼社革党团联席会议的记录未见于俄罗斯档案馆。对于2月19-20日的这几次会议，我见到的最佳媒体报道来自《我们的时代报》，1918年2月21日，第2版；《新日报》，1918年2月21日，第3版；《新生活报》，1918年2月20日，第3版，以及1918年2月21日，第2版；《社会民主报》，1918年2月21日，第2-3版。

⁷¹¹ 《共产党人》(Коммунист)，1918年3月14日，第2版。

⁷¹² 这一数字是斯维尔德洛夫在1918年3月初的第七次全国党代会上给出的。《俄共（布）第七次特别代表大会》，第4页。

踪夺取政权以来从彼得格勒不断流出的老党员。那时，还有很大一部分仍然留在彼得格勒的老布尔什维克全职担任政府或军事职务；他们实际上已经切断了与党组织的联系。

为了弥补上述损失，市代表会议的与会者通过了新的党务条例。⁷¹³彼得堡委员会的规模从各区委按比例代表制选举的至少 40 人，减少到一般由每季度市代表会议选举的 9 人。因此，如今并非所有 16 个区党委都在彼得堡委员会当中有代表。作为对这一变化的补偿，新条例规定创建一个全新的、代议制的代表苏维埃。代表苏维埃主要由各区委按 500: 1 的比例选举产生的代表组成，并将替代彼得堡委员会而成为两次季度市代表会议之间的地方最高党务机构。大约同时，还创建了一个新条例未提及的咨询机构，即[党的]组织员大会（Собрание организаторов）。它将由彼得堡委员会召集，并由各区有偿责任组织员组成。或许部分由于这些责任组织员中一些人兼任区党委书记，他们当中有异常多富有献身精神的女青年。⁷¹⁴

尽管组织员大会一直存在，⁷¹⁵但选举产生的代表苏维埃从未如预期般运作。⁷¹⁶结果事后来看，布尔什维克彼得格勒第四次市代表会议对彼得格勒党组织的精简和重塑严重破坏了相对的党内民主（这是 1917 年布尔什维克的一个主要力量来源）。虽然如此，对于就接受德方和平条件而进行的激烈争论来说，最重要的是，市党代会和彼得堡委员会一样，都由左翼共产主义者掌控。因此无怪乎会议在 2 月 20 日转而讨论政府那富有争议的求和决定。⁷¹⁷对于战还是和，列宁和拉狄克分别阐述了各自相互对立的看法。之后，与会者甚至都没有讨论这些看法。会议不顾列宁的警告“彼得格勒无产阶级的精华将在一场对德斗争中牺牲掉”，通过了一份措辞尖锐的决议，责备中央委员会，并要求撤回人民委员会接受德方和平条件的决定。⁷¹⁸

就许多方面而言，在此时对人民委员会和平政策的抗议中，最不祥的是由 4 名少数派中央委员（布哈林、乌里茨基、洛莫夫、布勃诺夫）和其他 7 名党的杰出领导人（雅科夫列娃、波克罗夫斯基、斯米尔诺夫、皮达可夫、梅奇斯拉夫·布龙

⁷¹³ 中央国家历史-政治文献档案馆，4000 号全宗，7 号目录，814 号案卷，第 12-17 张；《共产党人》，1918 年 3 月 5 日，第 4 版。

⁷¹⁴ 芭芭拉·埃文斯·克莱门茨在《布尔什维克女性》（剑桥，1997 年）中，对重要的女布尔什维克（包括数位彼得格勒的责任组织员）做出了令人瞩目的研究。

⁷¹⁵ 3 月、4 月和 6 月的组织员大会会议记录见中央国家历史-政治文献档案馆，1 号全宗，1 号目录，66 号案卷，第 1-25、50-33（译者注：原文如此，此处当有误）张；和 4000 号全宗，7 号目录，814 号案卷，第 1-81 张。组织员大会继续运作到了至少 1918 年 12 月 25 日，目前所知的大会议记录最晚到这一天。

⁷¹⁶ 1918 年 4-7 月的代表苏维埃会议记录，见中央国家历史-政治文献档案馆，4000 号全宗，7 号目录，820 号案卷。

⁷¹⁷ 《共产党人》，1918 年 3 月 5 日，第 4 版；《真理报》，1918 年 2 月 19 日，第 4 版。

⁷¹⁸ 中央国家历史-政治文献档案馆，12 号全宗，1 号目录，4 号案卷，第 1 张背面；《共产党人》，1918 年 3 月 5 日，第 4 版；《我们的时代报》，1918 年 2 月 21 日，第 2 版；《俄罗斯新闻》，1918 年 2 月 21 日，第 2 版。

斯基⁷¹⁹和亚历山大·斯蓬德⁷²⁰) 联署的一份声明。这份声明实际上是对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多数派的宣战书。它谴责中央委员会有意按德方条件达成和约是“对国际无产阶级事业特别恶毒的一击”，这将不可避免地“摧毁十月革命以来[俄国]无产阶级在建设社会主义方面已经完成的所有工作”。在列宁看来，其中最吓人的莫过于，署名者宣布决心在党内鼓动反对并在近期的党代会上推翻多数派的和平政策。⁷²¹

此时左翼社革党的中央和地方委员会，也通过了类似不合作的、反对媾和和支持开战的决议。最重要的是，2月20日，左翼社革党中央委员会的相当多数表示反对单独媾和，由此便逆转了委员会在2月18/19日夜通过的立场。通常可靠的《新生活报》报道称，在这次会议上，反对接受单独媾和的情绪是如此高涨，以至除非列宁和托洛茨基取消接受德方条件，否则多数中央委员准备立即与布尔什维克拉开距离。⁷²²

在左翼社革党中央委员会反悔后不久，左翼社革党中执委党团形成了支持革命战争的共识。⁷²³此外，大约同时，布尔什维克中执委党团内的力量对比，据称在彼得格勒市党代会形势发展的影响下，甚至更加强烈地转向了左翼共产主义者。⁷²⁴

* * *

在列宁-托洛茨基投降电报发出后的最初几天里，德国政府显然并不急于做出回复，这进一步加剧了布尔什维克和左翼社革党阵营当中日益浓厚的好战情绪。德军继续沿着广阔的战线前进，沿着联通里加、雷韦尔和普斯科夫的铁路干线夺取了一座又一座城镇。很快，彼得格勒自身就面临着它在心理和军事上都未有准备的迫近的攻击危险。

⁷¹⁹梅奇斯拉夫·亨里科维奇·布龙斯基（Мечислав Генрихович Бронский/Mieczysław Broński, 1882-1938），生于波兰工厂主家庭，1900年起参加革命活动。1902年加入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此后主要从事鼓动和宣传工作。参加了1905年革命，次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后流亡国外，在瑞士继续从事革命工作。一战期间，为齐美尔瓦尔德左派。二月革命后，返回俄国，为布尔什维克从事宣传鼓动工作。十月革命后，从事《真理报》编辑工作，并任副贸易与工业人民委员。1920年代，主要从事外贸工作。1928年，因庇护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而被撤职，此后主要从事经济教育工作。大清洗期间被处以死刑，1956年平反。——译者注

⁷²⁰原文为“安德烈·斯蓬德”(Andrei Spunde)，恐误。亚历山大·彼得罗维奇·斯蓬德(Александр Петрович Спундэ, 1892-1962)，生于工人家庭，1909年加入拉脱维亚社会民主党。1917年成为布尔什维克乌拉尔局成员，次年担任苏俄人民银行人民委员。1919-1921年，从事地方工作。此后，主要从事银行、农业、财政和铁道工作，1931年退休。大清洗期间被开除出党，1956年平反。——译者注

⁷²¹《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会议记录》，第209-210页。

⁷²²《新生活报》，1918年2月21日，第2版。左翼社革党第三次彼得格勒代表会议迅速支持了这一转向（《劳动旗帜报》，1918年2月26日，第1版）。

⁷²³《我们的时代报》，1918年2月21日，第2版。

⁷²⁴《我们的时代报》，1918年2月21日，第2版。亦参见德·弗·奥兹诺比申（Дмитрий Владимирович Ознобишин），《从布列斯特到尤里耶夫》（От Бреста до Юрьева），第88页。

德军进攻的消息使苏维埃政府和军事人民委员部当局大吃一惊。对于俄国的不堪一击，俄军军官是比其他人（或许列宁除外）更为敏感的。他们在托洛茨基宣布“不战不和”之后，对德国人会满足现状抱着一丝希望。而使旧军队复员显得有些秩序以及着手建立一支社会主义新红军的努力，进展并不顺利。在多年后所写的回忆录中，伊利因-热涅夫斯基⁷²⁵记起了这些担惊受怕地等待的日子里自己的感受：“和平度过的每一天都带来了新鲜的希望，而之后是晴天霹雳。德国人开始进军，并以难以置信的速度向彼得格勒扑来。”“我绝不会忘记，在我们的党和苏维埃当中，笼罩着人们的那种沉重压抑的情绪，”他继续写到。“许多人觉得，现在似乎失去了一切，我们将被德帝国主义的武装力量摧毁，苏维埃共和国注定要成为德国的殖民地。”在第一批向普遍的绝望屈服的人当中，有伊利因-热涅夫斯基的妻子。她于 2 月 20 日饮弹自尽。⁷²⁶

2 月 19/20 日深夜，人民委员会已经讨论过组织防御并在必要时进行革命战争的可能。⁷²⁷据报道，这次讨论的焦点更多地在于，生存至德国无产阶级能够“从背后打击德帝国主义”的前景，而非以传统方式组织防御行动的可行性。此外，鉴于旧军队成员、赤卫队和匆匆集结的红军部队在与德军的冲突中不断惨败，游击战再次作为有希望的战略而被提出。⁷²⁸安东诺夫-奥弗申柯的非常规部队在顿河流域的胜利进军无意中加强了这种想法。

2 月 20 日，人民委员会听取了克雷连科和海军总参谋部代表瓦西里·阿尔特法特尔⁷²⁹有关前线日益扩大的混乱的报告，通过了诸多应急措施，以动员彼得格勒人民保卫首都、创建战争基金并疏散不适于兵役的市民。在左翼社革党的发起下，人民委员会组建了一个由布尔什维克的列宁、托洛茨基和斯大林，以及左翼社革党的卡列林和普罗什·普罗尚组成的临时执行委员会。在紧急情况下，该委员会代表休会期的人民委员会活动。⁷³⁰

2 月 21/22 日夜在斯莫尔尼宫召开了持续三小时的彼得格勒苏维埃紧急全会。这次会议反映了当时支持立即媾和的布尔什维克所面临的两难困境，即他们需要考虑到德国人似乎越来越不可能同意可以接受的投降条件，而同时正在动员工

⁷²⁵ 亚历山大·费奥多罗维奇·伊利英-热涅夫斯基（Александр Фёдорович Ильин-Женевский，1894-1941），生于贵族家庭，国际象棋大师。1912 年加入布尔什维克，1914 年返回俄国参加一战，后参加 1917 年革命，曾为彼得格勒军革委委员。后主要从事国际象棋运动相关工作。——译者注

⁷²⁶ 伊利英-热涅夫斯基，《掌权的布尔什维克》，第 22 页。

⁷²⁷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19 号全宗，1 号目录，65 号案卷，第 1 张。

⁷²⁸ 《新生活报》，1918 年 2 月 23 日，第 3 版。

⁷²⁹ 瓦西里·米哈伊洛维奇·阿尔特法特尔（Василий Михайлович Альтфатер，1883-1919），生于高级军官家庭，1902 年从海军军校毕业。1902 年起担任沙俄海军军官，曾参加日俄战争。1916 年起担任大本营海军参谋部参谋长。1917 年末转向布尔什维克，并作为海军专家参加了布列斯特谈判，次年起在陆海军人民委员部任职。1918 年 10 月，被任命为苏俄海军司令。1919 年因心脏病去世。——译者注

⁷³⁰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19 号全宗，1 号目录，65 号案卷，第 1 张背面-第 2 张；《我们的时代报》，1918 年 2 月 22 日，第 2 版。

人、士兵和农民参加似乎越来越像事关革命存亡的斗争。⁷³¹季诺维也夫召集此次会议的首要目的在于，争取它支持接受德方条件。布尔什维克的彼得格勒苏维埃党团在激烈论争的党团会议（时长远超计划，以至全会推迟了两个多小时）上，终于就此问题达成了共识。无论2月18/19日中央委员会以微弱优势表决支持媾和，还是20日市党代会高声支持革命战争，对仍不受党的外部监督的党团都没有约束力。季诺维也夫在拉舍维奇的帮助下，努力使党团接受列宁的观点。拉狄克和梁赞诺夫领导着左翼共产主义者的战斗。他们呼吁党团：不要通过列宁-托洛茨基电报，要求人民委员会和中执委停止与德国人的交易、专注于军事防御。根据掌声判断，党团是同情拉狄克和梁赞诺夫的。但是，它投票支持了季诺维也夫和拉舍维奇。这一决定对整个党团都有约束性；散会时，季诺维也夫坚持了这一点。⁷³²

季诺维也夫为政府行为所做的冗长而热烈的辩护拉开了全会的序幕。⁷³³“最大的耻辱是，”他绘声绘色地说道，“我们必须承认，我们的士兵无论如何实际上都没有进行抵抗。……已经发生过这样的情况：几群没有武装的德军士兵驱散了我军数百人”（黑体为原文如此）。同时，他坚称，如果德国人不给俄国以喘息之机，那就只能捍卫革命直到“最后一人和最后一弹”。在整篇讲话中，季诺维也夫摇摆于两种在策略上不协调的立场之间：一方面，完全有必要立即投降；另一方面，重中之重是为了革命防御战而把其他所有问题放到一边。季诺维也夫尤其强调后者，并宣布“社会主义祖国在危急中”（这是在当天早些时候苏维埃报纸刊出的保卫革命的高调口号）。

克雷连科进一步证实了前线日益扩大的灾难及其经济影响。在他的描述中，俄国铁路网由于逃离战场的俄军士兵，而充斥着极端的混乱。他断言，无论采取了何种措施来立即结束目下战事，如果不在某种程度上堵住这一人潮，彼得格勒将不可避免地发生饥荒，并会完全丧失建设社会主义的可能性。克雷连科呼吁立即征兵，并从彼得格勒最老练有力的工人和士兵之中向前线派遣大量鼓动员。如果这些鼓动员使前线部队恢复了一定秩序，他暗示称，那么日益严重的食品供应危机便会得到减轻，彼得格勒也会得到防御（如果有必要的话）。⁷³⁴

在季诺维也夫和克雷连科的上述讲话之后，彼得格勒苏维埃各党团的代表被给予时间陈述自己的立场。米哈伊尔·利文森⁷³⁵代表左翼社革党，叶夫列姆·贝格⁷³⁶代表社革党和孟什维克提出了反映各自立场的决议。利文森的决议要求取消列宁-

⁷³¹ 《消息报》，1918年2月22日，第2-3版；《新晚间报》，1918年2月22日，第2版；《我们的时代报》，1918年2月22日，第3版。

⁷³² 斯图波琴科 (Л. Ступоченко/L. Stupochenko)，《在布列斯特的日子里》(В Брестские дни)，莫斯科，1926年，第10-12页。

⁷³³ 《我们的时代报》，1918年2月22日，第3版；《消息报》，1918年2月22日，第3版；《新晚间报》，1918年2月22日，第2版。

⁷³⁴ 对于这些部队当中几乎全面的混乱，值得注意的文字描述见一位红军政委的报告，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146号全宗，1号目录，169号案卷，第30张。

⁷³⁵ 米哈伊尔·阿布拉莫维奇·利文森 (Михаил Абрамович Левенсон, 1888-1938)，生于犹太商人家庭，1905年加入社会革命党。后因试图刺杀参与镇压1905年革命的俄军高级军官而被捕，1909年越狱并流亡国外，在索邦大学取得博士学位。二月革命后返回俄国，并被选入彼得格勒苏维埃

托洛茨基电报，并动员全国力量来与德国人战斗。这使得季诺维也夫责备左翼社革党“在其最关键的时刻之一”与革命分道扬镳。贝格的社革党-孟什维克联合决议呼吁立即任命一个具有广泛代表性的新政府，“再次召集”立宪会议，并召开一次国际社会主义和平大会。

安东·斯卢茨基代表布尔什维克提出的决议反映了该党在策略上的两难困境。它在表示支持发出列宁-托洛茨基电报后，明确表示德国人有摧毁革命的企图。因此，决议呼吁彼得格勒工人和士兵“立即起来保卫社会主义俄国和她的革命首都”。决议准备组建彼得格勒革命防卫委员会（Комитет 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й защиты Петрограда），以指挥和协调防御准备工作。⁷³⁷最后，它呼吁区苏维埃组建派往前线的鼓动员队伍，以使复员进程具有一定秩序。与会者就以上三个决议进行表决，并通过了布尔什维克的决议。组建彼得格勒革命防卫委员会也得到了批准，并且它的主要职能被认为是领导防御战的准备工作。⁷³⁸

* * *

2月21/22日夜10时，彼得堡苏维埃开始审议人民委员会的和平政策，与此同时斯维尔德洛夫召开了拖延已久的中执委会议（表面上是为了讨论相同的问题）。⁷³⁹不能忽视两次会议在政治意义和面貌上的差异。最重要的是，在彼得格勒苏维埃当中，左翼社革党和布尔什维克之间就战与和的问题存在难以调和的冲突；但支持列宁的布尔什维克占多数。在这次中执委会议上，部分由于许多左翼共产主义者缺席，左翼社革党占据了明显多数。⁷⁴⁰最有责任避开这颗致命子弹的个人是策略机敏的中执委主席斯维尔德洛夫。对于和平问题的反复无常，以及中执委日益愤恨于人民委员会未征询其意见便发送列宁-托洛茨基投降电报，他比自己党内的其他同事更为敏感。为了使热忱冷却下来，他推迟了中执委会议。似乎由于他

主席团，后参加左翼社革党。1918年起，在伊尔库茨克从事打击白卫军的工作。1920年后，从事劳动监察和贸易工作。大清洗期间被处以死刑，1956年平反。——译者注

⁷³⁶叶夫列姆·所罗门诺维奇·贝格（Ефрем Соломонович Берг, 1875-1937），出生于犹太家庭，后参加社会革命党。1917年当选社革党中央委员，后被捕、判刑。大清洗期间被处以死刑，2001年恢复名誉。——译者注

⁷³⁷《消息报》，1918年2月22日，第3版。据斯维尔德洛夫称，该委员会将具有不受限制的权力（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1235号全宗，18号目录，8号案卷，第40张）。

⁷³⁸就此，见安·利·弗赖曼（Антон Львович Фрайман），《1918年2-3月彼得格勒的革命防卫》（Революционная защита Петрограда в феврале-марте 1918 г.），莫斯科-列宁格勒，1964年，第82页。彼得格勒革命防卫委员会最初的成员有布尔什维克季诺维也夫、斯维尔德洛夫、拉舍维奇、沃洛达尔斯基和扎卢茨基，以及左翼社革党人雅科夫·菲什曼（Яков Моисеевич Фишман）和米哈伊尔·利文森。委员会后来增补了1名军事人民委员代表、当日（2月21日）早些时候组建的彼得格勒军区特别指挥部（Чрезвычайный штаб Петроградского военного округа）全部5名成员、5名中执委代表和2名分别来自布尔什维克和左翼社革党的成员（《真理报》，1918年2月23日，第2版）

⁷³⁹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1235号全宗，18号目录，7号案卷，第32-41张；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86号全宗，1号目录，76号案卷，第1-15张。

⁷⁴⁰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1235号全宗，18号目录，7号案卷，第30-32张。

的作用，列宁相信上述愤恨的可能意义，并他被迫承诺无论德方作何反应，人民委员会经与中执委再做商议之后，才会采取进一步的和谈措施。⁷⁴¹

在中执委主席团会商夜间全会的议程时，甚至列宁都开始承认防御的必要性。这有益于斯维尔德洛夫。完全由布尔什维克和左翼社革党人组成的主席团领导层，以未来任何关乎和平问题的决定均服从中执委的专权为基础，制定了议程和步骤，以确保全会不出现激烈对立。特别是同意，会议甫一开幕，斯维尔德洛夫便报告迄今为止的和平进程；此后会要求中执委搁置政策分歧，通过一份照例支持政府的媾和努力并表示相信工人、士兵和农民会团结起来捍卫“社会主义苏维埃政权免于一切攻击”的主席团决议。⁷⁴²从国内外敌人手中拯救社会主义革命将是会议的主题。

计划如此，并且实施得严丝合缝。尽管在其开场报告中，斯维尔德洛夫没有完全排除这种可能性，即德国人或许会对列宁-托洛茨基电报报以可接受的和平条件，但显然他像人们普遍所设想的那样，觉得这是不可能的。以这样的精神，他高声念出了一连串已由人民委员会发布的振奋人心的武装呼吁（其中包括“社会主义祖国在危急中”）。念出这些呼吁的意图，一方面在于表明政府尽管努力争取立即媾和，但承诺捍卫革命，另一方面则在于传递军事紧急状态即将来临的气氛。斯维尔德洛夫接着宣布，他已征得主席团同意，不会开放讨论，“因为中执委所有成员都已经相当充分地思考和讨论过当前局势了，”就此他也提议不经过讨论而通过一项支持政府和平努力并准备捍卫革命的决议。孟什维克国际派拉斐尔·阿布拉莫维奇徒劳地抗议称，主席团提出的决议未能处置任何需要立即澄清的、与和平相关的问题，并问道，哪个国家的最高政府机构会被禁言两天——确实，为什么仍然不许“反对派”发声。⁷⁴³与会的 150 名中执委委员中，仅有 6 人投票反对主席团的决议；仅有 1 张反对票来自温和社会主义者。⁷⁴⁴拖延已久的中执委全会由此闭幕。它开了还不到一小时。

* * *

2月 22/23 日夜，被苏维埃官员作秘密通讯之用的皇村无线电台（因其是彼得格勒地区最安全的长波通讯设施）收到了布列斯特俄方代表团团长格奥尔基·契切林的两封电报。第一封电报告知人民委员会，德方对俄方媾和提议所作之回复已交予一名苏方信使，后者正将其带回彼得格勒。第二封电报告知托洛茨基，奥匈国及其盟国准备结束和谈。⁷⁴⁵条件于上午 10:30 送达，尽管苛刻，但未必令列宁吃惊。除了此前在布列斯特坚持的条件之外，德国人如今还要求俄国转交利沃尼亚和爱沙尼亚的控制权；退出并承认芬兰、乌克兰和格鲁吉亚的独立；立即复员旧

⁷⁴¹ 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1235 号全宗，18 号目录，7 号案卷，第 39 张。

⁷⁴² 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1235 号全宗，18 号目录，7 号案卷，第 37 张。

⁷⁴³ 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1235 号全宗，18 号目录，7 号案卷，第 34-38 张。

⁷⁴⁴ 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1235 号全宗，18 号目录，7 号案卷，第 38 张。

⁷⁴⁵ 《我们的时代报》，1918 年 2 月 24 日，第 2 版。

俄军、新建的红军和赤卫队；封闭俄国海军⁷⁴⁶或解除其武装，恢复 1904 年贸易协定，并且事实上付出相当数量的赔款；停止在同盟国领土内进行革命宣传。苏维埃政府被限期 48 小时内接受条件。新条件送达时，期限已经过半，情况由此变得更为复杂。⁷⁴⁷

列宁在头脑中如何考虑德国人的新条件，这是令人好奇的。他是否会因为它们也就这般苛刻而松了一口气？它们毕竟类乎他在 2 月 18/19 日中央委员会深夜会议上提出的俄国或许不得不接受的条件。另一方面，这几天已经表明，许多（如果不是大部分）列宁最亲密的战友是如何深刻、广泛地厌恶向德帝国主义屈膝。他在这个布尔什维主义和俄国革命的关键历史关头决绝地克服自己的反对者——很少有其他事例能更好地表现出列宁传奇般的坚韧和意志力。

给 2 月 23 日下午商议德方新条件的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下的赌注不能输。对于如何确保革命的存续，两种看法针锋相对。此外，即将展开斗争的党内各派都觉得其他派别鼓吹的政策一定是自杀性的。

书记员对这次会议所做的机械式的简要记录看上去尤其别扭。⁷⁴⁸“斯维尔德洛夫同志念出了德方条件，”记录开头写到。列宁几乎立刻把自己的牌全都摊到了桌上。记录写道：“列宁同志认为，喊革命口号的政策已经结束。如果现在继续这一政策，他将辞去政府和中央委员会的职务。革命战争需要一支军队，[而]现在还没有。这意味着必须接受条件。”左翼共产主义者立刻明白：列宁威胁辞职不是随便一说，也不是虚张声势；如果反对接受德方条件，他们将不得不承担管理苏维埃俄国的责任，并负责领导对德帝国主义和俄国资产阶级的战斗；会有多少无产阶级支持列宁。列宁煞费苦心，消除了这一问题上的一切犹疑。

大部分中央委员相继表示接受和平条件。托洛茨基宣称：“列宁的论说并不完全令人信服。”季诺维也夫则相反地宣称：“从过去几天的经验来看，显然没有[为无产阶级而战的]热忱。……我们如今必须接受[德方]提议。”布哈林猛烈抨击德方条件，并称它们“不支持列宁的预测[即有可能提供在短时期内准备革命战争的‘喘息空间’]”。斯大林支持列宁。“要么我们获得喘息空间，要么革命死亡——没有其他可行的选项。”他插话道。斯维尔德洛夫和索科利尼科夫表示，他们会投票支持列宁、季诺维也夫和斯大林。乌里茨基和洛莫夫同样明确表示，他们坚决反对签署和约，并将据此投票。乌里茨基坚称：“签署和约救不了苏维埃政权。”洛莫夫对于群众情绪，做出了迥异于季诺维也夫的估计。“这里所说的惊慌是不存在的，”他说道，“我们[通过进行防御]会受益良多。”

⁷⁴⁶ 指“军舰驶回俄国海港并在普遍性和约订立以前留在港内”，见《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载《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徐天新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年，第 102 页。——译者注

⁷⁴⁷ 迪博，《革命与生存》，第 142 页；惠勒-贝内特，《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第 255-257 页。

⁷⁴⁸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会议记录》，第 211-218 页。

左翼共产主义者当中唯一公开接受抛开列宁的洛莫夫提出：“没有理由被列宁的辞职威胁所吓倒。我们[左翼共产主义者]必须接手没有弗·伊·[列宁]的政权。”但显然，许多左翼共产主义者对这种前景惴惴不安。捷尔任斯基、克列斯京斯基⁷⁴⁹、越飞和托洛茨基亦然。托洛茨基并不同意列宁所谓的如果拒绝德方条件，革命注定灭亡。相反，他表达了这样的信心，即如果党团结一致，便有可能组织起对德防御战，并取得成果。舍此便不可能领导一场革命战争。

在是否接受德方条件付诸表决之前，布哈林再次攻击了列宁及其党羽，但战斗失败了。表决结果是7票赞成接受德方条件（列宁、斯塔索娃、季诺维也夫、斯维尔德洛夫、斯大林、索科利尼科夫和斯米尔加），4票反对（布勃诺夫、乌里茨基、布哈林和洛莫夫），4票弃权（托洛茨基、克列斯京斯基、捷尔任斯基和越飞）。在一份克列斯京斯基紧接表决之后念出的书面声明中，克列斯京斯基、越飞和捷尔任斯基辩称，他们弃权的理由是，虽然反对签署和约，但列宁威胁的那种党的分裂更具灾难性。⁷⁵⁰乌里茨基代表像他那样投反对票的委员，宣读了一份宣言。在宣言中，乌里茨基、布哈林、洛莫夫和布勃诺夫，以及雅科夫列娃、皮达科夫和斯米尔诺夫注意到，实际上大部分中央委员并未向德国人妥协，而是提出辞去党和政府的高级职务，以便在党内外自由地进行反对和约的战斗。⁷⁵¹左翼共产主义者的直接关切显然在于，阻止布尔什维克中执委党团和中执委通过和约。在列宁看来，由于两方面的原因，事情仍有变数：第一，存在新的危险，即左翼共产主义者或许会一方面在布尔什维克中执委党团中取胜，同时另一方面又联合左翼社革党、孟什维克和右翼社革党，在中执委取得成功；第二，在当时情况下，左翼共产主义者的辞职很可能在党内造成决定性的分裂，并且几乎必定造成布尔什维克-左翼社革党联盟的瓦解。

鉴于此，列宁准备尽可能把左翼共产主义者留在党内。早在这次会议上，当被洛莫夫问及是否会允许左翼进行反对和约的鼓动时，列宁迅速做出了肯定回答。此外，斯维尔德洛夫在讨论接近尾声时，默认了乌里茨基提出的条件，即他和自己的同事能够完全自由地在中执委游说甚至投票反对协议（从而推迟辞职）。后来，列宁鼓励但没有坚持要求左翼共产主义者在表决时留在会场。结果，带着这种暧昧的理解（即暂时不提出辞职，以待明天更进一步的商讨），委员们讨论了布尔什维克与左翼社革党中央委员会联席会议、布尔什维克与左翼社革党中执委党团联席会议，以及中执委与彼得格勒苏维埃联席全会的计划。根据计划，所有

⁷⁴⁹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克列斯京斯基（Николай Николаевич Крестинский，1883-1938），生于教师家庭，1903年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后成为布尔什维克。1906年起在布尔什维克西北区域委员会工作，1908年起以合法身份参加杜马工作。二月革命后，当选布尔什维克叶卡捷琳堡省委员会主席。1917年8月，当选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十月革命期间，担任叶卡捷琳堡军事革命委员会主席，并当选立宪会议代表。当年末，开始从事财经工作。布列斯特谈判期间，为左翼共产主义者。1918-1922年，担任苏俄财政人民委员。1919年当选布尔什维克中央政治局委员。1920年代，为左翼反对派和托-季反对派联盟成员，并曾在德国从事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1930年代，主要从事外交工作。大清洗期间被处以死刑，1963年平反。——译者注

⁷⁵⁰《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会议记录》，第216页。

⁷⁵¹《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会议记录》，第216页。

这些会议应当立刻前后相继地在塔夫利达宫召开。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会议接近结束时，列宁给皇村的无线电台匆匆写了一封短笺，指示后者准备于早晨 7 时（德方设定的截止时间）之前向德国政府发出电报。⁷⁵²

* * *

布尔什维克-左翼社革党中执委党团联席会议于 2 月 23 日夜 11 时召开。会议一开始，克雷连科再次可怖地汇报了俄军士兵逃离前线，并绝望地要求立即投降。左翼社革党人觉得克雷连科的评论实在片面，便用抗议声将之打断。听众席上有人喊道“舰队呢？”——拉斯科尔尼科夫绝望地挥手答道：“没有舰队。……士兵逃回家了，把他们的船留给了敌人。”⁷⁵³

两党党团都仅被允许进行两次发言（一次支持媾和，一次反对），并且不许讨论。在布尔什维克这边，列宁发言支持接受德国的最后通牒，拉狄克则发言反对。⁷⁵⁴左翼社革党拒绝派人发言支持媾和，卡姆科夫顽固地坚称，他的党团一致反对接受德国的和平条件。结果，唯有热烈提倡革命战争的施泰因贝格发表了讲话。在这次联席会议结束时，没有进行表决，因为左翼社革党党团已经决定不接受新条件，而布尔什维克党团尚未就此进行讨论。

随后，斯维尔德洛夫迅速召集布尔什维克中执委党团开会，并提议与会的布尔什维克不再进一步讨论是否接受德方和平条件，而是直接就此进行表决。“但我们也连问题都不能问吗？”一位党团成员谨慎地问道。“当然能问。”斯维尔德洛夫答道。据与会的斯图波琴科称：“如今发生的可算我所听说过的最有意思的讨论之一了。”媾和的反对者不断地向列宁提问，“每一个都比上一个更恶毒”。⁷⁵⁵领导这波攻击的是尤里·斯捷克洛夫⁷⁵⁶。最后投票时，列宁的立场据报得 72 票，左翼共产主义者则得 25 票。⁷⁵⁷后者还遭受了另一重打击：斯捷克洛夫提议党团成员不应受此次讨论的约束，以便他们能像中央委员会默许的那样，在中执委会议上按自己的

⁷⁵²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年谱》，第 5 卷，第 274 页。短笺刊于《列宁文集》，第 11 卷，第 27 页。《给皇村无线电台的指令》，《列宁全集》第 33 卷，中央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年，第 388 页。——译者注

⁷⁵³ 斯图波琴科，《在布列斯特的日子里》，第 18-19 页。

⁷⁵⁴ 对列宁发言的概述见列宁，《全集》，第 35 卷，第 372 页。《在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布尔什维克党团和左派社会革命党团联席会议上的讲话》，《列宁全集》第 33 卷，中央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年，第 391 页。——译者注

⁷⁵⁵ 斯图波琴科，《在布列斯特的日子里》，第 24 页。

⁷⁵⁶ 尤里·米哈伊洛维奇·斯捷克洛夫（Юрий Михайлович Стеклов，1873-1941），生于犹太资本家家庭，早年即参加革命活动。1893 年参加社会民主主义运动，次年因工运活动被捕，后被流放。1899 年从流放地脱逃，后从事宣传工作。俄社民工党二大上支持布尔什维克，参加了 1905 年革命，并被捕。1909 年皈依基督教，后参与社民党人的杜马工作，1910 年流亡国外。持革命护国主义立场，曾积极参加二月革命，当选彼得格勒苏维埃执委会委员。十月革命后，主要从事报刊编辑和教育科研工作，曾参与起草苏俄宪法和苏联宪法。大清洗期间被捕，并被判处有期徒刑，1941 年因病死于狱中。1956 年平反。——译者注

⁷⁵⁷ 《我们的时代报》，1918 年 2 月 26 日，第 2 版。

良心投票，但这一提议未得通过。⁷⁵⁸

由于所有这些预备活动，斯维尔德洛夫直到凌晨3时才得以召开中执委全会。⁷⁵⁹那时距离德国最后通牒的时间仅剩4小时。以此为由，斯维尔德洛夫代表主席团提议，在听取德方和谈条件和人民委员会代表的15分钟报告后，各党团的一名代表有机会就接受还是拒绝德方和谈条件表达所在党团的看法。然后将该问题付诸表决。这一提议被接受，从而使甚至阐述左翼共产主义者的观点都不再可能。

在斯维尔德洛夫念出德方条件后，列宁作为人民委员会首脑发言。其间最值得注意的是，内阁对于新条件既未审议也未表决。严格来讲，列宁的发言仅代表了他本人对签署和约的看法。实际上，会上就和平问题出现了三种立场：(1)列宁和季诺维也夫表达的布尔什维克多数派立场；(2)卡姆科夫表达的左翼社革党立场；(3)分别由马尔科夫、米哈伊尔·利哈奇⁷⁶⁰和加夫里尔·林多夫⁷⁶¹代表的孟什维克国际派、社革党和统一社会民主党人-国际派的立场。

列宁和季诺维也夫的发言无需详述，因为他们谈的还是之前的看法。⁷⁶²卡姆科夫代表左翼社革党的发言表明，和平问题上的分歧给布尔什维克-左翼社革党的伙伴关系造成了何等深刻的裂痕。他明确有力地阐述了进行战斗的理由，还对列宁指控反对和约者逃避可厌现实和举止轻率报以嘲笑。相反，对于列宁所谓的除签署和约之外别无他选，卡姆科夫坚称，只有明确拒绝德国的新条件并宣布进行反对世界资产阶级的普遍“起义”（即便这意味着，在被中欧革命解救之前，俄国需要放弃彼得格勒和广大领土），作为一场社会主义革命的俄国革命才有得救的希望。⁷⁶³

在马尔托夫看来，和平条件本身证明，接受它们便注定了俄国革命的早夭。他宣称，“喘息空间”的想法（正是以此为基础，列宁才得以期望早日复兴俄国革命）

⁷⁵⁸ 斯图波琴科，《在布列斯特的日子里》，第27页。

⁷⁵⁹ 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1235号全宗，18号目录，8号案卷，第91-110张；《我们的时代报》，1918年2月26日，第2版。

⁷⁶⁰ 米哈伊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利哈奇（Михаил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Лихач，1887-1931），生于警察家庭，1903年加入社会革命党，次年被捕。获释后在彼得堡组织战斗队，1907年流亡国外，后返回俄国。1916年被征召入伍，后从事兵运工作。1917年当选社革党中央委员和立宪会议代表。1918年参加反布尔什维克暴动，1921年被捕。1922年被判处死刑，后减刑为有期徒刑。获释后于1930年因从事政治异见鼓动活动而再次被捕，1931年被判处有期徒刑，同年因肺炎死于狱中。
——译者注

⁷⁶¹ 加夫里尔·达维多维奇·莱特伊仁（Гавриил Давидович Лейтейзен/Gawriil Dawidowicz Lejtejzen，1874-1919），化名“林多夫”（Линдов），生于铁匠家庭。1890年代初即参与社会民主主义运动，1895年逃亡国外，后参加劳动解放社。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二大期间，加入布尔什维克。1905年末返回俄国，在彼得堡工人当中从事组织和宣传工作。1907年当选俄社民工党中央委员会，同年被捕，并流放图拉。此后主要在图拉从事革命工作。一战爆发后，被征召入伍。二月革命后，返回图拉，并参加统一社会民主党人-国际派。1918年4月，脱离统一社会民主党人-国际派，重返布尔什维克。内战期间在红军中从事军事和政治工作，1919年在战斗中牺牲。
——译者注

⁷⁶² 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1235号全宗，18号目录，8号案卷，第98、101张。

⁷⁶³ 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1235号全宗，18号目录，8号案卷，第99、102张。

不过“自欺”而已。他表示，德方条件实际上确保了“苏维埃政权一旦签署和约，便会沦为德国人的囚徒”。他还补充道：“你们必须明白这一点，并问问自己，为了苏维埃政权的生存，是否允许付出这样的代价。”在马尔托夫看来，仅有两种可接受的进程：或者在希望的鼓舞下战斗，或者如不能取胜，便像巴黎公社那样光荣战死。可是，他明确表示，他觉得，局势尚存希望，一种可行的策略是退入俄国腹地，并在那里以各主要革命力量的团结为基础而组织起一条防线。另一方面，列宁所要求的极端解决方案，即立即有条件投降，不是解决而是造成了灾难。⁷⁶⁴马尔托夫强调，同意德国的和谈条件是不可接受的，并且无论存在怎样的困难，都必须尝试与德国人一战，利哈奇和林多夫的讲话对此表示附议。⁷⁶⁵

在反对者发表上述讲话时，列宁站在主席座位旁，紧张地等待投票开始。一切迹象都表明，表决结果会极为接近。又是由于相当一部分委员（其中许多人是左翼共产主义者）的缺席，布尔什维克在近 230 名与会者当中没有占据多数。⁷⁶⁶即便所有到场的左翼共产主义者遵守布尔什维克党团多数派强加的纪律，投票接受德国的和平条件，列宁仍然需要另外四分之一与会者的帮助，才能保证它们被接受。同时在幕后，布列斯特和约的左翼社革党反对者试图把左翼共产主义者吸引到他们这边来。⁷⁶⁷同意以举手方式进行预备投票，然后立即唱票。斯维尔德洛夫先唱了同意票——112 票。结果太过接近以至难以宣布。然后点了反对票和弃权票——分别是 86 票和 22 票。一些布尔什维克士兵对这一结果鼓起掌来。掌声中，施泰因贝格愤怒地尖叫起来，用拳头敲击着自己政府座位⁷⁶⁸的扶手。⁷⁶⁹

清晨 4:30，在距离德方最后通牒时间 2 个半小时之前，列宁获得了授权。当他匆匆离开，以便从人民委员会获得同意致德国政府的接受电讯文本时，开始了唱票表决。中执委委员相继地走上讲台，宣布自己的表决情况。当布哈林投票反对接受和平条件时，温和社会主义者和左翼社革党在这一进程当中早早地鼓掌。⁷⁷⁰卢那察尔斯基据说在起而投出赞成票时流下了眼泪。唱票结果仅仅和预备投票的结果略有不同：116 票支持，85 票反对和 26 票弃权。“你不能就靠 5 票出卖俄国，”大厅后排的人叫道。22 名反对和约的左翼社革党人弃权。显然，他们帮了列宁一

⁷⁶⁴ 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1235 号全宗，18 号目录，8 号案卷，第 95-97 张。

⁷⁶⁵ 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1235 号全宗，18 号目录，8 号案卷，第 97-98、103-104 张；《我们的时代报》，1918 年 2 月 26 日，第 2 版。

⁷⁶⁶ 关于此次会议的与会人数，说法不一。投票数约 230 票。毫无疑问，布尔什维克不占多数。各党团与会者总数和对各党投票人的官方统计分析，见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1235 号全宗，18 号目录，8 号案卷，第 70、109-110 张。

⁷⁶⁷ 1924 年，数名前左翼共产主义者承认，卡姆科夫已经向布哈林和皮达可夫建议，他们应当与列宁分道扬镳，利用他们在中央委员会所占多数，并与左翼社革党一道组建一个反布列斯特的政府。这些前左翼共产主义者称，卡姆科夫的提议也就随口一说，而且他们也没把它当回事（《真理报》，1924 年 1 月 3 日，第 5 版）。或许这很可能是真的，但没有理由去怀疑，卡姆科夫的提议是认真的。

⁷⁶⁸ 指议会大厅中专为政府人员设置的座位。——译者注

⁷⁶⁹ 《我们的时代报》，1918 年 2 月 26 日，第 2-3 版。

⁷⁷⁰ 克·季·斯维尔德洛娃（Клавдия Тимофеевна Свердлова-Новгородцева），《雅科夫·米哈伊洛维奇·斯维尔德洛夫》（Яков Михайлович Свердлов），莫斯科，1960 年代，第 350 页。

个大忙。彼得堡委员会当中几位最热忱的左翼共产主义者（包括博基、沃洛达尔斯基、科肖尔和拉维奇）遵守党纪，也投票支持接受德方和谈条件。梁赞诺夫和皮亚特尼茨基像布哈林那样，表示异议，反对接受和约。那些“没有露面”的重要左翼共产主义者则包括柯伦泰、捷尔任斯基、克列斯京斯基、越飞、布勃诺夫和乌里茨基。⁷⁷¹

2月24日晨近7时，皇村的无线电台电告柏林：“根据中执委决议……人民委员会同意接受德国政府的和约条件，并将派代表团前往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⁷⁷²

* * *

托洛茨基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刚一宣布“不战不和”，许多（尽管不可能是全部）彼得格勒革命者便庆祝起“战争的终结”。即便托洛茨基都自信地觉得，他的以退为进之策已获成功。但德国人于2月18日做出回应，发起了旨在使己方战线大为逼近彼得格勒的攻势。

这轮攻势在布尔什维克领导层中引起了新一轮有关单独媾和的讨论。最初，在中央委员会和人民委员会中，多数人都坚决反对列宁所提出的请求立即媾和，以待观察欧洲无产阶级对德方行动的反应。但前线俄军兵败如山倒，以至2月18/19日深夜，托洛茨基为列宁提供了关键一票，使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得以表决接受德方条件。当日夜，与会者寥寥的左翼社革党中央委员会议和人民委员会会议，以类似的微弱优势接受了立即媾和；列宁和托洛茨基则向柏林发出了他们声名狼藉的“接受”电报。

此后，在布尔什维克和左翼社革党阵营中，有关单独媾和的冲突变得空前激烈。例如布尔什维克的彼得堡委员会，照旧严辞批判党和政府的媾和举动。在这种情绪中，彼得格勒布尔什维克第四次全市代表会议在讨论完组织改革（以便在某种程度上补偿严重的人员损失，同时保持决策的民主性）问题之后，责备中央委员会，并要求撤回人民委员会接受德方条件的决定。

同时，德军继续迅速推进。彼得格勒很快便似乎面临行将沦陷的危险。这一严峻的现实将党和政府领导层内的列宁多数派置于自相矛盾的立场上：一方面试图继续支持单独媾和，另一方面又要组织彼得格勒防务。令人讽刺的是，在2月21/22日夜的中执委，这一难题使斯维尔德洛夫将决策重心从媾和转到防务，进而由此通过决议，在照例为人民委员会的媾和政策背书后，呼吁俄国群众保卫革命到底。

但紧随其后，接受德方更为苛刻的和平条件再次引起了对战还是和的争论。在此关头，列宁威胁辞去党和政府的领导职务。由此似乎决定性地说服了多数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支持接受德方新条件。但布哈林领导的左翼共产主义者和左翼

⁷⁷¹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1235号全宗，18号目录，8号案卷，第109-110张。

⁷⁷²列宁，《全集》，第35卷，第381页。（《人民委员会关于接受德国和约条件的决定》，《列宁全集》第33卷，中央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400页。——译者注）

社革党仍然激烈反对。这些深刻的裂痕在历史性的 2 月 23/24 日夜中执委会议上得到了最为充分的表现。会上，列宁领导的立即媾和派赢得了一次结果极为接近的表决。毫无疑问，在通向退出战争的道路上，一个主要障碍被克服了。但由于德军日益逼近彼得格勒，由于相当一部分布尔什维克和左翼社革党人仍旧坚决反对单独媾和，前路依然障碍重重。

七、一份可耻的和约

2月24日凌晨，列宁电告德方，接受更为苛刻的和平条件，以期阻止快速前进的德军占领彼得格勒。他自然没有觉察到，德国人计划勒兵彼得格勒城下。因此，当天晚些时候收到的消息，使他重又担心起德国人有意夺取俄国首都并摧毁革命——首先是位于彼得格勒西南约150英里、铁路直通首都的普斯科夫沦陷；其次，德军最高统帅部拒绝了克雷连科提出的立即停火要求；最后据报，敌军正越过普斯科夫。与此同时，德军正深入今天的白俄罗斯和乌克兰。3月3日，将在布列斯特正式签署俄国退出世界大战的条约。中执委主席团到时会做出安排：莫斯科召开的全俄苏维埃第四次代表大会，将于3月12日开幕时批准该条约。⁷⁷³此间，随着德军继续前行，政府和党的列宁派领导层不得不一面为疏散（如有必要）做准备，一面指挥彼得格勒防务，同时还要与反革命势力以及激烈反对单独签署“可耻的”和约的左翼共产主义者和左翼社革党人作斗争。

* * *

2月26日，人民委员会经讨论后决定，中央政府疏散至莫斯科。⁷⁷⁴此前几天，危机重重。例如，随着2月24日德军进占普斯科夫，面对德方似乎要对彼得格勒发起的大规模攻势，俄军仓皇逃窜。同时，由于广泛动员了彼得格勒工人上前线，政府越来越容易遭到内部阴谋活动的破坏。2月22日，人民委员会建立彼得格勒疏散非常委员会⁷⁷⁵，从而开始了迁移中央政府的准备工作。⁷⁷⁶甚至在之前的2月20日，人民委员会便建立了临时执行委员会，后者会在迅速升级的军事危机中代表人民委员会行事。21/22日夜，首都被宣布处于包围状态，彼得格勒苏维埃建立了领导防务工作的彼得格勒革命防卫委员会。⁷⁷⁷

在其运作的最初几个小时里，人民委员会临时执行委员会迅速发布了大量文告，号召俄国人民武装起来。其中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祖国在危急中！》：

为了使疲惫不堪、疮痍满目的国家免除新的战祸，我们愿忍受最大的牺牲，向德国人声明我们同意接受他们提出的媾和条件。……[可是，]德国将军们想在彼得格勒和基辅建立自己的“秩序”。……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处

⁷⁷³ 《苏维埃政权法令》，第1卷，第512页；《消息报》，1918年3月3日，第1版。

⁷⁷⁴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19号全宗，1号目录，70号案卷，第1张。

⁷⁷⁵ 即由左翼社革党人弗·亚·阿尔加索夫担任主席的“彼得格勒后送与疏散非常委员会”（Чрезвычайная комиссия по эвакуации и разгрузке Петрограда）。该委员会更为普遍地被称为“彼得格勒疏散非常委员会”（Чрезвычайная комиссия по разгрузке Петрограда）。参见舍拉耶夫（Ю. Б. Шелаев）：“1918年春彼得格勒后送与疏散非常委员会的活动（基于新材料）”（Деятельность Чрезвычайной комиссии по эвакуации и разгрузке Петрограда весной 1918 г. [по новым материалам]），载《历史辅助学科》（Вспомогательные исторические дисциплины）第21卷，1990年，第30-39页。——译者注

⁷⁷⁶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19号全宗，1号目录，68号案卷，第1张及其背面。

⁷⁷⁷ 见上文，第6章。

在万分危急中。在德国无产阶级尚未行动起来和取得胜利之前，俄国工农的神圣义务，就是要奋不顾身地保卫苏维埃共和国，抗击资产阶级帝国主义德国的庞大军队。⁷⁷⁸

这份托洛茨基撰写、列宁批准的宣言通告俄国公民，人民委员会决定：全国兵力和资源应当完全用于革命防务；各苏维埃和其他革命组织应当保卫每一阵地至最后一滴血；应该尽一切可能防止德方利用俄国的铁路线和装备，并确保俄国的食品供给和其他有价值的财物不落入敌手。它还授权立即封闭反革命媒体，并“就地”枪决“敌方奸细、投机商人、暴徒、流氓、反革命煽动者、德国间谍”⁷⁷⁹。《社会主义祖国在危急中！》次日被电告全俄各地的苏维埃，并以人民委员会的名义刊于《真理报》和《消息报》。⁷⁸⁰

2月21/22日夜，中执委开会并商定，需要准备进行一场协调统一的防卫战。在此之前，人们就已开始采取措施，来阻挡“德国的庞大军队”。但无论德军力量几何，都难以组织起像样的防务。前线旧军队因士气低落而不能指望。而正如克雷连科2月21日向彼得格勒苏维埃所示，彼得格勒卫戍部队也陷于严重的瓦解状态。

卫戍部队的不可靠在2月25日显露了出来。当时，担任彼得格勒军区司令和彼得格勒革命防卫委员会委员的布尔什维克康斯坦丁·叶列梅耶夫⁷⁸¹，试图调动名义上归他指挥的北方战线部队。除拉脱维亚步兵团之外，对出京迎击德军怨声载道的卫戍部队都拒绝调动。⁷⁸²确实，2月24/25日夜（即所谓工厂汽笛之夜），在政府当局和市民普遍认为，普斯科夫的陷落意味着德军即将攻击首都的时候，大部分卫戍部队的群众大会誓死保卫首都。但实际上，它们都置身事外。一些部队要求确保提高配给和薪水，否则拒绝参战。但更典型的是彼得格勒团和伊兹马伊洛沃团⁷⁸³的所作所为：布尔什维克费尽心力，才设法把人弄出营房、组织成型，但仅有乱糟糟的几队士兵愿意走向等在华沙站的火车，并且最后除个别布尔什维克

⁷⁷⁸ 《社会主义祖国在危急中！》，《列宁全集》第33卷，中央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370页。——译者注

⁷⁷⁹ 《社会主义祖国在危急中！》，《列宁全集》第33卷，中央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373页。——译者注

⁷⁸⁰ 《消息报》，1918年2月22日，第1版；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19号全宗，1号目录，67号案卷。

⁷⁸¹ 康斯坦丁·斯捷潘诺维奇·叶列梅耶夫（Константин Степанович Еремеев，1874-1931），生于士官家庭。1893年志愿入伍，后升为士官。1896年参加社会民主主义运动，后被捕流放。1903年加入布尔什维克，次年流亡国外。1906年回国从事革命工作。1915年加入俄社民工党彼得堡委员会，此后在士兵当中从事革命宣传工作。二月革命后，参与编辑《真理报》和《士兵真理报》，并成为布尔什维克军事组织成员。后作为彼得格勒军革委委员参加十月革命，参与指挥了攻打冬宫的行动。苏维埃政权建立后，主要从事军事工作。1931年因病去世。——译者注

⁷⁸² 弗赖曼，《彼得格勒的革命防卫》，第132页。

⁷⁸³ 分别指彼得格勒近卫团（Гвардии Петроградский полк）和伊兹马伊洛沃近卫团。前者即沙俄时代的圣彼得堡御前近卫团（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ский лейб-гвардии полк）。——译者注

之外，他们都拒绝上车。⁷⁸⁴

动员工厂工人参与防务的情况更为复杂。1918年2-3月间彼得格勒无产阶级和布尔什维之间的关系，相对于1917年10月末克伦茨基进军首都时，已经冷淡下来了。这一不利于募兵工作变化，部分缘于对十月革命的经济后果（尤其是食品短缺和日益严重的失业状况）的普遍幻灭。1918年2月底和3月，征召工人保卫彼得格勒面临的其他障碍还有：普遍士气低落；大量已参加赤卫队的党员和党外工厂工人，或在全国各地巩固革命，或在顿河流域与反革命军作战；德军重启攻势的突然性；以及极端混乱的军事和政治局势。实际上自2月10日以来，在种种因素的引导之下，彼得格勒工人认为战争已经结束。因为2月16日德方宣布于2月18日中午重启军事行动的通告，是在军事行动实际开始之后才被公之于众的，所以请求工人迅速上前线进行保卫革命的生死斗争，是在突然之间发生的。此外，动员令的发布，正值安东诺夫-奥弗申柯在南方取得了对“科尔尼洛夫-卡列金”反革命的首次军事胜利（红军于2月23日夺取罗斯托夫）。公众仍在讨论与同盟国是战是和，而苏维埃政府似乎在考虑有可能达成差强人意的和约。因此，工人对于最初的动员和征召呼吁，常常报以困惑甚至恐慌。⁷⁸⁵

苏维埃时代的俄国历史学家们一直强调布尔什维克党组织当时有效地组织了彼得格勒防务。⁷⁸⁶这显然是误导性的。⁷⁸⁷面对德军重启攻势后日益扩大的军事灾难，彼得堡委员会呼吁区党委派人上前线，而区党委也竭尽所能地这样做。⁷⁸⁸但在2月24日，彼得堡委员会指示所有积极党工向区苏维埃报道，从而进一步耗尽了区党委的资源。⁷⁸⁹尽管在1918年2月对德军占领的一片恐慌之中，为使区苏维埃这样的地方机构在军事上更为活跃，彼得格勒布尔什维克党组织的军事职能得到了削弱，但左翼社革党还是组织了该党独立控制的战斗队，布尔什维克则鼓励这些战斗队在防务中发挥重要作用。2月26日，立陶宛团⁷⁹⁰的营房和武器库存被移交给这些战斗队。同日，左翼社革党按照布尔什维克当局的指示，没收了贵胄军官学校⁷⁹¹（位于彼得格勒市中心的前军校）的所有武器，并在布尔什维克的祝福下，将之作为自己的总部。在这场危机中，左翼社革党的米哈伊尔·利文森成

⁷⁸⁴ 中央国家历史-政治文献档案馆，4000号全宗，5号目录，212号案卷，第148张。

⁷⁸⁵ 见例如《劳动旗帜报》，1918年2月24日，第3版。

⁷⁸⁶ 例如见弗赖曼，《彼得格勒的革命防卫》，第122页。

⁷⁸⁷ 布尔什维克军事组织曾在1917年给彼得格勒卫戍部队做革命行动准备工作，并为红军输送了第一批军事领导人和政委（其中包括波德沃伊斯基、克雷连科、安东诺夫-奥弗申柯和叶列梅耶夫），此时已行将就木。它正式解散要到1918年3月底。见《彼得格勒真理报》（Петроградская правда），1918年3月26日，第1版。

⁷⁸⁸ 见例如，中央国家历史-政治文献档案馆，10号全宗，1号目录，12号案卷，第5-6张，2月24日奥赫塔区布尔什维克及其同情者全体会议对于这一呼吁的积极回应。

⁷⁸⁹ 中央国家历史-政治文献档案馆，4000号全宗，7号目录，814号案卷，第91张。

⁷⁹⁰ 指立陶宛近卫团。该团成立于1817年，二月革命前称“立陶宛御前近卫团”（Литовский лейб-гвардии полк），1918年解散。——译者注

⁷⁹¹ 贵胄军官学校（Пажеский корпус）成立于1759年，校址位于沃龙佐夫宫。该校是为御前近卫军培养军官的学校，其学生来自贵族和高级军官世家。1917年二月革命后，被临时政府解散。——译者注

为彼得格勒革命防卫委员会副主席，左翼社革党战斗队成了委员会可靠的军事力量之一。⁷⁹²

除了左翼社革党及其战斗队，彼得格勒革命防卫委员会可资利用的，还有起初极其反对接受德方和约的各区苏维埃。因此，彼得堡委员会决定将手头的干部交由它们调遣。许多区苏维埃已根据《社会主义祖国在危急中！》这样的文告，自行开始了防卫战的准备工作。彼得格勒区苏维埃决定组织自己的革命防卫委员会，并在一次当地工厂委员会和卫戍部队代表的集会上付诸实施。⁷⁹³瓦西里岛区苏维埃也开始行动，宣称自己有权按照防务所需，给当地所有区苏维埃代表、工厂委员会委员和各革命党分配军事职务。它还决定：暂停 15-18 岁之间工厂工人的歇工；授权实行 6 小时工作制，以便工人能够有 2 小时参加义务军事训练；鼓励本区女工参加 2 小时的卫生和医疗训练；并同意组建由中等阶级市民组成的掘壕队。⁷⁹⁴

圣诞区⁷⁹⁵苏维埃号召工厂委员会实行全天候执勤，登记所有具备掘壕或武装能力的人，并加紧进行刚启动的红军招募工作⁷⁹⁶。彼得霍夫区⁷⁹⁷苏维埃在讨论完红军征募相关问题后，决定组织自己的军事部，以便与当地赤卫队总部就募兵工作密切合作。⁷⁹⁸与此同时，其他区的苏维埃（例如，市郊的新村区苏维埃）派遣特别得力的代表前往前线，试图恢复旧军队各部的秩序。⁷⁹⁹

2月22日夜，彼得格勒革命防卫委员会开始尝试统辖上述活动。它在一份晦涩的电话消息中，要求各区苏维埃和各卫戍团委员会，立即为不晚于24日调出彼得格勒的红军部队募兵。但各区苏维埃却悉心维护自己的行动自由，并且常常按照自身对形势变化的独立判断来回应上级指示。

工会也有动员工人的潜质。2月22日，仍由左翼共产主义者梁赞诺夫领导的

⁷⁹² 见例如，圣彼得堡中央国家档案馆，9618号全宗，1号目录，229号案卷，第83张。3月末，布尔什维克彼得堡委员会开始组织类似的本党战斗队，但为时已晚。可是在一段时间里，组织上的争吵，以及自己的人员被征募入红军和后来的征粮队，阻碍着它们的发展（中央国家历史-政治文献档案馆，4000号全宗，7号目录，64号案卷，第5-6张及第6张背面，第12、23、37、58-60、215-218张）。

⁷⁹³ 弗赖曼，《彼得格勒的革命防卫》，第91页。

⁷⁹⁴ 《消息报》，1918年2月26日，第3版；和弗赖曼，《彼得格勒的革命防卫》，第91页。

⁷⁹⁵ 圣诞区（Рождественский район）位于彼得格勒主城区东北角，北面和东面为涅瓦河，西邻铸造厂区，南隔涅瓦大街与涅夫斯基区相望（如果就苏维埃区来看，则是西面和南面为第1城区包围）。该区是18世纪中后期建立的城区，得名于当地的基督圣诞节教堂（Церковь Рождества Христова）。1919年该区与奥赫塔区合并为斯莫尔尼区（Смольнинский район），现为中央区（Центральный район）的一部分。——译者注 《消息报》，1918年2月23日，第3版。

⁷⁹⁶ 《消息报》，1918年2月23日，第3版。16

⁷⁹⁷ 彼得霍夫区（Петергофский район）位于彼得格勒主城区西南角，北面和东面为纳尔瓦区包围，西邻芬兰湾，南接郊区。1919年与纳尔瓦区合并，现为基洛夫区（Кировский район）的一部分。——译者注

⁷⁹⁸ 圣彼得堡中央国家档案馆，101号全宗，1号目录，38号案卷，第120张。

⁷⁹⁹ 圣彼得堡中央国家档案馆，150号全宗，1号目录，3号案卷，第121张。

彼得格勒工会理事会召开紧急会议，讨论战还是和的问题。⁸⁰⁰彼得格勒最大和最活跃的 20 家工会的代表参加了这次会议。梁赞诺夫发表了激动人心的讲话，呼吁工会一方面提醒工人，拯救革命需要最大程度的纪律、干劲和自我牺牲，另一方面利用自己的组织架构，来协助建立一支强有力社会主义红军。之后，理事会请求工会将自己的力量汇集于中执委和人民委员会身边，以进行一场决死的防卫战。此时，转而积极参与防务准备工作的工会有金工工会、运输工人工会、食品加工工人工会和木材加工工人工会。⁸⁰¹

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计划于 2 月 23 日下午和傍晚更为广泛地在首都各处的剧院和会议厅集中召开募兵集会。主要的发言者有，代表布尔什维克的布哈林、季诺维也夫、卢那察尔斯基、沃洛达尔斯基、拉斯科尔尼科夫和斯卢茨基，以及代表左翼社革党的卡姆科夫、施泰因贝格和特鲁托夫斯基。媒体报道称，参加集会的彼得格勒工人的情绪表明，“高涨的革命责任心瓦解了暂时的惊慌”。⁸⁰²但革命热忱并未转化为战斗意愿。这些集会只招募到了相对少量的红军，各区苏维埃的努力也是如此。⁸⁰³而在紧接德军攻占普斯科夫之后的 2 月 24/25 日夜，彼得格勒革命防卫委员会给各群众组织发出的种种指示显露出恐慌的迹象；它们号召“各苏维埃、所有人、所有人”对全体工人和士兵进行总动员，并将他们迅速送至斯莫尔尼宫，所有铲子登记造册，所有汽车予以没收并送往斯莫尔尼宫。全体彼得格勒居民被命令立即准备迎击空袭和毒气攻击。⁸⁰⁴布尔什维克当局将德军攻势，与更形泛滥的俄国资产阶级、社革党人和甚至孟什维克从内部推翻苏维埃政权的活动关联起来，试图以此克服人们对募兵工作的抵制，为镇压彼得格勒的反革命活动寻求理由，并加强安全部门的力量。在布尔什维克看来，温和社会主义者像在 2 月 23/24 日夜中执委会议上那样，呼吁进行反对德帝国主义的联合斗争，只是因为他们希望布尔什维主义毁于一场必败的战争。孟什维克与利用外敌进军来推翻苏维埃政府的内部阴谋有联系——这种说法尤其混淆视听，因为孟什维克党积极反对这样的活动。尽管如此，当时的诸多文献表明，1918 年初立宪会议的解散以及后来人民委员会通过和谈最终接受布列斯特和约，确实刺激了彼得格勒的反革命团体。

⁸⁰⁰ 这次会议的会议记录见圣彼得堡中央国家档案馆，6276 号全宗，3 号目录，163 号案卷，第 5-6 张。

⁸⁰¹ 弗赖曼，《彼得格勒的革命防卫》，第 93 页。对于金工，见安·利·弗赖曼编，《德国占领在普斯科夫地区的崩溃：文献汇编》(Крах германской оккупации на Псковщине: Сборник документов)，列宁格勒，1939 年，第 73 页；运输工人见圣彼得堡中央国家档案馆，6276 号全宗，3 号目录，123 号案卷，第 6-7 张；食品加工工人见 6261 号全宗，2 号目录，2 号案卷，第 29 张；木材加工工人见 5937 号全宗，2 号目录，4 号案卷，第 49 张。

⁸⁰² 《消息报》，1918 年 2 月 23 日，第 1 版；1918 年 2 月 26 日，第 6 版。

⁸⁰³ 见例如，弗赖曼，《彼得格勒的革命防卫》，第 88-89 页。

⁸⁰⁴ 圣彼得堡中央国家档案馆，9618 号全宗，1 号目录，240 号案卷，第 30 张；2421 号全宗，1 号目录，4 号案卷，第 18-19 张。

⁸⁰⁵ 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130 号全宗，2 号目录，1098 号案卷，第 8 张。

早在1月的下半月，一连串炸弹恐慌就困扰着斯莫尔尼宫。⁸⁰⁵当月底，契卡成功破获了一起推翻苏维埃政府的阴谋。参与这起阴谋的数千军官很可能受英国支持，且武备精良。时任契卡打击反革命局局长的伊万·波卢卡罗夫⁸⁰⁶后来指出，这是契卡在成立半年内所遇到的最危险的阴谋，因为正如他所解释的，“它的特务遍布各处”。⁸⁰⁷在当时的未刊文献中，披露了这一反革命活动的有：1月27日捷尔任斯基致彼得格勒各区苏维埃的紧急函件，1月28日瓦西里岛区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紧急会议的会议记录，以及1月28、29日彼得霍夫区苏维埃及其执行委员会紧急会议的会议记录。这些文献表明，为了启用一套人员紧急求助信号，以及讨论与镇压阴谋相关的指示，契卡与各区苏维埃的代表在27日夜开了一次全市危机会议。⁸⁰⁸彼得格勒各区苏维埃得到指示，要24小时保持警戒，动员各自资源，报告所在地区镇压运动的进展，并组建区契卡。⁸⁰⁹

几周后，德军重启攻势以及对其目标在于占领彼得格勒的担忧，在相当程度上加强了契卡的任意权力。如前述，《社会主义主义祖国在危急中！》——敌人进军后发布的最具战斗性的文告之一——鼓励枪决实施犯罪的一般罪犯和反革命分子。这是临时执委会未经人民委员会全体成员讨论便签发的。⁸¹⁰结果，在2月22日的人民委员会会议上，围绕这一就地处决的任意处置权，左翼社革党人和布尔什维克吵了起来。左翼社革党人要求撤销这一史无前例的条款，但可以想见，他们票数不够。⁸¹¹这一首次在官方文件中支持任意枪决据称之政敌的条款，后来被施泰因贝格称为“给契卡恐怖扫清了道路”。⁸¹²契卡立即利用这一授权，于2月22日宣布：“在反革命活动一再发生、越发有恃无恐的时候”，“只有在他们实施犯罪时予以无情处决，才能打击反革命分子、投机商、恶棍、流氓、破坏者和其他寄生虫”。⁸¹³

⁸⁰⁶ 伊万·尼古拉耶维奇·波卢卡罗夫（Иван Николаевич Полукаров，1895-1920），沙俄时期参加一战，1917年加入布尔什维克，曾任彼得格勒军事革命委员会委员。1917年12月加入契卡，次年任契卡的打击反革命局局长。1918年11月至次年4月，在军校进修，后担任红军军官。1920年12月因伤寒去世。——译者注

⁸⁰⁷ 见1918年6月11日波卢卡罗夫在契卡全俄第一次代表会议开幕式上大意如此的陈述（俄罗斯联邦联邦安全局中央档案馆，1号全宗，3号目录，11号案卷，第4张）。

⁸⁰⁸ 圣彼得堡中央国家档案馆，9618号全宗，1号目录，266号案卷，第6张；47号全宗，1号目录，28号案卷，第32张及其背面；101号全宗，30号案卷，第119张；38号案卷，第2-3张及第3张背面。

⁸⁰⁹ 瓦西里岛和彼得霍夫区的苏维埃此时创建了契卡（圣彼得堡中央国家档案馆，47号全宗，1号目录，28号案卷，第32张及其背面；101号全宗，1号目录，38号案卷，第2-3张及第3张背面），而彼得格勒其他区的苏维埃或许也这么做了。

⁸¹⁰ 见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19号全宗，1号目录，67号案卷。

⁸¹¹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19号全宗，1号目录，68号案卷，第2张。

⁸¹² 施泰因贝格，《在作坊里》，第146页。

⁸¹³ 《来自契卡史》（Из истории ВЧК），莫斯科，1958年，第95-96页。

⁸¹⁴ 彼得格勒军区特别司令部（Чрезвычайный штаб Петроградского военного округа）成立于1918年2月21日，负责德军围城期间的人员动员和应对措施。布列斯特和约达成后，该司令部解散。——译者注

除契卡之外，彼得格勒各区苏维埃和彼得格勒军区特别司令部⁸¹⁴也利用这份文告来合法化现行犯的就地处决。⁸¹⁵2月22日，后者在契卡的领导下，授权红军部队实施“就地”枪决。尽管这一授权很快被撤回，但从那时起，匆匆招募的红军士兵变成了彼得格勒之鞭。

2月23日，契卡发函称，它又破获了另一起俄国资产阶级的全国性阴谋。这一阴谋意在帮助德国人，并企图通过在彼得格勒、莫斯科和其他俄国城市组织武装暴动，来背刺苏维埃政权。契卡警告彼得格勒各区苏维埃和其他工人机构，许多反革命小组已经伪装成援助战争中受伤军官的人道主义团体。这实际上是在怀疑所有不受政府控制的公民组织。各苏维埃将找出、逮捕和枪决所有参加反革命阴谋的人。这一消息涉及的反革命组织有：“反布尔什维克斗争和为卡列金调兵组织”（Организация борьбы против большевиков и за отправку войск Каледину）、“一切为了祖国”（Все для Отечества）、“白十字”（Белый крест）和“黑点”（Черная точка）。大约此时，一些反对布列斯特和约的军官和士官生盘踞于重开不久的米哈伊洛夫斯基炮兵学院。他们从那里出发，在士兵和工人当中进行反苏维埃鼓动，并为其支持者获取武器。这个团体由包括弗拉基米尔·佩雷尔茨韦希⁸¹⁶（后文还将提及此人）在内的右翼社革党人领导。⁸¹⁷

契卡有意“就地”枪决反革命分子的2月22日文告被公布于报刊之上。它完全可以被视作先发制人式的国家恐怖的实例。苏维埃安全机构对“反革命蛇怪”的关切是确确实实的，这一点得到了绝对无意公开的未刊文献的证实。在2月24日一份标有“秘密”和“极端紧急”的备忘录中，彼得格勒革命防卫委员会命令各区苏维埃，在组建部队上前线的同时，组织打击内部反革命的飞行队（летучий отряд）。⁸¹⁸2月26日，各区苏维埃接到命令，立即在可疑组织、设施和个别资产阶级家中搜查武器。⁸¹⁹另一份标注日期为2月27日、发给各区苏维埃的秘密紧急函件表露了委员会在德军越过普斯科夫时的担忧。函件称：“立即采取措施，销毁粘贴于全市的名为《俄国已被出卖给德国人》的宣言。一旦抓获粘贴这些标语的人，应当就地枪决。”⁸²⁰对于参加跨区代表会议的区苏维埃代表来说，这太过分了。会议指示自己的下属苏维埃，“就地枪决”仅限于嫌疑人武装抵抗的情形。⁸²¹完全可以把这一指示视为，基层阻止临时执行委员会2月21日文告引起的过火行为的努力。

⁸¹⁵ 《真理报》，1918年2月22日，第2版。

⁸¹⁶ 弗拉基米尔·鲍里索维奇·佩雷尔茨韦希（Владимир Борисович Перельцвейг，1898-1918），生于工艺工程师家庭，1915年进入喀山士官生学校学习，次年参加沙俄军队。曾任彼得格勒军区士官生-社会党人联盟主席。1918年因在米哈伊洛夫斯基炮兵学院士官生中进行反革命鼓动而被契卡枪决。——译者注

⁸¹⁷ 圣彼得堡与列宁格勒州联邦安全局档案局，H-47037号。关于佩雷尔茨韦希，见第12章。

⁸¹⁸ 圣彼得堡中央国家档案馆，9618号全宗，1号目录，226号案卷，第43张。

⁸¹⁹ 圣彼得堡中央国家档案馆，101号全宗，1号目录，53号案卷，第14张；226号案卷，第39张。

⁸²⁰ 圣彼得堡中央国家档案馆，9618号全宗，1号目录，240号案卷，第59张。尽管就地枪决看来实际上并未发生，但在这次危机期间，还是有许多人因为进行反苏宣传而被逮捕，并被送至彼得格勒苏维埃革命法庭。见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336号全宗，1号目录，69、149、216号案卷。

⁸²¹ 圣彼得堡中央国家档案馆，47号全宗，1号目录，44号案卷，第85张。

* * *

同时，2月24日普斯科夫陷落后，对于动员号召的积极回应，使得工人当中的募兵量在短期内略有上升。如此略微的进步在2月23-26日维堡、纳尔瓦、第1城、第2城和圣诞等区有关红军募兵、向新兵供粮和当地工人政治情绪的报告中得到了反映。⁸²²这些报告共同构成了一幅虽不完整但粗具代表性的彼得格勒横截面。

维堡区苏维埃的报告尤其引人兴趣，这不仅因为该区作为1917年布尔什维主义堡垒的历史重要性，而且还由于它如今产业衰败。报告表明，在2月26日，3600人（全是工人）志愿参加红军。该区苏维埃能够为这些新兵提供武器弹药。粮食补给问题则更为要命。但报告自信能克服这一困难。工人的总体情绪被认为是“最革命的”。区内的反革命活动正被“连根拔起”。在给工人开情况介绍会，并且“参会情况良好”。总体来讲，街面生活“正常”。⁸²³

市中心南部的纳尔瓦区在经济和政治上都比较混杂。该区的报告人指出，要准确统计红军新兵数量是困难的，因为该区有好几个募兵站。但他能确定，人数“超过2000”。武器充足[但]粮食不够。已经制作了“资产阶级”居民的名录，“一旦征发”，就能给他们分配防务相关的工作。报告人警告称，尽管工人情绪乐观，但不能说热衷于战斗。在居民当中，总体精神是“反革命的”，反苏鼓动在增长。⁸²⁴

地处右岸、部分工业化的奥赫塔区的消息则是，已登记1000名红军新兵（其中大部分是工人，并有“少量”老兵）。报告认为，当地工人的情绪是“勇敢的”，而富裕居民[обыватели]则是“懦弱的”。这份报告总结称：“生活情况正常——没有恐慌或反革命活动的迹象。”⁸²⁵

⁸²²这些报告的汇编，见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393号全宗，2号目录，70号案卷，第137-138张及第138张背面。

⁸²³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393号全宗，2号目录，70号案卷，第138张背面。

⁸²⁴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393号全宗，2号目录，70号案卷，第137张背面。

⁸²⁵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393号全宗，2号目录，70号案卷，第137-138张及第138张背面及第138张。



图 10 红军募兵站。戴维·金特藏。

至于那些规模更小，工业化程度更低，商业、治理和居住等方面状况“更好”的市中心各区来说，它们的报告较于工人更为集中的区域，就没有那么振奋人心。例如，坐落有一些近期停工的大型国有兵工厂的第 1 城区苏维埃的消息是，当地红军募兵工作“非常活跃”，工人的情绪是“勇敢”甚至“振奋的”。同时由于反革命鼓动，居民的情绪总体来讲是“不知所措的……迷乱的”。这份报告的作者宣称，难以确定红军新兵总数。但他还是记录有，当日（2月 26 日）晨已向前线输送了 250 名新兵，另有 250 人计划于当日夜输送。⁸²⁶第 2 城区的总体情况和第 1 城区的相同，尽管该区的报告没有提供数据。⁸²⁷可以想见，面积相对很小、位于战略意义重大的中心地区（因为斯莫尔尼宫和塔夫利达宫都在那儿）的圣诞区的情况，甚至更为暗淡。该区苏维埃报告称，红军的募兵工作“非常冷清”⁸²⁸。

⁸²⁶ 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393 号全宗，2 号目录，70 号案卷，第 137 张。

⁸²⁷ 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393 号全宗，2 号目录，70 号案卷，第 137 张。

⁸²⁸ 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393 号全宗，2 号目录，70 号案卷，第 137 张。



知乎 @lj soviet

图 11 工人赤卫队的一支分遣队在奔赴前线前摆造型拍照。雅·施泰因贝格摄。戴维·金特藏。

在作报告的三天里（2月 23-26 日），六个区记录的红军新兵总数是 10320 人——鉴于敌军貌似即将兵临彼得格勒，这一数字并不特别可观。但这或许不是全貌。有证据表明，即便有意参战的工人也宁愿加入由各自工厂或劳动组织建立的临时游击队，而不想因为参加红军而承担更漫长、更严格的兵役。⁸²⁹此外，红军新兵数目并未计入左翼社革党战斗队的新队员。

所以，工人对捍卫革命、抵抗德军的态度，评估起来是错综复杂的。在彼得格勒工厂中从事鼓动工作的布尔什维克彼得堡委员会委员和左翼共产主义者费多尔·丁格尔施泰特，在其 1927 年出版的回忆录当中提出，要确定布列斯特危机期间人们对于募兵号召的回应，就必须将党的地方领导人以及“工人积极分子”，与基层工人分别而论。据丁格尔施泰特称，尽管当德军攻势特别有威胁性之时，已开始重新考虑自己的立场，但大部分积极分子仍然倾向于革命战争，确实热衷于跟德国人一战。另一方面，基层工人几乎从一开始就不愿战斗。

丁格尔施泰特的回忆基于他当时的一份日记，因而特别有价值。作为一名左翼共产主义者，他并不想夸大工人在对德作战方面的消极被动。作为例证，他描述了自己 2 月 23 日在大型管材厂参加的两次集会。第一次是工厂中布尔什维克组

⁸²⁹ 维·伊·斯塔尔采夫（Виталий Иванович Старцев），《彼得格勒赤卫队与工人民兵史概要》（Очерки по истории Петроградской красной гвардии и рабочей милиции），第 244-246 页。

织的会议。丁格尔施泰特回忆称，这次会议表现出“惊人的”热情。第二次则是工人的群众大会；据他说，这次大会的反应恰好相反——日益恶化的经济状况和新战争的威胁导致的怨声载道和不满，表明无党派群众的情绪极为低落。“对于这段时期的广大彼得堡工人来说，这样的画面显然算有一定的典型性，”他总结道。作为佐证，他还描述了自己 2 月 27 日在亚历山大机械制造厂⁸³⁰车厢车间的一次会议上遇到的类似情况。⁸³¹

跟丁格尔施泰特相反，大部分记述过这一主题的同时代人，都目击到党的区级活动家和一般工厂工人，相对迅速地从最初支持革命战争转向赞成立刻媾和。在 3 月 7 日全俄布尔什维克第七次党代会的讲话中，作为少数几名之前就支持媾和的彼得堡委员会委员之一的基里尔·舍拉温⁸³²指出，在德军攻势变得生死攸关的时刻，人民对革命战争的态度发生了 180 度的转向。

两周前，工人支持革命战争。……[但]在看到敌人不仅是白卫分子而且是装备着新式武器的可怕[军队]后……所有集体，一个接一个地，开始通过不可能进行革命战争并且[有必要]缔结和约的决议。……彼得堡工人听到工厂汽笛而去保卫革命彼得堡的时代已经过去了。⁸³³

由于其广大支持者的压力，各工会和区苏维埃已经历了舍拉温描述的转向。如前述，在 2 月 22 日的紧急会议上，彼得格勒工会理事会通过了梁赞诺夫提出的完全支持革命战争的决议。在人民委员会接受了德方更具毁灭性的第二份和约后，2 月 28 日的理事会会议又通过了一份左翼共产主义者的决议，但梁赞诺夫提交的这份决议是他最后的胜利。⁸³⁴3 月 9 日，理事会召集了一次代表会议，以询问下属工会的看法。会上，梁赞诺夫的立场失败了。500 名工会代表中的大部分人投票支持批准和约。⁸³⁵

⁸³⁰ 亚历山大机械制造厂（Александровский механический завод）初创于 1789 年，原为铸造厂，后主要为了生产火车车辆而变更为机械制造厂，曾名“尼古拉铁路亚历山大机械制造厂”。苏联时期更名为“无产阶级工厂”（Пролетарский завод），并延续至今。——译者注

⁸³¹ 费·丁格尔施泰特，《一名俄社民工党(布)彼得格勒委员会鼓动员的回忆》(Из воспоминаний агитатора Петроградского комитета РСДРП[в] [с сентября 1917 г. по март 1918 г.]), 载《红色编年史》，1927 年第 1 期（总第 22 期），第 65-68 页。

⁸³² 这里的基里尔·舍拉温（Кирилл Шелавин）疑即康斯坦丁·伊万诺维奇·舍拉温（Константин Иванович Шелавин，1886-1934），1903 年加入布尔什维克，参加了 1905 年革命。1917 年先后担任第 1 城区和瓦西里岛区的布尔什维克区委主席。1918-1919 年，在俄共（布）中央常务局工作，并参与编辑《彼得格勒真理报》和《红色公报》。1920 年代，从事文教和党史研究工作，并参加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领导的新反对派。1920 年代末至逝世时，在尼·古·托尔马乔夫军政学院从事教学工作。——译者注

⁸³³ 《第七次特别代表大会》，第 90 页。

⁸³⁴ 梁赞诺夫提交的决议位于圣彼得堡中央国家档案馆，6276 号全宗，3 号目录，6 号案卷，第 12 张。

⁸³⁵ 圣彼得堡中央国家档案馆，6276 号全宗，3 号目录，6 号案卷，第 14 张背面。

在彼得格勒各区苏维埃当中，也能看到类似向支持革命战争的摇摆。如果说在德方进军之初，它们显然大多倾向于左翼共产主义，那么到3月就绝非如此了。这种变化在维堡区得到了反映。起初，这里的红军募兵工作相对成功；2月末，工厂工人的情绪也被当地苏维埃形容为是“最革命的”。⁸³⁶而3月初，随着德方似乎必将马不停蹄地进攻彼得格勒，维堡区苏维埃将注意力集中于：必要时疏散、破坏不动产、逐屋防御的实际措施，以及因应形势发展而解决资产阶级的计划。

在3月4日的维堡区苏维埃执委会会议上，与会者的脑际都萦绕着上述问题。当天是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签订的次日，而德军的进军仍无放缓的迹象，彼得格勒革命防卫委员会也在加强彼得格勒防务。主持会议的彼得堡委员会前委员亚历山大·库克林⁸³⁷敦促称，鉴于德国人在普斯科夫和纳尔瓦对待工厂工人的残忍行径，应备好各种交通工具，并将所有工人编入赤卫队。显然，他在考虑工人无法及时撤离时的防务问题。但正如另一位发言者所称，要系统地完成这项工作，同时又不引起恐慌，是困难的，因为“中央依靠我们，那么等待中央指示便是没有意义的”。还认真考虑了将苏维埃政权的所有反对者（包括“从店主到专家”）囚禁于一处能控制他们的地点。最后，决定提议，苏维埃全力准备采取如下措施：不分政治立场动员所有18-50岁的工人；烧毁所有对德国人有价值的东西；处决所有有所动作的反革命分子。⁸³⁸苏维埃全会还加上了疏散工人家属这一项。⁸³⁹

* * *

在人民的战斗情绪经历这一连串变化的同时，彼得堡委员会的大部分委员都忠于其激进、独立的传统，坚定支持革命战争。接受德方新和平条件之后的2月25日，委员会召集区党委代表开会。这次会议通过了一份包含如下内容的决议：谴责政府的所作所为，坚称这样做并不能阻止德方进军，并确信除“武装”自卫外别无他选。⁸⁴⁰布尔什维克彼得格勒第四次全市代表会议在要求撤回接受德方和平条件之后，已于2月20日休会。⁸⁴¹3月1日，代表会议复会，以重新审议其在战和问题上的立场，并选举该市参加全俄布尔什维克第七次党代会（定于一周内召开）的代表。⁸⁴²

⁸³⁶ 圣彼得堡中央国家档案馆，9618号全宗，1号目录，191号案卷，第44-64张。

⁸³⁷ 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库克林（Александр Сергеевич Куклин，1876-1936），生于工人家庭。1903年参加布尔什维克。1918-1919年担任彼得格勒苏维埃副主席和维堡区执委会主席。1924年成为俄共（布）中央委员。1925年，任俄共（布）列宁格勒省委组织部长，积极参加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领导的新反对派。1926-1928年，参加左翼反对派。1927年被开除出党，次年又恢复党籍。1934年被捕后，判处十年有期徒刑。1936年被处以死刑。1988年平反。——译者注

⁸³⁸ 圣彼得堡中央国家档案馆，9618号全宗，1号目录，191号案卷，第45-47张。

⁸³⁹ 圣彼得堡中央国家档案馆，9618号全宗，1号目录，191号案卷，第57-58张。

⁸⁴⁰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17号全宗，65号目录，57号案卷，第35张。

⁸⁴¹ 见前文，第6章。

⁸⁴² 中央国家历史-政治文献档案馆，1号全宗，4号目录，113号案卷，第7-9张及第9张背面；亦见1号全宗，1号目录，67号案卷。

在这次会上，无论对进军彼得格勒的恐惧，还是人民委员会慌乱的防卫工作，都暂时地加强了。三月初的这一波新恐惧近乎喜剧。似乎在3月1日，俄方布列斯特和谈代表团秘书列夫·加拉罕⁸⁴³向彼得格勒的人民委员会发了两封电报：第一封是密电，描述了与签署和约有关的外交问题；第二封是明电，要求派一列火车来接代表团。它表明，代表团希望和约一俟签署，就离开充满敌意的德军战线后方。不幸的是，列宁首先收到的是第二封电报。他立刻得出谈判破裂的结论，并将之宣布于3月2日的《真理报》上。在这份公告中，列宁向“各苏维埃、所有人”发出警报，要为德方即将对彼得格勒发起的攻势做准备。⁸⁴⁴《真理报》的编辑更进一步，在头版用大字标题写道：“我方和谈代表团正返回彼得格勒。战争问题已经确定。战争！……资本主义旧世界正向我们全力进攻。”⁸⁴⁵或许并非巧合的是，列宁恰在此时签署法令，由新设立的最高军事委员会⁸⁴⁶统辖苏维埃方面的全部军事力量。

这种加剧了的对占领的恐惧并没有影响到代表会议的讨论。因为它是布尔什维克彼得格勒第四次全市代表会议复会讨论了战和问题（3月1日）之后的上午，才爆发出来的。此外，由于会议代表都是二月中旬选举产生的，他们的看法便不可能反映工人最近在和约问题上的观点变化。代表会议上做主旨发言的是杰出的中央领袖——代表左翼共产主义者的拉狄克和布哈林，代表列宁派的斯维尔德洛夫和季诺维也夫。在谈及革命战争时，拉狄克的主要看法是，喘息空间的想法是“荒唐的”，因为实际形势是俄国将被迫“或者一再退让，或者在两三周内开始新一场战争”。“没有第三条道路，”他坚称。另一方面，斯维尔德洛夫的论说刚好相反。他的主要看法在于，战斗如今是不现实的——“在需要派队伍上前线的时候，一个人都指望不了。”“达成和约后，我们将组织一支红军，”他说道。“我们正向所有人宣告，我们签署这份声名狼藉的和约[仅仅]是为了短暂的休息。”斯维尔德洛夫坚称，左翼共产主义者对和约的否定“包含着分裂[党]的种子”，并呼吁与会者对此加以抵制。⁸⁴⁷

斯维尔德洛夫所谓左翼共产主义者在制造分裂的说法引起了布哈林的反击。他极为有力地指出，列宁在大部分中央委员支持革命战争时威胁辞职，这一举动

⁸⁴³列夫·米哈伊洛维奇·加拉罕（Лев Михайлович Карабан，1889-1937），生于格鲁吉亚的亚美尼亚律师家庭。1904年参加孟什维克，一战爆发后持国际主义立场，1915年被捕流放。二月革命后获释，返回彼得格勒，成为彼得格勒区杜马和彼得格勒苏维埃代表，后随区联派加入布尔什维克。布列斯特和谈期间，为苏方代表团秘书。1918年担任苏俄副外交人民委员，后长期从事外事工作，曾任苏联驻华大使。1937年被处以死刑。1956年平反。——译者注

⁸⁴⁴《真理报》，1918年3月2日，第1版。

⁸⁴⁵《真理报》，1918年3月2日，第1版。

⁸⁴⁶最高军事委员会（Высший военный совет）成立于1918年3月3日，负责苏俄的防务工作和组建红军。委员会主席由陆海军人民委员托洛茨基担任。1918年9月2日，委员会解散，其职能被移交给新成立的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Революционный военный совет Республики）。——译者注

⁸⁴⁷中央国家历史-政治文献档案馆，1号全宗，4号目录，113号案卷，第7-8张及第8张背面。

已经开启了分裂。⁸⁴⁸最后发言的季诺维也夫阐释了彼得格勒苏维埃体现出的工人情绪，以此来支持批准和约。在听闻了左翼共产主义者的“革命词藻”后，苏维埃的代表仍然坚持，有必要签署和约。尽管并未完全否认左翼共产主义者宣称的工人当中可以察觉到革命热忱，但他辩称：“派工人和全体布尔什维克上前线……会摧毁党和无产阶级之花。”⁸⁴⁹此时，彼得格勒的左翼共产主义者正准备出版自己的报纸《共产党人》。⁸⁵⁰在讲话结束时，季诺维也夫请求他们不要这么做。可斯维尔德洛夫和季诺维也夫的论说对大部分与会者并没有什么影响。他们支持左翼共产主义者的立场，选出了左翼共产主义者均占多数的七大代表团和新一届彼得堡委员会。⁸⁵¹《共产党人》第一期于3月5日面世。

此时，彼得格勒的左翼共产主义者相信，他们仍然得到了区党委和相当数量普通工人的支持。可是，党的七大于3月8日召开时，正如左翼共产主义者所坦承的那样，这种信心动摇了。因此在详述了工厂关闭和红军动员对彼得格勒（尤其是像维堡这样高度工业化的区）党的组织架构和活动的消极影响后，一位撰稿人在3月14日的《共产党人》上评论道：“各区改变了对战和问题的看法。如果说之前区代表们反映了各区对革命战争的支持，那么如今的看法则是以支持批准和约为主。”⁸⁵²布尔什维克各区委在3月中旬的记录证实了这一变化。⁸⁵³

3月5日的彼得格勒苏维埃全会讨论了和约；在季诺维也夫和卡姆科夫正面交锋后，否决了由孟什维克、社革党和左翼社革党支持的反布列斯特决议，通过了布尔什维克的支持批准和约的动议——尽管彼得堡委员会仍然支持革命战争。实际上在全会之前，季诺维也夫指挥布尔什维克彼得格勒苏维埃党团召开会议，通过了一份谴责《共产党人》编辑并要求改选彼得堡委员会的决议。⁸⁵⁴据《红色公报》，对于这份非常不恰当的决议，投票结果是“几百比一”。⁸⁵⁵这进一步表明，基层大规模地转向支持批准和约和反对左翼共产主义者。

* * *

3月初，由于德国人似乎即将占领彼得格勒，彼得堡委员会呼吁中央委员会将定于5日召开的布尔什维克全俄第七次代表大会转移至莫斯科。⁸⁵⁶在彼得堡委员

⁸⁴⁸ 中央国家历史-政治文献档案馆，1号全宗，4号目录，113号案卷，第9张。布哈林想到的是第6张曾提及的2月23日中央委员会会议。

⁸⁴⁹ 中央国家历史-政治文献档案馆，1号全宗，4号目录，113号案卷，第9张背面。

⁸⁵⁰ 勿混淆于布尔什维克莫斯科区域局在1918年4-6月间出版的同名理论刊物。

⁸⁵¹ 《共产党人》(Коммунист)，1918年3月5日，第4版。亦见《共产党人》，1918年3月14日，第2版。

⁸⁵² 《共产党人》，1918年3月14日，第3版。也有例外。在3月14日纳尔瓦区党委的会议上，多数人投票支持革命战争。见《共产党人》，1918年3月15日，第4版；1918年3月17日，第4版。

⁸⁵³ 见例如，中央国家历史-政治文献档案馆，2315号全宗，1号目录，3号案卷，第83张；8号全宗，1号目录，2号案卷，第1张及其背面。

⁸⁵⁴ 圣彼得堡中央国家档案馆，9618号全宗，1号目录，201号案卷，第3张。

⁸⁵⁵ 《红色公报》，1918年3月6日，第2版。

⁸⁵⁶ 中央国家历史-政治文献档案馆，1号全宗，4号目录，128号案卷，第3张。

会的怂恿下，季诺维也夫也紧急要求中央委员会拨出数十万卢布作为紧急补贴，以备彼得格勒党组织因敌军占领而被迫转入地下后继续运作之需。⁸⁵⁷此时，布尔什维克区党委已经开始为转入地下做准备。虽然政府逃往莫斯科的计划当时已经非常成熟，但上述两个要求都被否决了。可以合理推测，中央委员会之所以对彼得堡委员会的关切反应冷淡，是受到了后者公开且激烈反对批准布列斯特和约的影响。由于这一态度，3月9日，中央委员会召开了在彼得格勒的最后一次会议，会上投票决定解散彼得堡委员会。曾在彼得格勒苏维埃布尔什维克党团带头反对彼得堡委员会的季诺维也夫、斯米尔加和拉舍维奇，受命执行这一决定，并（有可能）监督建立一个更顺从的、支持布列斯特的彼得堡委员会。⁸⁵⁸

对于布尔什维克全俄第七次代表大会（其首要目的是在全俄苏维埃第四次代表大会之前通过批准布列斯特和约的立场），最值得一提的或许是它终究召开了。因为去往彼得格勒的路途艰难——毕竟德国人确实“兵临城下”，而且铁路交通一片混乱——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事先已同意，如果与会人数超过1917年8月初召开的布尔什维克全俄第六次代表大会代表数的一半，则这次党代会合法有效。⁸⁵⁹那次代表大会的与会者当中，157人具有完全的表决权，110人有“发言权”。由此，出席七大的法定人数为至少79名有表决权的代表，即便有发言权的代表人数不够也无妨。代表大会预定开幕的3月5日，仅有17名有表决权的代表。次日，则为36名有表决权的代表，一些其他代表据报尚在途中。⁸⁶⁰尽管人数少于法定人数的半数，代表大会还是被允许召开了。对于这种背离程序的做法，可能的解释是，列宁不愿继续拖延下去；为了克服左翼社革党和温和社会主义者在即将到来的全俄苏维埃第四次代表大会上对和约强有力的反对，他需要消灭左翼共产主义者，并拿到党对于批准布列斯特和约的授权。德国人也似乎随时准备进攻彼得格勒。

列宁利用自己作为中央委员会报告人的地位，开启了对批准和约问题的讨论，并设定了讨论规则。列宁首先强调，前线的彻底惨败表明，他在1月初请求立即媾和是正确的。他像对待闹腾的小青年那样对待左翼共产主义者，叱责他们要为如今革命被迫接受更为苛刻的和平条件负责。列宁还认为，对于苏维埃俄国的

⁸⁵⁷ 中央国家历史-政治文献档案馆，1号全宗，1号目录，3号案卷，第2张。彼得堡委员会还独自向中央委员会提出了类似的要求（中央国家历史-政治文献档案馆，1号全宗，1号目录，105号案卷，第1张）。

⁸⁵⁸ 《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中央委员会会议记录》，第165页。这次会议的记录附于1958年出版的1917-1918年中央委员会记录中。但是，它们标注的日期为1月19日，而苏联史学家克洛波夫（Э. В. Клопов）在1966年首次论述称，这一日期显然弄错了。法国史学家埃娃·贝拉尔（Ewa Bérard-Zarzycka）则认为，1月19日是这次会议的正确日期。尽管她令人信服地论述了，摆脱彼得格勒持续不断地反革命阴谋对于政府疏散的影响，但这次会议显然发生于3月9日。双方针锋相对的论述见克洛波夫，《俄共（布）中央会议的日期需要澄清（1918年3月9日）》（Даты заседаний ЦК РКП[б] необходимо уточнить [9 марта 1918]），载《苏共党史问题》（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КПСС），1966年第11期，第118-119页；以及埃娃·贝拉尔，《布尔什维克为何离开彼得格勒？》（Почему большевики покинули Петроград？，作者此处误为 большевики），载《过往：历史年鉴》（Минувшее: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альманах），1993年第14期，第226-250页。

⁸⁵⁹ 《第七次特别代表大会》，第1页。

⁸⁶⁰ 《第七次特别代表大会》，第1页。

困境，托洛茨基要负相当一部分责任。尽管托洛茨基最初利用布列斯特谈判来推动外国革命的努力是崇高的，但他在临近最后期限时，未能接受德方的最初条件，反而宣布自己的“不战不和”战略，则是无可辩驳的错误，而且（列宁提出）有悖他们相互之间牢固的谅解。尽管列宁对于俄国军事虚弱的所有预言都成真了，并且俄国在 11 天里败给了一支弱小的敌军，但还不至于山穷水尽。确实，彼得格勒看来必定沦陷。列宁对此是确定的，并且我们如今知道，他是照此设想来活动的。可即便是批准目前形式的和约，也能提供至少几天以及更长时间的喘息空间，从而便于继续撤离首都、建立新军队、建立内部秩序、组织经济生活、修复铁路并做其他关键的防御准备工作。总之，列宁表明，批准和约代价高昂、令人痛苦，但也是生存的必需。⁸⁶¹

与列宁的开场攻击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布哈林代表左翼共产主义者所做的回应是字斟句酌的。对于列宁一再坚称左翼共产主义者一直拒绝面对现实和退让的必要性，他提醒列宁称，恰恰相反，左翼共产主义者一直坚持这条原则，即俄国革命要么被外国革命所拯救，要么会被资本主义列强摧毁。此外，左翼共产主义者常常设想，俄国与帝国主义的冲突会以失败开始。对布哈林来说，双方之间的根本区别在于，左翼共产主义者相信即将发生一场国际工人革命。左翼共产主义者不像列宁派那样，悲观地估量即将到来的决定性的外国革命的前景，而是认为世界工人运动当时正在急剧转向革命，因此自己提出的办法是对的。

对于列宁所谓需要数日喘息空间，以实现他所预想的那种规模和性质的防御准备工作，布哈林也予以否认——乌里茨基后来在这次讨论中又特别强调了这一点。在布哈林和乌里茨基看来，对德战争中的短暂停战不足以使俄国军事力量发生重大改善。革命如何才能改善它的生存前景呢？列宁的回答是喘息空间，并在如今为之构造了一套精致的理论。布哈林的回答是革命战争；随着德军日益深入俄国，越来越多被侵略者蹂躏和压迫的工农会揭竿而起。最开始，缺乏经验的游击队会遭遇挫折，但在这场斗争中，面对经济混乱而四分五裂的工人阶级会在反对军国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神圣战争的口号下团结起来。工人和农民会学会使用武器，会建立起一支军队，并最终取胜。⁸⁶²在布哈林看来，俄国革命和国际革命的命运有赖于这一策略的施行。

七大上就布列斯特和约的激烈争论持续 12 小时，并延续了 2 天多。除列宁和布哈林之外，还有 17 名代表就这一问题发言——10 人支持，7 人反对。对批准和约的记名投票结果为，30 票赞成，12 票反对，4 票弃权。⁸⁶³这一结果是压垮梁赞诺夫的最后一根稻草，在他看来，列宁支持布列斯特和约的决议背叛了国际无产阶级，而这种背叛违背他最深切的革命原则。他现在公开宣布退党。⁸⁶⁴针对列宁因“不战不和”策略而大肆抨击托洛茨基，克列斯京斯基提出了一份赞扬该策略

⁸⁶¹ 《第七次特别代表大会》，第 7-24 页。

⁸⁶² 《第七次特别代表大会》，第 24-40 页。

⁸⁶³ 《第七次特别代表大会》，第 127-128 页。

⁸⁶⁴ 《第七次特别代表大会》，第 128 页。

的决议。正如他所正确指出的，托洛茨基的立场曾得到党内绝大部分领导人的支持。但克列斯京斯基的决议未能通过。这种公然的羞辱刺伤了托洛茨基，他情有可原地总结称，党自觉处境极为困难，而他正成为如此处境的替罪羊，并且否决克列斯京斯基的决议意味着对他的不信任。由此，他辞去所有政府职务。⁸⁶⁵

季诺维也夫试图安抚托洛茨基。关于布列斯特问题，提出并表决了诸多决议，其中一些在列宁看来掩藏着这样的企图，即重新让党员有可能在苏维埃代表大会上支持革命战争。对此，他自然加以反对。最后，季诺维也夫提出了一项提案，赞扬苏维埃代表团在布列斯特的整体策略，但隐晦地批判其未能接受德方作为最后通牒提出的条件。这一提案得票最多。⁸⁶⁶

在 3 月 8 日代表大会的最后一次会议上，代表们接受了列宁的如下论说：党的正式名称“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⁸⁶⁷已经过时，应改为“俄国共产党（布）”，简称“俄共（布）”。⁸⁶⁸托洛茨基是如何被说服撤回他的辞呈，尚不清楚。在代表大会闭幕时，选举了中央委员会。只有托洛茨基和列宁获得了最多的 34 票，39 名有投票权代表中有 5 人弃权。⁸⁶⁹或许，这一巨大的支持帮助抚平了对托洛茨基失败的布列斯特策略的批判留下的伤痕。即便如此，甚至当布尔什维克七大代表结束他们的审议时，一些中央政府机构就已迁至莫斯科，并且立即将人民委员会、中执委以及布尔什维克和左翼社革党中央委员会迁至莫斯科的秘密计划也进展到接近尾声的阶段。

* * *

2 月 26 日，人民委员会决定逃离彼得格勒，下令立即疏散国家造币厂，并转移国库中储存的黄金。⁸⁷⁰那些关键的政府人民委员会部和外国使馆如今匆匆准备逃离。被认为重要性等而次之的中央部门，例如卢那察尔斯基的教育人民委员部，则将尽可能长久地留在彼得格勒。戴维·弗朗西斯⁸⁷¹领导的美国使馆被疏散至彼得格勒以东 350 英里外、坐落于直通北部阿尔汉格尔斯港铁路线上的沃洛格达镇。英法两国使馆的工作人员试图经芬兰离开俄国，但只有英国使馆成功了。法国大使约瑟夫·努朗斯⁸⁷²和他的同事很快抵达沃洛格达，跟美国人和其他更小的盟国代表

⁸⁶⁵ 《第七次特别代表大会》，第 129 页。

⁸⁶⁶ 《第七次特别代表大会》，第 137 页。

⁸⁶⁷ 原文为“Russian Social Democratic Party (Bolshevik)”，系误。——译者注

⁸⁶⁸ 《第七次特别代表大会》，第 176-177 页。

⁸⁶⁹ 《第七次特别代表大会》，第 170 页。

⁸⁷⁰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19 号全宗，1 号目录，70 号案卷，第 1 张。

⁸⁷¹ 戴维·罗兰·弗朗西斯 (David Rowland Francis, 1850-1927)，早年从商，1885 年作为民主党人当选圣路易斯市市长，1888 年当选密苏里州州长，1896 年被任命为美国内政部长。1916 年被任命为美国驻俄大使。——译者注

⁸⁷² 约瑟夫·努朗斯 (Joseph Noulens, 1864-1944)，1903 年当选法国众议员议员，1913 年担任战争部长，1914 年担任财政部长。1917 年被任命为法国驻俄大使，十月革命后支持白卫分子，参与了破坏苏维埃政权的阴谋活动。此后一直持反苏立场。——译者注

团汇合。⁸⁷³所有这些发展，再加上商界预计德军将扼杀革命，使得低迷的彼得格勒股市股价飙升。⁸⁷⁴

2月末，季诺维也夫带领一个高级代表团来到莫斯科，开始准备中央政府的安置工作。⁸⁷⁵为了给新来的人腾出办公室和生活空间，下令从莫斯科立即疏散非必要机构和市民。即便在季诺维也夫于3月4日返回彼得格勒之前，一些政府机构已经坐上了开往新首都的火车。尽管这种程度的行动无法保密，并且非苏维埃报刊确实进行了详细准确的报道，但在3月1日，中执委主席团宣布，所有关于人民委员会和中执委逃离彼得格勒的谣言，完全都是虚假的；人民委员会和中执委都留在了彼得格勒，并准备最有力地保卫首都；疏散问题只会在彼得格勒的安全面临最可怕直接的威胁的最后时刻才会提出，而现在还没到那种时候。⁸⁷⁶这样的否认又持续了一周。⁸⁷⁷

幕后，当地布尔什维克担心政府逃离会对彼得格勒工厂工人产生消极影响。这一关切在3月6日的彼得堡委员会会议上得到了体现。⁸⁷⁸费尼格施泰因报告称，疏散已经开始，并且不恰当地让政府机关首先撤出。群众恐怕陷于群龙无首的境地，从而极大地加剧了反革命成功的危险。

此时，已得悉德方接受了苏维埃政府的投降，斯坦尼斯拉夫·科肖尔据此相信，当时正在实施的疏散计划将被修订。但即便他也对“疏散的惊慌失措”表示抗议。舍拉温不像费尼格施泰因和科肖尔那样是左翼共产主义者，却也一样忧心忡忡。他提议，疏散应遵循如下原则：(1) 优先疏散有价值的工厂设备，而非政府机构；(2) 各苏维埃不能疏散，因为这会使彼得格勒失去经济管理的负责机构，而且匆忙疏散政府机构并不明智；(3) 党的疏散必须逐步准备；(4) 如有必要，应当优先疏散中执委和布尔什维克彼得堡委员会。会议通过了这些原则，并附上如下规定：任何疏散都要先让相关人员做好准备，并且不能惊慌失措地突然进行。它们被提交给中央委员会，但未对疏散产生实际影响，尽管此时，德国人即将攻击彼得格勒的威胁已经减小了。

3月7日，连前一天还坚称没有政府官员“已或正计划去往他处”的《红色公报》都突然承认，政府机构正在转移。这样做的理由则是，在如此接近敌人的情况下，不可能重建政治和经济机构，并管理俄罗斯国家；作为补偿，据悉将宣布

⁸⁷³ 关于沃洛格达作为俄国的外交首都，见亚·贝科夫（Александр Владимирович Быков），列·帕诺夫（Леонид Сергеевич Панов），《俄国的外交首都》（Дипломатическая столица России），沃洛格达，

⁸⁷⁴ 《消息报》，1918年2月27日，第2版。

⁸⁷⁵ 《我们的时代报》（Наше время，莫斯科），1918年3月7日，第3版；《红色公报》，1918年3月6日，第4版。

⁸⁷⁶ 《劳动旗帜报》，1918年3月1日，第3版。

⁸⁷⁷ 迟至3月6日，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团还下令，传播有关政府逃离的不实谣言的个人应当逮捕（圣彼得堡中央国家档案馆，9618号全宗，1号目录，240号案卷，第80张）。亦见圣彼得堡中央国家档案馆，47号全宗，1号目录，42号案卷，第49张。

⁸⁷⁸ 中央国家历史-政治文献档案馆，1号全宗，2号目录，3号案卷，第1-5张。

彼得格勒为自由市，而这一地位确保了无限的经济利益。据《新公报》称，连一些产业家都在期待彼得格勒成为“第二个纽约”。⁸⁷⁹次日，即3月8日（周五），《红色公报》报道称，司法人民委员部当日正向莫斯科转移，并将于次日（周一）在莫斯科重新办公。值得注意的是，契卡试图利用施泰因贝格专注于转移工作，来处决一些政治犯。在动身前往莫斯科的2小时前，施泰因贝格得悉这一企图，于是连忙命令自己的副手亚历山大·施赖德尔去制止枪决。⁸⁸⁰

人民委员会最初疏散政府的决定明确规定，应当只将最少量的中央行政部门官员及其家属，以及关键的文件和设备（这没明说）迁往莫斯科。⁸⁸¹实际上，大部分人民委员部都乘机逃离德国人，并将从首脑到办事员在内的大量官员及其家属，以及大批家具和设备（实际上“下到厨房水池”）迁往了莫斯科。这样大规模的迁移给已不堪重负的俄国火车和铁路（更不用说莫斯科的住房）带来了沉重负担。这违背了人民委员会所宣布的内容，即疏散是暂时的，且必须得到全俄苏维埃第四次代表大会的批准。运往莫斯科的物品清单便是例证。海军总参谋部的清单有1806项，其中包括文件、地图、办公设备和家具、画像（位于大部分办公室清单的首位）、窗帘、地毯、镜子、烟灰缸、炉子、厨具、盘子、扁平餐具、茶炊、餐厅家具、毛毯和各式其他装备。50余间房间被搬空了。⁸⁸²为了运走自己的大量藏书和其他私人财物，邦奇-布鲁耶维奇挪用了两节原本用于转移党务文献至莫斯科的车皮。⁸⁸³在其领导层于3月8日决定疏散整个委员会及其工作人员后，契卡也清空了自己的办公室，“不留一人”。⁸⁸⁴契卡在用船将自己的全部彼得格勒案件文件运往莫斯科的时候，将数百名自己的囚犯困在了豌豆街2号和十字监狱⁸⁸⁵，因为没有文件说明他们被捕的原因。⁸⁸⁶所有这些不仅严重地增加了中央政府疏散工作的难度，使之拖到了晚春，而且对于留驻彼得格勒的各苏维埃当局已然面临的种种可怕问题来讲，可谓雪上加霜。难怪到3月末，彼得格勒的布尔什维克领导层致信党中央，对中央政府留给这座城市的摊子表示抗议。尤其使之愤怒的是契卡的所作所为：“带走了文件[和]侦查员，但留下了犯人。”⁸⁸⁷

⁸⁷⁹ 《新公报》，1918年3月21日，第4版。

⁸⁸⁰ 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6148号全宗，1号目录，2号案卷。刊于《革命的道路（文章、材料、回忆）》（Пути революции [статьи, материалы,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柏林，1923年，第357页。

⁸⁸¹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19号全宗，1号目录，70号案卷，第1张。

⁸⁸² 海军中央档案馆（ЦА ВМФ/Центральный архив военно-морского флота），p-342号全宗，1号目录，116号案卷，第34-56张及第56张背面。

⁸⁸³ 《1918年3月-12月间叶·德·斯塔索娃与克·季·诺夫戈罗采娃（斯维尔德洛娃）通信摘编》（Из переписки Е. Д. Стасовой и К. Т. Новгородцевой [Свердловой] март - декабрь 1918 г.），载《历史问题》（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1956年第10期，第91-92页。

⁸⁸⁴ 阿·利·利特温（Алтер Львович Литвин），《左翼社革党与契卡：文献集》（Левые эсеры и ВЧК：Сборник документов），喀山，1996年，第51-52页。

⁸⁸⁵ 豌豆街2号是契卡总部。十字监狱（Кресты）南邻涅瓦河，接近芬兰火车站，因狱内两栋十字形大楼而得名。——译者注

⁸⁸⁶ 《新生活报》，1918年3月14日，第1版。契卡是在3月9日中午逃离彼得格勒的。

⁸⁸⁷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446号全宗，1号目录，1号案卷，第2张及其背面。

3月10/11日夜，最高政府机构——人民委员会和中执委——以及布尔什维克和左翼社革党中央委员会，在夜色的掩盖下逃离彼得格勒。行程计划是由弗拉基米尔·邦奇-布鲁耶维奇精心制定的。根据绝密指示，政府和党的官员，及其家属和私人包裹，将经由连接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的尼古拉铁路⁸⁸⁸一条人迹罕至的支线，迅速启程前往莫斯科。此次旅程集中了至少三列由拉脱维亚步枪兵护卫的火车。列宁、克鲁普斯卡娅、列宁的妹妹玛丽亚·伊里尼奇娜⁸⁸⁹、人民委员会其他成员及其家属乘坐第一列火车，其后距离几分钟车程的两列火车则搭载中执委和执政党的中央委员会。

在车队抵达彼得格勒东南75英里的小站小维舍拉之前，一切都进展顺利。在那里，一列不期而遇的货运火车截停了车队。车上运载的是桀骜不驯且武装起来的波罗的海舰队水兵。水兵们在数小时内被制服了，政府得以继续顺利前行。在苏维埃时期的俄国，小维舍拉事件被不屑一顾地描述为，私自蜂拥回家、碰巧出现的无政府主义水兵的作品。⁸⁹⁰在当时的俄国铁路线上，经常可以见到，四处劫掠的士兵和水兵成群结队地游荡。所以那样的说法或许是对的。车队于3月11/12日夜安全抵达莫斯科。但不能排除水兵一心阻止政府疏散的可能性。

喀琅施塔得水兵集团特别热忱且持久地支持革命战争。正是由于他们的独立和激进主义，1918年最初几个月里，左翼社革党（和更小的激进社革党团体，社革党最高纲领派）在喀琅施塔得苏维埃获得了巨大的影响。3月2日《喀琅施塔得苏维埃消息报》醒目地刊出了一封信，它集中反映了此时喀琅施塔得的群众情绪。⁸⁹¹“我们推翻俄国沙皇制和资产阶级，就是为了向德国压迫者不战而降？”这封信的作者问道，然后回答道：“不，一千个不！……逃离红色彼得格勒的可耻懦夫！”正是在人民舆论和彼得格勒大部分苏维埃的看法转而支持批准和约后，喀琅施塔得苏维埃继续呼吁拒斥人民委员会的和平政策，并重启对德战争。结果，喀琅施塔得的左翼社革党人亚历山大·布鲁什维特⁸⁹²在4月的左翼社革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评论道：“在布尔什维克的圈子里，喀琅施塔得已经变得可疑了；他们[布尔

⁸⁸⁸尼古拉铁路是连接莫斯科与圣彼得堡的铁路线，得名于沙皇尼古拉一世。1923年更名为十月铁路。——译者注

⁸⁸⁹玛丽亚·伊里尼奇娜·乌里扬诺娃（Мария Ильинична Ульянова，1878-1937），列宁最小的妹妹，1898年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在工人当中从事宣传工作，多次被捕流放。1900年起，先后从事《火星报》和《真理报》的编辑工作。1925年起，从事纪检工作。1937年因心脏病去世。——译者注

⁸⁹⁰例如，见弗·德·邦奇-布鲁耶维奇，《苏维埃政府从彼得格勒迁至莫斯科（据个人回忆）》（Переезд Советского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а из Петрограда в Москву [по личным воспоминаниям]），莫斯科，1926年，第16-18页；和雅科夫列夫（В. Яковлев），《小维舍拉事件（1918年人民委员会迁往莫斯科的途程）》（Мало-Вишерский эпизод [Переезд Совнаркома в Москву в 1918 г.]），载《红色编年史》，1934年第1期（总第58期），第94-102页。

⁸⁹¹《喀琅施塔得苏维埃消息报》（Известия Кронштадтского совета），1918年3月2日，第3版。

⁸⁹²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布鲁什维特（Александр Михайлович Брушвит，1892-1918），生于小职员家庭，波罗的海舰队“民意党人”号练习舰水兵。左翼社革党人，反对《布列斯特和约》。1918年在拉脱维亚参与反德游击战时，被俘牺牲。——译者注

什维克]绝不会将其夸耀为革命的荣光和骄傲。”⁸⁹³

* * *

在中央政府主要机构抵达三天后的3月15日夜，全俄苏维埃第四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在大会的主要议程当中，代表们面临着一个既成事实，即批准布列斯特和约以及首都由彼得格勒迁至莫斯科。根据资格委员会的官方数据，在与会的1172名有表决权的代表当中，有814人是布尔什维克（其中大部分承诺支持批准上述措施），238人是左翼社革党人，另有114人属于更小的党派或无所属。⁸⁹⁴主要由于缺乏严格的代表选举规程、通讯不畅以及交通困难，来自个别苏维埃的代表看上去立场变化不定。可是，至少就“列宁派”、左翼共产主义者和左翼社革党代表的比例而言，大会的组成似乎并没有被动手脚。尽管施泰因贝格在会前公开保证将审查所有代表是否为“死灵魂”，但仅有14名有表决权的布尔什维克代表资格存疑。⁸⁹⁵无论大会期间或之后，左翼社革党人和左翼共产主义者都没有质疑大会的合法性。

人民委员会和中执委曾就战和问题向全国各苏维埃发出问卷。以列表形式公布的问卷结果显得比大会代表更支持革命战争；可是，这些数据很大程度上并不能反映3月月中的情绪，因为其中相当一部分数据在时间上要早于，3月3日苏维埃俄国和德国初步签署和约，以及此后各地区和地方选举苏维埃四大代表的集会。⁸⁹⁶在这些集会上，对于布尔什维克党团票数最有影响的是，全俄布尔什维克第七次党代会对批准和约的强烈支持，以及前线持续惨败的消息。

在3月13-14日最初几次党团会议上，布尔什维克的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代表压倒性地支持批准和约；在这次会议上，列宁提出了批准和约问题，各省党组织提交了它们的报告，随后决定由列宁在代表大会上阐述党对于该问题的立场。再次失败的左翼共产主义者后来单独开会，来决定他们的策略。⁸⁹⁷会上同意，将在一份提交给代表大会的正式宣言中，概述左翼共产主义者对布列斯特和约的反对立场，以及他们未来的策略。但为了遵守党纪，左翼共产主义者不会参加代表大会有关批准和约问题的讨论，并就该问题投弃权票。

同时也在开会的代表大会左翼社革党党团听取了其地方苏维埃代表的报告，这些代表大多反对和约。卡姆科夫和施泰因贝格强烈呼吁，继续反对批准和

⁸⁹³ 《左翼社会革命党：文献与材料》，第261页。

⁸⁹⁴ 《工人、士兵、农民和哥萨克代表苏维埃第四次（非常）代表大会速记记录》（Стенографический отчет 4-го чрезвычайного съезда советов рабочих, солдатских, крестьянских и казачьих депутатов），莫斯科，1920年，第83页。

⁸⁹⁵ 《工人、士兵、农民和哥萨克代表苏维埃第四次（非常）代表大会速记记录》，第82页。对于施泰因贝格的保证，见《新晚间报》，1918年3月14日，第1版。

⁸⁹⁶ 见例如，奥兹诺比申（Д. В. Ознобишин），《列宁就地方苏维埃要求人民委员会达成布列斯特和约的回复汇编》（Ленинский свод ответов местных советов на запрос СНК о заключении Брестского мира），载《苏维埃社会史史料学》（Источниковедение истории совет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第2期，莫斯科，1968年，第189-243页。

⁸⁹⁷ 《社会民主党人报》，1918年3月15日，第2版。

约，而党团在经过长时间讨论后，通过了这一立场。此时左翼社革党中的所集中论争的，与其说在于是否反对批准和约，不如说在于左翼社革党中央委员会的如下决定：如果布列斯特和约得到批准，那么该党在人民委员会中的代表将辞职，以便党能够自由地领导持续不断的反对德帝国主义的“起义”。

由于以上种种，全俄苏维埃第四次代表大会的会程不出所料是在走过场。3月15日第一次会议的大部分时间，都被列宁用来发表其冗长的讲话。在讲话中，他大略地阐述了对于批准和约的支持立场。由于已经战胜了那些反对批准和约的人，所以列宁没有无谓地攻击左翼共产主义者，以期尽快恢复一定程度的党内团结。其讲话的一个主题在于，随着德军于2月月中展开攻势，帝国主义以及金融资本对于俄国革命的屠戮已经开始，而俄国革命无力抵抗这一屠戮，革命的进一步发展有赖于欧洲无产阶级一次成功的起义。⁸⁹⁸

由于左翼共产主义者保持沉默，反对批准和约的讲话主要由卡姆科夫和施泰因贝格发表。卡姆科夫嘲笑了所谓代表大会正被要求批准和约的想法，指出在前俄罗斯帝国的领土内（例如乌克兰），德军攻势遭遇了激烈抵抗。在他看来，苏维埃俄国仍在与德国交战；无论是否批准和约，德国都将继续对俄国提出苛刻的要求，从而批准和约最终将不可避免地彻底扼杀俄国革命，并使劳动阶级完全失去去年的一切成果。

列宁在他的讲话中，并未阐述“喘息空间”的看法，而后者正是其在党的七大及此间著述当中支持和约的核心论点。但这没有阻止卡姆科夫提及这一点。在他看来，以为按德方条件缔结的“和约”有任何战略价值的看法，一定是荒唐可笑的。例如，按照德方条件，是不可能建立一支军队的。卡姆科夫强调指出，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批准和约都于事无补。但他并没有夸大俄军成功防御的前景，而是更加强调游击战的功效，以及即将到来的、决定性的国外社会主义革命前来解救革命俄国（除非它们被俄国屈服于德帝国主义所破坏）的可能性，而非传统军事战斗。通过批准布列斯特和约，苏维埃俄国不仅将损害自己，还会严重背叛外国革命无产阶级。列宁所提出的屈膝投降，必然造成一个被战胜了的、被压制了的、低三下四的和被践踏的俄国革命，而非斗争着的、或许垂死但不可战胜的革命俄国。这将抑制国际人民起义。⁸⁹⁹

最后卡姆科夫概述了，倘若对德和约得到批准，左翼社革党将采取的策略：他们将全力确保和约不能得到实现；并且俄国工农在哪里继续打击德国人，他们的力量就转移到哪里去；他们还相信，国际革命运动最终会来解救自己。⁹⁰⁰施泰因贝格也对列宁嗤之以鼻，坚称德国人的抱负使苏维埃俄国只能选择战斗，并作为榜样鼓舞世界革命起义。如果批准了和约，他警告称，那么左翼社革党将退出人民委员会，之后左翼社革党领导的最优秀的劳动阶级分子将与布尔什维克党内的

⁸⁹⁸ 《工人、士兵、农民和哥萨克代表苏维埃第四次（非常）代表大会速记记录》，第18-22页。

⁸⁹⁹ 《工人、士兵、农民和哥萨克代表苏维埃第四次（非常）代表大会速记记录》，第23-31页。

⁹⁰⁰ 《工人、士兵、农民和哥萨克代表苏维埃第四次（非常）代表大会速记记录》，第48-51页。

健康力量携手战斗。⁹⁰¹施泰因贝格的这一评论是代表大会上左翼社革党人仅有的一次表示希望与左翼共产主义者合作共事。

在列宁、卡姆科夫、施泰因贝格和季诺维也夫发言的间隙，苏维埃代表大会还听取了马尔托夫代表孟什维克、米哈伊尔·利哈奇代表右翼和中翼社革党、亚历山大·格⁹⁰²代表无政府主义共产党、格里戈里·里夫金⁹⁰³代表社革党最高纲领派以及瓦列里安·普列特尼奥夫⁹⁰⁴代表统一社民党国际派的发言。他们全都激烈反对批准和约，提出的决议也都基于这一立场。这些决议除了无政府主义共产党和社革党最高纲领派提出的之外，都呼吁通过重新召集立宪会议来把布尔什维克赶下台，并在普选权的基础上选举一届新政府，或者彻底改组现行苏维埃体制。代表大会的表决结果却如一开始所显而易见的那样，是压倒性地支持批准和约。这一结果记录在案之后，斯维尔德洛夫才允许左翼共产主义者表明他们继续反对布列斯特和约。代表大会的最后一天（3月16日），在一份显然是准备在表决前发表的正式声明中，左翼共产主义者宣称，不应批准和约，而应代之以呼吁展开社会主义革命的神圣保卫战。这份由58名有表决权的左翼共产主义者代表和9名中执委左翼共产主义者委员联署的宣言，在最后解释称，尽管联署者感到有责任公开自己的看法，但布尔什维克党的[正式]分裂将危害革命事业，因此在宣读了自己的宣言之后，他们将就批准和约问题投弃权票。总之，左翼共产主义者不支持批准和约，但也避免党的公开分裂。他们表明，自己将继续反对单独媾和，并致力于动员革命俄国进行防卫。⁹⁰⁵

在决定批准和约之后，代表大会转向审议迁都莫斯科这一类似的例行公事。对于该问题，负责阐述布尔什维克立场的是仍任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的季诺维也夫。据他说，迁都是由这一事实所决定的，即彼得格勒处于极端危急的状况（此时，右边的一位代表叫道：“什么，你是说你的手提箱不够？”）。季诺维也夫承认，

⁹⁰¹《工人、士兵、农民和哥萨克代表苏维埃第四次（非常）代表大会速记记录》，第40-43页。

⁹⁰²亚历山大·尤利耶维奇·格（Александр Юльевич Ге，1879-1919），原姓“戈尔贝格”（Гольберг/Golberg），生于柯尼斯堡。1905年革命期间，成为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者，并当选彼得堡工人代表苏维埃代表。1905年末被捕下狱，后流亡国外。流亡期间，参与了俄国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者的理论和组织工作。十月革命后，返回俄国，并当选全俄苏维埃中执委委员。反对布列斯特和约和革命恐怖政策。1918年5月起，在高加索地区领导契卡工作。1919年，在与白卫军的战斗中受伤被俘，后被白卫军杀害。——译者注

⁹⁰³格里戈里·阿布拉莫维奇·里夫金（Григорий Абрамович Ривкин，1877-1922），生于牙医家庭，1896年赴法国接受高等教育，专业为化学。1902年回国后参加社会革命党。1905年革命期间，参与领导了莫斯科和喀琅施塔得的武装起义，并主持炸药的生产工作。起义失败后，被捕入狱，后逃亡国外。期间，参加了社革党最高纲领派的理论建构活动。二月革命后，返回俄国，担任喀琅施塔得苏维埃社革党最高纲领派党团主席，并当选全俄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代表。科尔尼洛夫叛乱期间，参与平复叛乱。十月革命后，参与打击反革命的工作。1922年因伤寒逝世于基辅。——译者注

⁹⁰⁴瓦列里安·费奥多罗维奇·普列特尼奥夫（Валериан Фёдорович Плетнёв，1886-1942），生于工人家庭，曾为木工，化名“波塔佩奇”（Потапыч）。1904年参加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为孟什维克，多次被捕流放。一战期间，持国际派立场。十月革命后，从事经济和军事工作。1920年起，主要从事文学艺术工作，参与领导了无产阶级文化协会（Пролеткульт）。——译者注

⁹⁰⁵《工人、士兵、农民和哥萨克代表苏维埃第四次（非常）代表大会速记记录》，第64-65页。

迁都不会迁延“数周或数月”，并坚称，所耗时间相对来讲是不多的。他提交的决议得到了几乎一致同意。决议规定，在彼得格勒的军事形势发生变化之前，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苏维埃共和国的首都将从彼得格勒“临时”迁往莫斯科。⁹⁰⁶

* * *

左翼共产主义者和左翼社革党兑现了他们的威胁：布列斯特和约一俟得到批准，便退出人民委员会。全俄苏维埃第四次代表大会闭幕 2 天后的 3 月 18 日，在人民委员会第一次于莫斯科召开的会议上，讨论的主要事项便是由左翼社革党人和左翼共产主义者亚历山德拉·柯伦泰、弗拉基米尔·斯米尔诺夫、瓦列里安·奥博连斯基（奥辛斯基）和帕维尔·德边科辞职造成的“阁员危机”。在匆匆草就的短笺（notes）中，实际上所有离任的左翼社革党人都将该党中央委员会的决定作为其辞职的理由。⁹⁰⁷

可以理解的是，布尔什维克-左翼社革党关系在中央层面接踵而至的变动速度令观察家们的头脑乱作一团。在 1 月的全俄苏维埃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列宁带着对于布尔什维克-左翼社革党联盟的热忱而笑逐颜开，宣称这一联盟不是在逐日而是在逐小时地加强，在人民委员会中，大部分问题都是一致通过的。⁹⁰⁸过了两个多月，他在全俄苏维埃第四次代表大会之后，则将两党的同盟作为“没有欢乐的爱情，分离也不会有什么烦忧”⁹⁰⁹而予以摒弃。

退出人民委员会后，左翼共产主义者和左翼社革党人都积极参加更低层级的和地方的苏维埃机构，并继续他们反对布列斯特和约的斗争。左翼社革党人也加强了其在波罗的海地区和乌克兰的游击战。此外，他们还开始实施一项针对德国高级官员的恐怖主义计划。⁹¹⁰

与此同时，列宁派和左翼共产主义者之间已在彼得格勒展开了争夺政治领导权的斗争。3 月 9 日，布尔什维克彼得堡委员会投票决定，于 3 月 20 日召开一次全市特别党代会，即彼得格勒布尔什维克第五次特别代表大会。这次大会表面上的目的在于，评估地方党组织的基层党员对于前一日全俄布尔什维克第七次代表大会支持批准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的态度。⁹¹¹彼得堡委员会据信在彼得格勒的第七次党代会和莫斯科的全俄苏维埃第四次代表大会的短暂间隙期，即 3 月 12 日的一次会议上，首次讨论了党的苏维埃党团所通过的敌对的决议。对于党团攻击

⁹⁰⁶ 《工人、士兵、农民和哥萨克代表苏维埃第四次（非常）代表大会速记记录》，第 70-73 页。

⁹⁰⁷ 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19 号全宗，1 号目录，77 号案卷，第 9-14 张。这批辞职的左翼共产主义者人民委员会当中，只有国家救济人民委员亚历山德拉·柯伦泰以文字详尽阐述了自己辞职的原因。她解释称，自己所以只有辞职这一选项，既由于她对革命战争的支持，也由于她相信，批准与“奥-德帝国主义分子”达成的谅解，会削弱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攻势，并动摇俄国的苏维埃政权（俄罗斯国家社会-政治史档案馆，19 号全宗，1 号目录，79 号案卷，第 10 张）。

⁹⁰⁸ 《全俄苏维埃第三代表大会》，第 23 页。

⁹⁰⁹ 《晚间公报》（Вечерние ведомости），1918 年 3 月 18 日，第 4 版。（这处列宁的话是在引用莱蒙托夫写作于 1841 年的诗歌《密约》[Договор]。这里采用的是余振对该诗的译文。——译者注）

⁹¹⁰ 见下文，第 11 章。

⁹¹¹ 彼得堡委员会就这次大会及其目的的通告，见《共产党人》，1918 年 3 月 10 日，第 1 版。

《共产党人》及其史无前例地要求选举新一届彼得堡委员会，委员会的反应非同寻常地克制，这无疑部分由于它自己失掉了信心。委员会只是重申它计划召开一次全市特别党代会，以审议所有的争议问题，并直截了当地提醒苏维埃党团，它的左翼共产主义者纲领已于 3 月 1 日得到复会的彼得格勒布尔什维克第七次代表会议的通过。⁹¹²

3 月 14 日，《共产党人》刊出了一份大意如上述的公告。⁹¹³彼得堡委员会中的左翼共产主义者多数派无疑希望，通过反思和讨论，并在《共产党人》的帮助下，“各区”布尔什维克会无视第七次党代会投票支持布列斯特和约，以及全俄苏维埃第四次代表大会正式批准和约。简言之，他们寄希望于彼得格勒党组织的基层布尔什维克能够忠于左翼共产主义者遵循的革命原则，并在全市代表会议代表选举中据此投票。但事情的发展并不如意。在 3 月 20 日彼得格勒布尔什维克第五次特别全市代表会议讨论和平与战争问题时，来自彼得堡委员会、代表左翼共产主义者的拉狄克将布列斯特和约斥为社会主义革命的严重挫折，并呼吁停止向德国让步。代表支持批准和约一方的季诺维也夫则连篇累牍地批判左翼共产主义者，坚称《共产党人》应当休刊，并要求同处党组织中的左翼共产主义者协调配合。这次冲突的结果是完全逆转了 3 月 1 日的表决。由拉狄克提出的反布列斯特决议获得了 7 票，而季诺维也夫支持批准和约的决议获得了 57 票。⁹¹⁴

* * *

2 月 18 日德国重启军事行动之后，彼得格勒的苏维埃当局立刻开始疯狂支持本地防务。但他们遇到了如下阻碍：卫戍部队的士气极为低落；工厂工人人心不定，他们幻灭于十月革命的经济结果，又饱受人员流失之害，还因德军进攻的突然性而陷于惶惑。无论彼得格勒各区苏维埃（许多最老练的布尔什维克基层领导人纷纷集中于此）的尽心竭力，还是全国最卓越的布尔什维克和左翼社革党人的呼吁，都不能给红军带来数量可观的新兵。此外，国内反革命团体尽管受到安全部门的严厉镇压，但其颠覆活动还是日甚一日，这进一步加剧了彼得格勒的苏维埃政权目下的危机。由于德军于 2 月 24 日占领普斯科夫，尤其是在游击队和左翼社革党战斗队补充人员被并入红军新兵后，征兵情况稍有改善。但随着俄军前线惨败的严重性广为人知，随着工人认为对德作战就是死路一条，这一略微的改善也化为乌有了。

此间，领导着布尔什维克彼得格勒党组织的左翼共产主义者仍然激烈反对布列斯特和约，坚决支持革命战争。这在他们对于 3 月 1 日布尔什维克彼得格勒第四次全市代表会议复会的立场，以及 3 月 5 日出版《共产党人》创刊号上得到了体

⁹¹² 中央国家历史-政治文献档案馆，4000 号全宗，7 号目录，814 号案卷，第 82-83 张。

⁹¹³ 《共产党人》，1918 年 3 月 14 日，第 2 版。

⁹¹⁴ 中央国家历史-政治文献档案馆，1 号全宗，1 号目录，69 号案卷，第 2 张背面及第 3-8 张；莫·卢里耶（Моисей Львович Лурье），《关于反对彼得格勒布尔什维克组织中“左翼”共产主义者的斗争史》（Из истории борьбы с «левыми» коммунистами в Петроградской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большевиков），《红色编年史》，1934 年第 2 期（总第 59 期），第 105-111 页。

现。但很快，彼得格勒的左翼共产主义者被迫承认，人民对他们的支持是微弱的。此外，由于彼得堡委员会的独立立场，彼得格勒苏维埃中的列宁派党团起来反对它，中央委员会决定改组它。3月20日召开了布尔什维克彼得格勒全市第五次特别代表会议。这次会议标志着独立的左翼共产主义者运动在彼得格勒的终结。会上，季诺维也夫领导的列宁派击溃了拉狄克领导的左翼共产主义者。

与此同时，在彼得格勒召开了与会者寥寥的全俄布尔什维克第七次代表大会。在大会批准了布列斯特和约之后，苏维埃政府逃往莫斯科。尽管全俄苏维埃第四次代表大会也批准了和约，但对和约及其消极影响的争议仍然激烈。在中央层面，左翼共产主义者和左翼社革党人都退出了人民委员会，并且他们当中许多人自行其是。此外，如果说在中央政府迁移后，彼得格勒对列宁的首要意义在于，那些能免于德国人染指而为异地使用的人力和工业资源，那么留驻的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当然不会这样想。对他们来说，“红色彼得格勒”仍然拥有作为迫近的世界革命的据点和模范的骄傲。最重要的是，他们面对着这样可怕的任务：在一个更加敌对和复杂的环境中，领导彼得格勒的苏维埃政权生存下去。

